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西哈努克在北京居住期间于 1972 年春前后向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口授，经贝却敌整理的回忆录。西哈努克为此亲自作序。现在译出，作为一段历史资料，供读者参考。

1979 年 2 月

目 录

前言——W. G. 贝却敌	1
序——诺罗敦·西哈努克	5
第一章 莫斯科——北京	7
第二章 策划背叛	24
第三章 通往3月18日的道路	39
第四章 抵抗的开始	53
第五章 马尼拉插曲	71
第六章 美元援助要付什么代价?	89
第七章 “达琼阴谋”	102
第八章 幸存的奇迹	113
第九章 极其痛苦的决定	125
第十章 彻底决裂	138
第十一章 独立乃是最重要的问题	151
第十二章 从放弃王位到被废黜	168
第十三章 柬埔寨在战斗中所起的作用	182
第十四章 新生	200
第十五章 北京——后方根据地	219
第十六章 我要控诉	235
第十七章 春季攻势	253
第十八章 未来	275

DB 42 94

后 记	290
主要人物一览表	299
大事年表	304

前 言

十六年来，柬埔寨一直生活在 1970 年 4 月 30 日发生的事件的阴影下。那一天，美国的坦克闯进了她的边界，美国的轰炸机开始系统地把柬埔寨的城镇和村庄化为一片瓦砾和灰烬。在本书里，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记述了从他在五十年代中期初次同杜勒斯兄弟（他们分别领导着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关系重大的会见开始，直到 1970 年 3 月 18 日政变的背景。

这一记录的描述是很典型的：它全面描述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经济大国如何运用各种手段迫使一个小国偏离它自己所选择的政策，设法搞掉该政策的缔造者和主要执行者。在西哈努克同杜勒斯兄弟最初几次的会见中，就有人坚决奉劝他抛弃他的中立主义思想。在伴有军事威胁的外交、政治和经济压力都失败了之后，接着就进入了一个企图搞阴谋和暗杀的时期。当这一切又失败了，最后就用大量金钱收买最上层的一个叛国集团，发动军事政变，并通过美国和它的西贡走狗的武装干涉来使篡权者得以继续掌权。这样才把这件事办成了。通过 1970 年 3 月的朗诺政变，美国居然成功地把它在拉丁美洲常用的那套办法输出到印度支那了。

对我们这些从签订 1954 年日内瓦关于印度支那停火协定起就一直在注视着这场不平等透顶的斗争的人们来说，看

来这出逐渐展开的戏是有其不可避免的发展顺序和结局的。人们对这出戏的剧情太熟悉了。当诺罗敦·西哈努克看起来由于被暗杀分子的子弹或大量收买去的叛卖行径弄得非后退或倒台不可时，柬埔寨的朋友和西哈努克和平中立政策的支持者们往往都怀着痛苦的关切心情，担心得要命。但是那些最了解他的人却深信他是永远不会后退的。

那些狂热支持美国东南亚政策的人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为了实现这些政策就非依靠军事独裁政权这种标准格局不可。这一点对南越、柬埔寨和泰国都同样适用。必须完全服从美国的路线，在政治上有丝毫的偏离都会是不可容忍的。只有当这些政策的推行受到武力的抗击时，美国才会让一点步。比如说，柬埔寨 1970 年的政变就同邻近的泰国在 1971 年 11 月 17 日发生的政变十分相似。只凭传闻泰国在向中国和北越送秋波，以及科曼外长在考虑中立主义的好处等理由，就足以搞起一场把他依·吉滴卡宗元帅树为军事独裁者的政变。就象朗诺在柬埔寨篡夺了政权后的所做所为一样，他依的第一批行动就是解散政府、议会的两院和废除宪法。同在柬埔寨一样，美国在泰国的空军不久就被用来支持新政权。

华盛顿在 1970 年 4 月 30 日事件公开暴露以前就对柬埔寨进行地下战争了。诺罗敦·西哈努克对这些肮脏透顶的勾当不仅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还提供了详尽的文件证据。第三世界一定会怀着特殊的兴趣来研究这本书的，因为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都在不同的场合下受到阴谋圈套和压力的胁迫，而这些胁迫又都是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其他机构作为搞垮这些

国家的序幕而施加的。

本书的材料是由诺罗敦·西哈努克用法语口述，由我写成英文，根据我们都同意的篇名来划分章节，然后由西哈努克亲王加以订正。由于他用的不是他本国的语言，而且又被译成第三国的文字，这就意味着：本书要是直接译自诺罗敦·西哈努克的柬埔寨语的话，一定会更加辛辣尖刻、更加生动活泼。写本书的工作主要是在1971年12月下旬到1972年1月在国家元首的北京住宅里进行的。接着我又在1972年3月同他在上海和北京举行了进一步的工作会见后基本写成，并且随着柬埔寨国内形势的发展又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

当我一走进西哈努克亲王的总部，从人员的角度就显然可以看到政变的一个侧面。头一个接待我并同我安排工作时间表的是掌管西哈努克的礼宾事务的西索瓦·梅达维亲王——他是同朗诺一起发动政变的施里玛达的兄弟。1972年1月，出席元首官邸欢迎两位柬埔寨乒乓球运动员——他们是在南朝鲜参加比赛后返国途中，从朗诺的保安人员手里逃脱出来的——归来的人群中就有一个是郑兴的妹妹，而郑兴是在政变后不久取代西哈努克任国家元首的。

郑兴的妹妹自己就是一名乒乓球运动员，现在她在北京学习医科。她的两个兄弟也在北京学习工科。看来甚至那些首要的阴谋家们在他们自己的家里也只是少数派。至于说他们在柬埔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叙述是很有说服力的。

作者把本书当作重新赢得他的祖国的独立斗争中的武器之一，同时也把它作为对其他国家——它们已被选定为日后

的牺牲品——的警告。

W. G. 贝却敌

1972年6月30日于巴黎

序

报道导致 1970 年 3 月 18 日旨在废黜我作为柬埔寨王国国家元首的政变诸事件的书籍、材料为数着实不少。其中有的持同情态度，有的则不甚友好，有的比较客观，有的则倾向性很强。有些书的作者，利用曾为我工作过因而知道的一些机密，自称掌握“内幕情况”——其实往往都是些不关重要或无关大局的东西——为的是要确立自己作为这方面的专家的名声。这些人编造了一些荒诞的情节，无非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的叛卖行径。

另外一些在政变后到柬埔寨去的人倒是真心实意想要重新恢复事物的原来面目。不过，他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观察事物，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事物，试图把问题讲清楚，而他们对这些问题是既无了解又缺乏作出精确评价所必需有的客观态度。

许多西方作家写的文章和书籍都有一个共同点：总是在贩卖“西方最高明”的论点。亚洲人对于那种认为高加索文化高人一等的看法是很敏感的，因为我们遭受殖民主义侮辱的时间太长了，不可能有另一种想法。

有些来自远方的报道，用心倒挺善良，但却缺乏事实根据并且对我们的历史也不了解，因而显得逊色。由于全世界对我们柬埔寨人民扮演了自己并不想演的角色的剧情都颇感兴趣，这类报道能否被接受为真正的史实是成问题的。

几乎所有这些书籍和文章都没有涉及到最重要的关键问题——为维护和平和独立而斗争；我国的主权和中立——而相形之下，一切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要衡量我过去三十年领导柬埔寨的功过，只能从这个角度出发，不能以那些有关国内政治的胡言乱语为根据，而这正是许多作家所爱依靠的东西。对于柬埔寨事务方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人太多了，而有些人则根本不想见到森林。尽管他们走遍了许多国家，尽管他们在学术界很有名气，但事实却证明，许多观察家竟不如我们农民中水平最低的人那样明事理。农民在搞清独立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差异以及在分清和平与战争方面的觉悟，很快就被美国炸弹给提高了。

我之所以要在这本书里把我在柬埔寨舞台上（我在其中经常扮演主角）所经历的触目惊心的事实写出来，为的就是要澄清史实。可惜我由于缺少文件档案而遇到了一些困难。当我1970年1月离开我们和平的绿洲去法国疗养时，我身边只带了为了进行疗养所必需的最少量的行李。显然行李里并未带有历史性的文件。

但是，手头的证据仍然足以证明美国坚决地不断地要干涉我国的内部事务，特别是中央情报局在一系列阴谋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而1970年3月18日的军事政变就是这些阴谋活动的高潮。

我决定把这一切经过口授给一小批作家中的一位——他们对我们民族的尊严、我国人民的愿望以及我个人在捍卫这些愿望中所起的作用，一贯显示了同情、了解和尊敬。

诺罗敦·西哈努克

1972年6月于北京

第一章 莫斯科——北京

“亲王殿下，您今天不应该动身。今天既是星期五又是13号。”在到机场搭乘从巴黎飞往莫斯科的飞机的路上，我的一名助手半开玩笑地说了这些话。时间是1970年3月13日早晨。我并不迷信，于是笑了一笑并照样搭乘该班机飞往会见俄国领导人了。五天以后，当时我还留在莫斯科，我被废黜了——而到现在为止，苏联政府还没有承认在我被废黜之后不到两个月就在北京成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结果，既是星期五又是13号的那一天毕竟是个不吉利的日子。

在莫斯科机场，波德戈尔内主席迎接了我。由于我的访问是政治性的访问，不是国事访问，所以就没有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

在欢迎仪式之后，波德戈尔内主席对我说，已经准备好一架飞机，等着把我直接送回金边。

他说，“如果您愿意，可以在莫斯科休息一夜，然后就在第二天早上飞往金边。西哈努克亲王，我们信任您。您确实是贵国人民不可缺少的领袖。但重要的是，您得直接飞回柬埔寨去掌管国家事务，不要让它落入朗诺和施里玛达手中。您必须采取措施，不让柬埔寨逐渐陷入被美国人接管的局面。您必须阻止朗诺和施里玛达给正在为自己祖国的解放而进行英勇斗争的南越人民制造各种困难。”

我回答说，我必须十分慎重地考虑这些问题。我有很多需要考虑的事情。3月8日那天，在柴桢省发生了反对越南人的示威，我得到的报告表明，这些示威者的幕后操纵者是当时担任首相的朗诺。3月11日，一群从外表看来象是青年学生和学龄儿童的暴徒袭击了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大使馆。几小时之后，接着又袭击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河内）的大使馆。我接到的报告又再次表明，这是陆军——具体来说是朗诺——干的事。在这两次事件中，袭击者的核心都是由朗诺的弟弟朗农上校指挥的五十来个穿便衣的军人所组成。这远远不是欧洲报纸和美国电视台所天真地报道的“自发的示威”。事先准备好了用英文写的标语，而英文在我国的公众示威活动中是很少使用的。摄影师和人群都得到了做好准备的预先通知。这一切都表明，这场戏是事先早就筹划好了的。

我一听到袭击使馆的消息就打电报给我的母亲哥沙曼王后陛下，谴责这一暴行是“那些把他们个人利益和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之上的人们的行为”。我对右派发动政变的可能性提出了警告，并说我将回国反对那些应对这事负责的人。但是我又指出，如果人们选择追随他们“走一条把柬埔寨变为第二个老挝的道路，我将不得不辞职”。

3月10日，我在巴黎的法国电视广播中说，金边的右派分子利用我长期不在金边的机会，*企图改变柬埔寨的政治方向。他们希望我们参加美国阵营。我指出右派和中央情报局早已有联系，并且再次提出有政变危险的警告，认为“一切取决于陆军的态度”。

* 当时我在法国南部的格拉斯疗养。

当时我只考虑到副首相施里玛达和他的右派集团的情况。我仍然完全信任朗诺，并以为他会使用陆军对付任何颠覆的企图。我知道施里玛达从1969年6月柬美复交时起就和美国大使馆过从甚密。我在巴黎答电视记者问时就曾预言，如果我失败了，那前景将会是十分不妙的。

我给王后陛下的电报招来了更多的示威行动和对越南侨民，包括对他们的教堂的残暴的袭击。这同我们的佛教文化和宽容的传统是背道而驰的。我自己的消息提供者送来了很多报告，也都反复指出暴行的带头者是穿便衣的军人。我开始考虑到朗诺是否有可能已经转而反对我了。我不愿意信以为真，因为我同他在一起度过了大半辈子，而且我一直把他当成是我的左右手。他的效忠宣言——现在我回想起来，他的这种宣言未免太多了——总是比我的其他大臣的宣言更为显著。我想起就在没几个星期前，他在法国还重申了他对我的忠诚。

示威和捣毁使馆的正式借口是，边境地区出现了越共和越盟军队。没有人能比朗诺知道得更清楚，即使民族解放阵线的部队偶而进入边境地区，他们也并没有对我们造成任何损害。如果说他们享有“庇护所”，这些“庇护所”也都是在东北部人口稀少的森林里。在“鸚鵡嘴”地区——不能提供任何掩护的平坦的稻田——一个这样的“庇护所”也没有。无论怎么说，民族解放阵线的目标是西贡，而不是金边。他们是在为解放祖国而战斗，而不是为了要侵略我们。多少年来，正象摩洛哥人和突尼斯人在阿尔及利亚的抵抗斗争中对阿尔及利亚抵抗战士出现于他们境内不闻不问一样，我们对民族解放阵线

出现于我国境内所采取的官方态度，也是假装没有看见。越南抗敌战士出入東境并没有干扰边境人民的生活。如果他们需要什么东西，而我们的人民有这样东西并且愿意出售的话，那他们就出钱买。他们回避我们的妇女。当朗诺把西贡军队引进来时，我们的人民对另一种类型的越南人可算是领教了。

我们边境地区的农民所遭受的苦难来自于美国的炸弹和炮弹，而不是来自于偶然出现的越共。在经常遭到轰炸而且炸得最惨的地区却从未有过任何越共的足迹。在柴桢省和其他边境地区被炸以后，发现的尸体都是柬埔寨农民的尸体，其中包括很多妇女和儿童。这一点在国际监督委员会进行调查以后已为好几十个报告所证实。

无论如何，如果美国人以他们能调动的一百多万军队，其中包括五十多万他们自己的军队，都未能从他们那边封锁住边界，要我们以总数只有三万人的军队守卫我们所有的全部边界，其中包括经常遭到威胁的柬泰边界，又怎么能期望我们从我们这一边对边界进行封锁呢？朗诺一向同意我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如果他现在以越共的出现为借口来改变我们的政策，并且公然对抗我，那肯定是发生了什么更为严重的名堂了。

我是在考虑了这些问题以后才告诉波德戈尔内主席说，我将按照我对莫斯科访问的原定日程行事，然后按原计划继续前往北京。不管怎样，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观察金边的事态发展。后来，有人说我错过了我的机会，假如我当时立即飞回金边的话，我是可以控制得住局面的。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说法是否对。

报纸上报道说，我到莫斯科去是为了要求苏联协助把越共逐出柬埔寨。情况并非如此。我到莫斯科去主要是为了请求他们援助我们，加强我们的军事地位。我想通过谈判签订一项军援协定。美国—西贡军队不断从东面侵犯柬埔寨，而中央情报局支持的自由高棉叛徒集团也不断从他们在泰国的基地出发，从西面入侵柬埔寨。每天都发生侵犯柬埔寨领空的事件。这些才是真正的威胁，而柬埔寨人民也是这样看待它们的。自从我 1963 年拒绝接受美国军事援助以来，我们的美国军事装备一直没有更新，因此什么都缺乏，特别是运输工具。陆军的军官们为此感到焦虑，除非赶紧想办法，军官们要求恢复美国军事援助的危险是确实存在的。我甚至建议苏联派一个象美国军援和顾问组*那样的小型军援代表团到金边来估计我们的需要，并训练我们的武装部队使用苏联武器。

经过了几天的会谈，俄国人同意提供我们所需的一切。但是为时已晚矣。

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前，柯西金总理在克里姆林宫为我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午宴。他让我坐在他的对面。在喝咖啡的时候，我们谈到了柬埔寨的局势：

他说，“您必须防止朗诺和施里玛达从背后捅民族解放阵线一刀。如果他们竟敢这样干，我们永远也不会饶恕他们。对我们的越南同志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历史时刻。他们在为祖国的解放而进行斗争。搞掉朗诺和施里玛达，您已经证明您是反帝的。您给了民族解放阵线以宝贵的支持。您已经

* 美国军援和顾问组(MAAG)在美国开始卷入越南时，在西贡起着和这类似的作用。

发挥了光辉的作用，我们将来也指望着您。”我答应我永远支持民族解放阵线 and 他们的独立斗争，决不动摇。

这时，我收到周恩来总理的一封电报，对金边的事件表示关注。3月17日，我和柯西金总理举行会谈以后，立即给母后发出了如下的电报：

社会主义阵营认为，最近的事件是对它和美国之间力量对比的一个直接威胁。周恩来总理已经要求我们的大使转告我，中国对此表示关注。就目前而言，中国对威胁其驻金边大使馆的挑衅还保持冷静态度。

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告诉我们，他们认为我们的右派的现行政策对我国的前途是极其危险的。俄国人已经答应向我提供各种援助来恢复柬埔寨的秩序和中立，但是，我在对他们表示感谢的同时，也告诉了他们，作为一个柬埔寨人，我保留根据我自己的良心以及根据我自己认为是我国和我的人民的中期和长期利益而行使的权利。

对我来说，柯西金总理有一段话是意味特别深长的。他的原话是，“您的越南盟友是不会健忘的。正如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您在他们斗争非常艰苦时给予他们的支持一样，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也不会忘记您们的极右派在他们反对美帝的斗争的更加艰苦、更加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对他们的恶毒打击。如果右派继续对我们的盟友进行这种打击，这就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柬埔寨和越南之间的战争。”我希望我们那些正在为虎作伥的领导人会仔细思考一下苏联人的这些话。

母后召集了朗诺和施里玛达一起开会，要求他们停止反越暴动。他们提出派遣一个代表团同我谈判的建议。母后陛下代表我正当地拒绝了这一建议。没有什么需要谈判的。这是一个不再违犯我们宪法规定的政策的问题，正是这项政策使得我们的边界免遭战火之祸。母后对使馆的被捣毁表示了强烈的愤怒，并命令朗诺和施里玛达写信道歉、赔偿损失。

我发出电报以后，又继续同苏联领导人会谈。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这时第一次出现。这次会谈再次集中讨论金边的局势以及这一局势可能对越南的斗争发生什么影响。我收到了被人们认为是效忠于我的一些军官被捕的消息，并听到了有人企图逮捕朗诺和施里玛达的谣言。这证实了我对柬埔寨会发生严重危机的忧虑。

我在18日下午离莫斯科动身去北京。在乘汽车去机场途中，柯西金总理转身面对我说，“你们的国民议会举行了一次剥夺您的权力的表决。这是什么意思？”这时我们已快到达机场了。我后来才知道，我的一些随员已在无线电广播中听到了这个消息，但当时还没有勇气告诉我。

我回答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我已被废黜了。”

他问我，“您打算怎么办呢？”

我回答说，“我当然要进行反击。”

柯西金总理接着就说：“您可以绝对信任苏联对您的斗争的支持。我们将永远支持您，而且支持到底。您将会看到中国人对这采取什么态度。当您在金边掌权时他们是帮您的，但是您现在不再掌权了，您将会看到他们会怎么办。”

我向他表示感谢，并说，“我将继续前往北京，取得我的老朋友周恩来对我的支持。然后我将返回莫斯科。”

柯西金回答说，“不管您怎么干，您都可以指望我们支持您。”

我告诉前来为我送行的柬埔寨人士说我刚被废黜，但是鉴于莫斯科和北京不会承认新政权，我将考虑成立一个政府来组织抵抗运动。

波德戈尔内主席把他的专机供我使用，那是一架十分舒适、宽敞的飞机，完全可以在飞机上进行工作。

我几乎不需要描绘我自己在这些最初时刻的感情：我的最糟的忧虑竟得到了证实：朗诺变成了一名叛徒。施里玛达干出这种事倒不是什么太大的意外。他从童年时代起就仇恨我，因为他认为应该由他的叔父西索瓦·莫尼勒亲王而不应由我来继承王位。他甚至还有一种认为他自己应被选择来继承王位的想法。我听说过，他在东京以及后来在马尼拉当大使时，就同中央情报局有联系。可是朗诺会同施里玛达结成联盟使我感到震惊。关于朗诺的背叛，以后还有更加严重地令人感到震惊的事。该怎么办呢？

飞机一起飞，我们和宾努以及我的其他随员就一起开会，并且一致决定我们要呼吁我们的人民开展抵抗斗争。

我的妻子莫尼克——她在我们开会时曾对我们家庭的其他成员做了安慰他们的工作——对我说，“你做了那么多工作，你已经把你的一生贡献给你的国家，而现在他们却废黜了你。或许我们退休到法国去住会更好一些。”

我说，“不。”“这绝对不是我们可以隐退的时刻。如果我

们听任柬埔寨不仅变成一个军事独裁的国家，而且还将再次沦为殖民地，那历史将会谴责我们。我整个一生都在梦想着我国的独立，并为独立进行了战斗。我从法国人手里赢得了独立并不是为了想在现在又加以放弃。我们的君主政体现在决不能袖手旁观。美帝国主义肯定要在印度支那被打败，而我们必须参加这一斗争。越南人、我们的红色高棉* 以及我们，将在一起打败美国人。巴特寮也将在老挝取得胜利。和人民站在一起是君主政体的责任。”

莫尼克立即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在一张工作桌旁坐下来，莫尼克坐在我身旁，宾努坐在我对面。当我们的飞机在西伯利亚荒野的一万公尺上空飞行时，我开始起草号召进行抵抗的宣言和告人民书。和戴高乐将军点燃了法国抗击纳粹入侵的抵抗运动的著名的6月18日“告人民书”一样，这个文件后来成为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我想在那次飞行中我们谁都没有阖眼入睡。我们这些人中，有些是情绪激动得没法休息，而莫尼克、宾努亲王和我自己则忙于起草宣言，一会儿都没休息。事实上这个文件到了23日才广播出去，因为在我对它进行最后润色之前，我们必须研究柬埔寨国内事态的发展。不过，当我们的飞机在北京机场着陆时，这个文件的主要部分已经写成了。

当我在北京走下飞机后，周恩来热烈地拥抱了我。他对我很了解，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一定会进行斗争，而且他也根据这个设想采取了行动。他把整个外交使团的成员都召集来，

* 红色高棉是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人士的笼统名称，他们曾一度反对过王国政府，但是现在是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抵抗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列队等待我的到达。他说，“您仍然是国家元首。”“您是唯一的国家元首，我们决不承认别人。”*他说他将通过官方的新华社和中国的报纸，发表前来欢迎我的每一个大使和代办的名字，借以强调我仍被承认为柬埔寨国家元首。这时已接近19日的中午了，我被废黜的消息传出来已经一整天了。在场的外交官中，有的仍然以为我或许还能扭转局势，后来当我做不到这一点时就摒弃我了。但是那天早上，除了一、两个例外，他们都到了机场——总共有四十一个国家的代表。

接着在汽车里又进行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谈话。当我们的汽车驶出机场后，周恩来开头的几句话就是：“昨天我和毛主席讨论了局势。我只有一个问题：您准备进行战斗吗？”

我回答说，“我准备进行战斗，而且战斗到底。”

周总理宣布说，“那么我们就全力支持您。”他接着要求我再考虑二十四个小时，并警告我说，“在获得必然的最后胜利之前，这条道路将会是漫长而艰苦的，而且您在途中还会遇到挫折。”

我回答说，“我知道我的想法也就是所有高棉爱国人士的想法。他们将同我站在一起、并肩作战，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第二天，我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这个决定。

西方报纸报道说，中国在决定支持我以前犹豫了好几天——要是根据朗诺的荒谬说法，甚至是犹豫了好几个星期。可是在我作出最后决定之后不到二十四小时，我已通过北京电台发表了我的头两个声明。试问，如果中国人还没有决定支

* 本书中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同西哈努克的谈话，都是按英文译出的，未经核对。——译者

持我，我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我的头两个声明是3月20日和21日发表的，而《告人民书》是3月23日宣读的。

在我到达北京的第二天，范文同总理从河内来到北京。他非常热情地欢迎我，并且很高兴地说，“我们从此是战友了。我们对您参加到我们反美帝斗争的阵营里来感到骄傲。”西方报纸还报道过什么我同范文同有过“谈判”以及周恩来又进行了“调解”等等，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我们之间素来是团结的。现在我们的团结又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而且由于局势的发展而得到了加强。

我在北京最早的官方行动之一就是接见苏联代办。我提到了我同柯西金总理的谈话，并说我现在已经得到了中国支持我的保证，欢迎苏联根据柯西金对我所作的非正式保证的大意发表一项公开声明。苏联代办给我的答复是，由于我现在在中国境内，让中国人首先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比较好。苏联将会接着这样做。（为了报答他们在中国之前向我提出了非正式的保证，我原来以为让他们首先宣布他们的正式支持，实际上是给予苏联一个他们理应享受的政治好处。可是这番谈话竟会毫无下文。）

和范文同谈话的头几句话大致是这样的：

“我们能够帮点什么忙？”

我回答说，“军事教员。我们不缺人力，而且中国人已经答应提供武器。我们缺乏有训练的干部。打我们将要打的那种战争，你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有训练的干部。”

范文同总理回答说，“我会告诉武元甲派几千名最优秀的干部给你们。”我们详细讨论了协调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斗争的

最好方式，召开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想法就是在这次讨论中萌芽的。*

后来，我同毛主席在他登上天安门参加庆祝(1970年)五一节之前谈了几小时的话。他很详细地问我朗诺的情况，他在头一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二十周年的节日活动中会见过朗诺，但朗诺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印象。毛主席对柬埔寨发生的一切以及我在柬埔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都很关心。

他说，“我宁可同象您这样的爱国的亲王握手，而不愿同象某些所谓‘人民的儿子’那样的国家元首握手。您起了颇为光辉的作用。您可以当一个共产党员了。”这是毛主席能够表达的最高敬意了。他接着说，“您必须告诉我们您需要什么。只要我们有，我们就给您。我们给您的任何东西，同您通过您领导柬埔寨人民的斗争所给予我们的东西是没法相比的。

在我3月里到达北京的头几天里，周恩来总理和范文同总理向我明确保证，柬埔寨在赢得胜利以后将会是“独立、自主、中立的，并且没有任何越南驻军”。

周恩来说，“中国是中国，柬埔寨是柬埔寨。”“中国将仍然是共产主义的中国，柬埔寨应该保持它的中立”。

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尊重我的思想和行动的独立性，尊重我的君主主义、民族主义、佛教和我的尊严。他们为我提供

* 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是在我的倡议下，于1970年4月24—25日在中国同越南边境的一个地区召开的。它的主要目的是协调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敌斗争。

慷慨的财政援助，而且出于尊重我的感情，他们很微妙地把这种援助叫做“贷款”，可以在胜利后三十年偿还。

法国大使带来了他的政府给我的信息，大意是：如果我隐退到法国，他们将为我提供一座别墅、一辆小汽车和一名司机。我对他表示了谢意，并且说，“中国政府刚为我提供了这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头一部分。第二部分则是对我的事业的支持。因此，我必须接受他们为我提供的包含两部分内容的建议而拒绝你们的建议。”

在他离去以后，我突然想起了我在法国里维埃拉海滨格拉斯治病时发生的一件事。涅·刁龙将军* 请我去吃午饭。当我们步行去饭馆时，一路上看见人们正在喝开胃酒。我听见有人在议论，“瞧，刚走过去的不就是保大**嘛。瞧他养得多胖、多壮。他过的是大老爷的日子，可这笔花费却是你和我付的。”（他们认错了人，但这对我是个警告。如果我接受了法国人的建议，人们也会以这种态度对我的。）当我在北京散步的时候，人们认出我是谁之后就会说，“您为我们国家，为亚洲和世界立了大功。您帮助越南的抗战英雄们。现在柬埔寨人民参加了这个斗争，而您是他们的领导人。”这话比在法国里维埃拉被有钱的休假者把我说成是既胖又壮的保大令我感到舒服多了。

在北京来看我的外交官中有柬埔寨驻北京的大使瓦朗丹***。我请他为我的秘书处送些办公设备（一架文件复制机

* 涅·刁龙将军曾多次担任过柬埔寨国防大臣、武装部队总司令。

** 保大是法国人和日本人统治时期的前越南“皇帝”。1955年被吴庭艳废黜后，隐居到法国里维埃拉。

*** 瓦朗丹后来被朗诺派往澳大利亚任大使。

和几架打字机)来。他照办了,但没过几天他又派人来把这些东西给取走了,同时告诉我说,他接到了朗诺一封很重要的长电报。

这份电报实际上是要我停止一切活动,停止发表公开声明,否则……。我立即召集在北京的柬埔寨人士,当着大使的面宣读了电文。

瓦朗丹问我,“您怎么答复朗诺呢?”

我把电报撕碎,扔在地上,又踩了它几脚,说,“就这样。”“把这作为答复,发给他吧。”他捡起被撕碎的电报就退出去了。(他后来没收了两箱外交礼品。我作为国家元首在进行正式访问时通常都把这类礼品分送给人们。)

从4月5日到7日,周恩来总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他和金日成元帅的讲话以及两国的联合公报都对(在我发出“告人民书”以后成立的)高棉民族统一阵线和作为国家元首的我表示了最有力的支持。我再次会见了苏联代办,向他指出中国的支持现在已经成为公开的和正式的了,并且告诉他说,我希望他的政府也发表一个类似的声明。

他回答我说,“但是支持〔柬埔寨〕的声明并不是在中国的领土上发表的。”

我立即反驳说,“如果柯西金总理在波兰或捷克的领土上发表类似的声明,我也不会反对。”

一个月以后,我们在北京成立了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把国防、内政和新闻这三个重要的部设在自由的柬埔寨境内。这个政府立即被二十多个国家所承认,但是没有被苏联承认,而且除了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这几个明显的

例外之外，也没有被任何一个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承认。

由于我们的政府的一部分设在中国境内，因此很多人批评我太依赖中国了。但是事实上我们政府有很大一部分在柬埔寨境内扎了很深的根。我原来的想法是对北京进行一次短期访问，取得中国支持我们的具体条款。我很赞赏北越人在他们同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之间所保持的平衡。他们的天平秤盘里一头是中国，另一头是苏联，保持秤盘的平衡。现在我们的秤盘里一头是中国，可是另一头却是个空秤盘！（可以顺便提一句，中国并不反对苏联支持我的事业。事实上周恩来总理已经向我保证，这可以成为导致中苏关系略有改善的一个因素。）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对中国尊重我们的主权和我们的思想方法是很满意的。然而我们希望这两个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支持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会支持我们了。

柯西金总理十分强调我们要防止朗诺和施里玛达在背后捅民族解放阵线一刀。事实上我在没有外来援助的情况下已经用了我们的全力来对付朗诺—施里玛达集团，西贡部队和美国的空袭。他还能对我们有什么更多的要求呢？朗诺和施里玛达从来也没有中止过他们对民族解放阵线的出卖，可苏联却在犒赏他们，这究竟是谁在背后捅刀子呢？苏联不但在金边保留着大使馆并和卖国贼政权保持着外交关系，而且还把医疗和外科手术设备送给朗诺，去治好被我们打得丧失了战斗力的朗诺军队的创伤，让他们能重新来进攻我们。1971年10月苏联和朗诺政权签约延长一个财政协定的有效期限，而这个政权正是柯西金总理曾对我保证过他将“永远不予宽

恕”的。1972年的今天，我仍然同民族解放阵线站在一起，我们的军队在并肩作战。

我在1971年1月15日发给柯西金总理的电文中，提醒他在我们最后一次会见中对我讲的那些话。我提到了苏联政府在1970年5月24日，即政变后两个月，对朗诺政权发出的警告，其大意是：柬埔寨应该回到“和平和中立”的道路上来，不要走上“同侵略的势力联合，把自己变成对邻国人民进行战争的基地”的道路上去。我在电文中指出，朗诺政权正在干同苏联政府所劝告的方向完全相反的事情。我还指出，“朗诺政权并没有象阁下在克里姆林宫同我最后一次谈话中所说的那样，并没有放弃从背后对正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越南人民捅刀子的行为。”

在同一电文中，我还进一步呼吁柯西金总理“同违反宪法、反民族、反人民、反共的法西斯亲帝国主义的共和国完全断绝外交关系……并且正式承认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我还进一步要求，如果苏联“目前仍不可能”承认我们的政府，那么苏联政府至少应该在“那个愉快的日子到来之前”对美国施加压力，要求它停止它和西贡政权的武装干涉，并且“尽快向柬埔寨人民的武装力量提供军事和其他援助”。可是什么结果也没有。

我们对古巴外交部长劳尔·罗亚所树立的榜样倒是很欣赏。政变后不久，柬埔寨大使要求见他，并且象朋友一样受到了他的欢迎。

外交部长问这位大使，“你是不是将站在西哈努克亲王的一边进行战斗？”

“不。他被赶下台了，而且人人都支持朗诺。”

罗亚说，“滚出我的办公室！”“别再玷污了我的椅子。我限你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哈瓦那。你不但背叛了西哈努克，而且也替你们柬埔寨人民丢尽了脸。不——我不同你握手，而且我还因为在你进来时同你握了手而感到遗憾。”

在平壤的苏联官员告诉北朝鲜外交部说，北朝鲜从金边撤回他们的外交官是错误的。

苏联官员说，“你一旦撤回，就很难再回去了。”

有人把这情况汇报给金日成首相。首相的回答是：

“留在朗诺统治下的柬埔寨，不如离开没有西哈努克的柬埔寨。”

大家——特别是我自己——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这场政变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同这政变有关的主要因素又是哪些？对这个问题的完整的、准确的解答，不但对柬埔寨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对于那些敢于在内外敌人——不管来自何方——面前保卫自己国家的独立和民族尊严的领导人来说，也会是对未来的一个警告。

第二章 策划背叛

1969年9月初，我乘飞机去河内参加已故的胡志明主席——越南独立斗争的受人尊敬的倡导者和领袖——的葬礼。我非常钦佩胡“伯伯”。由于他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权利，不仅支持过去的殖民地人民，而且也支持美国的黑人，他不仅属于越南，而且属于印度支那、亚洲，甚至全世界。对我——一个亚洲人——来说，他首先是一个亚洲同胞。

他曾经给我写过一封很亲切的短信。我非常希望会见他，尤其是近几年里，我曾经要求让我到河内去会见他。可是〔美国人〕开始轰炸以后，我的越南朋友们说〔到河内去〕太危险了。

我争辩说，“这正是我表示同您们站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答复说，“但是您是国家元首，而且是我们的好朋友”。“由于空袭的缘故，在贵国人民面前，我们不敢承担要您冒生命危险的责任。”结果我们一直没有会见过。

飞机起飞时，我想到我的第一次访问竟会是去追悼我的朋友，这是多么不是味，多么令人伤心啊！我后来听说我的飞机刚一起飞施里玛达就转过身来对他的朋友们——其中包括朗诺——说，现在是废黜我的最合适时机了。就在越盟和越共的军队非法占领柬埔寨领土的时刻，“卖国贼”西哈努克却飞去参加他们的头子的葬礼而且竟敢下令在金边举行正式

的仪式悼念这位头子。还会有比这更好的机会吗？施里玛达预言，如果立即废黜我，我决不敢回到柬埔寨来。然而那个时候朗诺还没有准备好要采取行动。他的妻子刚死去不久，他还在忙于按佛教的规矩办丧事呢。他想等到一个更吉利的时候发动政变。（朗诺是极其迷信的，他知道没有一个圣人会同意他中断他妻子的丧事来发动政变的。）

我后来从美国方面来的消息获悉，中央情报局已经在一个月前就拟好了建议支持这样一个政变的指令，朗诺的工作人员中的一个中央情报局联络员早就拍过胸脯说，这种政变“不久”即将发生。等到我飞往河内的时候，中央情报局已经向朗诺保证他们将给予支持，就等朗诺和施里玛达去安排细节并商定发动政变的时间了。作为这方案的一部分，如果发动政变的时候我刚好在国内，那就得把我暗杀掉。

当时发生的事情可以从 1971 年 1 月 12 日墨尔本《世纪》杂志发表的澳大利亚教授、亚洲问题专家密尔顿·奥斯本的采访谈话中得到证实。〔同这位澳大利亚教授〕举行这次谈话的是山斋源，他是一名柬埔寨血统的越南人，南越参议院的参议员。就这次谈话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此人是我的终身死敌山玉成——在日本人占领柬埔寨时期担任过傀儡首相，现在是领取中央情报局津贴的自由高棉卖国贼集团的领袖——的兄弟。文章引了山斋源的话，说他的哥哥“在多年流亡生活中一直是按照推翻西哈努克这一炽热愿望行事的”。奥斯本接着说：“据山斋源说，朗诺是在 1969 年 9 月同山玉成取得了秘密联系的……并开始对推翻西哈努克的问题进行过初步讨论。尽管采取了这一步骤，朗诺仍然还没有准备好，等到朗

诺去法国治病时，这事情就暂时搁下来了。”

舞台现在转移到巴黎郊区塞纳河畔纳依的美国医院里。在他的亡妻的葬仪结束后，朗诺突然发现他必须到法国去治疗肩部受的伤。他是在他的同僚和对手涅·刁龙将军驾驶的一辆吉普车翻车翻到一条沟里被压在车底下时受的伤。

出于一种奇怪的巧合，有几个美国“病人”也和朗诺同时住进了这家医院。这些“病人”看不出有什么受过伤的迹象，也不象有什么病。事实上他们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顾问”，制造政变的专家。我后来从柬埔寨留学生那里得到了有关这些人情况的报告，因为在巴黎的留学生圈子里很快就传出一种说法来：去访问一下“抱病”的朗诺首相并且很同情地倾听他想说的不管什么话，那是搞点“外快”的最好的办法。第一次去访问的人通常可以拿到五百法郎（约合壹百美元）。朗诺的副官康根上校总是很明确地告诉学生们，说他们日后应该对朗诺的恩惠表示感谢。

朗诺每天从这个伪装得很巧妙的大本营用电话向施里玛达和其他阴谋参与者发出指示。这是他们进一步策划的时期。新闻记者 T. D. 奥尔曼在同包括山玉成在内的一些头目们进行谈话以后，在《卫报》*上发表文章说，有的观察家认为朗诺和施里玛达不一样，说他没有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个阴谋。这当然是不正确的，而这一印象无疑是由于朗诺在（甲）举行葬仪期间，以及（乙）绝对有把握得到美国给予成功所必需的支持以前，不愿意采取行动这一事实所造成的。奥尔曼正确地报道说，“我的消息提供者一致认为朗诺一直在进行远距离

* 分别发表于 1971 年 8 月 14 日、8 月 18 日和 9 月 18 日。

操纵；我们的行动总是得到了他的批准或按他的指示办的。他从巴黎用电话指挥着政府和我们的计划；”奥尔曼的消息提供者就是这么说的。不过他的叙述把以下的内容漏掉了：“这些电话指示”直接来自一伙穿着病人睡衣的阴谋家，他们正在美国医院的朗诺—中央情报局行动总部里进行策划呢。

在1969年10月朗诺动身去巴黎以前的好几个月里，以泰国为基地的自由高棉军队中发生了大规模的“开小差逃跑”事件。我在前面提到过，这支军队是完全由中央情报局建立、拥有、武装、出钱并完全听命于中央情报局的。起先是个别人，接着是成排的以至于到最后是成连的和更大单位的部队越过边界向柬埔寨投诚。早在1969年1月，就有一支两百人以上的部队从泰国进入柬埔寨并且立即“开了小差”。同年5月，一支三百人以上的自由高棉部队从梅莱山基地前来向我们的部队投诚。总司令朗诺把这一切归功于他自己，认为这是他争取卖国贼的宣传工作的胜利。他建议应该允许他们在邻近泰国的马德望省大致以部队的形式定居下来。他甚至还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吸收到金边卫戍部队和宪兵里来。

这种集体“开小差”出现过一个很古怪的现象。我曾经从我们的全国互助工作经费中拨出一百万瑞尔*来帮助这些“开小差的人”开展他们的新生活，并鼓励别人效法他们的榜样。他们却把钱退了回来，并且宣称鉴于他们是“出于爱国的理由而逃跑”，所以不能接受这笔钱。从到达时除了武器以外一无所有的这些人们嘴里说出这种话来真是稀奇得很！后来才知道，同他们从中央情报局领到的钱相比，区区一百万瑞尔当然

* 柬币，当时的官方汇价是三十五个瑞尔折合—美元。

是微不足道的。有人报告说，虽然他们拒绝接受我的钱，可是他们却在大肆挥霍，这一点使我感到很纳闷。这些人坚守雇佣军的法则，对豢养他们的那个更为有钱的主子是忠心耿耿的。他们奉命拒绝接受我的钱，为的就是要使我对他们的爱国主义深信不疑。

还有一件怪事：在我访问河内期间，范文同总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和敏感的人，我对他越了解，越能体会到他的爱国热情和诚实——对我讲了一件我本来毫无所知的事情。中国人一直在用美元买我们的大米。然后大米就运交南越的民族解放阵线。这大米是用军用卡车运到靠近边界的交货地点，然后由民族解放阵线用小车子运走。朗诺曾经预先收下了一笔相当大的美元款子，用于购买在1969年下半年交货的大米。但是据范文同说，大米可是一点没有交过。十分急需的药品也发生了同样情况。我答应查一查这件事。这些事可完全是经营了多年的正常商业交易，我简直不能理解，问题究竟出在那里。

我们的越南朋友们对这些没有收到的货物完全有理由感到惊讶，因为早在1969年5月我们就已经把民族解放阵线驻金边的代表机构升为大使馆这一级，而这一来好象我们是在欺骗人了。1969年6月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刚一成立，我们就是最早承认它的国家之一。在这以后不久，我们又是接待新政府黄晋发总理的正式访问的头一个国家，并且同该政府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

朗诺在1969年8月担任首相的职务，并且要求赋予他全权作为要他领导政府的条件。关于大米的交货问题，我只得

到了一些躲躲闪闪的答复，而在我参加胡志明的葬礼以后回到金边后不久，朗诺就代表我国到北京去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二十周年的国庆典礼。在通常情况下我自己本来是会到中国去参加这项庆祝活动的，但是当时英国的玛格丽特公主正在访问柬埔寨。朗诺在北京访问的整个时间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并且在国庆游行时受到了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主席身边的礼遇。

当时范文同也在北京，他通过周恩来才有机会向朗诺提出了大米和药品没有交货的问题。朗诺以边境地区出现了北越和越共军队为借口，干脆拒绝提供任何交货的保证。等他回到金边的时候我已经获得了有关此事的详细报告，于是我就告诉他，如果不立即恢复交货就得把钱退回。到他动身去巴黎时为止，朗诺既未恢复交货，也未把钱退回。

这个时候，施里玛达——他被朗诺选为他的副手，朗诺一出国，他就是代理首相——已经通知各大臣和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禁止他们直接送任何文件给国家元首，而在这以前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一切文件都得先送到首相办公室，而我只能收到施里玛达认为可以给我看的東西。任何人违犯这一指令就要受到“严厉的处分”。现在回头看来，一旦朗诺和施里玛达得到中央情报局对他们计划发动政变的支持，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俨然好象政变已经成功了似的，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1969年8月组成的朗诺-施里玛达内阁代表了本国的买办、封建分子以及他们的外国支持者。内阁组成后，朗诺就宣布不再把私人工业收归国有而且还要把一些国营企业改归私

营。因此，1969年11月15日，经济部长屋金安和商业部长波隆托提出了把进出口贸易改为私营的措施，结束了国家对生产烈性酒饮料、药品和其他商品的垄断，并且允许私人银行和外国银行进行经营活动。

在12月27日到29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上，我让代表们自己去决定如何对这些倒退的措施表态，但是我对“骗子们为了腐蚀统治阶层、枯竭我们的经济和企图改变政府的性质而让外国银行渗透到柬埔寨国内”的恶果，提出了警告。我对“那些不为柬埔寨的利益服务，把大量货币转移国外，只给国家留下一笔少得可怜的钱的外国银行”的作用，提出了告诫。

我后来听说施里玛达认为这一非国有化时期或许是发动政变的有利时机。T. D. 奥尔曼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文章里写道，根据他的消息提供者的说法：

反西哈努克的那一派准备在1969年12月在金边召开国民大会时把西哈努克赶下台。这个消息提供者说，朗诺指挥下的四千名宪兵和士兵奉命包围大会会场，而西哈努克一向是把大会作为反映他的政纲的机构的。西哈努克看到他自己的力量没有敌人大，只好让大会投票支持施里玛达的政策，而没有解散他的政府并要求举行新的选举。

虽然T. D. 奥尔曼所讲的大部分都是符合事实的，但这

* 人民社会同盟的国民大会，每年开会两次，它的决定对国民议会有约束力。

一段叙述却不然。当时朗诺已在法国。这些“恶棍们”都是在朗诺的授意下渗透到金边卫戍部队里来的自由高棉人，并且由他的弟弟朗农上校指挥。朗农是一个有他自己的政治野心的法西斯分子。我的警察部队已经把这种暴力渗透者的情况报告了我。红色高棉也动员了大量他们的人来捍卫我过去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是得到大多数代表和公众的支持的。

等到了快要投票的时候，公众将会强烈反对新措施的情况已经很清楚。自由高棉分子害怕暴露自己，跟着大多数投了票，投票的结果是全体一致反对施里玛达的措施。

人们已经写了不少关于这次国民大会的文章。命运注定这次大会是最后的一次大会，因为这种民主形式的公众行动很快就受到朗诺-施里玛达政权的镇压。就是对独立以来所建立的一切民主实践进行镇压的开始。

大会结束后没几天，我住进金边的一个医院进行治疗，1月7日，我同我的妻子和不多的随行人员，包括宾努亲王，到〔法国〕格拉斯巴德医生的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我通常每两年到那里进行一次治疗。我需要彻底休息，并对一些慢性病进行治疗，而且我还这么想过：就让施里玛达和他的支持者们放手去干，让他们看看通过废除我的政策他们能把我们的经济问题解决得怎样，那对他们将会是一个有益的教训。我打算在接受治疗后到巴黎、莫斯科和北京进行政治性访问。在这些访问中我将寻求经济、财政和军事援助，回国后可以有力量作出新的努力，依靠我们自己的办法和我们的真正的朋友的帮助，对我们的经济进行整顿。我深信施里玛达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内准会让见不得人的金钱交易把他自己搞得焦

头烂额，以致于这个国家将会很高兴地回到在独立初期所制定的路线上去。

我既不知道在塞纳河畔纳伊的美国陆军医院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现在还在继续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当我在河内访问时朗诺竟背信弃义地同山玉成会见过！我的公安部长是费尔南德斯上校，此人后来在金边东南一个叫萨安的城镇把自己的名声搞得很臭，因为他利用信奉天主教的越南人和儿童来掩护他的军队进攻我们的抗敌部队。尽管费尔南德斯——据说他本人也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知道要废黜我的阴谋，可是他从来也没有向我报告过。

T. D. 奥尔曼在他的文章里说，他的消息提供者——“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仍然在金边位居高官”（或者至少在他写那些文章时是如此）——向他保证说，朗诺、施里玛达“以及最高统帅部和国民议会的重要成员早在实际发生政变以前六个月就阴谋用武力推翻西哈努克，并且在必要时把他暗杀掉”。这一点进一步证实了9月初在飞机场被人听到的那些谈话内容。

1970年2月18日，朗诺带着他在刚好一个月以后打算要做的事情的既定计划返回金边。他立即视察了边境地区的部队，激励官兵们准备和“越南世仇”进行大对抗。他的活动还不止这些。奥尔曼报导说，

撵走西哈努克的一些最后步骤是在1970年头几个月在金边开的一系列高级秘密会议中策划的。好几个这样的会议是在朗诺和施里玛达的家里召开的；为了避免

被西哈努克的秘密警察发现，其他会议是在行驶中的小汽车里举行的……据说这些会议的结果是：朗诺和施里玛达亲自下令，让教育部长巧索康负责组织安排反对越共的示威游行，先是在受到共产党人渗入的柴桢省，随后就在金边搞。

这个报导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根据巧索康的命令，事先在新闻和教育部的印刷厂里准备好了要拿到“自发的”游行示威中散发的传单和宣传画。由于施里玛达曾下令要把送给我看的文件先进行检查一遍以及弗尔南德斯的叛卖，他们很巧妙地使我同可以帮助我察觉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那种消息彻底隔绝了。3月9日，根据巧索康的指示，柴桢市和柴桢省“鸚鵡嘴”地区的五六个小城镇里进行了主要由教员和中小學生参加的小规模反对越南南方的示威游行。这些只不过是3月11日要在金边演出的“主要节目”的彩排。效忠我的学生受到他们巧妙的欺骗，还以为这些示威游行可以在即将在莫斯科和北京举行的会谈中“加强我的谈判力量”。金边的报纸对示威游行进行了详细的报导（朗诺早已接收了新闻部并且控制了报纸和电台），并把它说成是“人民爱国义愤的自然爆发”。

T. D. 奥尔曼关于接着发生的事情的说法是值得在这里引证并予以校正的。这是由于第一，它是迄今为止所发表的最接近于真实情况的报道；第二，它已经具有某种正式文件的性质。柬埔寨的忠诚朋友，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认为有必要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会议记录中登载阿尔曼的三篇文章，并且

还附了他自己极为气愤的评语*：

3月8日在柴桢市举行了学生和教员的小规模游行示威后，又下令在金边举行更大的示威游行。政府的广播车催促学生们去参加游行，政府一手创办的青年大会的工作人员布置学生们在两个共产党国家的大使馆前集合。

可是使馆实际上被捣毁——这件事和西哈努克的被推翻以及柬埔寨发给共产党的最后通牒，构成了可以引起战争的事件——是由柬埔寨统帅部布置，实际上是由穿便衣的小队宪兵在朗农指挥下进行的。

我们在这里必须指出，这些小队还不仅是宪兵，而且还是中央情报局训练出来的突击队。这些突击队队员是从南越的柬埔寨少数民族中招募来的，然后在政变前一个月被送到金边来为这些阴谋家们充当冲锋队的。奥尔曼接着说：

3月11日的示威游行只不过是撵走亲王的两部分计划中的头一个部分。我的一个消息提供者说，“我们筹划举行两次示威游行”，“一次是11日用来制造危机的，另外一次是3月16日用来制造撵走西哈努克的借口的。”

（这话听起来象是中央情报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传授给

* 《美国国会（参议院）会议记录》，1971年10月13日，S16252—4页。

朗诺的一个技巧，因为我们都知道朗诺是没有这种迅速抓住政治问题要害的能耐的。)

但是，3月16日反西哈努克的游行示威由于亲西哈努克的学生包围国民议会而失败了。那一天，当被挑出来带着反西哈努克的传单参加游行的示威者走向议会大厦时，亲西哈努克的金边警察逮捕了二十名这样的学生。有人告诉我说，由于这个缘故，“当时看来我们受到了挫折。”

那天，在国民议会内，反西哈努克的代表，包括议会的代理主席英丹*在内，正在等着示威游行出成果，满以为这下子他们可以使议会蜂拥而起把西哈努克赶下台。结果反而是，“我们开始由于我们作了反西哈努克的发言而受到攻击。议会只好在混乱中宣告休会。”

需要补充一点细节。3月16日国民议会开会的主要议程是罢免国防部长翁·马诺林和公安部长索斯丹尼·费尔南德斯上校的职务，其表面理由是贪污。实际上是要把阴谋者们担心在刚一出现“军事政变”迹象时有可能被动员起来保护我

* 奥尔曼写这些文章时，英丹还是内政部长。他后来由于未能完成朗诺“绥靖”各省的计划而被后者免职。英丹作为议会“主席”，授给了朗诺元帅六颗星。朗诺给了他“准将”的一颗星作为回报。但是1971年3月，英丹“将军”由于在西贡傀儡军队企图重新攻占湄公河岸的桔井遭到失败时未支持他们，又被朗诺摘掉了这颗星。朗诺于1971年11至12月间发动的“真腊二号”战役遭到惨败以后，英丹又被认为是美国对未来的所谓“白色希望”之一。朗诺解散现有的国民议会后，英丹又企图以“立宪”议会主席的身分东山再起。在1972年6月的总统选举丑剧中，他同朗诺竞选又遭到了事先可以预料到的失败。

的力量给消灭掉。“贪污”和所谓“越共庇护所”一样，同这问题毫无关系。由于费尔南德斯的机会主义品质是人所共知的，所以阴谋家们不愿意冒这风险。然而由于示威游行的情况发生了意外，朗诺等人在3月16日还不敢进一步轻举妄动。

同三个月以前的国民大会一样，人民的真实感情占了上风。他们支持我的力量之大吓坏了阴谋家们，更不必提那些国民议会的代表们了。（后来有两名代表企图解释为什么他们在3月18日投票赞成废黜我时，就在磅湛省活活地被人打死。当时朗诺也有一名兄弟在那里被杀。）

对于当时的代表们为什么要比我们实行议会制以来的任何一个时刻都更不代表公众舆论这一点，必需予以解释。

在本书稍后的一章里，我将详细说明为什么我认为柬埔寨不必效法西方式的民主及其多党制、“忠诚的反对派”等等。尽管这种制度在西方实行了好几百年，其结果也还不足以使我深信有必要在柬埔寨推行这种制度，因为柬埔寨没有支持这种制度的传统。我们对多党制“民主”进行短暂试验的结果至少可以说是令人失望的。我创建的人民社会同盟是各个政党的一个联合组织。为了保证左、中、右三派在国民议会中都可以得到公平的代表权，候选人事先由人民社会同盟的领导机构圈定。这个办法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平衡和稳定，而这在东南亚是很难得的，并且大大地有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

在举行产生第六届国民议会（即废黜我的那一届）的1966年9月选举之前，中央情报局出钱支持了一个在报纸上大肆反对我的所谓独裁的宣传运动。我被指责为已经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党制”，并且“扼杀了柬埔寨的民主”。在泰

国，中央情报局给山玉成的自由高棉分子提供的电台也不断地播送这种强烈的指责，就这样使我上了中央情报局的圈套。针对国内外报纸的宣传运动，我决定允许完全自由地选择候选人，而不是由上面事先圈定。其结果是一片混乱。为了争夺一个议员席位，竟会有多达二三十名的候选人。最有钱的资产阶级——他们是美国人的天然盟友——挥金如土地出钱为他们的候选人进行选举活动，而这些候选人顶多只不过是他们的傀儡而已。选民从候选人的后台老板那里得到衣服、药品、不花钱的电影票和戏票以及送给他们的孩子的玩具和糖果。选民既无法区别政治骗子和诚实的候选人，也无法辨别真理和谎言。结果在九十一个席位中，只有三名比较得人心的候选人被选上。这三个人都是“左派”的候选人，而且是以压倒多数被选上的。可是立即就有人掀起一个宣传运动，指责他们是“共产党”，于是他们只好离开金边到刚在萌芽中的抵抗根据地去——既是为了保全生命，也为了对付最糟糕的局面。（他们现在都是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重要大臣，在国内就地领导斗争。）

关于关键的 1966 年选举，参考一下法国人丹尼尔·罗伊的观点是很有意思的。此人曾在柬埔寨居住多年，并在 1970 年 4 月号的《外交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下面这段话：

1966 年，选民们发现他们自己迷失了方向，因为西哈努克——无疑地是出于避免被人指责他滥用个人权力——允许人民社会主义同盟的好几个候选人同时在一个选区里竞选。结果出现了好几个候选人在同一个旗帜下

以同样的政纲进行竞选的怪现象。这些候选人为了竞选，采取各种蛊惑人心的手段，并且大量运用了几乎与意识形态风马牛不相及的论点。他们一个赛一个地许下不可能做到的诺言，滥发花钱很多的印刷品和传单，并且到处封官许愿：官职、荣誉和金钱。在这种竞赛中，除了极少数例外，赢得胜利的是最有钱和享有封建特权的人。

这是独立以来选出来的最糟的立法机构。通过贪污和贿赂选出来的代表只不过是在等待美元开始滚滚而来的那一天的到来——象朗诺和施里玛达所许诺的那样。预计到大批美国工作人员在银行家和美援代表团打先锋之下会返回柬埔寨，人们都抢着建造一栋栋的公寓房子准备以高价出租给美国人。

难怪代表们在 1970 年 3 月 16 日那一天，面对着国民议会大厦外敌对的示威游行，心情极其矛盾：既害怕他们自己如果遵照朗诺和施里玛达的要求，迈出那无法挽回的一步，会激起人民的公愤；又担心如果现在不照办的话，那早答应要给他们的美元收益就会失掉。正象奥尔曼报道的那样，那一天在一片混乱中渡过，并没有发生阴谋家们所指望的那种决定性的打击。

第三章 通往3月18日的道路

朗诺和施里玛达决心要把他们在3月16日暴露出来的那些弱点克服掉。奥尔曼提到了3月16日晚上在施里玛达家里举行的另一次“高级会议”。他引用了阴谋家在那次会议上所说的一句话：“我们现在已经走得太远，没法再回头了。”可见在阴谋家的头脑里大概还有一些怀疑。朗诺似乎从头到尾都犹豫不决——倒不是对他自己的背信弃义感到内疚，而是担心他自己能否成功。尽管他从在法国的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们那里得到了保证，但他并没有完全信服，而且在他回国后还一直在担心出毛病。在前面提到的密尔顿·奥斯本同山玉成的兄弟的谈话中，奥斯本引用了山斋源说过的一句话：

1970年2月朗诺回来以后，他又同山玉成取得了联系，有时是亲自秘密地跑到柬埔寨和南越的边境，有时则通过中间人联系。

奥斯本接着引用了山斋源的话，说明他的哥哥担心他自己的武装部队不够强大或不够忠诚，击败不了对政变的武装抵抗：

因此，他要求山玉成答应为他提供物质援助，他的兄

弟说，山玉成立即答应了这一点。山玉成还向朗诺保证，自由高棉和在越南同美国与南越特种部队一起作战的柬埔寨血统军队将会帮助朗诺。

到了这个时候，即在废黜西哈努克的行动付诸实施之前不久，朗诺——当时施里玛达亲王只不过是一个次要人物——才决定要推翻西哈努克。

由于自由高棉和“特种部队”都是中央情报局的部队，除非中央情报局对这一切给予支持，显然山玉成是不会作出这种保证的。

3月16日会议后，朗诺同意发动政变并动用陆军逮捕被认为是效忠于我的重要公安人员。当天晚上，金边警察局局长布奥少校和忠于翁·马诺林上校的军官们一起企图用先对朗诺和施里玛达下手并逮捕他们的办法来制止政变。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而且马诺林已被软禁。朗诺手里的牌很硬，并且还可以使用自由高棉的冲锋队。

那天晚上和第二天一天，朗诺利用挑选出来的卫队，不但逮捕了马诺林上校和布奥少校，而且还逮捕了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山休养地基里隆省任省长的胡笃上校；王国陆军参谋部的彭潘伊上校；伞兵司令顾桑拉上校；和金边接壤的干丹省省长；以及大约十五名其他高级军官。陆军通讯兵的首脑在这一行动中被杀害。我在得到两个越南使馆被捣毁的初步消息后，原先计划3月18日从巴黎返回金边。到了那天上午，机场已被封锁；从机场到金边的公路都布满了铁丝网；所有的主要街口都设置了机枪阵地，街上有坦克和装甲车在巡逻。

换一句话来说，部署了足够的军队来威胁金边市民不要再举行两天前的那种示威游行，并为那些胆小如鼠的国民议会的政客们壮一点胆。

奥尔曼报道说，“只是在朗诺的军队接管了金边的文官政府和坦克包围了〔国民议会，诺罗敦·西哈努克注〕大厦以后，才举行要把西哈努克赶下台的投票。”

作为使柬埔寨走向“自由、民主和共和主义新时代”的第一步，国民议会投票决定中止行使宪法规定的各项自由六个月；议员们在盖上橡皮图章批准建立这种军事独裁以后，就开始举行要废黜我的“秘密投票”。投票的人们必须先选票上签名然后再投入投票箱内；考虑到议会大厦外面的武力示威以及头一天的大逮捕，议员们全体一致投票废黜我是丝毫不会令人感到意外的。

他们选举了郑兴来接替我的位置。郑兴是一个很有钱的地主和议会的议长，他在这以前在行政经验方面的主要资历是主管过金边的中央监狱。他是一名微不足道的傀儡，不大可能给他在国内外的主子制造任何麻烦。

当时有一件我对它并不怎么注意的小事，可是后来却表现出它的重要意义来了。有一个叫做德·波蒙伯爵的有钱的橡胶庄园主——他在南越边界附近的朱普地区拥有大量土地——一直在特别殷勤地追求我的友谊。由于我父亲临死时把他推荐给我，所以我同他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我在法国小住时，没有一次不收到他的请帖。可是1970年我在法国时，却没有收到他一点信息，于是我就采取主动同他联系。或许他是病了？但我得到的答复是，他“不在法国”。可是偏偏碰巧

我听人说他其实并没有离开法国——这件意想不到的事在当时顶多只不过令我皱皱眉头表示一下惊讶而已。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件回避我的小事。

1969年上半年宾努亲王担任首相时，为了保护我们的外汇储备，他限制了可以汇回法国的外汇利润的数额。橡胶园利润的一部分必须留在柬埔寨并且可用以重新投资于橡胶园企业。德·波蒙伯爵向施里玛达提出抗议，后者向他保证说，西哈努克不久就会被搞掉而施里玛达自己将会掌大权，到那个时候伯爵先生就可以放心地把他的全部收益汇出国外了。情况既然如此，又何必继续对注定要被人遗忘的西哈努克表示礼貌一番呢？可是在政变以后不到两个月，德·波蒙伯爵的橡胶园及其设施都被变成灰烬和一堆碎石乱瓦了——被朗诺和施里玛达的新盟友破坏了。这是因为西贡政权不能容忍柬埔寨橡胶的竞争，于是朱普就成了它的空军的最早的攻击目标之一。朗诺和施里玛达以及他们手下的阴谋家就是为了象德·波蒙伯爵那样的人的利益，破坏了柬埔寨的独立和中立的。

政变的借口——所谓存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庇护所、基地和供应线等等——都是骗人的东西。朗诺就亲自签署了许多柬埔寨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之间的协定，而民族解放阵线一直一丝不苟地遵守这些协定。朗诺知道，有一段时期当泰国对我们施加压力的时候，正是由于民族解放阵线实际上占领了我们同南越接壤的整个边境地区这一事实才使他有可能把军队调到泰国边界上去。关于“越共渗入”的突然叫嚣只不过是一个烟幕弹而已，而我也立即认识到是这么

一回事。T.D.奥尔曼在前面提到的一系列文章中也得出了这个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我的消息提供者在五、六次谈话过程中，从来没有把西哈努克同越南共产党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外交政策当作要赶他下台的理由。

其中一个消息提供者说，“说实在的，西哈努克同我们一样都是反共的。”另外一个人说，“他掌权的时间太长了。我们想夺权。我们可以搞掉他的唯一办法就是攻击越共”。

上面这些话只有部分是正确的。我并不象那些阴谋家那样“反共”。有个很具体的例子，在政变以后没有几天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朗诺立即开始同美国和西贡的部队进行合作，这种合作起先是通过交换军事情报，接着就对边境地区的民族解放阵线部队采取联合行动。多少年来美国和西贡政权一直对我施加压力，要我打民族解放阵线，而我拒绝这样做就成了金边和华盛顿之间的主要争论之所在。为了掩盖他们在南越战场上所吃的败仗，美国的司令官——特别是威斯特摩兰和克赖顿·艾布拉姆斯硬说，阻止他们赢得“彻底胜利”的唯一因素就是存在着“柬埔寨庇护所”。

我有两个理由拒绝屈从于华盛顿。第一，它将意味着放弃中立。第二，我和绝大多数柬埔寨人民都真诚地同情越南抗敌战士，他们很明显地是在同美国侵略者进行艰苦的斗争。我在河内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战线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

人会见次数越多，我就越理解他们的爱国热忱、自我牺牲精神和待人热情而且通情达理的品质。我通过为胡志明主席的逝世在柬埔寨全国志哀三天，表达了我对他们的这种钦佩。尽管这正好是朗诺对红色高棉和“越共渗入”叫嚣得最厉害的时候，我还是下令为胡志明举行了悼念活动，就象我会为我们人民自己的领袖去世而下令举行的悼念活动完全一样。在王宫的王位宝座大厅里举行了有王国最高官员参加的百名高僧的祷告仪式，金边电台还广播了特殊的纪念音乐。可以顺便提一下，我是在河内参加葬礼的唯一的国家元首。（当我在被废黜后没几天同范文同总理在北京会见时，他还很感激地提起了这事。）

我的确是不愿意让柬埔寨搞共产主义。在朗诺的影响下——他企图用让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从左边来的敌人身上的办法，来掩盖他自己同极右的阴谋勾结，等我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时，为时已晚矣——我有时候对我们的红色高棉未免太苛刻了，特别是当我以为他们的活动会危害我们的独立和中立的时候。

奥尔曼的高级消息提供者所讲的话中完全符合事实的一点是：他们企图“用攻击越共的办法来搞倒西哈努克”，正好象朗诺通过伪造红色高棉阴谋的证据来有意识地破坏国家统一和掩盖他自己的颠覆活动一样。红色高棉理解我的动机并且从未怀疑过我的爱国主义——甚至在他们由于我采取限制他们活动的措施而遭受损失的时候也从未怀疑过我——这一点从他们立即响应了我号召进行武装抵抗的呼吁得到了证明。同时他们还极力坚持，在我们打垮了阴谋家并把入侵者赶出

柬埔寨以后，要我继续担任国家元首（这一点同我自己原来的想法不一样）。

朗诺和施里玛达最担心的是，我会在政变后立即返回柬埔寨并且把人民和武装部队争取到我的一边来。即使只有一线可以回国的机会，我是会回去的。但是朗诺政府是彻头彻尾凶残无比的。比方说，他们威胁说将没收敢于把我和我的随员送回柬埔寨的任何外国飞机并把机务人员关押起来——这个威胁是违犯国际法的，而且在民航史上大概也是没有先例的。但是，如果任何一家航空公司或驾驶员想逼他们摊牌的话，他们甚至还准备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奥尔曼报道说：

由朗诺签署的军事命令指示政府军队，如果国家元首返回柬埔寨的话，就把他暗杀掉。当时的主要担心是：西哈努克一回到柬埔寨就可能把整个国家团结在他的周围，并且举行选举，“由于他在农民中那么得人心”，他将会在这次选举中赢得胜利。

在大量引用奥尔曼的报告时，迄今为止我只引证了由于参议员曼斯菲尔德的宣读而载入美国国会记录、成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除了极少数一些例外，这些报告中所包含的事实和我自己获得的情报完全吻合，而我的情报是从川流不息地由朗诺-施里玛达政权下逃跑出来的人——包括政变时在金边当过朗诺手下参谋军官的人——那里得到的。这些人中有的成功地逃了出来，经过巴黎或莫斯科到北京来投奔我；有的则在到达解放区以后寄了报告

给我。

奥尔曼在对这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以后，就象一条猎狗那样以很内行的方式紧紧地咬住它不放，而且还挖掘出来很多连我自己都没法知道的极其重要的事实，这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同他的“无懈可击的非共产党消息提供者”接近，而他的这个消息提供者不是什么别人，而是山玉成本人。奥尔曼错误地把他说成是“柬埔寨独立运动之父”。奥尔曼在泄露他的一个主要消息来源是山玉成时把他说成是“初生的高棉共和国首任总统职务的主要候选人”。我从我自己的消息提供者那里获悉这一点是符合事实的，当奥尔曼见到他的时候，他由于自己干了二十年的叛卖勾当，最后却没有得到在金边掌握最高权力的犒赏而怀恨在心。他认为政变是他自己一手搞起来的。可是等到盼望已久的时刻到来时，他却被朗诺和施里玛达甩在一边，因为这两个人暂时克服了彼此之间的分歧，形成坚实的同盟共同对付山玉成这个有潜在危险的敌人。使山玉成感到懊恼的是，他并没有以胜利者的姿态骑着白色战马（或许说他骑着一匹白象要更合适些）进入金边，而且也没有欢呼的人群来迎接他。政变后五个月，他的中央情报局主子所能尽到的最大的努力是，让他被任命为朗诺的“首席顾问”。人民从来没有上过山玉成的当，他们一向知道他是一个卖国贼。甚至在朗诺得了瘫痪病（朗诺自己说这是“天意”）以后，山玉成也没被召来接替他的位置。他决定向奥尔曼倾吐满腹的牢骚当然是由于他自己感到失意的缘故：

1969年初，美国政府通过派驻在山玉成的流亡的反

西哈努克游击队中工作的特务，作出了支持柬埔寨的反西哈努克活动（其中包括分两路入侵柬埔寨的计划）的保证。

这只不过是1959年初的“达琼阴谋”的翻版而已，关于这个阴谋，我将在本书第七章加以叙述。在这里我必须对所谓的“流亡的反西哈努克游击队”这一名称加以澄清。除了玷污了“游击队”这个光辉的字眼这一点以外（因为这个字眼带有爱国主义和抵抗外国入侵者的含义），山玉成的雇佣军通通是从南越的柬埔寨少数民族中招募来的，先在南越沿海芽庄的中央情报局突击队中心接受训练，然后用飞机送往泰国的中央情报局基地。有的则被征集到“特种部队”里，并且在中央情报局官员指挥下在南越境内活动。这些“游击队”的大多数在他们越过我们的边界袭击我国农村的那一天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柬埔寨是啥样的。

山玉成告诉奥尔曼说，原定计划是让他指挥八营美国人训练过的军队（指由中央情报局训练和提供经费并以泰国为基地的自由高棉军队，以及从南越来的KKK突击队*）分两路入侵柬埔寨。这一进攻计划在1969年初就已制定好了，看来他和朗诺-施里玛达的密谋是没有联系的。山玉成希望，一旦他的部队越过边界，柬埔寨军队就会群起而投靠他。“这个

* Khmers du Kampucheu Krom，有时候被人们称为 Khmer Krom。这个组织的“主席”和直接的军事指挥官是一个杀人不眨眼而且好吃人肉的匪徒，曾在金边美国大使馆当过司机的人。他曾对西方新闻记者——例如法国巴黎《世界报》的让·克劳德·玻蒙迪——吹嘘说，他同他的匪徒同伙喜欢吃越南人的肉，“尤其是人肝”。这家伙真不愧是山玉成、朗诺和施里玛达的仆从。

计划”，他对奥尔曼解释说，“得到了一个美国特务的支持”，他只肯透露这特务的代号叫“弗雷德”。当时，朗诺和“柬埔寨陆军”要同这个头号卖国贼接触而又不让我知道，那是做不到的。不过，作为山玉成入侵战略的一部分，自由高棉军队于1969年初开始大批“开小差逃跑”可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当时策划这一入侵的中央情报局，后来在某个阶段决定把它的主要希望寄托在朗诺-施里玛达从内部夺权的阴谋上，而不是采取公然入侵的行动。经历了老挝的“丑闻”，更不必去提“猪湾”的惨败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事件，中央情报局这时大概需要采取比较合乎“宪法规定”和比较“合法”的途径了——特别是对付一个象柬埔寨那样为全世界所瞩目的国家。很可能是在山玉成自己也不知道的情况下，他被降到次要的地位，而他的士兵，包括那些“开小差逃跑”的人在内，都划归朗诺和施里玛达指挥了。山玉成突然发现失去了“他的”军队的一大部分。他对奥尔曼悲叹说，“事情的发展迫使他放弃”他的原定计划，如今他只能在他的新领导下起一种次要的作用了。

根据奥尔曼所叙述的情况，朗诺2月份从法国回来后同山玉成保持联系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楚：

如果越共象他们在1968年进攻西贡那样进攻金边，朗诺能不能期望山玉成的军队帮助他保卫首都？山玉成在2月底和3月初两次请示了“我的美国朋友”之后，作了肯定的答复。

1970年2月底，在西哈努克被废黜前几个星期，有

十来个柬埔寨陆军军官和几个美国特务被派到山玉成的司令部里去，在那里他们显然交换了情报并且彼此答应互相支持。当时仍然担任西哈努克的首相的朗诺，在2月里原则上同意在越柬边境上的一个指定地点会见山玉成。

同意会见一名已被判了罪的卖国贼这件事本身就犯了大逆不道的叛国罪。山玉成告诉奥尔曼说，这时他已经在柬埔寨边界附近位于二号公路*靠近南越那一边的靖边村设立了他的“野战司令部”。起先，朗诺派来几名他的特务，有报道说，“在位于边境区柬埔寨这一边的二号公路上举行了好几次会议”。

在举行了这些预备性会议（会后朗诺在山玉成的司令部里派驻有他自己的军官）之后，这两个卖国贼才互相会见，并且制订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奥尔曼评论说：

柬埔寨〔指朗诺政府，诺罗敦·西哈努克注〕的官方发言人已经否认在他们决定要把西哈努克赶下台以前美国作出过提供支持的保证。但是在西哈努克被赶下台后，一共有十营由美国出钱装备和供养的山玉成KKK部队被派来守卫金边。山玉成回忆说，“我们在1970年4月调了四个营到金边，到了7月底，我们一共调了十营兵进入柬埔寨。”

* 这条公路从金边往南经过茶胶到海边。

这个时候，西方的报纸正在刊登被砍了头挖去了内脏的越南人的照片以及 KKK 的青年分子手里拿着人肝去“和蔬菜一起煮”了吃的照片。事实上，KKK 的军队在政变以前就已调进金边，而且参加了对使馆的袭击以及后来对越南人的屠杀。

山玉成向奥尔曼揭露的情况具有以下这些特征：它是出自一个官迷心窍而又牢骚满腹的人之口，而且这个人觉得他自己做出了那么多的贡献、却没有得到他应有的报酬。同他所立的“功劳”相比，给他的犒赏实在太少了，而且甚至当他后来担任“首相”时，这个职位也只是一个挂名的职务。山玉成的愚蠢之处是，他以为一个傀儡有朝一日可以提高他自己的身分，可是他忘了，总是有人在操纵傀儡戏，眼下是中央情报局在拉傀儡戏的线呢。没有多久以后，当西贡进行接管时，这三个头目都变成傀儡了。

上面所说的一切就是我今天所知道的那个复杂的阴谋的基本事实。这个阴谋把我赶下了台，同时也把柬埔寨昔日享有的那种和平绿洲的地位给葬送掉了。鉴于中央情报局的这些走卒彼此抢着要当主角，毫无疑问，密谋里面还会有形形色色的密谋。但是它的主要轮廓和罪犯是谁，现在都已被揭露无遗了。他们明明知道其结果将给我国带来战争与破坏，这一点可以从奥尔曼根据山玉成的谈话于 10 月 12 日写的那篇文章（为国际新闻电讯社撰写）的最后一段中看出来：

同山玉成的谈话表明，朗诺-施里玛达政权不但早在 1 月分就打算把西哈努克赶下台，而且它完全理解其

结果或许会导致同一个强大得多的对手进行战争。根据山玉成的说法，美国作出了如果发生战争就给予支持的保证。*

〔美国〕参议员迈克·格拉韦尔(阿拉斯加州，民主党人)在审阅了有关证据以后评论说，

象白宫所做的那样，采取下面这样一种态度，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国进行了对柬埔寨的秘密入侵，雇佣和训练了一个公开宣称要推翻西哈努克的派别的成员，却不知道有人在策划政变。

这个阴谋的另一项内容值得在这里提一下。这就是神秘的“哥伦比亚之鹰”号事件，在这个事件中两名美国水手进行了“反叛”，结果把全体船员都囚禁了起来。简直是布莱船长和“Bounty”号水手反叛事件的重演！表面看来这两个人是反战的抗议者，他们把“哥伦比亚之鹰”号开入西哈努克港是因为他们反对把凝固汽油炸弹运到曼谷去。正巧有几个法国中学教员在西哈努克港把这艘“被绑架”的船进港和离港时的情况都给照下了相。他们注意到，它到达时吃水很深，可是等到离去时吃水却很浅了。

而且在“哥伦比亚之鹰”号下锚停泊那一天天黑以后，西哈努克港到金边的公路突然禁止民用车辆通行——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制造的军用卡

* 引自国际电讯社的电讯，1972年4月4日。

车车队从西哈努克港码头沿着通往金边的公路通宵达旦地奔驰，直到第二天早上。在政变那一天，西方记者注意到聚集在国民议会大厦外的军队，通通佩着全新的 M-16 步枪，而这种步枪是柬埔寨的陆军所没有的。看来“哥伦比亚之鹰”号是中央情报局对朗诺的请求的答复之一。这是通过山玉成交的货，以便在“越共”反攻时帮助朗诺。其实他们真正害怕的是柬埔寨人民〔对政变〕的反应。

虽然也有可能是朗诺和施里玛达都太愚蠢，没有能够预见到他们的行动会招来可怕的后果（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攫取美元，而且越多越好），但是美国却是有意识地故意把战争从南越输出到柬埔寨。然而他们对这样做的长远后果，也照例作了错误的估计。

第四章 抵抗的开始

我在从莫斯科到北京的旅途中起草并且在1970年3月23日通过北京电台广播出去的“告人民书”，对我的同胞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我正式要求解散非法和违宪的朗诺政权，并且号召建立一个广泛的民族团结阵线和一支民族解放军：

我们将建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在柬埔寨的形势恢复正常以前，我们要成立一个协商会议。它的成员将包括一切爱国、进步并具有反帝倾向的佛教僧侣、军队、警察、省防军、青年、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及其他依靠自己的劳力生活的人，工业家、商人、政府职员和妇女的有资格的代表。

我们将建立一支民族解放军，把祖国从以朗诺、施里玛达和郑兴为首的卖国贼集团和亲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独裁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并对他们的主子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民族团结政府、协商会议和民族解放军将和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组成一条叫做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统一战线，它将担负起解放祖国和在胜利后重建祖国的双重责任。

我们越南朋友的经验告诉我，到达胜利的道路将是漫长和艰苦的，但是由于越南人的经验和成就，我们的这条道路将会缩短些。

3月24日，我发出一个呼吁，要求我在国内的支持者参加地下斗争并等待武器和训练人员的到来，同时要求我在国外的支持者想办法到北京来。在随后的日子里，全国发生了受到残酷镇压的起义和夺权斗争；西方报纸很不幸地只报道了发生于邻近首都的东部各省的起义，这是因为新闻记者们到这几个省去比较方便。在广大的地区里，朗诺的行政机构在能够建立起来以前就干脆被报销了，而且从此一直没有重新建立起来过。他企图把这些起义说成是越共搞的，但是西方记者们却说不是这么一回事。〔英国〕《金融泰晤士报》准确地把这些起义描绘为“农村地区对一个曾尽全力争取农村同情的政权被赶走所感到的不满的一种自然爆发”。

从3月26日到27日，成百名手无寸铁的同胞由于示威支持我而被残酷地枪杀。3月27日至少有三十人在位于从西贡到金边的一号公路上离金边约四十英里的乃良渡口被杀害。另外五十人于同一天在磅湛市被朗诺的军队用高射重机枪进行近距离扫射时所打死。还有五十多个人是在靠近南越边界的苏翁和棉末被开枪打死的。新闻记者报道说，在茶胶市发现了大约八十具尸体，而在菠萝勉市和安塔松则分别发现了二、三十具尸体。死者无可争辩地都是柬埔寨人。我手头有我们成队的农民被双手反绑，等着被枪毙的照片，也有学生们的同学面前活生生地被打死的照片。我们至少能够确认出有的刽子手是在中央情报局唆使下从自由高棉来

的“开小差”分子，而这些开小差分子都是由朗诺安插到金边卫戍部队和宪兵中去的。

我在4月4日的一次广播中说到有三百多名爱国人士遭到屠杀，并再次劝告我的支持者转入地下，“到丛林中去加入那些早已在那里的抵抗部队”，而且一到那里就搞得到武器。

使我感到最高兴的事情是在我用广播发出宣言后的第三天，从三位红色高棉领导人那里收到了一封他们在5月26日发出的电报。这三位就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在1966年选举中当选的仅有的正派人。他们选择了流亡到丛林中新生的抵抗运动基地去的道路。他们三位都是我国最出色的知识分子：乔森潘、胡荣这两位在法国受教育并得过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以及当过律师的符宁。由于我们之间过去的关系相当紧张，我以为他们或许会提出一些问题或条件，也许在他们表态以前需要经过一番谈判。结果没有发生过任何这种事情。他们收听了我的宣言并且回答我说（大意），“太好了。如果您，柬埔寨人民的传统领袖，决定和我们并肩作战——我们再也不会有其他更多的要求了。”

朗诺曾经秘密而有计划地企图把我同左派分割开来。可是红色高棉人士后来告诉我：“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爱国主义和您对人民的忠诚。我们总是把您同朗诺和施里玛达之流区别开来的。”我们之间不需要进行谈判这一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我发出了一个呼吁，他们全心全意地响应了我。后来，当我们组织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时，乔森潘被任命为国防大臣（后来又兼任副首相），胡荣任内政、公共改革和合作大臣；符宁任新闻和宣传大臣。

由于政府和红色高棉之间过去的敌对关系问题同1970年3月抵抗运动得以迅速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回顾一下交恶的根源是很值得的。朗诺成为1966年选举出来的右翼议会的首相。1967年初，他故意挑起了后来为大家所知道的“三洛事件”。

在柬埔寨，土地历来归整治和耕种土地的人所有。朗诺的军队到达马德望省的三洛地区后就开始驱逐在多年前就把土地整治好并且一直在那里耕种的农民。他手下的军官拿出文件说，这土地根据法律是属于某一个本地官员的，并命令农民们收拾好东西搬走，因为朗诺需要这些土地来安置自由高棉的军队，即所谓那些开小差的人，作为他的计划需要用的精锐后备力量。（甚至早在1967年，我的一个叫做周成的部长就曾警告我，说朗诺在阴谋策划推翻我。当时看起来这件事可能性很小，所以我不相信他。后来他自己主动流亡到巴黎去，3月政变后，他是最早支持民族统一阵线的人之一。他目前是特殊使命大臣。）

三洛的农民采取了农民在历史上历来采取的行动。他们进行了抵抗并且得到人民的支持。马德望市举行了群众示威游行支持他们。马德望有许多华裔和越南裔居民，他们也参加了这一抗议行动。这就给朗诺提供了一个他需要的借口，硬说中国人和越南人阴谋接管柬埔寨。左翼的国民议会代表被人们骂成是毛派分子，被迫逃离金边。农民和朗诺的军队之间爆发了公开的战争。我当时不在国内，但是朗诺送给我的报告说得娓娓动听，好象这一切都是北京同河内在幕后指挥的叛变似的。

由于这是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极左分子干扰的高潮中发生的，形势就变得更为复杂了。金边和其他地方的华裔居民正被煽动去从事等于是干涉我们内政的各种活动。金边和其他城市到处都有毛主席的肖像，这种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表现是过去从未见过的。所以当我从国外回到柬埔寨时，不但看到了马德望省的农民造反，而且也发现中国血统的少数民族反对我的政府和我个人。（当时极左分子批判外交部长陈毅的理由之一就说他同拥护君主制度的西哈努克友好）我回国后没几天金边就发生了反政府的示威游行。朗诺早已发动了针对左派的政治迫害，很多青年人都效法那三位国民议会代表的榜样逃出金边到比较安全的丛林里去了。

中央情报局很快就利用了这个局势。他们发动了一场谣言攻势，并且假冒红色高棉的名义散发伪造的传单——当时我就曾指责这些传单是假的。那些坐在扶手椅上空想的专家指责我在1967年倒向右派，他们应该考虑到当时非常紧张和复杂的局势。当时，看来有大量证据说明我们的独立正受到来自左派的威胁还是第一次，而这一可能性是我在那以前一直不愿承认的。

关于中央情报局伸得很长的那只黑手，中央情报局“绿色贝雷”特种部队的小约翰·J·麦卡锡上尉作过一个很吸引人的揭发。麦卡锡是林应海被谋杀案的被告之一。林应海据说是一个原籍柬埔寨但后来被中央情报局收买的“双料特务”。麦卡锡由于对他不得不干的事情——姑且不提他因为服从中央情报局的命令而挨美国陆军的整的情况——感到厌恶，在1971年5月辞去了他的军官职务。他当时揭露他曾经

在一个“樱桃行动”中率领一支中央情报局的小队伍，这个“樱桃行动”计划的内容包括率领一支自由高棉的军队深入渗透到柬埔寨的腹地。这是1971年5月25日的《诺福克领航报》所透露的情况。

理查德·A·法因伯格又发现了关于麦卡锡案件的更多情况。法因伯格的这个报告是由国际新闻电讯社出版的：

小约翰·J·麦卡锡(原任美国陆军第五特种部队的上尉兼代号为“樱桃行动”的绝密柬埔寨军事行动的指挥官)说在他自己1968年被军事法庭审讯时，山玉成是一个关键人物。麦卡锡被控告说他杀害了一个柬埔寨翻译，这个翻译是自由高棉的一个成员，而自由高棉则是由山玉成领导并且据说是由中央情报局出钱的一个秘密的右翼叛乱组织。

这个前特种部队军官被判犯了谋杀罪并且在1970年上诉推翻原判以前曾被判刑二十年并关过两年。

麦卡锡说他的律师曾要求山玉成在1968年1月在南越隆平举行的对他的两天审讯中出庭作证，但是陆军说它不能强迫外国人出庭作证。当时山玉成住在越南而且在越南的柬埔寨少数民族中是一个有势力的人物。

山玉成没有出庭作证，但是审讯记录透露美国军官曾在特务被杀后不久在西贡的一座宝塔里与自由高棉的成员会见。在那次会见中，美国支付了据说是两万五千元美元给自由高棉作为其成员被杀的赔款。

审讯记录还表明搞“樱桃行动计划”的目的要从南越

越过边界入侵柬埔寨。为了这个秘密任务，美国雇佣了柬埔寨响导和译员，其中至少有些人是自由高棉的成员。在审讯期间，麦卡锡认定自由高棉是一个“实际上在策划颠覆柬埔寨政府的组织”。

虽然经过大量保密删节以后予以公开的审讯记录并没有直接提到山玉成，但是它提到了一个名叫陈松海的人，这个人被参加过“樱桃行动计划”的一个人确认为“自由高棉的领导人或大祭司”。麦卡锡告诉本记者说他认为山玉成和陈松海是同一个人。

在他被审讯以前，自由高棉送给麦卡锡一个金质奖章表彰他的“革命行动”，这个做法是以麦卡锡杀了这个特务这样一个设想为依据的，而自由高棉认为这个特务是一个受过共产党训练的双料特务。随同奖章一起颁发的奖状是由山玉成作为“自由高棉领导人”签署的。

我得到的这一审讯记录的未经删节部分的一些摘录更说明问题。比如说，麦卡锡的小队成员、本·W·汉考克中士曾就他在该特务被杀后为陈松海和特种部队的一个军官安排的一次会见中宣誓作证。下列逐字记录的证词见于审讯记录的第138页：

汉考克：由于特种部队卷入了……（被删）他问我愿否去
 宝塔一趟，看看我能否为他安排同陈松海会见。

问：谁是陈松海？

答：他是南越境内……（被删）的领导人。

问：这次拟议中的会见发生了些什么事？

答：我安排在当晚六点钟会见。格洛弗上校、亚当斯少校和我同陈松海以及译员参加了会见。格洛弗上校把所发生的事情如实地对他们讲了；他们认为他〔指特务〕是被一名美国上尉杀害的。

问：他们的反应——如果有任何反应的话——如何？

答：他并没有显出怀恨在心或其他反应，于是他首先问美国政府将为林应海之死支付多少钱。于是同意议定一个价格；我们约定，或者说他同我约好第二天早上把尸体送到西贡的宝塔。

在该审讯逐字记录的第 141 页上汉考克还确认陈松海是“自由高棉的大祭司或领导”，所以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头号卖国贼山玉成，这一点也说明为什么美国陆军在制止他出席军事法庭作证这一方面会那么随和。麦卡锡后来告诉新闻记者法因伯格说，所付的补偿款项是二万五千美元。法因伯格的报告接着说：

虽然“樱桃计划”在麦卡锡受审讯以前已告结束，特种部队成员继续在柬埔寨为中央情报局进行秘密搜集情报的活动。

1969 年受柬埔寨情报秘密计划雇用的另一个受到怀疑的双料特务之死在报纸上又轰动一时，这是由于陆军企图对八名特种部队成员，包括驻在越南的第五特种部队指挥官罗伯特·里阿特上校，进行军法审讯引起的。

当中央情报局拒绝作证时，陆军只好撤销该项控诉。

罗勃特·F·马拉斯科是与后一案件有牵连的特种部队成员之一，他在1968到1969年间在柬埔寨负责两个情报网。他告诉本记者说，他的使命包括“把军事目标的位置弄准确”，在柬埔寨搜集情报，以及在西哈努克访问农村时监视他的行动。马拉斯科说他雇用并训练自由高棉特务和其他柬埔寨人为他工作。

1970年6月2日马拉斯科在一次同全国广播公司的谈话中透露，他的使命的代号是“黑胡子”，并说它分成两组，在整个鸚鵡嘴地区以及有时候远到金边都有他的特务网。马拉斯科雇用的二十名南越和柬埔寨特务的任务包括监视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这一点意味着除了其他任务，还得包括决定什么时候是搞暗杀的有力时刻。

“樱桃行动”和“B-57”小组究竟是搞什么的或许永远不会被人们知道。新闻记者们曾经告诉我说审讯麦卡锡的完整记录被列为“绝密”文件的做法是没有前例的。1967年三洛事件发生时，中央情报局的活动之一是以红色高棉的名义散发煽动性的小册子，其目的是为朗诺提供加强迫害左派以及破坏红色高棉和我之间的关系所需要的借口。

很幸运的是使朗诺负伤的吉普车事故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把他搞下台了，使我一回到柬埔寨就能够亲自了解一下三洛

* 法因伯格的报道是由华盛顿国际新闻电讯社在1972年4月5日发表的。马拉斯科的全国广播公司谈话发表在1970年6月3日的巴黎《国际先锋论坛报》上。

事件。我发现农民们确实有理由感到不满，我立即撤了马德望省省长的职。我公开宣布了当局在这不幸事件中的责任，重建了被朗诺的军队毁坏的农村，并把农民重新安置在他们的土地上。朗诺的意外事故使我能够比较容易地改组内阁，让宾努来担任首相。在《柬埔寨研究》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很清楚地表明：

叛乱完全是一个内政问题，没有任何外国的支持和鼓励，王国政府将以它自己的力量并用它自己认为是最好的办法来解决这问题。但是敌对的宣传和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进行了一场疯狂散布谣言的运动，企图把国家分裂为两个没法调和和敌对的部分，以便为进行直接干涉制造借口。*

当时我对“樱桃行动”毫无所知，但是我从伪造的小册子里和一些口号的词句上很清楚地认出了中央情报局伸得很长的那只黑手。

西方报纸上开始出现耸人听闻的故事，把被压迫的马德望省农民说成是在进行反对西哈努克的流血叛变，并且还企图表明北京和河内在这一叛变中插了手。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叫做吉拉德·布利塞的法国新闻记者的看法。他在柬埔寨居住多年，并且对三洛事件进行过调查：

和当时的报道相反，它的矛头并不是指向诺罗敦·

* 《柬埔寨研究》，柬埔寨王国政府官方刊物，第十期，1967年4月—6月。

西哈努克的……而是指向某些当地的小土霸的。正象抵抗运动的范围几乎包括了柬埔寨的全部农村地区（布利塞指的是1970年以后的抵抗运动）这一点所证明的那样，西哈努克在农民群众中所享有的声望并没有受到损害。*

但是，朗诺对左派知识分子的政治迫害，加上对马德望农民所采取的军事行动，迫使这两种人采取一种公然用武力抵抗的态度，在我对三洛事件进行了干预以后，这种抵抗逐渐平息了，可是在1970年3月18日政变以后又发展起来了。

1967年8月发生了一个令人遗憾的事件，这件事同一时笼罩了北京同我之间的关系（但这决不是指周恩来同我之间的关系，因为我同周恩来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融洽）的阴霾有关。北京中柬友好协会发了一个电报给金边的柬中友好协会，含蓄地主张推翻我。这明显地等于直接干涉柬埔寨的内政，我被迫把金边的协会连同所有的这种组织一起解散，代之以官方的组织。我的批评者立即抓住这点，把它当作是我倒向右派的决定性证据。但是当我在1970年到中国时，周恩来总理告诉我说，我为了维护柬埔寨的主权完整而这样做是做得对的，因为这一切是由于极端分子控制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并且通过他们的驻外使馆发出各种挑衅性的指示所造成的。不仅柬埔寨受到了损失，而且对我们来说，在我们战后历史上一个特别关键性的时刻发生了这种事是太不幸了。周恩来告

* 见1970年7月巴黎《政治与经济年刊》。

诉我说，北京这个协会的领导人已受到处分。一般地说，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出现的“极端分子”后来都彻底地信誉扫地了，但是他们已经给中国的对外关系造成了不少损害。

为了摆脱我国持不同政见者——象朗诺之流的右派对我的攻击，我偶而也发表讲话，攻击越盟、越共和红色高棉。越盟和越共认识到，我在政治、外交和物质上对他们的抗敌斗争的坚决支持才是最主要的方面。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红色高棉早已理解这一点。1970年他们立即同意我们为抗敌而建立的联盟就是证明。

1967年，我由于看到数以百计的柬埔寨青年抛弃自己的家庭、学习和专业跑到丛林和山里的游击队根据地去而感到沮丧的事情，到了1970年3月我发出进行武装斗争的号召时，却变成幸事了。现成的根据地已经有了，武器不久就来到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1967年还不大愿意向红色高棉提供武器，从而冒爆发一场有可能导致美国干涉的柬埔寨内战的危险，到1970年3月就用不着担这份心了。政变发生后不久，他们立即开始散发储存在边境地区的武器。当美国人在六个星期后发动攻击时，他们惊愕地发现储存地区已经空空如也。这些武器中的很大一部分直接到了我们的人民解放武装力量最早成立的一些部队手里。

我们的武装抵抗之所以发展得非常迅速——这情况甚至使我们的越南朋友们感到惊奇——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有些老干部在保护他们自己的生命和根据地不受朗诺的袭击的同时学会了怎么打非正规战争。在东北的腊塔纳基里省，南部的象山山脉地区，以及西部的大莫美山脉地区，都有

游击队的根据地。很快就有数以万计的被一些新闻记者叫做“西哈努克分子”参加红色高棉的队伍。这些都是农民和城市居民、士兵、包括一直效忠于我的完整的陆军部队，以及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参加我们的队伍的越南裔和华裔居民，或者是由于他们看不到别的出路，如果他们想要活下去并保持他们的自由的话。

到了4月中旬，柬埔寨的大部分地区都已解放，我们的部队已进抵金边的郊区，迫切希望同我们在市内的支持者联系会师了。尽管他们运进了所谓的“迈克部队”（KKK突击队）来防卫首都，还是发生了这个情况。1970年4月30日美国派遣它自己的军队和南越的军队一起入侵柬埔寨，构成了近代史上最明目张胆和最毫无道理的侵略行为，这时朗诺-施里玛达政权已经摇摇欲坠、奄奄一息，只有束手待毙了。除了“侵略”以外，没有别的字眼可以用来形容美国的这种行为。为了掩盖他自己的责任，朗诺自称他既没有请美国人进来，也没有在事先得到任何要入侵的警告。尽管这说法是难以置信的，但这却是朗诺-施里玛达政权的有记录的正式态度。5月2日，也就是入侵后的头几天，西方新闻记者报道说朗诺在考虑要不要提出正式抗议。最后他决定“赞同”入侵。

他充其量只能够通过于5月11日对一群集会的佛教徒发表讲话的方式来说明他自己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而到那个时候为止，已经有好几十座城镇和村庄被美国空军炸成一片废墟，成千成百个无辜平民被美国和越南军队炸死、烧死和用机枪打死。他想用这种不合时宜的夸夸其谈来为成千上万越南平民的被屠杀进行辩白，尽管这屠杀是一种由于官方明令

纵容而造成的种族主义暴行，并且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他居然会打着佛教的帽子来为屠杀和通敌罪开脱，这一点可以让我们看出此人已经墮落到了什么地步。他在金边电台的一次广播中说：

我向笃信佛教的同胞们发出这一呼吁。人们认为我们的宗教可以存在五千年。我们现在才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正处于佛教纪元的中间。人们还认为佛教在下一个五百年将会兴旺起来。根据一位占卜者的说法，柬埔寨现在的战争是一个宗教战争。我们的宗教是佛教。我们有我们的僧侣，祷告、纪律以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信念。共产党人不相信宗教，因为他们不相信有佛。

我想告诉我的信佛的同胞们，有一个占卜者预言，人人都将享受同样的权利。当这场宗教战争结束时，每个人都会感到快乐和幸福。但是战争如果还在进行的话，你们必须尊重你们的宗教并且要祈祷。接受这一劝告的人们将会免除一切不幸并将得到安全和繁荣的报酬。预言这个时代的中叶将爆发一次宗教战争的占卜者说，在湄公河四条支流的中间将要建立起金宫和银宫，而且在湄公河四条支流中间将会发生屠杀。这就是说，佛的敌人将要把信教的人民杀掉。然后国王将会逃跑，天空将会出现一颗彗星。

当高棉人民拒绝抛弃他们的佛教道德并拒绝援助越共侵略者时，战争就按照中国和北越共产党制定的计划爆发了。中国并不喜欢西哈努克；它只不过在利用他作

为帮助越共在我国境内发动战争的一个工具，其目的是要把我国变成共产党在东南亚的一个基地。

说得更明白一些，根据佛教，我们必须打仗——同把宗教当作敌人的越南共产党人打仗。在这场反对越南共产党人——他们是佛的敌人，——的宗教战争中，有很多佛教徒会来帮助我们。我们国家将会象占卜者所预言的那样，在战场上赢得最后胜利。因此，我们信佛者必须团结起来向在我国境内从事侵略战争的敌人进行斗争*。

人们或许可以从最后一句话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朗诺是在呼吁他的信佛的同胞们站起来反对美国人。但是他的用意却决非如此。我把朗诺在他的胡言乱语里反复使用的“宗教战争”这一名词用重点号标了出来。这个，以及他在讲话中提到的所谓“湄公河的四条支流”，似乎是在企图解释一千多个越南平民，包括男女儿童的被屠杀。这一千多具双手被反绑的尸体4月中旬被人们发现时正沿着湄公河漂流而下。对柬埔寨声誉的这一可怕的玷污，当时全世界的报纸曾经作过详细的报道，但是美联社杰夫·威廉斯在4月15日发出的一条电讯特别值得在此一提。威廉斯当时正在乃良渡口采访，他描述了湄公河里数以百计的被处决的越南人的尸体。有一个渡口的警察局观察者在一个早上数了四百多具尸体，而当时双目视力所及，河面上的尸体还在源源不断地漂流而下。

* 《柬埔寨：印度支那日益扩大中的战争》，第109—112页。纽约华盛顿广场出版社，1971年2月。

出于宗教目的的杀人！可是越南人中很多人也是佛教徒。还有那些信天主教的人呢？佛教宣扬宗教上的容忍。谁是那些“会来帮助我们的很多佛教徒”呢？从什么时候开始把美国人也当作是佛教徒了呢？我敦促美国国会的所有成员和美国的一般公众先读一下朗诺的讲话，然后衡量一下他们把亿万美元托付给那号头目究竟是些什么人，以及他们用美国的财富、军事力量——尚且不提用美国的威望——在支持的政治和道德哲学是什么货色。

美国人也可以考虑一下保守的《远东经济评论》(1971年1月16日香港版)如下的一段报道：*

金边那些在为柬埔寨的问题伤脑筋并且抢着要为朗诺出谋划策的外国官员，如果听说这位首相是对一小撮佛教僧侣言听计从，而这些僧侣一见到他时又往往一下子要呆上几个钟头的话，大概会有点感到恼火。

在这些处于重要地位的顾问中名列前茅的是曼普罗莫尼〔音译〕。他是一个长相很狡猾的二十岁的和尚，他那很自信的气派和傲慢的举止倒和他的头衔——“圣洁大智”——十分相称。他属于摩诃尼迦耶教派。他说 he 自己是星占学家、矿物学家兼历史学家。他每星期都见到朗诺，但是他除了提到他们从个人问题到国家大事什么都谈到以外，不肯泄漏他们两人的谈话内容。为了让人们领略一些他同柬埔寨领导人所分享的智慧，请看看他

* 本书出版人未能使西哈努克亲王获得利用这条电讯的许可，所以只好在这里插入这一段按原文意思改写过的话。

所作的下列预言：

“今年春天柬埔寨将会恢复和平，但是在能够满足下列条件以前这个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所有从北越和南越来的越南人必须离开这个国家。……美国商人必须通过大量投资来帮助柬埔寨复兴——而且他们必须走在日本商人之前。”

看来那些关于占卜者受到中央情报局操纵的谣言并非完全事出无因：

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我的同胞在面临以下抉择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要么听信这个变节者蒙蔽人民的胡言乱语，要么倾听要求他们发扬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和同我们边界那边的越南、老挝战友的战斗团结这一既合乎逻辑又属明智的呼吁。尼克松的军事战略家希望通过4月30日的入侵，在我们的抵抗部队没有组织好以前就把我们打垮，同时以朗诺的部队和他们自己的部队形成的钳形攻势一举击溃民族解放阵线。可是这个钳子的西边的钳牙由于朗诺的部队没有作战的愿望而没有合拢。另一方面，我们的新生的抵抗力量却打得很出色。所谓的“越共的五角大楼”原来根本不存在；边境地区根据地储备物资的绝大部分——如同美国人后来在1972年春天发现的那样——已经被运到别处，或者转到我们手里来了；“庇护所”现在已向西扩展，包括了柬埔寨的大部分地区。尼克松的柬埔寨冒险的结果是，柬埔寨很多城镇和村庄遭到毁灭，成千上万的柬埔寨人——几乎全部都是平民——的生命损失。但是从军事观点来看，对美国 and 它的

傀儡们来说却是一个大灾难——这个灾难的严重性是尼克松从来都不敢向美国人民透露的。

对我们柬埔寨人民民族解放武装力量来说，1970年4、5月的入侵是头一个火的洗礼。在很短的时间内，乔森潘和他的同志们建立了三种部队：地方游击队、地区游击队和正规军。如果说这些部队在开始时缺乏装备的话，他们卓绝的士气完全足以弥补这个缺点而有余。当他们亲眼看到自己的家被洗劫烧毁，父母被杀死，母亲、妻子、姐妹和女儿被强奸，他们的士气怎么能不高呢？如果在1970年3月18日政变以后柬埔寨人中还有对朗诺和西哈努克之间的区别分不太清楚的话，那末在4月30日的侵略行为——且不管是否请进来的——之后，再也没有一个这样的人了。我们抵抗的种子是撒在用我们人民的鲜血施过肥的土壤里的。这难道是西哈努克的宣传？人们只需要注意一下1970年3月18日以来事情发展的悲惨过程就明白了。

第五章 马尼拉插曲

我对3月18日政变以前不久发生的事情——以及对政变本身——的头一个反应就认为这是中央情报局插手干的事。3月14日我在巴黎答记者电视访问以及我到达北京后不久就曾经发表过这种意思的宣言。显然我当时还没有掌握那些我后来才获得的文字证据。但是发生了那么多无疑是中央情报局干的事，我完全有理由怀疑3月18日发生的事情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在这以后我所能够收集到的一切证据只是证实了我的这些怀疑而已。

我对中央情报局干涉柬埔寨事务的头一个印象可以追溯到1955年底当时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前来金边访问我的时候。在这以前，他的哥哥——已故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以国务卿的身份访问过我，他把他所有的论点都施展出来，劝我把柬埔寨置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下。我拒绝这样做，因为这样一种安排和柬埔寨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作出的中立保证是背道而驰的，而且我在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一立场。

我认为东南亚条约组织是一个针对我们某些邻邦的一个侵略性军事同盟。我并不赞同这些邻邦的意识形态，但是柬埔寨同它们并没有什么争端。我把这一切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一个尖刻而又傲慢的人——说得都很清楚，但是不

久他的弟弟就带着满满一个公事皮包的文件来到，这些文件是要“证明”柬埔寨即将沦为“共产党侵略”的牺牲品，而挽救这个国家及其君主制度和我自己的唯一办法是接受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这些“证据”同我自己的情报并不吻合，我用我答复约翰·福斯特一样的话回答了艾伦·杜勒斯：柬埔寨对东南亚条约组织一点都不感兴趣。作为中立国和佛教徒，我们将会照顾自己。这个特务头子只好收拾起他的那些很成问题的文件离开柬埔寨。

美国大使罗伯特·麦克林托克还继续对我和我的父母施加压力。就我的情报工作人员所知，这个大使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有经验的特务。麦克林托克和杜勒斯兄弟一样唠唠叨叨地反复大弹他的陈词滥调：中国人打算把我们一口吞掉。……美国国会将不向走中间道路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不能想象在反对世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有一个国家可以保持中立。……在这场斗争中不站在美国一边就等于反对美国。……他提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关于中立主义是“危险而又不道德的”这一见解的许许多多变种。（他从来没有抛弃过这个主题。当我在1958年见到他时，他对我怒目凝视地说：“柬埔寨没法成为亚洲的瑞士。您没法保持中立。您必须在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阵营之间选择一个。”）

我应菲律宾政府的邀请，到马尼拉去访问，于1956年1月31日到达那里。我受到了隆重的接待。一路上到处都是鲜花，街上都站满了欢呼的人群——一个纽约式抛纸屑的欢迎，从街道两边的高楼里五彩纸屑象雪花般飘下来。最漂亮的电视和电影明星都被动员来突出表现菲律宾人的殷勤好客。虽然

我的职务只是首相，他们却以特别隆重的仪式——包括人数很多的乐队——来欢迎我，而这种仪式恐怕只有我过去作为国王的身份才够资格享受的。（我在十个来月以前退位不当国王了。）但是谁能不对所有这一切漂亮的仪式和热情的欢迎感到高兴呢？

第二天早上我拿起报纸来读的时候却不是那么高兴了。《马尼拉记事报》里很明显地是由政府授意写的一篇社论说：“西哈努克的访问应该以柬埔寨签约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而告结束”，“对西哈努克来访的精心准备是要把这个中立国推进东西方的斗争中来的运动的一部分。”

我的脑子里忽然有一个很不愉快的想法：这些鲜花、音乐——甚至于电影明星们——只不过是一个讨人喜欢然而却是狡诈的心理手法的一部分；它是杜勒斯兄弟和麦克林托克一直在对我和我父母施展的政治压力的延伸，只是所用的办法令人较为愉快一些而已。

在我对菲律宾议会发表的头一个讲话中，我为柬埔寨的中立立场作了坚决的辩护而没有攻击东南亚条约组织，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有的参议员和众议员甚至于站起来说菲律宾的政策应该根据不结盟来重新审查。

在发表讲话以前，我接受了一个叫做曼格拉帕斯的参议员的邀请，在那天晚上到他家去作客。我同他在万隆会议期间交了朋友。他同我一样是一个音乐爱好者。这个晚会的用意是要庆祝下列事实：他对我能够到菲律宾来访问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在菲律宾还以为我肯定会正式接受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伞”。结果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谁都过得不

开心。

我的下一个约会是对菲律宾墨菲营的陆军司令部进行一次访问，在那里要检阅一个礼仪性的欢迎队伍，我也还要发表一个讲话。可是在我到那里去之前，发生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我曾经帮过一个叫做弗朗索瓦·巴卢克的人一点忙。这个人自称原籍是黎巴嫩的商人，曾经在金边逗留过几个月。有关部门向我指出此人似乎除了贸易事务以外，还对各色各样的古怪东西感兴趣。这位巴卢克先生曾经问我他能不能乘我去菲律宾之便和我同机到那里去，因为他也在菲律宾经商。他说其实他原来是从菲律宾来到柬埔寨的。

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是，当我在马尼拉时他来看过我，并且要求我在墨菲营发表一个讲话来软化我在议会发表的讲话中的强硬态度。他解释说，我的讲话的语气使他作为菲律宾政府的朋友处于一个十分为难的地位，并请求我作出一个“个人姿态”，帮助他缓和一下事态。在政府圈子里一些熟人的帮助下，他已经起草了一份他认为是可以被他们接受的稿子。我一看是一份写在马尼拉大饭店的信纸上的东西，（后来我的随员们告诉我说，他们亲眼看到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的一名秘书曾在旅馆的酒吧间里口述“我的”墨菲营讲话稿给弗朗索瓦·巴卢克先生，让他用笔记下来。）

我起先接受了他的稿子，以为我或许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现成的提纲来利用。但是等我念它的时候，我发现他是要我讲和我告诉菲律宾议会的话几乎完全相反的东西。我到菲律宾来并不是想要冒犯我的主人；可是我也不是专为了要拿柬埔寨外交政策的基础做交易而到菲律宾来的。那天晚上我通

宵没睡起草了一个新的稿子，而且为了防止任何用巴卢克的稿子来替换我的稿子的企图，我采取了在记者俱乐部散发我的稿子的预防措施。我还照相复制了一份使馆官员亲手炮制的东西——也是出于谨慎。这位巴卢克先生要我说的话里有这么一段：

我相信菲律宾政府同其他自由国家共同采取的防止共产党侵略或颠覆的措施将使南亚所有的自由人民受到裨益。柬埔寨人民——他们不久以前还不得不保卫自己以防止共产党的侵略——以感兴趣和同情的态度，考虑了马格赛赛总统和其他自由国家为了防止世界这一地区的共产党的新进展而采取的措施。除非我们共同合作维护我们的自由，亚洲人民由于热爱独立而遭受的所有牺牲和痛苦都将是徒劳的。我们迫切需要保卫亚洲，以防止一切形式的奴役或新殖民主义。

我把从杜勒斯兄弟和麦克林托克的令人厌倦的陈词滥调里贩来的词句都用着重点标出。我的经过修改的讲话稿强调指出（这无疑会使美国大使馆感到大为惊惶失措）：

虽然我们由于自己自愿在日内瓦签署的协定而不能参加任何军事集团，我们的高棉军队是同菲律宾那样的国家的部队站在一起的。这些部队的唯一愿望是保卫和平、正义和民主的理想。……我表示希望，有朝一日所有的民族都向往彼此之间有更好的了解能够帮助那些被最

近战争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国家减少它们的沉重的军事开支，并且能够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这是永久和平的唯一的扎实基础），同所有国家的保持正常的关系而不受意识形态分歧的干扰。

这段话和平共处的味道显然是浓得会使美国不高兴，但是我应邀到菲律宾并不是来为东南亚条约组织做宣传的。我把我的发言稿散发给记者们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巴卢克先生了。到墨菲营的访问被取消——当然也就不会有欢迎的队伍了。《菲律宾先锋报》评论说，我通过我的宣言“给菲律宾政府要把柬埔寨拉进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希望泼了冷水”。我后来发现巴卢克是一名中央情报局特务，而菲律宾政府只不过是在充当美国政策的代言人。因而再也不会以音乐、鲜花和妖艳的电视明星来欢迎我了。

马格赛赛总统邀请我参加告别宴会，同时还请了国家图书馆馆长参加。宴会结束以后，他请那位馆长拿出一件著名的历史文件。这件文件表明，早在十七世纪时我的一个祖先在快要丢掉他的王位时，靠菲律宾雇佣军而得了救。马格赛赛说，“您看，当您的王位处于危险时，我们并没有保持中立。我们不久都将遭到被中国侵略的危险——可是您却要保持中立。”

我回答说，“总统先生，如果有一天您的独立遭到威胁，我们不会保持中立。柬埔寨人民、柬埔寨政府以及我个人，都不会保持中立。您如果成为侵略的牺牲者，我们将偿还我们欠您的债，而这句话也可以用于共产党的侵略。”我不知道这

位总统是否对我的回答感到高兴。没几个月以后，他死于飞机失事而我的人民（我已经向他们很详细地谈了在马尼拉发生的事情）认为他的死是命中注定。在“马尼拉使命”失败以后，巴卢克被中央情报局召回。后来我听说他也死去了。

不久我被迫在一个公报里透露一个我不能不认为是破坏我们的中立的阴谋。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对一个新闻记者在地埔寨国境以外所写的一些文章和无线电广播里的评论提出了抗议。这位新闻记者曾经访问过我国并且叙述过美国为了要柬埔寨接受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而对柬埔寨施加过一些压力。杜勒斯采取了一个在外交上很不寻常的做法（这种做法可不能予以忽视）：发一封抗议信给柬埔寨外交部，宣称这位盛气凌人的新闻记者作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断言：

根据这种说法，美国企图用威胁要撤销美国的经济援助的办法，强迫柬埔寨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我对有人作出这些断言感到遗憾，因为这些断言完全是不真实的，而且会损害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我相信我这封信将会制止这些有关我国政策的不真实的断言。我再重复一句：我们的政策除了帮助自由国家维护它们的自由和独立以外，没有别的目的。

杜勒斯还引用了麦克林托克大使访问〔柬埔寨〕国王和王后以后发表的一份公报里的一些词句。这份公报声明，美国“从来没有对柬埔寨的中立发表过任何官方评论。”

我用发表公报的形式来反驳他。公报的内容包括了马尼

拉事件的细节、巴卢克的稿子的照相复制本、我的经过修改的发言稿(但是并没有正式发表过)和一篇前言。这篇前言指出,“美国的确从来没有对柬埔寨的中立发表过正式的和公开的评论。但是,美国私人的‘劝告’和非正式的‘批评’却从来没有少过。既然杜勒斯兄弟是最积极地对我们的中立提出尖锐批评的人,我想约翰·福斯特一定不难理解我的用意是什么。

我离开马尼拉的情况同我到达时的情况是一个明显的对比。美国大使没有出席在机场举行的冷冰冰的告别仪式。我看到了一个完全被外国主宰的国家,这加强了我誓死保卫柬埔寨的独立的誓言。当时我还没法猜到采取这样一个立场的惨重代价。但是,即使我知道这一点,我想我也不会不这样做。公开揭露在马尼拉发生的丑事也有它的后果。加西亚副总统颇为生动地指责我吃了菲律宾的东西却“反而忘恩负义,咬了喂我吃食的那只手”。

1964年初——上述事件发生后八年,命运却又嘲弄了人。鉴于我同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的融洽关系,当时担任菲律宾总统的马卡帕加尔问我能不能在缓和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三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方面起一点作用。当时正是苏加诺采取同马来西亚“对抗的政策”的时期。菲律宾对马来西亚也有领土要求。我邀请马来西亚的登古·阿布杜勒·拉赫曼和马卡帕加尔总统到柬埔寨来。我们首先在吴哥会见——我一向认为吴哥的安宁有利于平息人们的怒气——然后在金边会见。我在金边为菲律宾总统安排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十万人在从机场出来的街道上列队欢迎。下一步是由我到吉隆坡、雅加达和马尼拉访问。在马尼拉机场没有欢迎的

人群——只有马卡帕加尔总统同他的夫人在我走下舷梯时在使劲儿鼓掌。他曾经安排让学龄儿童拿着柬埔寨国旗在街上列队欢迎我。但是，从表面看来似乎总统并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国民议会的代表们派出卡车把儿童们接走了。他们被告知说，“回家去！”“别举这些柬埔寨国旗！”结果我见到的是写着这些字眼的旗帜：“西哈努克在 1956 年诽谤了我们”，“让他的访问见鬼去吧”，“西哈努克是菲律宾人民的敌人！”我们的汽车从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开过去。这是我这一辈子最不好受的时刻之一——比被人废黜还要难受，因为我被废黜后我知道自己即使在过流亡生活，我的人民也是同我站在一起的，而且我们还会进行反击并且赢得胜利。但是在一个所谓的友好访问中被人这样屈辱的确是令人恼火极了，而且使我更痛恨美国和它的卫星国。

在 1956 年访问马尼拉失败以后，我到北京去同周恩来重温我们一年前在万隆会议上开始建立的友谊。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的尊严和姿态是多么的不一样啊！虽然我是一个亲王和一名佛教徒，而周恩来是一个共产党革命家，而且我们两国的大小又相差那么悬殊，中国却以平等待我。没有任何压力而且真诚地关注柬埔寨的问题。

在中国周游时，我注意到中国的农具和它的很多消费品比起西方很多产品来更适合于柬埔寨的需要。我立即获得这样一个信念：这才是一个会同我们共患难的强大的朋友；一个受到同我们所受到一样的威胁的朋友，因此，完全理解和同情我们的问题。我对北京的访问是从 2 月 13 日开始一直进行到 21 日，其具体结果是签订一个中柬友好的联合声明，这

个声明重申了柬埔寨的中立，同时重申我们双方同意把彼此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万隆会议通过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上。

由于这次访问的结果，我回到金边后成了南越和泰国——两个比菲律宾还要更完全地受美国摆布的卫星国家——报纸的攻击对象。我被指责说由于我准许经由柬埔寨领土进行侧翼包围，我是在为中国人侵这两个国家铺路。如果南越和泰国被迫采取防御性措施，那就只能怪西哈努克了！麦克林托克大使也发表了这个论点并且进行了同样的威胁。在边界那边的曼谷，中央情报局已经扎根很深，担任美国驻曼谷大使到1954年和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前局长的威廉·多诺万已在那里安置好特务。多诺万在曼谷的后继人不是别人，而是又一个叫做约翰·F·普里福伊的中央情报局特务。这个特务在马尼拉事件之前八个月在危地马拉一手策划了颠覆阿本斯政府的政变，颠覆这个政府是因为它居然敢于公开对抗美国政府。考虑到从泰国发出的号召推翻我的宣传，这对我来说当然不是一个好征兆。我刚从马尼拉回到柬埔寨后不久，泰国和南越就强行对柬埔寨进行经济封锁。这是个严重问题，因为我们同外界的联系不是沿着湄公河通过南越就是由铁路通过泰国。

为了加强经济封锁的效果，每天都对柬埔寨进行军事挑衅。以南越和泰国为基地的飞机不断深入侵犯我们的领空，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经费的非正规部队也开始对边境地区进行突击。这些都不仅是威胁而已。它们越来越象是为了发动一个危地马拉式的政变而进行的、用来削弱柬埔寨抵抗力的初步试探。

为了使自己在同外界联系方面能够独立于两个敌对的邻邦，我们曾请求美国援助我们修建一条公路或铁路到暹罗湾上法国答应我们修建的一个深水港——磅逊（即后来的西哈努克港）。华盛顿答应帮助我们修一条公路，宣称修一条铁路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但是自从我在马尼拉采取了对抗的立场以后，很明显的是，除非我变得更“愿意合作”一些，这条公路是修不起来了。为什么要修一条可以被用来把柬埔寨的橡胶运到赤色中国的公路呢？这是所提出的非正式的论点之一。

1955年4月，在曼谷集会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决定把我们国家和老挝、南越一起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就我所知，事先并没有同柬埔寨、老挝或南越协商。柬埔寨并不需要这种“保护”。对于这种“保护”将会带来什么我们都再也清楚不过了，而且我把这一点告诉了麦克林托克大使。问题在于我们会不会被强行“保护”。1956年3月，我接见两位来访的记者，苏联的尤里·格里申科和澳大利亚的维尔弗雷德·贝却敌。我对他们解释说，美国作为一个自称是民主国家的国家，应该接受我的见解。我作为首相，不能不阐明人民的愿望，而人民要求保持独立和不受任何人的摆布。在我们的国民大会上，我要求那些认为我们应该接受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人举起手来。没有一个人举手。我要求那些认为我们应该避免参加军事盟约的人举手时，人人都举了手。格里申科是《真理报》的记者，我向他保证柬埔寨将乐于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当时在金边派有代表的非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只有日本和印度，所以我觉得社会主义阵营派驻代表将是正常的和有用的，特别在美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压力面前就更是如此。

1956年3月，我辞去首相和外交大臣的职务。从而我就避免了麦克林托克大使——一个傲慢而又极其令人受不了的人——几乎是日常的讨厌的访问。同时为了更好地进行斗争，我也希望自己够能腾出手来。正好一年以前，我出于类似的理由放弃了我的王位。当时是由于内部的不同意见，这次却是为了对付外来的危险。

我辞职后不久，我在南方沿海岸的喷吓市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为我的行动辩解。我说，“我认识到我的辞职将会被人们认为是美国人的一个道义上的胜利，我希望他们现在会感到满足。这些经常许诺别人他们会维护小国的自由的人刚刚在柬埔寨暴露了他们的真实面目。这是一个并不怎么光彩的面目。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的同胞确信这一点：我们决不允許任何人践踏我们的中立或主权。我们决不后退一步。我们过去曾经胜利地击退过这种威胁，我们将再次这样做。”当然，我指的是南越和泰国不断在进行的军事入侵以及〔它们扬言要采取〕防御性措施的公开威胁。这些都是在美国的几乎毫不掩饰的支持下干的。我决定把我这个情况和理由公诸于人民。在喷吓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宣布了召开民社同盟第三届国民大会的日期——1956年4月21日。

在大会开幕以前的几个星期里，压力几乎增加到了到达爆发点的程度。泰国军队侵犯了我们的领土，并且占领了吴哥有历史意义的柏威夏寺。柬埔寨同泰国和南越的边界仍然处于关闭状态。

国民大会的议程包括“柬埔寨对外国的态度及其和外国对我国态度的关系”，以及“已经提供给我国和拟议提供给我

国的外援”问题。这一议程的宣布在外交人士中引起了一场骚动。尤其是华盛顿特别理解我这样做是当真的。我不但决心拒绝同东南亚条约组织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而且计划彻底结束美国对我国的垄断性影响。我将转而求援于社会主义世界。第三届国民大会正在成为柬埔寨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华盛顿由于过分蛮横地企图把一个小国推向它自己不愿采取的方向而将自食其果。

本来会是一个亲西方的中立将要变成一个东西方之间更纯正的一种中立形式。我对中国的访问；我在北京同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谈话；我参加万隆会议的经验——更不必提对马尼拉的访问——都结合在一起，指出了摆在柬埔寨面前的道路。中国人早已在向我们打听他们提供什么形式的经济援助比较合适。同苏联已经进行了联系。正当经济和军事压力快要达到顶点的时候，麦克林托克通知我们说他要递送一个重要讯息。可是到了这个时刻，不管是新首相钦·迪，还是任何其他大臣，都不肯接见他了。他被通知说如果要送什么讯息，可以让印度的临时代办米特拉先生转达。可是麦克林托克和米特拉——我的反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坚强支持者——的个人关系是如此之坏，以致于美国大使馆和印度使馆之间的来往信件不得不通过澳大利亚使馆来转达。就是这个臭名昭著的非外交家麦克林托克一手搞出来的情况！通过这种曲折的渠道，给美国大使约定一个时间来让他会见柬埔寨国王和王后，从而递送从国务院来的一封紧急电报。

这封电报宣布了美国在外交上的一个退却。美国将继续提供经济援助；到西哈努克城的著名公路将予以修建；国务院

并且作出保证说，美援将不附带“任何不利于柬埔寨的中立和独立的条件”。可是没有多久我们就会领略这一句话的真实涵义。我的父母对所发生的事情完全了解，而且还亲自领略过麦克林托克屈辱性的无礼行为。金边的外交使团对这次访问后发表的公报中的下面这段话的背景是十分清楚的。这段话的原文为：

正如国王和王后陛下同麦克林托克大使所共同认识的那样，国王和王后陛下同大使一起再次重申了这一原则：柬埔寨的外交政策只能由王国政府根据它的主权和在没有任何外国的影响下自己来制定。美国对柬埔寨政策的唯一目的是帮助柬埔寨加强和维护它的独立。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后来在企图反驳指责美国进行了经济讹诈的说法时所引用的就是这份公报。）

我把问题向人民公开的战略取得了成功。对气势汹汹的麦克林托克来讲，让他把他使用的语言冲淡到正常外交文牍的水平也就是衡量他所遭到的失败的一个尺度。没有一个国家会让一个大使象美国让麦克林托克那样把自己糟蹋到这种地步。

随着华盛顿的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它的两个卫星国也跟着这样办。国民大会开幕前两天，泰国和南越开放了它们的边界，从而结束了经济封锁。泰国声明它愿意把柏威夏寺的问题提交国际仲裁。虽然我欢迎这些行动，它们同时也是这两个国家完全屈从于美国政策的又一证据。可是

这一大转变不但来得太迟，而且明显到了已经没法影响大会的代表们的程度。在大会开幕的那一天，又发生了一个事件，这事件就好象点标点符号一样更突出了我在下面即将透露的一切。

在那些日子里，国民大会是在王宫的一个院子里举行的。召开这个大会向来是一个丰富多采的事情。穿了白衣服的外交官们聚集在主席台上。我作为民社同盟的主席，做了主要的报告，然后答复代表们提出的问题。代表们和从社会各阶层选出来的公众聚集在用国旗和绿色的树枝装饰起来的露天亭子里。在我背后的主席台上坐了内阁全体成员，各部大臣还得准备回答就他们职权范围内所提出的任何问题或批评。

这一次，在1956年4月21日那一天，正当我走到话筒前准备做我的报告的时候，麦克林托克大使站了起来，用他的头向其他外交使团的成员做了一个傲慢的姿势，要他们照着他的做法办，然后带着美国大使馆的其他成员大步走下主席台。作为外交使团的团长，他很明显地期望别人会跟着他走。有的人的确曾从他们的座位上欠起身来，但是法国的高级专员皮埃尔·戈尔斯——他的职务和地位比麦克林托克要高——留在他的座位上一动也不动，别人也就学了他的榜样。在我们的政府和从我国各个角落里来的代表们前面公开表现的这种无礼行为产生了同麦克林托克所企图产生的效果完全相反。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这一失礼行为——甚至于对美国国务院来说也太显眼了——他不久以后就被召回了。

我在对国民大会所作的报告里提到了封锁我们的边界对我们头一个两年经济计划所造成的损害不算大。我还谈到了

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可能性，我谈到我国最近同美国和我们的两个邻国的关系的缓和，还有准备同苏联、波兰以及随后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行动。我叙述了企图强迫柬埔寨接受东南亚条约组织“保护”的经过，以及我如何和为什么要在马尼拉和其他地方抵制这些压力。对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即“我们的中立究竟真有多么巩固”？我答复说：“你不是刚看到美国大使走下主席台吗？”

大会经过透澈的讨论，全体一致通过柬埔寨应该严格保持中立，不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或任何其他军事集团。大会还一致通过同苏联和波兰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至于从苏联和中国接受经济援助的问题，我指出，如果我们这样干美国有可能停止它的援助。有人问我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威胁我们说如果我们继续接受美援，它们将拒绝提供援助。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不是“没有”。但是我不想影响大会的决定，而且很谨慎地仅限于只提供真实的回答。有人发表意见说，如果我们由于接受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而冒犯了美国并且因而断绝了美援，其结果是我们将只从社会主义国家接受援助——从而断送我们的中立。但是最后代表们一致通过只要援助是不附条件的就接受社会主义世界的援助——美国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第二天早上，金边的一家报纸把这个结果描绘为“略为滑向左边”——这句话是很正确的。但是还不如说是被美国和它的两个卫星国推向左边去了。它们恃强凌弱的手法帮助教育了我和全体柬埔寨人民。国民大会的辩论进行了三天三夜，

而这些辩论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教育论坛。任何一个想发言的人都可以发言。由于把主席台上的实况全部进行转播,发言人不仅是在我和代表们的面前发言,而且是在对全国发言。代表们和反对党的成员只要说出他们自己是什么人,他们就可以登上主席台。这是每一个负责任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得不维护他自己的行动和思想的讲坛。

我曾经希望大会的结果——我们人民的大多数明确表达出来的意见——会促使美国人反省一下,但是他们仍然我行我素。麦克林托克的行为——起先我还以为只是他的乖戾的性格所造成——象征着一直到1970年3月18日的美国官方政策以及在这一天以后六个星期的赤裸裸的入侵。大会闭幕后,要求我们接受东南亚条约组织或放弃我们中立的压力似乎松动了一些。我们后来才发现这种压力只不过转到了地下,而且中央情报局的也把它战略改变为致力于在南越建立和扩大自由高棉部队来为发动政变作准备。

1956年末,我离开柬埔寨到欧洲旅行,这次旅行包括在苏联、南斯拉夫、捷克和波兰的停留——这是我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第一次访问。我回到柬埔寨,(在1957年初)召开了第四届国民大会——这一次有一个苏联大使和中国经济代表团的成员坐在主席台上。麦克林托克已被卡尔·斯托罗姆所取代,后者在我站起来致开幕词时并没有站起来离席。

尽管有人用美元贿赂了一些代表,第四次大会通过了一个正式的和永久性的中立法案。辩论拉得很长,因为有人怀疑把它写进我们的宪法是否可取。有一次,正当大会即将取得一致意见的时刻,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国会不喜

欢我们的中立法，并且投票切断经济援助，那该怎么办？保卫中立委员会的胡荣对我的问题作了回答。

他说，“如果我们对我们的中立是真诚的，其它国家应该尊重它。但是如果美国不尊重它，而且停止了它的援助，我们还有强大的朋友，我们可以转向它们求援。”胡荣的话受到了热烈的鼓掌欢迎，大会一致通过让国民议会起草一个包括下列几点的法律：

1. 柬埔寨是一个中立国家。
2. 柬埔寨不同其他国家缔结军事或意识形态的盟约。
3. 柬埔寨不侵犯其他国家，但是如果自己成了侵略的对象，它保留下列权利
 - (1) 进行武装自卫
 - (2) 呼吁联合国给予援助
 - (3) 吁请一个能够击溃侵略者的友好国家给予援助

这个法案后来被纳入我们的宪法。美国从来没有尊重过我们的决议，而且日夜都在企图使它丧失意义——其结果到现在已是举世共知的了。但是第四届国民大会是柬埔寨发展史上又一个里程碑，而中立法案在我们赢得胜利以后将成为我国外交政策的一块奠基石。

第六章 美元援助要付什么代价？

1956年，我刚辞去首相和外交大臣的职务后不久，从而不必再以官方身份见到那个令人讨厌的麦克林托克大使了。我陪母后到一个拥有最近运到的美国器材建成的新的妇产科诊所。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麦克林托克会跑来主持移交仪式。麦克林托克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身上散发出从事慈善事业的社会名流大老板施舍礼品给穷人的那种自我陶醉味道，不断地炫耀这些装备的质量有多么优越。他当着聚集在一起的外交官们的面转过来对我说，“啊，西哈努克亲王……这所医院应该使你这位伟大的婴儿制造者对它特别感兴趣。”*

我回答说，“不，大使先生。不会再有婴儿了。那些本来有可能到这个诊所来的婴儿已经闻到了美帝国主义装备的臭味。他们宁可永远留在他们所在的地方而不愿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生。他们不喜欢这种臭味。”这些话引起外交家们的一阵窃笑。麦克林托克满脸通红，远远地躲到母后的那一边去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当着我的面做出的失礼行为。

这虽是一件微不足道的轶事，但是它却生动地说明了接受美国的礼物会给我们的民族尊严带来没完没了的侮辱。因

* 根据柬埔寨王室的传统，西哈努克有六个妻子——他的祖父有六十个妻子——和十三个孩子（编者注）。

为美国人显然期望我们忘掉我们的尊严，忍气吞声地咽下他们对我们进行粗鲁的凌辱，而且还要我们奴颜卑膝地对他们表示感恩戴德。美国外交官们在口头上损害我们的天才尽管有时候是最能伤人的，但这种天才却是他们的品质中为害最小的，乍听起来这好象是荒谬的，但事实却如此。

我很快就发现的是我们接受他们的“援助”就等于让自己感染上一种使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毒的病毒。我试图抵制他们的“美元外交”，但是它就好象是一种从表面看不出来实际上却很厉害的瘫痪病——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治疗了。即使在我把援助完全切断以后，这种病毒还继续在起作用。我们政府里的最高一层的“美元迷”，为了让美元能重新流入，不惜犯叛国罪或破坏我那些堵塞漏洞的措施。

当个事后诸葛亮，美元“援助”是用来收买卖国贼的，这一点现在是看得很清楚了。柬埔寨十年来每年接受一笔并不太大的援助——两千五百万美元，据说是用以恢复遭到战争破坏和殖民主义者掠夺的经济。我也曾很天真地以为可以用这笔援助来改善我的同胞的生活。但等到情况转变为要屠杀我的同胞的时候，这笔钱却突然一下子可以螺旋式地上升到每年四亿美元。

雇用亚洲的卖国贼来杀害亚洲的爱国人士：这就是尼克松主义的实质，在尼克松主义的名义下，柬埔寨已经变成一片废墟。如果美国的纳税人能够看到他们的钱在我国被用来干什么，他们准会感到恶心。

首先，我当初为什么会接受美元“援助”呢？当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结束印度支那这场战争的时候，美国通过直接提

供给巴黎的贷款已经在支付百分之八十的战争费用了。法国又从这笔钱里拨出一部分给柬埔寨军队和政府，并且作为在那里进行战争的经费。随着柬埔寨的获得独立——以及后来战争的结束——美国人不再付钱给法国，并且建议要直接付给柬埔寨。法国人反对这样办，但是没有进行争辩的力量。美国最早向我们作的主动表示是以下列主题为基础的：为了在保卫“自由世界”中起到我们应该起的作用，应该扩充我们的军队并使之现代化。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向我们描绘了即将发生的“共产主义侵略”的幽灵，用实例说明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美国愿意支付这笔钱——并且还愿意在其他方面提供财政援助。

我们必需有一支军队——但是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修补遭到战争破坏的国家基础结构，建立起同外部世界联系的独立体系，修补公路和桥梁，以及在为我们长期遭受苦难的人民提供一些生活必需品方面做一些事。我们特别希望改善教育和卫生设备。所以我很感激地同意接受财政援助。但是从一开始它就成了贪污的源泉。

除了属于纯军事用途之外，美元主要被用于支付消费品的进口。进口商把瑞尔按三十五个瑞尔折合一美元的官价汇率付给一个所谓“对等基金”，而政府则可以从“对等基金”里提取这些瑞尔来给军队发饷或作为经济建设工程的经费。这种情况很快就发展成为进口商之间为了捞到一笔尽可能大的美元横财而进行的疯狂争夺，可是这些美元却被他们用于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毫不相干的用途上。在最上一层，都是由美国人来决定谁应该得到多少，美元的分配额往往和领受者在

政治上进行合作的程度成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合作就意味着得把我们柬埔寨人关于中立和独立的概念予以破坏。

对于那些经手颁发进口许可证以及管理分配随之而来的美元分配额的人们来说，贪污是很有油水的。对那些海关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在发现实际进口的货物往往同分配美元时作为依据的货单毫无关系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贪污也是很有油水的。我们后来发现这些美元的很大一部分都被存在香港的银行里，而在分配美元时规定该进口的货物，如果不是从来没有进口过，就是只进口了同批给的美元数额相比起来是微乎其微的数量。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进口商”，他们用进口急需货物的名义按官价取得美元，然后以官价的两倍或更高的价格在黑市出售，再把得到的钱按官价重新结汇到美元，而且这种办法可以无休止地干下去。

赞扬美“援”最厉害的人也就是依靠这种办法养肥了自己的人们。由于美国人参加了控制“分配美元”和“对等基金”的机构，他们从一开始就卷入了这种贪污活动。有人听见一个好说挖苦话的美国人吹牛说，“对等基金”是发明车轮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基金的管理人有意识地在培养一种在推动美国的政策方面有既得利益的买办阶级；这种买办阶级对发展我们的经济一点都不感兴趣。如果我们开始从我们自己的工厂生产本来该由他们进口的东西，这种非法买卖就没法再进行了。这些新买办们不仅反对而且还破坏我的各项政策，从一开始施里玛达就是这伙人的头头。

当我谈到“佛教社会主义”以及当我在民社同盟盟内强调

“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时，不仅右派分子讥笑我，很多左派分子也在嘲弄我。但是我知道，而且在战后的头几年里也曾反复指出过：没有经济和财政的独立，就没有政治的独立。我们并没有一个工业家或制造商阶级可言，因此我赞成建立一些国营工业，同时协助发展私营部门的手工业型小工业。

我曾经宣布要在中国的帮助下建立生产水泥、纺织品、纸张、胶合板、农具等产品的工厂。我们的资本家们既没有发展这类工程的钱又没有这种愿望。如果我们想要有这种工厂，就必须由国家来建立和经营。没有这种工厂就等于永远让我国处于一种发展不充分或根本不发达的状况，并且得靠美国的施舍来过日子。中国的援助是完全赠与的，不附条件的，而且其目的是明确地为了发展经济。它是以一种丝毫不带家长作风或施舍味道的精神提供的。

1956年2月，我在向民社同盟第三届内阁作的报告中把我的立场说得很明确。我说我们不要资本主义。在我们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我说我们的资本家感兴趣的只是自己的发财致富，对被他们雇用的人员和国家资源进行无耻的剥削而不给国家或被雇用人员一点报答。

为得到更大份额的美元援助而争吵是同民族尊严和佛教观念格格不入的。美国既不会向国营工业提供美援，也不会向任何为之服务因而与它们有关的工业提供美援。很快就在反对工业发展的买办中形成了一种既得利益。他们还利用他们的美元收入在国民议会中收买支持者；并且在那里建立起反对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强大的院外游说集团。不言而喻，这

些人后来都当上了朗诺-施里玛达政权里的头目。

对中国所提供的援助的利用遭到了破坏，因为中国准备兴建的工厂所要生产的就是买办们装模作样要进口并靠了它们发大财的商品。排斥中国和苏联的援助不但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且首先符合美国的政治利益。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利益和买办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对后者来说这就等于是卖国。美国经济“援助”的用意是要把我国的经济不可改变地纳入所谓的自由制度中去，而这种制度正象人们可以在泰国和南越看到的那样，只不过更强化了社会的不公平，并且毫不符合一个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的需要——更不必提在丧失独立这一方面的灾难性政治后果了。

没有用几年功夫，而且是完全倚靠对美元“援助”的操纵，美国就在我国国内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游说集团，也就是一支致力于破坏中立政策和把柬埔寨置于东南亚条约组织保护下的政治上的第五纵队。要是能如愿以偿的话，那么花掉一些美元的奖赏可就太大了，就象天空是没有边那样大。这倒也不假，只有从B-52飞机在天空中跟下雨一样扔下来几万吨炸弹带来了死亡和毁灭除外。可美元还是象流水般地倾注了进来哟！

我是不可能掌握在经济领域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更何况还有些集团，它们的任务就是不让我知道这些情况。可是，1956年12月发生了一次内阁危机——表面看来是由于未能惩治贪污腐化所造成的，实际上却是由于为了制止货币投机和黑市活动而采取的一些措施。这是买办们——其中包括一些前任的内阁大臣和政府某些部门的头头——采取的第

一个公开的政治行动。虽然我曾经努力挽救它，内阁还是倒了台。我有证据证明美国大使馆和比较有钱的买办们曾经收买了足够的国民议会代表来否决我的建议。

内阁倒台的时候，即将发生政变的谣言传得很凶，但是看来美国人还没有发现一个能搞成政变的铁腕人物。我对付这个新危机的办法是象我在前一章里所叙述的那样，召开了民社同盟的第四届国民大会。但是要讨论的还不止是中立法案。首先该讨论的是国民大会和国民议会之间如何分工和彼此之间的关系问题。我担心的是国民议会代表全部被收买——危机的直接原因——这件事的影响。然而，就算国民议会九十一名代表中的大多数会被人收买过去，但想要收买国民大会几千名来自基层的代表还是不大可能的。这不但是由于他们人数很多，而且还由于他们有崇高的道德。

在我的开幕词里，当着新来到美国大使卡尔·斯特罗姆的面，我提到了这么一个事实：根据我们的警察局的情报，“由国外出钱支持的暴乱活动正在准备之中”。我提到了“那些聚集成小集团的政客和野心勃勃的个人，他们为了某一个外国的利益而夺取政权，随时都准备置对方于死地”。我警告说，外国人并不白白给人东西，尤其当他把金钱赏给那些个人野心已经使他们可以把民族的更高利益都丢到脑后的人时，那就更是如此了。我说，“事情很清楚，我自己和民社同盟都成了这些人经常攻击的目标，因为我们居然敢以同我们国家的大小不相称的勇气和精力来推行我们的政策，这是他们永远不会宽恕我们的。”十六年以后重读这篇讲话，它真是对1970年3月18日以来发生的事情的十分恰当的描述。

我提到了在我访问社会主义国家时，它们表示要送给柬埔寨的各项礼物(其中包括苏联送的一个有五百个病床、全部装备好和配备好人员的医院，以及中国、波兰和捷克明确许诺的经济援助)，并且指出这些礼物的接受正在遭到反对我们的独立发展的内外敌人的破坏。

在讨论时，有人带刺地提到国民议会和民社同盟中有某些人已经被人用外国人的钱收买过去了。在这个时候我扔出了一颗炸弹：我提议应使国民大会成为国家最高的决策机构。它的决议应对国民议会有约束力。这样就可以排除大多数议会代表被人收买从而可以阻挠或者改变国家基本政策的可能性。国民大会将继续每年召开两次，以便确定主要的政策。国民议会的作用将是讨论、批准和执行国民大会的决议。这是一个大胆的和深远的行动，它可以暂时抵挡住利用美元贿赂来颠覆国民议会——从而也就是颠覆国家政策的企图。我的敌人以“缺乏民主”为借口，推翻了政府。我拿一种更纯正的民主来回敬他们，使得他们惊愕得发呆。我想我通过这样一个行动，为柬埔寨的和平和中立赢得了很多年——具体来说是十三年——的生命。

只有这样，人民的意志才能真正地得到体现。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意见是非常宝贵的东西。必须让人听到人民的声音，而且只有通过国民大会才能使这种声音最充分地发挥其作用。国民议会的代表们和大臣们为了自己的重新当选每隔四年才同人民见面，这是不够的。他们应该每六个月到这里来汇报一

下他们的活动。他们应该回答人民提出的问题；聆听人民的劝告；说明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

我的反对派被我的这番话吓呆了，以致于没人敢走到话筒前来发言。谁要是反对这种比较广泛的民主决策形式——一种古希腊式的民主——谁就会把自己同受贿者和贪污者等同了起来。所以有罪的人都噤若寒蝉而且找不到代表他们发言的人。人民党（或共产党），正象我知道他们肯定会的那样，立即支持了我的建议，因为他们过去曾经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作了一些细微的修改之后，这个建议几乎是在没有一个人反对的情况下得到了通过。从此国民大会将享有最高的权力，而且到1969年12月举行它的最后一次会议时都一直如此。3月18日政变以后，它就完全不起作用了。

国民议会的权力就这样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如果它拒绝批准国民大会的一个决议，它充其量只能把它退给下一届的国民大会再议，由后者作出最后的决定。如果国民大会的代表们不能就某个问题达成协议的话，它可以把这个问题提交全国公民投票表决。

我的宿敌们，其中包括后来废黜我的那些人，坐在主席台上除了把他们内心的忿怒隐藏起来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在大会通过这一措施时，他们的脸部都似笑非笑，只是有礼貌地跟着别人一起鼓掌。后来有人指责我，说我出于我个人目的操纵了国民大会。我的答复是：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准许采取这种直接形式的民主？还能够找出一个更好的真正体现人民意志的方式吗？诚然，柬埔寨的大小——同古代的希腊和今

天的瑞士相似——有利于这种人民和立法者之间的直接交锋。我的敌人依靠他们的金钱和在阴暗角落里耍弄花招，而我却让阳光照射到当前的问题上。我随时都准备同人民的代表进行讨论，而且需要讨论多久就讨论多久。我当然认识到，我作为过去的国王和王室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为我提供了一个我的敌人所没有的有利条件。但是如果我所支持的事业是不正义的或者违背人民利益的话，我既不会——也不敢——提倡它。如果我是为我的敌人的事业说话，我深信人民也不会支持我。

“民治、民有、民享”——尽管从来没有那么精确地提出来过——几百年来一直是我的王室祖先们在处理公共事务时奉行的格言。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君主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君主制，而我自己是第八十四个被加冕的国王。

美元攻势是千变万化的，正如下面两章里将要提到的那样，后来又采取了其他的形式。可是那些希望通过一个为金钱而听人使唤的国民议会来“合乎宪法地”接管权力的人却不得不再等待十三年。象懦夫那样乘我不在国内的时候发动攻击，并且违反了把国民大会置于国民议会之上这个受人民欢迎的决议。可是到这个时候，柬埔寨人民的政治觉悟，部分地由于他们直接参与了国民大会的辩论，已经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在那个重大的第四届国民大会上，为了制止人们把捞取美元当作职业，一些身居要职的贪污分子被迫向代表们解释他们的活动。结果是把他们的档案材料送到法院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在我的开幕词里说，我们已经“到达我们历史上

的一个转折点”，而且国家的幸福从此有赖于“我们人民中优秀分子的觉悟和我国全体人民。但愿这种觉悟再次恢复它的纯粹的民族特征，我们的国家也会重新获得自由和平”。这就是我国十多年来有相对的和平和繁荣的道理。虽然这种相对的和平和繁荣在 1970 年 3 月被突然断送，不过在锻炼民族团结方面还是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回顾起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美国的恩赐被限制在每年大约两千五百万美元时我们的日子过得还可以，可是当我们最后由于我在后面几章中将要详细解释的理由而废除一切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后，我们的日子就过得更好了。然而朗诺和他的追随者们每年堂而皇之地拿了三亿四千一百万美元*的卖国酬金去干了些什么呢？政变后的头几个月，他们就用这笔钱来摧毁我们在过去十六年里建立起来的东西。大学、普通学校、医院、工厂、水坝、水电工程、橡胶园、诊所、运动场、几十座城镇、成百个村庄、成万幢住房都被炸弹和凝固汽油弹从我们祖国的地面上给抹掉了。没有把钱用来搞建设，而破坏却是没完没了——这就是美“援”在柬埔寨的教训。

再也没有比这样一个事实更能够说明追求美元的人堕落到什么地步：朗诺“元帅”和施里玛达“将军”把他们的榴弹炮对准吴哥窟——我国古代光辉历史的独特而又无法取代的文物。朗诺的军队发射的炮弹造成了无法修复的损害，这些炮弹在吴哥窟南大门的上半部爆炸开来。但是特别是掉在地面那一层回廊的炮弹所造成的损害，把用寓言形式表现我国

* 我引用的是 1971 年的官方数字，可是别人——包括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在内——曾经引证多达十亿美元之数作为摧毁柬埔寨的年度经费总额。

人民历史的精美浮雕炸成粉末。法国人在他们进行征服和再征服的殖民战争中以及日本人在他们占领柬埔寨期间，都很尊重吴哥窟。只有我们民族的败类才会犯下这种暴行。在今后的一千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将会遭到人们咒骂。那些惯坏了他们并用美元把他们喂肥的人们也同样要遭到咒骂。再也没有比他们居然敢于用他们的大炮对准吴哥窟的寺庙进行轰击这件事更能够象征他们的贩卖行为了。

尼克松总统曾经解释说每年用于官方批准的对柬埔寨人的大屠杀的三亿四千一百万美元是“美国在我的政治生活中所作的最好的援外投资”。*由于柬埔寨战役的“成功”，“美国的死伤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二，已经有十万个美国人返回美国，而且还有更多的美国人正在返国途中。”**换一句话说，朗诺和施里玛达通过允许尼克松把战争从南越输出到柬埔寨——也就是说用柬埔寨人的尸体来取代美国人和南越人的尸体——已经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而对这种贡献来说，每年付出一笔三亿四千一百万美元的钱还是很合算的。

如果这种买卖在刚开始时还不太清楚的话，施里玛达在同〔巴黎〕《世界报》的克里斯琴·霍维拉克的一次谈话中——发表于1971年12月3日——就讲得很清楚了。霍维拉克问道，“越南的战争毕竟不是已经输出到柬埔寨去了吗？”施里玛达答复说，“是的，正是这样，而这就是印度支那战争的真正关键所在。我们从头一天起就明白这一点。如果共产党人没法粉碎我们的抵抗，他们也就没法在面对南越一百卅万人的

* 根据国际合众社1970年10月10日的报道。

** 1971年2月16日对记者的一次谈话。

大军的情况下取得成功。”

美国负责亚洲事务的副国务卿马歇尔·格林说，“我们的问题不是如何撤出亚洲，而是如何找到合适的方式留在亚洲”。* 他还声称柬埔寨的行动计划已经把印度支那的战争费用从每年二百九十亿美元减低到一百一十亿至一百四十亿之间。参议员乔治·麦戈文在谈到印度支那战争的扩大和尼克松主义时说，“我们出钱让他们互相残杀，在这同时我们就可以缩减我们自己的部队。”**

格林的一句话也许把美国帮助出钱用亚洲人打亚洲人、印度支那人打印度支那人和柬埔寨人打柬埔寨人的真正好处的实质都给概括出来了。他说，“美国在东南亚力量的缩减不应该意味着我们的私人资本在海外活动的缩减，也不应该意味着我们的商业和投资利益的缩减。”***换一句话说，只要朗诺、施里玛达和山玉成之流还在，印度支那对美国的投资来说就是安全的。

因为我不准备接受对我的国家的这种糟蹋，并且准备同任何一个打算这样糟蹋我的国家的人进行斗争，于是我就变成了无数的阴谋和暗杀企图的对象，其中有一些我将在后面几章里加以描述。

* 根据美联社 1970 年 12 月 25 日的报道。

** 根据国际合众社 1971 年 2 月 22 日的报道。

*** 根据国际合众社 1971 年 1 月 13 日的报道。

第七章 “达琼阴谋”

1958年6月，我受到一次重大的冲击：西贡的军队侵入我国东北部的上丁省。他们渗透的深度约有九英里，并且看来准备长期留驻下去——他们甚至树立起了新的边界标志。尽管这已经够糟了，然而最使我感到震惊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发现由于我在接受美国的军援，我被剥夺了驱逐入侵者出境的权力。至少，美国大使卡尔·斯特罗姆就是这么解释的：美国提供的军援只能用来抗击共产党侵略者，绝对不准用来打美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盟国。

我一开始就请斯特罗姆运用他的影响劝说吴庭艳撤出他的军队。这个大使的回答是，美国不能干涉双方都是美国的朋友的两个邻国之间的争端，并不存在什么争端嘛，那是一个公然入侵的案件。

我回答说，他逼得我除了让我的军队处于戒备状态准备打仗以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这位大使的反应可以同麦克林托克最坏的表现相比。他说，如果有人由于愤怒而向受美国保护的一方发射出一颗子弹的话，美国的军援就会中止。事情还不仅如此，甚至于连利用一辆美国供应的卡车来运输柬埔寨军队同一个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进行军事对抗都足以构成取消援助的理由。我徒劳地争辩说，并没有共产党侵略者在威胁我们，而且对我们的边界的唯一威胁来自于南越和

泰国。斯特罗姆发出的第三条命令可比头两条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我暗示说，这样我就只好考虑其他的军援来源（意思是指中国），斯特罗姆回答说，美国的军事援助只是在不准接受者从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军援的条件下才提供的。

如同我在当时发表的一个讲话里所解释的那样，把话说得更清楚一些，我们接受援助只是出于一个原因：为了保卫我们的领土完整。可是，由于提供援助所根据的条件限制，当我们的边界遭到侵犯和我们的领土被别人占领时，我们却只能坐在一边袖手旁观。这一切要到什么时候才算个完呢？我们迫切需要成为我们自己家里的主人，至少是在有关国防方面应该如此。我们必须采取“更合乎逻辑和理性的政策，更合乎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的生存所需要的政策”。

那年8月，我第二次访问北京。西贡的军队仍然盘踞在我国领土上。我和毛泽东主席就最近发生的危机进行了几次长谈。由于这次访问的结果，我们两国之间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还同意为我们建立一些工厂。正如人们可以期望的那样，外交关系的建立很快就激起了中央情报局的怒火。这一次这种怒火要比我1956年访问中国后所表现的那种形式还要更为具体。

他们正在培养、准备用来推翻我的那个人——山玉成——当时正在南越和泰国建立他的自由高棉根据地。在这里需要用几句话来说明一下这个一辈子搞阴谋的人的品质。他过去是一个宗教教师，给民主党担任过宗教顾问一类的职务，在日本占领军下面担任过傀儡首相和外交部长，从而被法国

人作为卖国贼判处死刑。我曾经向法国人说情给他减刑，后来还免除了对他的流放，以便他能回到他的家乡。从此他就一直在想谋害我。为中央情报局服务是他的罪孽的一生中合乎逻辑的一步。他们把他树立为自由高棉的领导人，同时接管了在南越和泰国边境地区的根据地和训练营，为突击队提供经费、训练和装备的工作。山玉成任命桑·萨里为自由高棉的副领袖，此人曾担任过副首相的职务，在1957年由于一件丑闻被我撤职以前是我们驻伦敦的大使*。

1958年9月，大概是我从北京回来后一个月左右，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理事会在曼谷开会。它的议程表上有两项主要议程。一个是美国要把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把台湾包括在内的计划。尽管美国太平洋海军总司令哈里·费尔特上将作了努力，这个计划还是没有通过。（当时“近海岛屿的危机”正达到顶点。可是有了朝鲜的经验以后，美国的欧洲盟国已不再热心于为美国火中取栗了。）第二个议程是怎么对付西哈努克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罪行”。大多数的意见决定应该采取“某种措施”，这真是使我感到荣幸之至。至于采取什么措施则留给泰国政府和它的中央情报局顾问们去决定。由于那位经验丰富的阴谋家约翰·普里福伊也在场，而且头上还戴着在希腊和危地马拉搞阴谋而获得的桂冠，毫无疑问不久就会有所行动的。

* 桑·萨里把一名使馆的女佣人当小老婆。当她怀孕后，他打了她并且用别种方式虐待她以致于有一天她逃到街上并被伦敦的警察所拯救。桑·萨里居然无耻到了敢于声称他只是在根据柬埔寨的传统习惯行事。他后来同山玉成的交往是短命的。他在老挝神秘地失踪了——传闻说他被山玉成搞掉了，因为山玉成是一个从来不能容忍对手的人。

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开过以后三个月，在曼谷召开了一次并未加以大吹大擂的阴谋碰头会，由沙立·他那叻元帅主持。这个人夺得政权后，根据泰国的传统方式成为一个军人独裁者*。与会的还有别的将军们，以及山玉成和吴同友（音译）（西贡驻金边总领事，同时又是吴庭艳的亲戚）。当然还有普里福伊手下的一些中央情报局特务。

会议作出了三项决议：

1. 出钱支持以推翻我的中立政府为目标的柬埔寨反对党。
2. 通过绑架、武装抢劫和散布共产党即将接管的谣言来制造不安全的气氛。
3. 在柬埔寨境内组织武装团体，为发动政变的那一天和那个时辰做好准备。

山玉成将把他的自由高棉部队集结于泰柬边境，他手下有两名泰国军官和中央情报局提供的一百多万美元归他支配。吴同友答应将在南越—柬埔寨边境集结数量相等的下高棉突击队。我们在暹粒省和磅同省的武装部队司令达琼将军（我当时对这个军官的忠诚一点都没有怀疑）和桑·萨里将在柬埔寨本土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协调联系、安排给养和经费

* 沙立·他那叻在国外呆了十个月以后——其中大部分时间是以“健康的理由”呆在美国——于1958年10月19日秘密返回曼谷并且在次日举行了一次军事政变。“为了表现他对自由世界的忠诚”，他在第二天宣布一切政党都是非法的，宣布戒严，并且逮捕了政治领袖、编者和新闻记者们。1958年沙立的政变和1970年朗诺的政变（在朗诺以“健康的理由”为借口在国外接受了长期的政治准备以后）之间所存在的相似之处已经无需评论。我们也无需评论下列事实：美国为了能有愿意执行它的政策的政权，最终不得不在西贡、曼谷和金边建立起军事独裁制来。

的工作则由一个驻在金边美国大使馆的中央情报局特务——一个叫做维克托·松井文雄的日裔美国人——来担任。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家伙，他在1966年由于从事颠覆活动而被驱逐出卡拉奇。他和吴同友两人合作得很密切。

1958年秋天，我率领柬埔寨代表团到联合国去开会，会后我因公到华盛顿去。我会见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他给了我一些家长式的劝告，会见后我到阿林敦国家公墓献了一个花圈。我回到联合国以后，我的代表团的成员告诉我说我不在的时候斯拉波几乎把他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美国人身上了。他同他们举行了无数次会议——甚至于在他的旅馆房间里开会——但是却从来没有同任何人提到这一点。斯拉波在金边曾经是松井很密切的朋友。他的哥哥达琼将军曾经利用他自己的影响让他当选为代表暹粒省的国民议会议员，从而使他进入了政界。

达琼还安排让他的弟弟到印度去学英语。他弟弟大概最初是在印度被中央情报局所吸收，参加了我的代表团以后就成为松井、吴同友和达琼之间的自然联系人。

一切似乎都在接着曼谷的计划进行。1959年1月，桑·萨里发给我一封公开信，要求准许他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和这封信同时散发的几万张传单很明显地表明，这个新政党将努力推行一种比较亲西方的“中立主义”，并且企图让我们国家偏离它由于美国干涉我们内政而不得不采取的不退让的中立立场。〔传单里〕还有煽动人们反对君主制和我们的传统制度的呼吁。人们可以看到山玉成伸到每一个角落的黑手。显然，它的真实目的并不是要成立一个政党而是要制造混乱。

在彼此相隔很远的地方发生了抢劫和绑架事件——特别是绑架著名政界人士的儿女。山玉成集结了三营自由高棉的军队，以马德望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被泰国占领）为目标；下高棉突击部队也开始从南越的西宁省和建祥省渗入我国领土。达琼悄悄地把他的部队集结在暹粒省和磅同省的战略要点，甚至于还把他的一些人安插到金边的王宫内部。这一点并不困难，因为即使当我开始风闻到这个阴谋时，我也没有怀疑到他身上。

总的来说，我们的情报网很不错，而且我们还很幸运，有些国家的使馆工作人员对我们很友好。除了接到我们自己的报告之外我们还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国大使馆的警告说，有些讨厌的事情即将发生。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掌握了可以采取行动的足够证据。1959年1月13日，正当形势似乎一触即发的时刻，我在磅湛发表的一个讲话里透露说，我们发现了一个阴谋，目标是搞掉我，夺取最高的权力，成立一个亲美的傀儡政权和结束我们的中立。

这个计划是由同我们毗邻的某个王国的元帅兼政府首脑、某个邻国的使节和山玉成一起制订的。好象夜间活动的猛兽被猎人的火炬把它的眼睛照得啥也看不见一样，秘密策划的阴谋一旦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会变成泡影。

结果是，虽然我的揭露在最高层这一级给西贡—曼谷的阴谋家们泼了一盆冷水，但在柬埔寨国内却还需要把不少事

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要在国内把阴谋搞个水落石出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在磅湛发表讲话后一星期，已经掌握了可以对桑·萨里下手的足够证据。我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逮捕了他的大部分心腹。但是，由于松井和吴同友的一些迅速对策——以及我多年以后才发现的那样，朗诺和他的一些高级助手的叛卖——桑·萨里逃跑了。我们的军队沿着边界采取的预防性行动挫败了他们这个计划的主要部分。

2月初，我收到有关在暹粒市发生的不寻常的事情的报告。吴同友在突然动身去西贡以前，对达琼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访问。2月7日，“建华电影公司”的两个中国人从香港带来了几大箱的器材——全部都装在达琼的别墅里。同一天稍晚一些时刻，一位更高贵的客人——哈里·费尔特海军上将——来到暹粒机场，他也是去看达琼的。

位于吴哥古寺所在地的暹粒是习惯于接待贵宾的，但是在这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人们对柬埔寨古迹所表现的兴趣是空前的。在费尔特海军上将之后十天，劳顿·柯林斯将军来到了。他曾经相当粗暴地从法国人手里接管了训练南越军队的问题。下一个在游客登记簿上签名的居然是中央情报局著名的搞阴谋活动的专家爱德华·兰兹戴尔上校。就是他一手让吴庭艳在西贡掌权，并且帮助〔南越〕把法国人一脚踢出去的。最后，太平洋舰队司令霍普伍德将军也顺便来参观吴哥古寺并且和达琼一起喝了一杯威士忌苏打水。

我还听到了其他细节。两名“中国人”实际上是南越人；他们的“电影器材”装配好以后就是一架强大的发报机，并且开始把它装在吴哥窟周围的丛林里。达琼在从金边到暹粒

的所有公路沿线都设有岗哨网，用来向他预先警告从首都方向来的任何军队调动。但是，当我在(1959年)2月21日决定派军队去逮捕他的时候，也就是这些关键岗哨上的哨兵把我们的部队领到要害地点，使他们能够不开一枪就进入暹粒，也没有让达琼事先得到警报。当他开始发现他的阴谋已经完蛋的时候，他正在他的别墅花园里散步。他逃跑到附近的一个村庄以后才被打伤并被活捉。

接着发生了一个很怪的事件，其细节我是一直到3月18日政变以后才获悉的。我把逮捕达琼的任务托付给当时的武装部队参谋长朗诺将军。为了澄清整个阴谋，我要求活捉达琼。朗诺当时报告我说达琼在企图逃跑时受了致命伤。事实上他只受了轻伤，而且在被捕时还坚决要求把他带到一名高级军官那里。朗诺的反应却是把他枪毙。达琼当时是在要求准许他发表一个声明。后来得到的证据证明这样将会把朗诺和阴谋牵连起来——因此才要杀掉达琼以灭口。当时我在脑子里想到过，关于暹粒所发生的事情的情报来自于直接同我联系的下层消息提供者，而不是通过朗诺的渠道发来的报告；可是在挫败了那么大一个阴谋的欢乐声中，这个细节却被忽略了。

两名无线电操作人员是在达琼的别墅里被逮捕的。他们持有南越护照，但是没有签证或图章表明他们进入了柬埔寨。他们的无线电器材和达琼同西贡和曼谷之间来往电讯的记录本一样都被没收。被没收的还有二百七十公斤用来支付给特务和突击队的小金条。有大量证据证明松井、吴同友和斯拉波所起的作用。松井和吴同友被驱逐出境；斯拉波被当作卖

国贼枪毙了；西贡的无线电操作人员被当作间谍枪毙了。所有这一切证据都拿给斯特罗姆大使看了。

1959年3月26日，我陪二十来名外交官——包括美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法国的外交官——亲自参观了达琼的别墅，让他们亲眼去看一看。展品包括各种美国武器——并不是在美国军“援”范围之内提供的武器。

“达琼阴谋”立足于两种可能性，一个高限的可能性和一个低限的可能性并附有根据不同情况可供选择的次要方案。由于桑·萨里的被揭露和逃亡而遭到挫折的高限可能性是，干脆用军事政变的办法夺取最高权力。原来还设想会有一支从泰国和南越进入柬埔寨的部队同达琼的部队会合，从而打开一条经过柬埔寨把越南同泰国联系起来的走廊。低限可能性——阴谋家们对于能够成功这一点似乎毫不怀疑——是把北部各省同柬埔寨的其余部分分割开来，并把它们和老挝的南部各省合并，组成一个新的分裂主义的国家，这个国家将立即会得到美国的承认。老挝的右派文翁·占巴塞亲王据说已经同意了这一点。这将成为进而接管整个柬埔寨的一个出发点。所有这一切潜在的威胁都被挫败了，这是由于外国朋友的及时警告，我的基层军队的警惕性和忠诚，以及尤其是由于暹粒的地方民兵，他们第一个使我警惕正在达琼的别墅里发生的事情。

“达琼阴谋”只是1959年在我国发生的很多邪恶的坏事之一。六个月以后，即8月31日，按照我过去当我们大家都一起在金边时候的习惯，我正准备到王宫的御座大厅去见我父母。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会在一起拆看每天早上收到的邮

件。这一次，我由于我们的宋双首相即将率领我们的代表团到联合国去，我们两人要讨论一些事情而稍微迟到了。他表达了希望向我父母辞行的愿望。这个时候一部分邮件已被拿进大厅，其中包括一包给我母亲的礼物。她通常总是亲自打开这种礼物，可是为了节省时间，而且也因为宋双正等着要动身到机场去，她把这包礼物送到一间前厅里去打开。当首相刚一进入御座大厅，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正在打开这件邮包的典礼局长瓦克利旺亲王当场被炸死。很厚的混凝土地面被炸开一个窟窿，炸死诺罗敦·苏拉马里特国王的私人贴身男仆，炸伤了另外两个仆人。一枚爆炸力特大的炸弹被隐藏在一个小漆匣里，而且被拨好了在它的包装被打开时爆炸。王宫立即用警戒线围了起来，所有在场的人的姓名都被查了一遍。我的卫队发现了桑·萨里的一些亲属，这些人供认，桑·萨里曾要他们那天早上到王宫里来，并向他报告任何异常的事件。当时桑·萨里正和山玉成一起在西贡。我们查到了这件致人死命的礼物的来源，并且确定它是从南越的一个美国军事基地寄出的。

我的父母并没有受伤，但是我深信这次惊吓加速了我父亲的死，这位仁慈的、普遍受人爱戴的国王是在七个月以后即六十四岁时去世的。在这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1月一家印度报纸发表了桑·萨里写给埃德蒙德·凯洛格的一封信的复制件，后者是中央情报局派到金边美国大使馆的政务参赞。这封信是1959年9月3日发出的，信件对8月31日的失败表示遗憾，并且说“只有最有效的措施才能帮助我们达到我们的共同目标”。根据这个复制件，桑·萨里表示“完全同

意你们的大使威廉·特林布尔阁下的意见……而且我今后可以倚靠他的帮助和合作”。这时，特林布尔已经接替卡尔·斯特罗姆担任美国驻金边大使。

后来达琼事件被我创作的一个电影——《吴哥阴影》——作为主题。很多西方人以为它是过分活跃的想象力的产物。可惜我当时还没有足够丰富的想象力可以预见到中央情报局正在凭空想出的那个荒诞不经的阴谋。

中央情报局在每次谋害我和我的国家完整的阴谋中总是站在最前列（只有当它认为他们不应该抛头露面时除外）。从1954年开始，一直到1965年断绝外交关系时为止，我的情报部门列举了二十七名已经知道的中央情报局特务被登记为驻金边大使馆的外交官，而这名单肯定还不完整。他们还得到驻西贡和曼谷使馆的几十名其他同他们密切合作的特务们的支持。对那些仍然怀疑美国是否通过中央情报局卷入了3月18日政变的人，我除了敦促他们研究达琼阴谋的细节和漆盒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第八章 幸存的奇迹

在3月18日政变发生后纷纷出笼的那些评论中——有的读起来象是有关我的为时过早的政治讣告——最常见的一个主题是，我的中立主义的政权居然能够幸存如此之久，而且我们这个和平的绿洲居然没有被环绕在我国边界周围的流沙般的战火所吞没，这着实是个“奇迹”。很多人在议论我，说我为了维护我国的和平、独立和中立，在各个大国和我的那些遭到战争之祸的邻国面前，演出了奇迹般平衡技艺。

甚至那些瞧不起我，当我在进行紧迫万分的外交斗争时还把我看成是“花花公子亲王”或“吹奏萨克斯管的王子”的人，考虑到我现在已不在台上了，也找出了几句入耳的话，赞扬我走钢丝的技艺使柬埔寨的完整得以维持那么久。当然，由于我已经“完蛋”了，对我宽厚一点也算不得是什么豪举了。当我无法再表演奇迹的时候，想马上把我埋葬掉的人中，不仅仅只是那些国际政治评论家们，还包括一些外交官们在内。

例如，我就听说有一个安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大使在政变后立即对他的同事们说（而且甚至发了一个内容相同的电报给他的政府），“你们不久就会看到西哈努克想要在某家法国电影制片厂找个导演的工作干干。”事实怎样呢，我仍然是国家元首。我多么希望后来那位大使并不是因为我没有按他的预言去做而被降了职啊！我之所以要提起这桩轶事，是因为它

能说明，西方的外交官们对柬埔寨人的思想或对我本人基本上是不了解的。

考虑到中央情报局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它在幕后策划要置我于死地的活动，说我的生命——更不必说我的政策——得于幸存实在是个奇迹，这是一点也不算夸张的。

民族统一阵线的领导人在一个公开出版的文件里是这样提的：

美国得出的结论是，为了摧毁柬埔寨的和平和中立，并把它转变成为一个新殖民地和侵略越南、老挝的根据地，必须把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杀掉，或者至少让他靠边站，因为西哈努克亲王是高棉人民一致拥护的和平、民族独立和中立政策的化身。

于是，问题只在于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和一个可靠的凶手了——一个愿意以他的性命来换取我的性命的人。可是受人雇用的杀人犯自己想要活命，也想要享受他的薪金，而愿意干这种事的人又很少。何况金边又不是万象，在万象暗杀政界人士是司空见惯的事，凶手可以在被害者流尽最后一滴血之前就被连夜送过湄公河到泰国去。从金边逃走可要比这困难多了，于是就采用从海外邮寄漆盒炸弹的手法。只要他们能够杀害我，他们才不管死掉是国王和王后呢！

另外一次暗杀未遂的事是1959年底一个叫做雷阿瓦这个受雇于中央情报局的人干的。但他在能够下手之前就被逮捕，不能再作恶了。他只不过是个年轻的狂热分子，山玉成在

他身上做了很多工作，直到他答应动手暗杀我。在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他被人从西贡偷偷带进柬埔寨来，并奉命在我经常到各省去视察（我养成了一种习惯，经常在外省同人民毫无拘束地交谈、相处）时，想法混进人群中去。他由于举止慌张而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在他被拘留后发现他身上带着一枚手榴弹和一支手枪。他本来是想完成达琼和漆盒案件所没有能达到的目的的。中央情报局在这个意义重大的1959年差一点儿达到它的目的。

1963年也是紧张的一年。这一年，南越和泰国搞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宣传运动，鼓吹要对柬埔寨进行一场“预防性的战争”，结果导致了我同这两个国家断绝了外交关系。老挝的形势也很紧张。发生了很多政治性的暗杀事件。右派分子企图破坏头一年在我的倡议下举行的国际会议所达成的协议。（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不理睬我关于召开一次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建议，直到右派在军事上大溃败才促使他们赶忙跑到会议桌边来。）老挝事态的发展于1963年4月1日晚达到了高峰。那天晚上，坚定的中立主义派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在他万象家里的台阶上被人枪杀致死，他的夫人也受了重伤，倒在他的身旁。这是一个准备对查尔平原亲巴特寮的中立主义部队发动全面进攻的讯号。这些事件的震波在柬埔寨都能明确无误地感觉到，左派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在贵宁·奔舍那被刺后整一个月，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到达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在机场上举行了最热烈的欢迎仪式后，他同我一起乘敞篷汽车从机场驶往首都，马路两旁柬埔寨群众和柬埔寨华裔居民列队欢迎，一边欢呼，

一边挥舞着手里拿的旗子。紧跟着我们座车后面的是刘主席随行人员、我的政府官员和其他重要贵宾乘坐的车队。

如果中央情报局的一切计划进行得很顺利的话，在离开金边市约三英里的地方，在我的汽车底下就会发生一次大爆炸，一百码的路面、车队、路旁的欢迎群众和所有的一切都会被炸得个精光。不过，当我请刘主席登上我的座车时，我知道那几个被中央情报局收买的罪犯已经被牢靠地关在金边的监狱里了。

在这次预先安排好的国事访问之前的一个星期左右，两个陌生人在机场路旁租了一栋房子，距当时金边最著名的一家越南餐馆很近。这两个人中年纪较大的一个是从台湾来的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这两个新来的人开始从他们的住房下面挖一条通往马路中心的地道。他们想在这条隧道里放一枚具有极大爆炸力的炸弹——象漆盒一样，也是“中央情报局特制品”。刘主席的访问为他们提供了一箭双雕的极好机会，可以同时满足国民党和中央情报局这两位恩人的要求。北京在这两个亡命徒从台湾动身到金边市来的时候就把这个情报提供给我的安全部门了。所以我们对他们进行了监视，我们的警察在他们作案时当场逮捕了他们——挖掘工具、炸弹以及伪造的身份证明书等等一应俱全。他们不得不彻底坦白，包括他们同中央情报局如何勾结的细节。依法对他们进行了审讯并判处他们以死刑。

但是没有把他们处决。我并没有赦免他们，但也没有签署将他们交付行刑队处决的命令。当时我们同邻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够糟的了，我不愿提供会引起更多麻烦的不必要的借

口。顺便提一下，朗诺出于我当时还不理解的原因，恳求我赦免他们，而通常他总是头一个提议把人枪毙掉的人。3月18日政变以后他所采取的第一批行动中，有一项就是把这两个谋杀未遂犯送还给了中央情报局。

也就是在1963年，一名海关稽查员对一口受到损坏的板条箱——写明寄交美国大使馆的几个箱子中的一个——感到有某些可疑之处，提出了准许他进行检查的要求。在正常的情况下，寄交一个大使馆的任何物品是受外交豁免权保护的，但是由于这位稽查员的怀疑是颇有道理的，于是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结果发现这些板条箱里装的全是武器，几乎可以肯定是准备供应给自由高棉分子的。我们的安全部门已经获悉，中央情报局正在把自由高棉分子渗透到柬埔寨来。如果泰国和南越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威胁得以实现的话，中央情报局的任务就是在柬埔寨境内的战略要地提供一支有力量的第五纵队。于是这些武器就在美国外交豁免权的掩护下，象国民党特务的炸弹一样，被偷运入境——给予我们的竟是这样一种军事“援助”岂非咄咄怪事！

在这些事件之后，我在1963年年底决定停止接受美援，并把三百来名美国的军事官员和经济官员——他们在我们全国到处乱跑，就好象柬埔寨已经属于他们的了——驱逐出境，难道任何一个讲道理的人会对此感到奇怪吗？

接近1963年年底时，山玉成的左右手之一普雷尹昂首阔步地越过边界，满以为这下子柬埔寨就会象中央情报局所吹嘘的那样，正等待着象他那样的人物到来，要揭竿而起把西哈努克搞掉了。当时自由高棉的主要基地在南越，所以他就是

从这些基地中之一进入了柬埔寨境内的茶胶省。他以一个英雄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当时茶胶省省长英丹的面前，并且说他准备同西哈努克“谈判”——估计是就我如何投降的问题进行谈判吧！中央情报局已经使他着迷发痴到了这种程度了。

在民社同盟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问山玉成——他一直在宣传，谁都反对西哈努克而支持山玉成——敢不敢到我们边界这边来亲眼看一看，作为对他的宣传的答复。山玉成和中央情报局显然说服了普雷尹，让他相信这是我表示愿意投降的意思。进行什么谈判？难道要我同卖国贼分享权力？不，决不。我召集了国民大会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来听取普雷尹的发言，并且也让他听听人民的呼声。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面对着他们所讲的事实，普雷尹承认他自己不幸上了中央情报局的当。可是他想退让已经为时太晚了，我们几乎无法阻止代表们对他进行拷打。多年来他一直在阴谋反对我们。自由高棉的突击队已经使很多无辜的人流血遭殃。国民大会一致要求把他交付军事法庭审讯。他被判了死刑。对他的情况来说，我在签署处死他的文件时是毫无顾虑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倒是，当时逮捕他的英丹后来自己倒同普雷尹的上司山玉成勾结到一起了。

不论从什么观点来看，1963年是艰苦而又紧张的一年。四面八方都在对我们施加压力，企图搞垮我们。美国早已接管了在越南进行的战争——尽管还未投入他们自己的军队——而且已经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运动，迫使农村居民接受被圈在铁丝网里的“战略村”生活。大规模的搜捕活动一直搞到我们的边界地区来了，并且还以对我们边境村庄进行空

袭的形式，把搜捕活动蔓延到我们境内来。难民群蜂拥来到柬埔寨境内寻找躲避飞机和坦克袭击的避难所，通常他们只呆上几天，等到军队一撤走，他们就回到自己那已成为废墟的村子里去了。来自湄公河三角洲的柬裔少数民族——他们在南越再三遭到迫害——则宁可留在柬埔寨境内的避难所。这几百家多灾多难的人们可遭罪了，最初是由于他们作为农民，总想留在自己的村子里不走；后来是作为受蔑视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化开始遭到西贡政权的摧残；最后是作为佛教徒，受到鼓吹种族主义和狂热信奉天主教的吴庭艳的迫害。他们不愿回到受祝福的“自由世界”去，对他们来说，这种祝福意味着：如果不赶紧迁入集中营，就得挨炸弹和凝固汽油弹。

美国人开始感觉到他们呆在我国的日子不会长了，这是由于：我对美援令人讨厌的状况不断予以抨击；美国人意识到，我对美援中有很很大一部分被用来支付柬埔寨境内中央情报局特务网的费用是知情的；再加上他们曾经参与策划一些丑闻和阴谋事件。我已同曼谷和西贡断绝外交关系，光是这一点就已使华盛顿大发雷霆了。柬埔寨在银行和进出口贸易方面加强国营资本的做法，更使他们感到火上加油。施里玛达、严森波、沈法以及其他一些人也对此感到不满。这一点我当时是清楚的，不过我所不知道的是，朗诺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已同他们抱成一团了。当时我们的政府十分稳定，政府中的左派是以负责商业的国务秘书乔森潘和负责经济计划的国务秘书胡荣为代表的。

就在1963年这个时候，朗诺开始编纂带有“证据”的材料来证明左派正在阴谋策划颠覆我。我不能说我已掌握了中央

情报局直接或间接地卷入了朗诺这一企图——使我误入歧途——的材料。但有理由这样假定：既然中央情报局在1963年已被如此彻底地揭露过，它要是搞一点针对左派的名堂也是不足为奇的。

不管怎么样说，当时伪造证据、搞假案之风甚盛，而朗诺不时对左派进行政治迫害——包括将被逮捕的嫌疑犯立即予以处决的做法——也就利用了存在这种风气作为借口。其结果是，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其中包括为几百从金边出走的人——离开城市跑到以前在反对法国人的独立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抵抗根据地去了。在1963年离开城市的人士中有一个叫做英萨利的大学教授，他的那位曾经在金边一所中学担任女校长的夫人也同他一起去了。他在3月18日政变以后立即参加了抵抗运动，并且成了乔森潘的助手。（英萨利是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在丛林中的总部派到北京的头一位抵抗运动领导人，并向政府成员作了一个介绍解放区形势的报告。）

说1963年是充满着阴谋和险恶活动的一年，这还不光限于在柬埔寨和老挝。我确实不能不认为我自己要比那些处心积虑想搞掉我的人幸运得多。那年11月1日，我的两个头号敌人——吴庭艳和吴庭儒——在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被人暗杀了；十天以后美国总统自己也被人刺死了。顺便提一下，我必须把美国报纸发表过的一则很不幸的错误报道给纠正纠正。在可恶的西贡独裁政权垮台后，我曾下令全国庆祝三天。但在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后，我国很多商店在它们的橱窗里悬挂了他的肖像，借以表示敬意。一名无耻的美国摄影记者

要求一个过路的柬埔寨人在一张肯尼迪的肖像面前摆好欢笑的姿势让他拍照。当这张照片在美国发表时，附有解说词说，柬埔寨的官方对肯尼迪总统的去世感到欢乐——这完全是荒谬绝伦的诽谤。我后来把西哈努克城的一条大街命名为肯尼迪大街来纪念他，而在1967年11月2日，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肯尼迪还参加了这条大街的命名仪式。

也就是在1963年，银行老板兼中央情报局高级特务吴松山，为了破坏我们的经济政策，利用中央情报局存在他自己的金边银行的经费，挥金如土地到处收买官员。当我在1963年年底命令所有的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人员离境时，他很可能就已对美国人组成的特务网被突然解散而有所警觉，因此他也根据这个情况准备了他自己的计划。也许他预感到自己可能在不久之后会遭到揭露，而在美国人离去之后就不会有任何人来支持他了。

不管怎样，当时的国家银行行长宋双有一天来看我，同我讨论吴松山的问题。后者不是柬埔寨人，而是一个在泰国出生的中国人。他同包括施里玛达在内的很多右派分子有联系，而且从曼谷到金边来时带来了很大一笔钱，据说是来做买卖的。这时，我正鼓励外国资本向我们私营经济部门投资，只要外资真正有助于我国的发展就行。根据他挥金如土的情况看来，柬埔寨人深信他确实是个财力雄厚的企业家。由于我表示了对发展旅游事业的兴趣，他就在西哈努克城盖了一些供汽车游客住的旅馆。他还签订了合同，在山区游览胜地基里隆修建更多的汽车游客旅馆和一家奶制品加工工厂。这是他的活动的合法的一面。

我们后来发现，他还用中央情报局的钱在首都创办了金边银行。施里玛达成了这家银行的重要股东之一，而且后来还成为吴松山的主要支持者和保护人。

宋双在我面前打开一份档案材料时说，“我确信这个人不是一个银行家而是一个骗子。”“我们一些国营企业的负责人怎么可能不把他们的资产和周转资金存在我们的国营银行，而存到他私人拥有的金边银行去呢？”宋双解释说，他进行过一些调查，发现吴松山曾经花了大量金钱收买国营企业的负责人、议员，甚至还有一些政府成员。他提到国民议会议员隆波烈（此人后来成为朗诺的新闻部长）等人的名字。宋双接着说，“这些官员们的借口是，他的银行付给的利息比国营银行的利息高。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吴松山把这些钱侵吞了——我们恐怕连本钱都被他盗走了，更不必提什么利息不利息了。”

我立即指示派几名会计审查员去核查金边银行的账本，我还下令，如果发现吴松山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就把他扣起来进行审讯。

等会计审查员到达银行时，吴松山已经不在那里了，而且钱也不见了。保险箱和放置现金的抽屉都已空空如也，连一个瑞尔也没有了。已经有人给他通了风报了信，几乎可以肯定此人就是施里玛达。吴松山已经象黑夜里的小偷一样，乘一架属于金边航空俱乐部的飞机飞往西贡了。他从西贡又跑到曼谷去投靠山玉成，并成为自由高棉三大头目中仅次于山玉成和桑·萨里的第三号人物。

不过我们从银行的账本里发现，施里玛达、隆波烈、严森

波——国民议会中右派集团的全部成员——全都被逮进去了。我要把他们全都逮捕起来，可是他们都声称他们享有议员豁免权。当这个问题提交国民议会时，已经有足够多的议员投票反对撤销他们的议员豁免权了——他们有的是被收买了，有的则被威胁将透露他们自己也与此案有牵连的讹诈吓得不敢吭声了。国民议会中所有的资本家都同此案有牵连，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都跟着他们的头目们转。

我们通过银行的账本追查到一些柬埔寨人的名字，他们被列在得到“贷款”的人的名单里，但却没有偿还贷款的记载，甚至连规定如何偿还的条款都没有。我们没法知道其中有多少是直接从中情局领来的钱，又有多少是从我们国营企业里侵吞来的钱，但是我们迫使这些人偿还他们得到的钱，并对他们的活动进行了严密的监视。我们还没收了吴松山的一些别墅和其他财产，通过这个方式收回了我们的损失的相当一部分。但是这一事件震撼了整个政府和全国。人们以金边的典型幽默方式议论“两 S 之战”——国家银行的宋双〔Son Sann〕和金边银行的吴松山〔Son Sakd〕之战。但是，这种事有什么好开玩笑的？吴松山潜逃时随身带走了四亿瑞尔，这笔钱就是按官价汇率来算，也相当于一千万美元以上。

这是针对我们国有化措施的最猖狂的进攻。我们的国营企业连周转资金都被自由高棉吸吮走了，怎么能赢利呢？这一丑闻强烈地影响了把银行收归国有和全面加强国营企业的决定。在我们的经济必须对付这么些阴谋的情况下，柬埔寨在经济上得以幸存的“奇迹”，必须同我个人和我所捍卫的政策得以幸存的奇迹一起来评价。

吴松山被缺席裁判并处以死刑。然而朗诺却在1970年临近年底时不顾学生们的多次抗议,要求撤销对他的判决,并允许他回到金边。这一点他居然做到了。

第九章 极其痛苦的决定

从1963年年底开始，象该年和1959年那样大搞阴谋的做法有了一个间歇。但是中央情报局仍然在其他战线继续进攻我们。自由高棉部队的不断集结并未因而停止下来。1963年11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部队攻克了位于西贡西南的芹苴省协和市的一个自由高棉指挥部根据地。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后来把这次进攻中俘获的训练手册和军事行动计划送给了我。（同时被俘的还有一些美国“特种部队”人员，其中两名后来经由柬埔寨送回美国。）这些文件证明，在突击队跨越我们边界进行袭击的掩护下，在柬埔寨境内建立第五纵队基地的计划已经进展到了什么程度。这些训练手册的内容包含进行暗杀和破坏（包括在水井里下毒药）的一切手段。在这个指挥部根据地被消灭和民族解放阵线控制了南越一边的大部分边境地区之后，自由高棉的主要根据地就转移到泰国境内。中央情报局集中了它的力量在南越建立下高棉突击队，即所谓“迈克部队”，这个部队是在美国特种部队军官直接指挥下行动的。下高棉分子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中为法国人作战，后来又为美国人打仗，最后为朗诺所雇佣。

从位于南越和泰国境内的固定的和流动的无线电发射台——包括澳大利亚政府所提供的一座功率强大的广播电台——山玉成大肆对我、君主制和我们的中立进行抨击，并且煽

动人民起来推翻我。他许愿说，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他念念有词地勾画出一幅人人都有舒服日子可过的图景——只要他们搞掉“腐败的君主”西哈努克，支持“共和派的爱国人士”山玉成就行了。因为到那时，美元的宝库就会永远受他们支配了。

山玉成，作为一个来自湄公河三角洲的下高棉人而不是一个土生的柬埔寨人，对柬埔寨人民的心理就和美“援”官员们一样地无知。柬埔寨农民和渔民对物质利益缺乏兴趣曾经使美援官员们感到绝望——一旦他们领略了真实情况的话。与此相关，有一个已经是人所尽知的轶闻。这轶闻发生在美国进行经济援助的初期。一位诚心诚意的美国人——确曾有过这样的美国人——在考察了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以后，作出判断说，只要运用现代技术，柬埔寨的大米产量可以增加一倍。这将意味着有大量多余的大米可供出口——而大米实际上等于是硬通货，或者说当时的情况是如此。但是怎样才能促使落后的农民引进新技术呢？他要求并且得到了在一个试点农村进行试验的许可。在一个村民大会上，他用简单的图表来说明化肥如何可以使作物增加产量，赢得了村民对这个试验的合作。一块供他试验用的土地被划分为对等的两块。对土地进行了耕种，并且用传统的方法插了秧。一块土地上喷洒了化肥，一块没有喷洒。果然到了收获季节，产量增加了一倍。大家都兴高采烈。农民们量了稻杆的长度、用手掂量了一下稻穗的重量，甚至于还从两块土地里摘下稻穗标本来计算和比较稻粒的数量和大小。他们被彻底地争取过来了。

当美援官员答应为他们免费提供整个村子下一季度所需

要的肥料时——这官员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更是喜形于色。当他在收获季节回到这个村子时，结果也同以前一样：产量增加了一倍。可是当他发现每个农民只种了他的土地的一半时，他大为震惊了。农民们说，“如果只耕种一半土地就能得到同耕种全部土地一样多的产量，干吗还要把全部土地都种上呢？”这位不幸的、用意善良的官员，虽然在美国佬的技术知识方面造诣很深，却被这些农民甚至连对利润动机的最原始形式都丝毫不感兴趣所挫败了。

在一系列解释我为什么停止接受一切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文章——它们是1963年开始发表——的头一篇里，我提到了山玉成所作的那些充满铜钱臭味、蛊惑人心而又和我们的民族概念背道而驰的呼吁。

“在他的胡言乱语里，他一本正经地向我们的同胞许下诺言：一旦他领导柬埔寨的事务，每一个公民都会有衣服穿，有房子住，而且能够吃饱肚子。^{*}好象每一个公民现在还没有享受到这一切似的，其实柬埔寨人民享有的不止这些，还享有在东南亚首屈一指的教育和公共卫生设施。然而在山玉成的野心得到部分的满足并成为朗诺手下的总理以后，柬埔寨人民事实上又得到了什么呢？在3月18日政变以前我们有几万名同胞自己拥有房子，可现在都没有房子了。当时吃得饱穿得暖的几十万人，现在却在难民营或集中营式的“战略村”里挨饿。他们或许已经被美国的炸弹和凝固汽油弹赶到金边，沦为乞丐了。另外还有多少万当时吃得很好、穿得很好、住得很好的人，现在可都死了——被山玉成的后台老板的飞机、坦克

^{*} 《民族主义者》(Neak Cheat Niyum), №196, 1963年11月24日。

和大炮屠杀了呢？

我没法知道，中央情报局究竟相信不相信用它自己的经费制造出来的荒谬宣传。最近的历史表明，中央情报局的头子们如果不是当了他们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的俘虏，就是在利用他们那些宣传上的发明来强迫他们自己的政府接受冒险主义政策已到了什么程度！就中央情报局在摧毁柬埔寨中立方面的主要依靠对象山玉成而言，金边有很多有资格的安格鲁撒克逊观察家们都知道，山玉成在国内根本毫无威望之可言。甚至连驻金边的美国军援代表团团长谢勒将军都同意这个观点。肯尼迪总统曾正式通知我他以“自己的荣誉”保证，他的国家绝对没有参预自由高棉的活动。我认为肯尼迪总统是个诚实的人，然而在这个情况下，究竟是谁真正代表美国政府呢？几乎就在我获得这一保证的同时，象普雷尹那样的卖国贼却在公开宣称中央情报局彻底地控制着自由高棉——而他又是自由高棉的一名主要干部。这就好象艾森豪威尔在我1958年访问华盛顿时鸣礼炮二十一响对我表示敬意；而艾伦·杜勒斯却同斯拉波一起，在纽约起草有关后者在达琼阴谋中的作用的合同；我并不是唯一想问一问究竟谁代表美国政府以及美国政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人。

谢勒将军在金边时曾向我保证说，他认为柬埔寨是真正中立的，但是他在西贡和曼谷的同事们却在继续致力于摧毁我。难道后者是受了我们邻国的心理战部队的影响，因此相信他们而不相信谢勒？还是说谢勒只不过是一个卑鄙的伪善者作为软化我们的一个步骤而在骗取我们的信任？在曼谷和西贡的中央情报局头目们果真相信他们所作的那些宣传吗？

他们说什么我快要“拱手把我们的佛教僧侣和农民献给外国共产党人了”，说什么“只要山玉成一露面，西哈努克就会被推翻了”，等等，等等。

事实上，在古巴雇佣兵于猪湾笑剧前夕在佛罗里达州所受到的那种煽动性的和狂热乐观的鼓励，和自由高棉成员每天在他们的训练营里所受到的鼓励之间，有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人们告诉古巴雇佣兵说，只要他们踏上了古巴的土地，卡斯特罗就会被推翻，而“解放者们”就会被人们抬着，胜利地进入哈瓦那。难道中央情报局果真自己相信这一切呢，还是他们只不过希望别人，包括他们自己的政府相信这一点呢？

也许正是这种胡言乱语驱使普雷尹走上了向茶胶进军的道路，他挺着胸膛，准备就我投降的问题同我进行“谈判”——而事实上这却是一条把他引向被枪毙的道路。那些入侵柬埔寨的人们发现他们自己也陷入了“猪湾”那样的情况，得不到当地居民的半点支持。

对我抗议美国支持自由高棉突击队侵犯我国领土和所进行的宣传活动，华盛顿总是假装和这个组织没有联系，甚至还说自由高棉连同它的电台等等都是以柬埔寨领土为基地的。在决定关闭“美援”代表团并赶走它们的人员以后，我向美国人提出挑战，如果美国人果真相信他们自己所说的话，“那么我就郑重地邀请他们在他们的大量军事和文职人员离开我国以前，想到那里就到那里搜寻——无论是城镇、农村还是丛林——挖出这些自由高棉部队来”。我这一建议没有为他们所接受，因为他们只能找出一些他们自己所安插的小组，而且他们的活动已经受到我们的监视。

我在《民族主义者》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拒绝再接受美国军援的文章里，清楚地说明了 1958 年 6 月西贡军队入侵上丁省后所发生的事情的细节：

我发现美国由于向我们提供了一项不仅是附有条件的，而且是有害和带侮辱性的军援，粗暴地辜负了我们对它的信任。美国人已经警告我们说，如果我们在接受美国军援的同时，胆敢接受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武器，他们就会切断供应和弹药。尽管这是和我们的主权不相容的，但我们在接受这个条款时容忍了对我们的尊严的损害，因为我们的“恩人”对我们保证说他们将为我们的武装部队提供足以捍卫柬埔寨的尊严、和平和领土完整的现代化武器和装备。上丁省事件突然揭露了美援的真实面目。*

我发现我们的运输装备就是对最原始形式的防御性战争来说也是毫无用处的。我们没法利用最容易得到的来源——中国和苏联——来扩充我们的运输设备实在是令人反感之极。例如要把我们的军队运到上丁省，我们不得不用旧式的中国大轿车，而这种轿车一路上都抛锚，因为它们那种拼凑起来的呼哧呼哧发响的发动机并不是供军用的。武器既不现代化，数量也不够，特别是同我们的邻邦相比的话。我们当然没法用它们来打我们的这些邻邦，哪怕就是为了自卫也用不上。我在同一篇文章里指出：

* 《美国军援与我们》，《民族主义者》，№197，1963 年 12 月 1 日。

所以对我们这样的中立者来说，美国人提供武器只是为了要杀共产党人，而共产党人却从来不威胁我们。对于当时用武力分别占据了柏威夏寺和上丁省一部分的曼谷军队和西贡军队来说，根本谈不上对他们造成过任何一点损害。在军援协定里，明文规定美国愿意为我们提供捍卫我们的主权和自由所必需的、充分的武器。然而在1958年就看得很清楚了，这种美元是只能用来打假想的共产党入侵者，而不能用来打真正的侵略者——即泰国—南越的“自由世界”雇佣军……美国只是在共产党人威胁我们的自由时，才对维护我们的“自由”感兴趣。但是这种自由、我们的独立和我们的领土完整，在美国佬的亲爱的盟邦想让他们士兵的铁蹄加以蹂躏践踏时，都可以被满不在意地牺牲掉。

今天，我也没有理由对这番话改动一个字。我唯一没有料到的是美国竟会直接参与分裂我们国家的企图。曼谷和西贡的目的一向是十分明确的。我的国家不得不同暹罗打交道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我们在我们的东邻和西邻手里吃的苦头已经太多、太久了，所以当我们看到它们在象美国所支持的那种侵略性的和扩张主义的政权统治下时，我们对它们根本不抱任何幻想。美国对柬埔寨的真正政策是什么？把我们自己的双手反绑起来，怂恿我们的传统敌人在他们所选择的时刻和地点，尽力狠揍我们。

我用美国提供给我们用以“捍卫柬埔寨的尊严、和平和领

土完整”的武器，并没有能够把上丁省的吴庭艳部队赶走，我靠的倒是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的有力的警告。泰军的撤出柏威夏寺不是由于美援，而是由于海牙的国际法庭。

我的敌人们，特别是在安格鲁撒克逊世界的敌人们，喜欢责备我变化莫测。他们提出这种责备，正是由于我做了我说过我要做的事，可是很多外交官却宁愿轻而易举地把我的警告置于一旁，硬说这是“西哈努克的反复无常”。我曾经在1958年上丁省事件后不久立即庄严地通知美国，我总有一天宁可拒绝他们的军事援助，甚至断绝同美国和西方的联系，也不愿意再忍受他们那种虚伪的友谊，甚至是侮辱。

在开始时，美国的军事援助确曾使我们的国家预算减轻了一些负担。在1954年国家总收入的一亿一千五百万美元中，美国提供了大约两千三百万元用于军事目的。可是到了1963年，当我们的预算上升到一亿七千万美元时，美国的军事援助却下降到八百六十万元。正如我在当时所表示的：“这笔钱太少了，实在不够补偿我们忍受了那么长久的羞辱。”更糟糕的是：在减少给柬埔寨军援的同时，美国给南越的援助却随着南越对我们威胁日益加剧而日益增长。在我回顾的这一段时期里——从1954年到1963年——它从一亿八千万美元猛增到四亿五千万美元。（当然同它最终达到的无边无际的数字相比，这数目算不了什么。）即使是在1961年，仅有柬埔寨人口五分之一（原文如此——译者）的老挝竟从美国获得了比柬埔寨多一倍的军援。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答案是十分简单的：柬埔寨拒绝同别人一道用武力镇压在它自己边界之内的政治上的反对派。而在我们边界那边的南越和老挝则

恰好那样做了，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中央情报局全力以赴的目标是想在我国国内培植一个有武装的政治上的反对派，这样一来我们为了维持秩序就不得不去乞求美国给予武器，而我们却拒绝上这个圈套。

在我们的领空被我们邻邦的喷气战斗机侵犯的时候，我在经历了无休止的谈判之后，才设法从美国人手里挤出了四架很小的、没有武装的螺旋桨飞机和两架直升飞机。与此同时，老挝的右派头目富米·诺萨万将军却得到了三十架直升飞机。顺便提一下，诺萨万有周期性地在战场上抛弃大量军火——例如 1962 年 5 月在老挝西北部的南塔——以及在地面上丧失他的飞机和直升飞机的习惯。美国人只是宽容地笑了一笑就给他们补充上了。尤有甚者，还有人责备我浪费和没有妥善利用我所得到的那一点点少得可怜的美援。当我提出抗议时，泰国的独裁者沙立·他那叻还说我是“一只企图冒充狮子的猪”。顺便提一下，就泰国而言，这句话就是“使瓶子里的水往外溢的那一滴水”，促使我同泰国断绝了外交关系。

我在 1963 年 12 月出版的一期《民族主义者》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吴庭艳和沙立的雇佣军以蔑视和挖苦的态度来压我们，在我们的领土上进行杀气腾腾的袭击而不受惩罚。他们的海军舰只经常恣意侵犯我们的领海，而他们的飞机也经常恣意侵犯我们的领空。我们不得不屈辱地、灰心丧气地低下头来，因为我们的贫困束缚了我们的手脚，还受着其目的在于使我们永远处于低人一等和软弱无能

的境地的种种限制。即使是一个儿童也能够理解这一点：我们柬埔寨王家武装部队如果一劳永逸地拒绝接受与美国军援有联系的一切东西，那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必须勇敢地面对这一事实：切断那些把我们束缚于这种软弱无能和蒙受耻辱的境地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

这确实是一个难以做出的极度痛苦的决定，而且也是我们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我实在没有选择的余地。美国通过它执行的政策——它打着友谊的旗帜，实际上却是在我们公开的敌人面前解除我们的武装——再次把我推入社会主义世界的怀抱。如果我们曾经在语言上或者行动上威胁了我们的邻邦，或是让我们的武装部队侵犯了他们的领土，或是向他们提出了领土要求，那么这样做或许还有点道理。尽管历史赋予了我们可以这样做的充分权利，但是我早就决定不念旧恶，并接受目前的边界。

正是由于我们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我们就得受惩罚、受凌辱，并且将被任人宰割。我们拒绝充当美国的傀儡，也不参加反共十字军。我们摒弃了充当这一角色的亿万美元酬金。在接连几届美国政府的心目中，这就是我们的罪行。我的文章接着说：

我们将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友好国家提供的无条件的和自发的援助，但是它们切不可认为它们因此就可以任意侮辱我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宁可在贫困中生活，因为至少我们还享有自由——不管怎样，我们够

吃够穿而且还有多余。必须明确指出，我们只接受物资和武器的援助，而永远不会再接受财政援助，因为接受这种援助将使我们在施舍人面前处于一种蒙受羞辱的地位。……我们的军队在道德和社会方面的优点将会大大补足它在物质上的劣势。我们那些来自人民的战士们今天知道他们必须依靠人民；而由外国武装起来的泰国和西贡部队则只不过是雇佣军而已，他们拿了人家的钱去为某种事业流他们自己和别人的血，反正这个事业不是，而且永远也不会是他们祖国的事业。

我就是要在我们的军队里培养这种精神。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等人企图让我们的武装部队去反对自己的人民，这真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他们只取得部分的成功，正规军里成千成万的战士们，包括营一级规模的部队，在政变后的头几天就投奔到抵抗运动的部队去了。我掌握无数的证据，主要是法国侨民提供的，证明在政变后参与大屠杀的不是王家陆军的部队，而是中央情报局的下高棉突击队。王家陆军不愿屠杀他们自己的同胞的证据是，在政变前和政变后不久，他们不得不调进十营下高棉的军队，而在他们遭到失败以后，美国人不得不动用好几万他们自己的军队和西贡军队入侵柬埔寨。

从我们的正规部队中逃亡出来的那些人们——而且仍然还有人在继续逃亡——一旦参加了抵抗运动部队的行列，就证明他们自己不愧是我们人民的好儿子。西贡雇佣军的所作所为同我最阴暗的预测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他们是一群杀气

腾腾的乌合之众，在战场上士无斗志，可是在屠杀赤手空拳的平民、强奸、以及特别是抢劫方面，却个个都是能手。他们没有任何理想，对他们为之战斗的事业也毫无信心。他们的主要兴趣是保全自己的生命以便享受掠夺来的果实，可是他们中有好几万人的血都已和我国稻田里的泥巴掺和在一起了。

在没有美援帮助的情况下——战场上俘获的战利品和用现金在黑市上从西贡军队手里买来的东西除外——我们的抵抗运动战士们捍卫了我们的民族尊严和道德，以及我们的佛教理想。他们将流芳百世。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和他们收买来的渣滓则将同他们的美国傀儡戏操纵者一样，遗臭万年。他们中某些人的名字将进入柬埔寨以至于亚洲的词汇，就好象奎士林这名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欧洲的词汇一样。他们将作为我们国家历史上极罕见的卖国例子被人们记在脑海里。与此相反，我们的抵抗运动部队则维护了我国几千年历史中最崇高的一切。他们不仅代表着我们过去的精华，也代表着今天和未来的最优秀的品质。在形式上是民族主义的，内容上是爱国主义的，而且官兵团结一致、亲密无间——这就是我在结束我们对美援的依赖的时刻自己心目中的理想。

我的一些忠诚的支持者对我决定停止接受美国军援是否正确表示了怀疑，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感到最困难的时刻之一。从那时以来的事态演变已经证明我做对了。人民通过全国代表大会批准了维护民族尊严的概念。它现在已经成为抵抗斗争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回顾往事，我感到这一决定真是作得非常及时——在我们的意志衰退之前；在我们陷于假援助

和假友谊的圈套无以自拔之前——更不必提上这种圈套所撒下的经济和文化上的诱饵的当了。通过我们的经济独立的政策，我们赢得了一个宝贵的喘息时间，这个时间使得文化侵略未能得逞。在泰国和南越起了那么大的腐蚀作用的文化诱饵从来没有在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民中站住脚，而且甚至在城市里的青年人中也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就。正是农民和青年形成了今天的抵抗运动的主力。

我之所以引用了一些我在 1963 年写的文章来说明我当时的心情，是因为我常常被人谴责为：自从我定居北京以后，我“向左转”了。然而，只要瞧一瞧历史记录，就可以看出我关于独立的想法三十年来一直没有变化过——从我奉召继任国王时开始，我就以彻底独立和维护我们民族传统中的一切好的东西作为我的目标。我不可能按照别的样子做。硬把我这个一贯的态度说成是我到北京以后才学来的“左倾偏向”是不公平的。

第十章 彻底决裂

我决定对经济援助,也同对军事援助一样,采取干脆不要的态度。我感到经济援助的条件太苛刻了,简直等于要我们国家受辱,何况美元援助实际上还使我们的发展受到了耽误。援助还被用来作为柬埔寨境内中央情报局领导的活动的经费,这一事实给我的印象是:好象是通过付钱给穷人,让穷人去挖自己的坟墓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同有关军事援助的限制一样,我们是不准把美国的财政援助用于旨在促进经济真正起飞的那些工程项目的。

我只从许多例子中举出一个来。有一个华侨血统的假工业家，他得到了一笔美元拨款用来进口一套火柴制造厂的机器设备。为了减少我们对进口商品的依赖，我一向鼓励私营经济部门进行这类工程计划。根据拨款文件的规定，进口的这套设备将是新的、最现代化的。但是运来的设备除了当废铁使以外可以说是毫无用处。美国经济代表团要求偿还美元——不是让那位中国商人偿还，他轻而易举地宣告破产，反正说什么也无力偿还——而是要王国政府偿还。我建议，既然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政府偿还，那么日后进口这种设备的权利就只应归政府享有，照理说这应该是合乎逻辑的。可是美国当局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的建议——正象以前多次发生过，而且以后还会发生多次的那样——理由是，他们绝对

不能把美元交给任何国家机构使用，美元“援助”只能用来帮助私人企业。

问题就在这里——这是美国经济援助的基本的、内在的缺点——也是军事“援助”的限制条款在经济援助方面的体现。援助被用来作为一种在我们国家建立、巩固并发展纯属资本主义的企业的手段；不仅如此，而且这些企业和政府的合法政策与人民的利益毫无关系。如果我们接受对我们主权的这种限制，我们还能当我们自己国家的主人吗？

我们曾经试图把援助引向它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例如公路和桥梁的修建。但是，只要这些公路和桥梁是为国营种植园或工业服务的，那就不能利用美援。在1963年11月17日召集的讨论停止接受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上，我详细地说明了这些问题。我手头已经没有这些报告的原文，但在我早些时候提到过曾在《民族主义者》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的最末一篇里，我提到我们大约在十年里所得到的三亿美元，同南越仅仅在1963年一年就得到的四亿或更多的美元相比，那是微乎其微的。当然这笔钱都是用来支付战争费用的。七年以后，我们将会发现，美国人为了在我国境内进行一场类似的战争，每年差不多也花费同样多的钱。根据西方新闻记者的报道，甚至连美国在1963年拨给吴庭儒的秘密警察部队的钱也都超过了给柬埔寨的所有各种援助的年度总和。（顺便提一下，给吴庭儒的秘密警察部队的巨额补贴，也没有能够使吴庭儒自己和他的哥哥吴庭艳在那年11月不被西贡军队搞掉，而西贡军队也同样是领美国人的钱的。）

在1963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从此停止接受一切美援的决议。11月20日，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通知华盛顿说，“本政府认为，最基本的尊严不允许柬埔寨继续接受任何形式哪怕数量很少的美援”，因而“柬埔寨要求停止美国在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领域的一切援助”。华盛顿收到这个通知时就好像收到了一颗炸弹似的，因为一个国家在决定接受美援之后又自愿放弃它，这几乎是没有先例的。

这样做必然会给我们造成困难，批评我的人预言很快就會发生经济上的灾难。如果说在头几年，援助的大部分都被用以进口小汽车、空气调节器、电冰箱等等的话，那么最近几年，在我的坚持下，援助已被转用于修建公路和桥梁以及小型灌溉系统和其他发展农业的工程了。它在我们的国家岁入中已经被当成是一个常规项目了，那么为什么反而要终止它？

理由是，美元施舍已经同许多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弊病联系在一起了。它刺激人们产生一种极不健康的“胃口”。它导致了无穷无尽的贪污、阴谋、诡计和猜忌，引起了对大臣和部长们的无原则的批评，指责他们在分配美元方面有亲有疏，甚至有歧视行为。早先为了防止整个国民议会被人收买而采取的措施只有部分有效。全国代表大会权力的加强，至少对收买投票人的行径起了刹车的作用。然而美元援助仍然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最腐蚀人和最有破坏作用的影响。这方面的情况是如此明目张胆，以致法国进口商们私下透露给外国记者们说，“不给柬埔寨的部长和高级官员们一点油水，简直就不可能把买卖继续进行下去。”这种在国际上

名誉扫地的现象对我国的声望是公然的侮辱。对美“援”处理方式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适用于对我们从出口贸易挣来的外汇如何分配的问题，这也是事实。正如我在当时所写的：

我必须向那些已经忘掉了这一点的人们强调指出，在我们独立后的头几年里，美元援助构成我们外汇的主要来源，而我今天所谴责的那些做法是 1955—1956 年间就开始了的，当时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还依赖美国的拨款过日子……。我们目前处理外汇——不管是我国自己的外汇还是来自外援的外汇——的组织机构一律保留了当初处理美国经济援助时那一套审批手续……这是连续多届政府之所以一直不得人心的主要原因之一。所有主管国民经济的部长、大臣们，不管他们学历、经验或背景如何，没有一个不在这些问题上“摔了筋斗”。

一些法国作家胡说什么在法国统治下根本没有贪污现象。他们妄图把发明贪污的“功绩”归诸于柬埔寨人。这实在是过奖了！我和法国人在一起生活和工作了很长时间。法国的官员们是贪污的能手。我们中有些人毫无疑问是法国人的高徒。我记得和王室有联系的一件事。有位公主的舅舅想在法国人掌管的政府机构里找个工作做。那时，只有通过竞争性的考试才能获得这类职位，而且申请应试的人必须对法语掌握得很好。可是这位公主的舅舅除了懂得自己本乡本土的柬埔寨语之外，一句外语也不通。不过，那位监考官是个中国

古磁器的收藏家，而公主却藏有大量中国古磁。她选送了一件精品给那位监考官，结果她那位一句法语都不会的舅舅在考试中就名列前茅，当然也就得到了那个职位。

在货币的黑市交易方面，人们只要回顾一下印度支那战争后期的西贡皮阿斯特丑闻——该丑闻从下面开始一直牵涉到国防部的勒维尔斯将军那样高的军官——就可以对法国人在这类事情上的专长略知一二了。总的说来，现代规模的贪污决不是柬埔寨本地的产物，而是从外面输入进来的。随着美国标准取代了法国标准，它的“质量”也随之提高了。

在评论那位中国“工业家”及其“火柴厂”事件的结局时，我在我的文章中写道，美国人“专门把美元留给某个阶级的商人谋利益的做法暴露了美援的真实面目。它并不是为了帮助正力图建立起真正经济独立的柬埔寨国家。这种‘援助’实际上只照顾‘某些柬埔寨人’的利益，而这些人最后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批‘仆从’，一批唯巨额外资赠与者之命是从的仆从”。

根据以上这些理由，我认为我们显然可以得出下列结论：除非我们从这种援助的桎梏里把我们自己解放出来，我们是永远也得不到我们的经济独立的，因为这种援助剥夺了我们国家开发我国生产潜力的权利，并且诱使我们的公民去从事轻而易举却有利可图的贸易活动，从而破坏了任何真正进取的精神。尽管施舍援助的人多次向我们作出保证说，他们只对帮我们获得经济自主感兴趣，但其结果却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他们多年来只是

把我们引向贪污腐败，从而使我们仍然处于一种依赖别国的地位。如果我们想避免某些国家的厄运——例如泰国、南越和老挝，现在已经成为“援助”的俘虏，不能自拔了——那我们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来一次外科手术，把“援助”切除掉。

我警告说，前途可能会有困难，但我断言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如果我们要实现并维护真正的独立的话。“如果我们非死去不可的话，我们宁可以一种比较勇敢和更有尊严的方式死去，而不愿被美援窒息致死或束手待毙。”

作为管制进出口贸易的头一个步骤，1963年6月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国家和私人合营的公司：由出口公司来经营进出口贸易；由进口公司通过国营商店来分配进口商品并经营批发和零售业务。现在至少可以把以前流入私人腰包的一部分利润用来发展国家的规划项目了，而且国家对分配用来进口商品的外汇额也有了控制权。

很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陆军和政府其他部门的最高统治集团里的朗诺、施里玛达、严森波等人都开始反对我了。这些人的爱国主义跳不出他们银行存款的范围，这一点我是到了后来才看清楚了的。当时的情况很明显，我们要是想自力更生，那就必须在各级都勒紧裤带，而这就招致了不满。朗诺在这一段时期，用装得特别阿谀顺从的方式来掩盖他自己的真实想法。我当时还不知道他同买办界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买办界的头头们则早已牢骚满腹，为他们即将失去得自美“援”的非法收益和从美国军援、经援人员身上刮得高价房租

等好处而哀声叹气了。批评我的人可真不少——在国内的是背着我干，在国外的则公开干——他们预言，由于我胆敢拒绝经济援助，柬埔寨会马上陷于破产。在国外的大多数批评者坚决表明他们对柬埔寨独立的“危险”的关切，大大超过对他们本国的命运的关切，而他们这些国家由于美国的经济渗透早已陷入唯美国对外政策之命是从的泥淖中去了。在我看来，我们已朝着争取真正的民族独立这一目标又迈出了必不可少的一步，而这个目标是全国人民所向往的，只有一小撮买办和他们在国内外的保护者除外。

我们并没有破产。事实上在这以后的几年里，经济发展得很不坏。但是，也就在这一段期间里，中央情报局通过吴松山全力以赴地暗中收买国营企业中的关键人员，最后导致了吴松山把他的银行的全部资金加上一些国营企业的资产卷走潜逃。对此，我的回答——这个回答受到了国民议会的热烈拥护——是，在进出口贸易中把私营的部分予以取消（当然给予了补偿），并创办了两家国营的贸易银行，只授权这两家银行经营一切国际性的银行业务。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此举在国内外引起了好一阵喧嚣。但是吴松山事件证明了，只采取一个步骤而不采取另一步骤是不现实的，不同时采取这两个步骤是不可能维护我们的国营企业的。外国银行界人士，特别是法国的银行界，对此大发雷霆。实力雄厚的印度支那银行带头向戴高乐总统呼吁，要求他进行干预。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他的爱国主义一直在鼓舞着我誓死捍卫柬埔寨的自由——在处理这个困难的问题上表现得很出色。他实际上是说，“让它们都关门好了，只留下一家能够专门处理有关我们

的财政援助事宜的银行就行了。”强大无比的印度支那银行——它是几十年来法国殖民主义的象征——就此不得不关上了大门。

1965年由于好几个原因成了一个难以应付的年头。那年2月间，美国开始对北越进行系统的轰炸，3月里美国头一批作战部队在南越登陆。我一方面感到我们必须比过去更加提高警惕，免得给别人以任何借口，把战争扩大到我国的领土上来。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必须表明我们的立场。我们必须坚决表示：我们反对美国直接侵略我们的邻国；我们反对美国在我国境内搞一支第五纵队的活动。（新的经济措施就是我们在后一方面有决心的表现。）我们毫无保留地谴责了美国对越南人民的侵略，并采取了步骤加强我们（当时）同领导南越抵抗运动的民族解放阵线的非正式关系。

我对于我们将会遇到什么情况是心中有数：边界地区的挑衅行为必然会加剧。对边界地区村庄的轰炸，在1964年这一整年中都不断有所增加，而且几乎达到忍无可忍的程度了。西贡美军司令部惯用的借口之一是，边界“不明确”。这是掩盖西贡对我们某些边境地区有领土要求的另一种手法。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明确无误。

1964年10月27日，柬埔寨王国政府和国民议会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警告说，“如果美国地面部队、空军或海军对柬埔寨领土进行任何新的侵犯，柬埔寨将立即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驻在金边的大多数外交官和新闻记者都认为我们只是在吓唬人。象柬埔寨这样的小国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事来的。几个月以前在美国大使馆门前的群众示威——有几万名工人

和学生参加了这次示威，撕下了星条旗并放火烧毁了使馆的汽车——应该足以警告美国大使，使他认识到公众舆论多么激烈。

1965年5月初，美国飞机轰炸了“鸚鵡嘴”地区，炸死炸伤我国几十名农民。我有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我们要维护我们的一点点民族尊严，除了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之外，别无他择。在同宾努亲王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我在1965年5月3日作出了这个历史性的决定。

我们同美国关系的整个阶段——最不光彩的一个阶段——到此结束。只要做到了这一点，等到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批人员收拾好他们的行李，带着他们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和其他进行间谍活动的装备离去之后，我真感到如释重负。情况总是这样。作出这种重大决定的过程是很困难而且也很痛苦的，它不仅使我好几夜不能成眠，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个不发达的小国居然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彻底赶走，这可不是一桩小事。看来导致公开和暗中的报复会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如要顶得住最严峻的考验，最好还是事先把第五纵队的头目们赶走，并且要在敌人面前维护住我们的荣誉和威望。这可不是什么空话。我国边界地区的农民每天都在挨炸弹和炮轰，对于农民们的愤慨，我必须在政治上作出反应。如果我不断绝同美国的外交关系，农村的人民在红色高棉的影响下将会对我感到幻灭，还会指责我已经成为亲帝国主义的卖国贼。有些人批评我“独裁”，其实我对公众舆论一向是很敏感的，就象任何其他领导人都想要保持人民对他的支持一

样。就这件事而言，象往常一样，公众舆论同我自己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我在断交两星期后对国民议会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如果全世界有很多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效法我们，坚决彻底地把美国的存在和影响清除掉，那末不管美帝国主义有多么强大，只要它无法再从我们的土地吸取养分，它就会象一棵树那样被连根拔掉。”后来我在一些国际会议上曾试图劝说第三世界国家仿效我们的做法，但没有获得成功，因为我发现其中有很多国家对美元的倚赖已经成瘾，无法摆脱它了。

政变之后不久，两个法国人合写的一本书中有一段很有说服力的评论，它是讲七年后朗诺和施里玛达怎样一反我们过去为了维护政治和经济的独立而采取的一切措施，倒行逆施的*。

这两位作者——一位是《世界报》的记者，另一位是社会学者兼作家——在描写经济情况迅速恶化以及按传统的交通路线运输货物或将货物运交给传统的贸易伙伴方面困难重重时，写道：

农产品的贸易还是有一些的，不过这种贸易是通过一条不同的渠道进行的。中国商人**在金边进行收购，然后在南越军队的保护下把货物运到西贡，而南越军队则抽取一笔佣金。在西贡的中国代理商在当地的市场上

* 让-克劳德·波蒙迪与塞奇·西奥恩合著，《从妓女到游击队员》，巴黎加伊马尔出版社，1971年版，第264—5页。

** 这里是指那些通常世代代居住在金边或香港的中国商人。

以有利可图的价格把大米、葡萄酒、胡椒和水果脱售。商品是以越南货币皮阿斯特成交的，而所获的利润则转存在香港银行的美元帐户里去了。柬埔寨国家从这种交易中什么也得不到，而它的领导人却与这种交易有私人的联系。朗诺有一个名叫顾安的中国亲信，他过去是民族解放阵线的大米供应商；施里玛达的亲信叫魏庚，是一个进口商和碾米厂的老板，对外以经营一家专门放映人民中国电影的电影院为名。

在前政权下由国家控制的国营贸易已经完全消失。新的盟国不向柬埔寨购买任何商品。国营贸易已被完全受西贡人所控制的庞大的食品贸易所取代。如同过去一样，柬埔寨的权势集团所起的作用是充当新生的买办们的寄生虫。

这段评论对当时这个政权的两个最高领导人描绘得何等的好啊！当金边食品奇缺的时候，他们却大搞其黑市食品交易，给自己在国外的银行添上一大笔存款。然而他们把我赶下台的一个主要借口却是“杜绝贪污”！

朗诺的买办顾安在宋双担任国家银行行长时，曾因一桩罪恶昭彰的贪污行为被宋双查获。我曾把顾安驱逐出境，但朗诺在政变后不久就马上把他从香港召回。在他为民族解放阵线采购大米的活动，中，他既坑了柬埔寨农民，又诈取了柬埔寨政府和民族解放阵线的钱！

朗诺妄图就北京是否真正支持我这个问题散播流言蜚语，在1970年5月11日发表的一次讲话中一本正经地“揭

发”说，在我被推翻以后：

中国人秘密地派了一名使节来问我〔朗诺〕，我们是否会象过去那样给北越人以同样的支持——企图借此表明西哈努克和金边政府之间的问题纯属柬埔寨的事务。只要我们继续象过去那样支持越南人的抵抗部队，北京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这种秘密接触一直延续到1970年5月5日，即西哈努克被废黜后的一个月零二十天。最后由于这些手法并未奏效，北京才决定同柬埔寨断绝外交关系转而公开承认西哈努克。*

全世界的通讯社都把这个讲话播发到国外，毫无疑问会有一些人相信它。不过实际情况是，此位“使节”不是别人，而是顾安。他也许是在劝说朗诺同时玩弄两种手法——一面继续做供应民族解放阵线大米的赚钱买卖，一面也开放通往西贡的黑市交易渠道。1970年5月5日这一天就是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的日子，在它成立后几个小时内中国就给予承认了。按朗诺此人的本性来说，要是照顾他的话办获利够高的话，他恐怕不会不听从顾安的劝告，不过，就算民族解放阵线还可能（其实这种可能性极小）愿意同这类骗子打交道，美国—西贡1970年4月30日入侵柬埔寨（据朗诺说，这次入侵是在没有得到他的允许和他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干的）也使这类阴谋不能得逞了。

这两位法国作家——尽管他们从未会见过我，却在他们

* 朗诺的官方通讯社——高棉通讯社电讯稿，1970年12月5日。

的书中采取了敌视我的态度——关于朗诺和施里玛达两人在3月18日政变后不久就亲自参与这类活动的报道表明，我在推动1965年的商业和财政改革时所面临的阻力有多么大。正如以后的事态发展所证明的那样，为了维护我们的独立到最后一分钟，就只能走这条唯一的道路。贪污腐化同叛国行为的自然联盟到1970年3月18日算是达到了顶峰，但是没过多久，那些在最顶层的人们就为了谁应该获得权力和美元这两项战利品中的最大份额而争吵得不可开交了。

第十一章 独立乃是最重要的问题

自从我当上柬埔寨国王头几年起，我就得去摸索如何获得独立这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我是在1941年4月25日，西索瓦·莫尼旺国王逝世的第二天，被挑选来继承王位的。当时我只有十八岁，是个在西贡的莎士克鲁-洛巴特公立学校专攻修辞学的学生。我祖父去世时，我们学校正好放假，我就回到了金边。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我会被挑选来继承我祖父的王位，我母亲也没有这样想到过。当时人们显然认为，不是挑选我父亲诺罗敦·苏拉玛里特亲王就是挑选我的伯父西索瓦·莫尼勒亲王。在传统上，王位继承的问题是由王位委员会决定的，而王位委员会是由下列人员组成：佛教的两个教宗的领袖、婆罗门教派的领袖、王室委员会的主席、首相和其他有关的阁员。可是，法国总督迪巴多破天荒第一次主持了王位委员会的会议。决定由我而不是由西索瓦·莫尼勒亲王继承王位的就是他，而本来莫尼勒亲王作为莫尼旺国王的长子应该是第一个拥有继承权的。

法国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要把他们自己在四十年前的错误做法给纠正过来。在法国人干预以前，我们这个君主国的继承顺序如同许多其他君主国一样，是由国王的长子继承王位的。十九世纪中叶，柬埔寨文艺复兴和爱国运动的倡导者安隆国王有两个年长的儿子，诺罗敦和西索瓦。当国王于

1860年去世时，他的王位根据传统由他的长子诺罗敦继承。诺罗敦国王统治的时期正是反抗法国和被法国兼并的时期。当他1904年去世时，王位本应由他身边的最年长的儿子苏沙洛特继承的。*

但是法国人却让敦罗敦的弟弟西索瓦继承了王位，因为西索瓦同他们合作，把诺罗敦所秘密支持的抵抗运动给镇压下去了。法国人的这种做法显然违背了柬埔寨的传统，而且人民当然还有诺罗敦家族对此都是反对的。西索瓦于1927年去世后，法国人借口恢复老传统的做法，又让他的长子西索瓦·莫尼旺继承了王位。这在国内就又引起了反抗，因为爱国的公众舆论都支持诺罗敦家族。当莫尼旺国王逝世以后，法国人便趁机试图调解这两个家族间的矛盾，他们本来可以选择诺罗敦的长子苏沙洛特亲王，那时他已经六十九岁了，或者选择苏沙洛特的儿子，即我父亲苏拉玛里特来继承王位。

然而他们却选中了我来继承王位。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我父亲是诺罗敦家族的成员而我母亲则是西索瓦家族的成员。这样一来王室这两个家族就能和解，使这方面的矛盾减少。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我很年轻，而且以有些腼腆和好学而闻名。法国人认为我会比我叔父莫尼勒温顺一些、听话一些。例如说，我那个叔父曾在法国外籍兵团服役，是个有名的硬汉子。按照那个叫克劳斯·慕赫内特的德国作家在他第一本关于亚洲的书中所写的那样，法国人之所以挑中了我是因为他们把我看成是一只“小羊羔”。但后来他们却抱怨我辜负了他们的希望，变成了一只老虎。其实，我在有关柬埔寨

* 不在身边的长子尤根托亲王当时流亡在海外，这在以后要提到。

独立这个问题上从来就是一只老虎，不过当他们让我继承王位时我还只是一只小老虎罢了。

还在维希法国的日子里，我周围的那些教师们从我继位时开始就企图用贝当元帅的那些道德和戒律来教育我，但我对此却是丝毫不感兴趣。在我一开始同法国人发生的一次顶撞中就是在个人自主这件事上。负责印度支那事务的秘书长乔治·戈迪埃就热衷于让我去同一个他中意的有钱的达官贵人的女儿结婚，我强烈地加以反对。经过许多回合的长时间的斗争，我还是走了我自己要走的道路。但这个早期对我个人自由的干涉却点燃了埋藏在我内心深处的忿恨的火种。

当时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总督是德古将军。他是独裁主义者贝当的狂热崇拜者。但是有一件事我还是很感谢德古的。他曾很热心地劝我要尽可能在国内多走些地方，并深入了解情况。我确实这样做了。我曾去过最边远的地区，而且经常是骑着象去。正是通过这个办法，我才第一次同我们的农民和渔民有了真正的接触，并欣赏了我的祖国的美丽多姿。这些旅行的结果可能是与德古本来所希望的相反。因为当我越来越多地了解了我的国家和我们人民的问题，我就越发开始憎恨殖民统治造成的罪孽，越发坚定了必须使我们的祖国获得完全独立这一信念。正是在执政的最初那些年里，我才学会了怎样去同农民乃至同山区部落人民交谈，并想办法了解他们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这种同人民密切接触的爱好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那时的柬埔寨还是法国的保护国。对于可恶的殖民主义一词的真实意义，到了1941年12月维希法国把柬埔寨连同

我一起都让给了日本人时才暴露无遗。即使法国人肯为了保卫自己而打几枪，他们也决不会为保卫〔我们的〕王宫而开一枪的。日本人在他们占领期间的头几年里，还保留了法国的行政机构，并通过它进行统治。我同这些入侵者几乎没什么接触。但是到了1945年3月9日，日本人突然接管了全部政权。他们最初的行动之一就是通知我从那天起柬埔寨独立了。这真又是一个意外的事情，差不多就象当时让我去当国王使我感到意外一样。不过，我很快就领教了这个所谓独立的代价，那就是我必须把柬埔寨变成日本在战争中的盟国，并为此目的而开始动员这个国家的人力和物质资源。

我根本不想这样做，而是决心利用我们这个新获得的地位来为我们自己谋取尽可能多的好处。在能动手做具体事之前，我先向日军最高司令部说明了我必须得到在法律上取得独立的文件。于是在金边与东京之间进行了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换文。我就这样才使柬埔寨没有卷入战争，后来我还把这个“独立”地位的问题当成同法国人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在同当地日本指挥官及东京交换照会的那五个月中——这个工作一直进行到他们投降为止——我经常处于山玉成的压力之下。此人在3月9日政变后马上由日本人从东京搞来硬塞给我，当我的首相，而且当时我在一切有关国家事务的处理上都得接受他的意见。我算是知道了这个傀儡的“爱国主义”而且永远也忘不了它。他当时是为自己拼命抓权的，就是现在也还如此。正因为他那时所犯下的罪行，所以法国人一回来就将他逮捕，并以叛国罪判处他死刑。

1945年9月，当法国人在英国的帮助下回到印度支那

后，他们便叫我派一个代表团和那个新任的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第厄里·达让里埃将军讨论所谓“有关我的王国利益的问题”。用不着有什么想象力就可以猜得出我们所争论的是些什么问题。我在9月28日给予的回答内容如下：

我们要求这位将军让我们知道，我们将予指定的代表……是否会被认为代表一个独立的国家。

柬埔寨在3月9日事件后恢复了它的独立……我们准备同法国打交道并与她保持政治、经济及文化性质的友好关系。但在此同时，这种关系决不能危及我们国家的独立。

这封信并没有得到回答，同达让里埃将军的讨论也没有举行过。后来法国人明确表示，他们所希望的是仍旧建立基于1863年那个“保护”条约和那可耻的1884年条约的关系，而前者是一个只经过四小时的最后通牒强加在我曾祖父诺罗敦国王头上，并由在湄公河上的法国炮舰所支持下所订立的条约，而后一条约则是用了更加残暴手段达成的。看来，我要是接受法国人的观点，那我就势必要从头开始设法恢复我们真正的独立。

那些持怀疑观点的人往往会认为，我所谈到殖民主义强加在几代高棉君主身上，并通过他们强加到柬埔寨人民头上的那些欺凌与侮辱未免有些言过其实。我的那些对手们总爱津津乐道西哈努克在处理国事和对待个人尊严问题上的“错误”与“极度神经过敏”。我只需举出一个过去的事例就足以

回答他们了。1900年，诺罗敦国王派他的王储尤根托到巴黎向法国政府递交了一份请愿书。法国人给了他空前的礼遇并且送了他大量的礼品，想以此使他忘记他自己的使命。但他并没有退却，而且成功地发表了他的讲话。在对他所受到的礼遇表示了感谢之后，他指出他的巴黎东道主所表现出的慷慨与他的人民在柬埔寨因为法国人执行的政策而遭受的苦难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在带来我父亲问候的同时，我要开诚布公地明确表达我父亲的忧虑心情。”然后他接着讲：

毫无疑问，法国政府并不知道使用过什么手段来达成这个1897年的文件的，而该文件标志着把王国的权力移交到保护者手中去的主要阶段。这个在柬埔寨进行权力移交的条约之达成正是由于1884年的军事政变和政变者用占领王宫并用刺刀架在国王的脖子上以绑架相威胁的结果。

到了1897年，杜麦先生也是通过威胁并使用了武力——虽说不那末残暴，但也同样无情——才把其余的行政权以及这个王国的经济权和领土所有权攫取到手的。

德威内维尔先生是当时的总督。他伙同他们的帮凶和姘头们所犯下的罪行是尽人皆知的。正是这个总督——我们国王的死敌——在国王对那些滥用权力使人民受尽了苦的行径提出抗议之后，宣布国王疯了并把国王关了起来，还威胁要杀国王的头，之后又决定废黜国王并把他流放到波罗康德的犯人垦荒区去。

杜麦先生出面干预并说要拯救国王，其代价是修改

1884年的条约，将国王和柬埔寨人民置于总督统治之下，根本不予任何补偿，并使我们的人民在这种专横的制度下忍受着痛苦，直至今天。

尤根托〔在提出这项著名的请愿书时——为此他失去了王位——接着说〕，从长远看来，这些代价都得由人民来付出。由于把土地所有权交给了总督，人民也遭了不少罪。而按照过去的法律，柬埔寨的土地是属于国王的，属于事实上占用并耕种土地的人们的。这同佛教法律给国王规定的义务是一致的。土地属于神，交给国王保管，并由国王将它交给需要土地的人们去处置，丝毫不加限制。然而正是你们建立了私有财产制，正是你们划出了大片的租让地，正因为有了你们，人民才陷于贫困：你们依靠武力，迫使柬埔寨人为使用自己的土地而付出高昂的代价，而按照过去国王的土地法是允许人民无偿使用土地的。

会不会有人因为我读了这样一个文件之后义愤填膺而责备我呢？这个文件我是在王家档案处找到的，当时我正处在法国人企图让我们倒拨时针再回到那种受殖民主义者摆布的年月中去的压力之下。尤根托亲王在提出他的请愿的同时，还详细阐述了许许多多蛮横不讲理的逮捕事件，往往只是由于犯了微不足道的罪行，尤其是那些对法国人的占领持有批评态度的人。

这些任意的镇压、流放、监禁和不时的杀戮竟被说成

是政治措施。国王的政敌们的报复行径，总督的歇斯底里——特别是他酒后、抽完鸦片后或在那些本地娼妇及秘书们的怂恿下——对人民犯下了大量的恐怖暴行。如果人民稍有不满意，那就会招致人身自由乃至掉脑袋的危险。

尤根托亲王告诉法国政府，当总督得知诺罗敦国王要派他的儿子去巴黎时，就用逮捕来威胁尤根托，因为他“害怕我讲出真情，而且人们也许会听得到的”。尤根托谈到了年迈的国王对于人民遭受镇压和侮辱而感到痛苦，并警告说，如果这种情况再不予以纠正，要是国王果真死于悲伤——这看来是很有可能——“那么我就完全有理由说国王是被人谋害致死的。”

人们可能以为〔法国〕这个被公认是西方世界上最文明国家的政府一定会被他讲的话所感动，因为这些话很体面而且很勇敢地把地处帝国远方的形势讲清楚了。但反应又是怎样的呢？那就是在尤根托发表这篇请愿讲话后，立即下令将他逮捕起来。尤根托后来设法逃到了英国，最后到了暹罗，并于三十四年之后死在那里。在他发表请愿讲话的四年之后，照理他本应继承其父的王位的，因为他父亲果不出他所料，是由于极度悲伤致死的。在诺罗敦国王去世的前一年，他在王宫院内修建了一座名叫银塔的建筑物，并亲自监工管理。（自从他被迫签署了1884年的条约后他就再也没有跨出过王宫一步。）塔建成后，国王就恳求佛陀作鉴，证明他是在屈辱中被迫结束他的统治的，并祈求把建塔的功勋“让那些能够恢复柬埔寨

寨的民族独立和过去的光荣的后代子孙们来享有。”但是，法国人对此的答复却是把王权交给了他那个对法国人百依百顺的弟弟西索瓦。

我是我曾祖父死后第一个诺罗敦家族成员继承王位的，难道我立誓要为最神圣的事业建立功勋会令人感到惊奇吗？从法国人一开始发动再次征服印度支那的战争那时起，我就全力以赴地去争取民族独立。但我是极力避免发生武装冲突和流血事件的。很明显，有很多同胞是不同意我那样做的，有些人宁愿同胡志明的越盟并肩作战。由于我的经历和教育所造成的偏见，我担心越盟恐怕只是为了要取代法国人在柬埔寨作为统治者而战斗的。后来事实证明，这对柬埔寨是有益的，因为有一批参加越盟作战的我国同胞，把有关游击战的宝贵经验学到了手。他们在反法战争结束后仍然把在过去那些岁月中建立的抵抗运动基地保留了下来，并使之能够发挥作用，以防殖民主义万一卷土重来，而我对此竟一无所知。这些基地的存在为我们 1970 年 3 月的抵抗运动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此同时，我在斗争的早期阶段则以合法的手段尽了我最大的努力。

我于 1946 年和 1948 年先后两次在法国的索慕尔军事学院学习骑兵和装甲兵科。当时学院的院长兼我的教官是德朗格勒将军。后来，当我表现得对我们的民族独立特别感兴趣之后，法国政府便把德朗格勒调到柬埔寨任驻军司令官。他们认为，既然我在索慕尔军事学院是德朗格勒的得意门生，那么我在自己的国家里也一定会继续俯首听命于他的。但正如德朗格勒是索慕尔军事学院的“皇上”，而且他也是那样干的，

我是柬埔寨的国王，我也当然完全想行使我的国王的权利。就象以后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导致了一件很沉痛的意外事件。（碰巧法国人让我上了他们的陆军大学，不过因为我很喜欢骑马，所以我情愿把我的军事训练同我最喜爱的一项体育运动结合起来。）

1949年9月，我向法国高级专员提出了如下五点要求：

一、给予柬埔寨以真正的内政主权。

二、自主地处理同世界各大国的外交关系并在联合国派驻代表。

三、逐步并迅速减少法国在柬埔寨的各个军区并由柬埔寨人取而代之。

四、赦免一切抵抗战士。

五、释放包括山玉成在内的一切军事犯、政治犯和被流放的人，并给他们以大赦。

这些要求最后都被答应了，并且被规定在一项新的条约中。于是柬埔寨能够在1951年9月出席了旧金山会议。自从殖民占领时期以来，我们第一次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同其他四十七个国家一起，签署了对日和约。

不过，我的人民和我自己都对1949年的条约感到不满意。尽管它在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但它距离我们要求无条件独立的目标则仍相差甚远。在1952年6月我对柬埔寨人民的一次讲话中，我保证要在三年之内获得完全的独立。那就意味着，法国得把它坚持要求保留的所有权力全部移交给柬埔寨，而法国人硬说这些权力是他们对越盟进行战争所必需保留的。

我把我的立场对法国人说得一清二楚。尽管我不愿意柬埔寨的领土上有越盟的势力，但越盟分子在他们自己本国怎么搞法可不是柬埔寨管得了的事，而且我也不希望别人把柬埔寨当作反对越盟的军事基地。我继续强烈要求得到完全的独立。

1953年3月25日，我被邀请到巴黎去同法国总统阿里奥尔共进午餐。这时我感到很有希望了。可是午餐会谈没啥成果，阿里奥尔明确表示，他希望我越快离开法国返回柬埔寨越好。他甚至走得如此之远，竟在正式的联合公报里写上“西哈努克国王应该在几天之内回到金边”这样无礼的词句。主管印度支那诸国的国务部长勒杜诺先生的一次访问竟明确指出，我为获得独立所采取的步骤至少说也是“不成熟的”。

虽然我的运气比半个世纪前我的叔祖父的运气要好一些，但我对被人怠慢也还不那么轻易就罢休。我决定到美国去为我的事业奋斗一番。我估计，在没有被印度支那殖民主义玷污的自由世界的根据地，我还是可以得到我所需要的谅解和支持的。勒杜诺一听说我有这个计划，就劝说我那亲法的叔叔西索瓦·莫尼勒亲王，要他警告我，如果我跑到国外去进行“反对法国的冒险事业”，那么我的“王冠”就可能保不住了。

这时，我同法国人主要的争论已归结到一点：法国人坚持柬埔寨留在法国联邦之内并在反对越盟的战争中扮演一个角色，而我则拒绝这样做。我曾对阿里奥尔总统说：

法国用不着为我或我的王位，为君主制的命运，或为

柬埔寨的命运操心，只需要给予柬埔寨以完全独立就行了，哪怕这意味着法国完全放弃我们的国家，如同法国所威胁的那样。在我国的历史和我国同法国的关系的转折关头，我被迫在法国和我的同胞这两者之间选择一个。显然我会选择同我的同胞站在一起。

我实在无法理解，不久前才挣脱纳粹占领者的枷锁的法国，居然不懂得柬埔寨人民——其实也是整个印度支那人民——的民族愿望；而一个社会党的总统竟会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更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那种说我要是做得太过分就有可能“失去王冠”的暗示也是令人非常气愤的。难道王冠真的是任凭他们可以随意予夺的东西？

我于1953年4月13日取道加拿大前往美国，在途中我草拟了一个紧急要求给予印度支那三国以全部独立的备忘录，把柬埔寨的问题列为首位。我强调指出，只有给予柬埔寨以真正的、完全的独立——这对整个印度支那三国也都适用——之后，柬埔寨才有可能参加有利于民主国家的任何活动。

这就是我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会谈一个小时的主题。但他的反应少说也是尖酸刻薄的。

“在你们的地区击败共产主义！然后我们才会对法国施加必要的压力。”这就是他所贩卖的货色的实质。他的固执的看法是：消灭越盟是迫切的需要，而柬埔寨对此作出贡献则非常重要。

只要我们共同的敌人越盟没有被打垮，而你们对越盟在消灭你们高棉君主制、你们的光荣传统、你们上千年的文明和年幼的民主方面有多大能耐是一清二楚的；只要这种巨大的，致命的危险性没有被击退，我们决不能做任何会使法国人泄气的事，因为法国人正在印度支那为了捍卫我们共同的自由事业而作出重大的牺牲。

我们正处在战争的最关键时刻。这场战争是非打胜不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应该把我们的力量和各种手段团结起来，而不是进行争吵，分裂我们自己。你同法国争吵只会对我们共同的敌人有利……你们国家要是没有法国军队的帮助，会很快被共产党人征服，你们的独立也就报销了。

我感到有必要对他说，就象我告诉阿里奥尔总统那样，要他别为我们的事操那末多心。

把上述的、在 1953 年讲过的话同 1970 年的现实作个比较倒是颇有讽刺意味。一直试图把我们的传统和文明消灭掉的，除了杜勒斯的继承者之外，还会是谁呢？一直试图把他的“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理论付诸实行的人又是谁呢？我同越盟在思想意识方面毫无共同之处，但是我同情他们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只要我仍然是个柬埔寨的爱国者，我就不会不这样做。我们所追求的目的是一致的，但用的手段则不同。我尽量对杜勒斯作了这样的暗示，但他那冷冰冰的意见竟和阿里奥尔总统的说法一模一样：“回柬埔寨去帮助纳瓦尔将军，打赢同共产党人的战争！”

我的下一个行动是安排一次同《纽约时报》的采访会见。该会见被《纽约时报》作为1953年4月19日的头版新闻披露出来。对有关“共产党威胁”的一个问题，我回答如下：

“过去几年来，柬埔寨的知识分子阶层日益认为越盟共产党人是在为他们国家的独立而斗争。”我又补充了一句，凡是持有这种看法的柬埔寨人都不理解，为什么他们“应该去为法国而死，从而帮助法国人继续留在柬埔寨”？我指出，法国人坚持保有各种治外法权和特权是不公平的——这些特权包括，继续对柬埔寨武装部队拥有指挥权，对经济和财政事务有控制权以及保留主权的某些其他属性。关于报界的威力，特别是在适当的时机用适当的方式发挥出来的时候，我通过这次大家对采访会见的反应算是得到了很深刻的印象。虽然我同阿里奥尔、杜勒斯的会谈失败了，但我同《纽约时报》的谈话却得到了成功。四天之后，法国就邀请柬埔寨派一个代表团去巴黎，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谈判。

我中断了我回国之行，在东京作了停留，等待巴黎谈判的结果。我在东京接到了杜勒斯一封电报，吁请柬埔寨“在老挝如此明显地受到共产党入侵的威胁的时刻”，务必以完全协调一致的气氛同法国合作。电报接着指出，美国“将以身作则，加强并加速它的援助，使高棉人民免受共产党的侵略”。我想，那好嘛。显而易见，柬埔寨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我在这里想到的是军事力量方面的问题。

诽谤我的人总爱装模作样地说，我在我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准是被毛泽东和周恩来洗过脑筋。其实，对我进行政治教育的人是樊尚·阿里奥尔、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及后来的

理查德·尼克松之流，不是别人。在这些领导人眼里，独立的问题是个用来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可以根据是否符合他们的利益来给或不给，根本不顾有关的小国的利益。

只是在将近五十万柬埔寨人集会支持我主张在必要时得进行武装斗争的号召之后，法国人才开始对谈判表示有真正的兴趣。

1953年9月，在法国同意移交军队、警察和司法权力之后，我让宾努首相向伊萨拉克高棉*—越盟以及越盟军队发出一项呼吁，其中有以下一些关键的话：“虽然我们不是共产党人，但我们并不反对共产主义，只要它不是从外界强加给我们的……越南发生的事与我们毫不相干。”我向他们保证说，独立的柬埔寨不会被人用来作为反对越盟的军事作战基地。这个宣言引起了一片责备柬埔寨“中立主义”的骂声——这是中立主义这个词第一次被用来形容我们的国家。它还使赢得了“中国帮”**美名的威廉·F·诺兰这个“代表台湾的参议员”不吝亲自驾临柬埔寨一行。他同美国驻西贡大使唐纳德·希思一起到来，坚持认为法国必须继续全面统率柬埔寨，以便实现消灭共产主义这一主要任务。施里玛达是当时的外交大臣，所以诺兰不难把他争取过去，让他同意了美国的观点，不过我仍然坚决不同意。

诺兰的访问标志着美国干涉柬埔寨事务这个漫长的过程的开始，并以1970年的人侵达到了高潮。诺兰和希思在施里

* 伊萨拉克高棉是一个松散的、有组织的抵抗集团，与越盟结成了联盟。

** “中国帮”是指当时以参议员诺兰、众议员周以德等为首的一批美国亲蒋帮分子组成的院外游说集团——译者注。

玛达的支持下，把一切可用的论点统统搬了出来，逼我们保证柬埔寨将为“共同的事业”助一臂之力。但我们已有我们既定的方针。他们只好怒气冲冲，空手而回。

1953年10月17日，进行了有关移交军事权力的最后阶段的谈判。到了11月9日，有关独立的所有标志都最终归柬埔寨掌握了——不过这只是在对法国人进行了某些军事摊牌并由我军把某些法国部队解除了武装之后才实现的。

由于我利用了越盟对越南和老挝的压力与日俱增，也利用了柬埔寨国内抵抗力量的日益加强，我居然能够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开展巧妙的活动，使法国人要嘛不得不对我的“争取独立的皇家十字军运动”让步，要嘛在牺牲其他更为重要的战线的情况下，加强他们在柬埔寨的力量。

等到正式移交权力的时候，我得同我的可尊敬的前骑兵科教官德-朗格勒将军打交道了。

他说，“陛下，你可‘狠抽了’我一顿。”*

我回答说，“我的将军，实际情况可不是这样。我只不过想要证明一下我没有辜负朗格勒将军的教诲罢了。我的成功就是您的成功，因为教会我懂得军事科学的正是你啊！”

他接着说，“但你对你的教官可不太宽厚啊！”

我说，“我的将军，我得证明我是你的弟子之一。我总不能在一场以我的国家作赌注的战斗中失败呀！”

在法国人离柬前夕，朗格勒手下有个参谋人员对他小声说道，“国王陛下简直疯了！你从前的学生简直疯了！他把我们从柬埔寨赶走，而要是没有我们，他准会被越盟吃掉！”

* 这是法国骑兵官兵常用的语言。

朗格勒转身对他和其他军官答道，“先生们，国王可能是发疯了，不过他这次发疯的水平可是很高的！”

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的〔日内瓦〕国际会议给予我国的独立以国际承认和保证。但我们还是把我们实际上获得独立的1953年11月9日作为我们庆祝的节日。对我来说，一条漫长且痛苦的道路好像已经走完了，可是结果它却只是另一场斗争的某个阶段的结束，而这场斗争的复杂性超出了第一个殖民大国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对我们提供“保护”时我的祖先们和我自己所能想像得到的，不知道有多少倍。

当我有幸在胡志明故主席灵前守灵时，我想起他说过“再没有比独立更为可贵的东西了”这句名言是多么正确啊！他是一个出身低微，奋斗了终生的革命家，而我则是一个世代为帝王的贵族。他年长我三十岁，是老一辈的人了。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点：都不懈地为我们国家的独立献身。他选择了坚定的革命道路——而我在年青的时候对这条道路是害怕的，因为我以为走那条道路非流血不可。

我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凝视着他这位无与伦比的爱国者的安详、严肃的面孔。我感到，他一生的活动就是印度支那人民为了摆脱外国统治作出了几十年流血牺牲的历史。他是一个彻底无私的、善良的人，他把他的一生献给了为人民求解放的事业。

最后教人们懂得这一惨痛教训的是美国人。这个教训是：只要帝国主义者决定把一个国家作为蹂躏的对象，他们只给争取自由的人们留下了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胡志明所指出的武装斗争的道路。

第十二章 从放弃王位到被废黜

1955年3月2日,我给金边广播电台送去了一封信,并附了以下的指示:中午时刻把信拆开;把信内装的录音带在广播中午新闻时予以播放。柬埔寨的人民是通过听广播才知道我已放弃王位的,当然感到十分惊讶。王室的成员和政府负责人也和其他人一样,都非常吃惊。这个决定完全是我自己一个人作出的,我对谁都没有透露过。根据1947年宪法的规定,遇有这种情况,王室委员会必须从安隆国王的男性后裔中遴选一人继位。那也就是说要由西索瓦王族或诺罗敦王族中产生。他们遴选了我的父亲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当时他是六十岁。我当时是三十二岁,已经当了十四年国王了。在我的广播讲话中,我斩钉截铁地表示我决不谋求也不再接受王位。

为什么我要采取这样一个步骤呢?为什么又在那个时候宣布?因素是很多的,有些与国内事务有关,有些则与对外事务有关。我在1952年就曾保证要使柬埔寨在三年之内获得完全的独立。不到三年我就提前实现了这个目标。在我决定放弃王位前不到一个月,在1955年2月7日举行的公民投票中,99.8%的选民对于王室是否完成了使命,让柬埔寨人民满意地获得了独立的问题,作了肯定的答复。在完成这项使命的过程中,我在同世界上的政治家打交道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对象我这般年纪的人来说,恐怕还是很难能可贵的。面对着

象法国、美国这号大国所采取的“漠不关心”的政策，我抛弃了一切天真的幻想。既然现在已经获得了独立，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持独立了。虽然君主制度对领导赢得独立的斗争是适应的，但对于解决以后的任务就不大适应了。

国际监督委员会开始象个超乎国家之上的政府行事了。委员会中的波兰人把我当作一个贵族看待，因此我当然成了进步力量和左派政党不共戴天的敌人。波兰人就利用了这一点。委员会中的加拿大人则维护美国人的利益，从一开始就对我们的边界屡遭侵犯视若无睹。柬埔寨国内互相斗争的政治派别则想要把我变成一个有名无实的君主，可以在他们的争吵中不把我放在眼里。至少可以说，这就是我当时对形势的看法，而且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定放弃这个只具有象征性的王位，并决定自己直接进入政治舞台的原因。

在对外关系方面，要求柬埔寨接受东南亚防务组织的“保护伞”的压力已在不断增强。我们国内的一些右派，把这种“保护伞”看成是有利于保护他们自己的政治野心的东西。杜勒斯曾明确表示，他准备派出军官来帮助柬埔寨训练陆军，但得“保证他们负有全面的责任，并且不受法国人的阻挠”。这条规定明显地意味着这么一种威胁：美国的目的是要利用法国人撤走这个机会，插手进来并取而代之。

我也想要在政治上能站住脚，并能在政治舞台上和我的反对派进行较量，而不是光靠我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权力。美国支持的（柬埔寨）民主党，想要实行基本上是法国式的西方议会民主。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波兰代表则保护亲共的人民党的利益。在1947年，我就把当时的君主绝对专制制度改变

为通过议会进行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后来，我感到这项新制度行不通，主要是因为我国人民对那种形式主义的民主制没有经验，在这种制度下，选民们把选票投入票箱，选举那些许下了最吸引人的诺言的人，不管他是什么人。当我在1952年把选出的第一届议会解散，并以我答应在三年内实现独立作为交换条件时，有个怒气冲冲的学生给我写了一封措词十分激烈的信，指责我摧毁了我们还很年幼的民主制度。这个学生叫做胡荣，现在是在国内领导抵抗斗争的三位主要大臣之一。实际情况是，那时我们大家对于如何建立一个民主制度都还没有经验，这个制度不但要能独立生存下去，而且还要在实际上行得通，保得住。在新近获得独立的国家中，面临这类问题的不光是我们。

柬埔寨不能照搬法国式的议会制度——它在战后期间，每隔几个月政府就倒台一次，几乎堕落到了接近无政府状态的典型。法国有一整套历史悠久的文官制度，不管政府最高层是否稳定，它总是能不断地行使职权。但柬埔寨的文官制度还很幼小，而且以前的工作人员都是由法国人或越南人充任。它不具有那种稳定的机构。于是我决定顶住那股我认为会导致混乱的逆流，让柬埔寨有一个崭新的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权力的行使可以杜绝蛊惑人心的手法到最低限度，而当时民主党的领袖之一的山玉成则把蛊惑人心的手法当成他的主要武器。

2月19日，正好在我宣布放弃王位的三个星期以前，我提议修改1947年的宪法，规定每个乡*选出议员参加省议会。

* 乡(Commune)是指包括几个村庄在内的行政单位。

全国十五个省议会在管理地方事务方面拥有广泛的权力，并由省议会选出参加国民议会的议员。候选人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政党的代表参加选举，尽管各个政党仍然可以进行活动。但内阁成员则由国王从选出的议员中提名遴选。国民议会有权撤销个别内阁部长的议员资格，但不能推翻整个内阁。如果选民的半数以上认为某个议员不称职，也可以撤销他的议员资格。

在提出这个显然很新颖的制度时，我的想法是，要人民根据候选人在地方政治活动的表现来选他们，而不是据根谁擅长花言巧语就选谁。反对党批评这个提议，甚至向国际监督委员会告状，说这种做法违反了日内瓦协议的精神。他们攻击之猛烈，他们企图归咎于我的动机之卑劣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使我感到我已不可能继续留在君主这种地位上了。我要么作为君主从而不得不在政治上持超然态度，要么就放弃王位并直接进入政治舞台。

在我宣布弃位大约两个星期之后，我作过如下的说明：我感到我一方面作为国王，同时又要同人民保持真正的联系是很困难的，而我一向都渴望能与人民有真正的联系。我想说服我们的年青人，特别是学生：我为国家效劳和想保留“国王陛下”的称号或在王宫中过骄奢淫逸的特权生活毫无联系。我还解释说：只要我还当国王，那么当我告诫国家官吏不要去追求权势和金钱时，他们就不会把我的话当真。

当我为了反对外国控制而同各大国打交道时，我拥有王室权威是很重要的……我需要拥有作为我国合法

的、有资格的代表的称号……要是我不以国王的名义讲话，那么他们总是会说我并不代表整个柬埔寨讲话……今天，情况不一样了。主要的问题是国内问题。

要是我继续当国王，在我的王宫里深居简出……那么我永远也无法了解真实情况，永远也不会知道人民遭受到哪些虐待。

(在我的面前，那些受苦受害的老百姓是不敢公开照直说话的，这一点我是太了解了。如果他们说了某些有关官员不爱听的话，想要在事后申斥他们，甚至打击报复他们的官员可就太多了。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老百姓在离开王宫以后会有什么遭遇？)我的广播讲话继续说到：

王宫里面，讨好的官吏和搞阴谋的家伙比比皆是。他们就象一群在大象腿上吸血的水蛭。

我非常讨厌当繁琐礼仪的俘虏，接受各种类型喜欢拍马屁之徒的逢迎谄媚。每当我要外出旅行自己到处看看的时候，总是事先就作了布置，不让我看到任何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我只能看到一群群穿得不错、拿着旗子欢迎我的人们，在我同社会现实之间建立了一堵人为的墙。我恨这一切，可是作为神圣的国王，我又非得接受这一套东西不可。

由于在独立之后已有四十多个国家承认了柬埔寨，因此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得用来接见各国大使和来访的贵宾，组织接待、宴会、王家芭蕾舞演出以及许多官方的事务，使我简直

毫无时间到我国国内走一走。毕竟我还是传统的“神圣国王”啊！我在广播讲话中把这一切讲完之后又加上了以下这些话：

这就是我为什么决定放弃王位、抛弃一切豪华盛典的理由，以便把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人民并为人民谋福利。

有人散播谣言，说我放弃王位是个政治姿态，只要什么时候我认为有利，我就会再当国王。为了让这些谣言没有市场，我声明说，“不论事态如何发展，我都断然拒绝再接受王位。”尽管我如此明确地“在全国、在历史、在宗教、在全世界面前许下诺言”，也还有许多人不相信这一点，而他们本来是应该相信的。

在发表放弃王位讲话后一个月左右，我宣布我打算组建一个新的政治组织，人民社会同盟，它将是实现民族团结——我把它作为我的目标——的主要手段。我吁请各个政党埋葬它们的分歧并参加到这个新组织中来。我把这个组织看作是一个阵线或运动，而不是一个政党。我说其目的是，“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平等的、社会主义的柬埔寨，恢复我们祖国过去的伟绩。”不少忠诚的支持者很快就把“民主、平等、社会主义的”这几个字丢在脑后，并且开始想方设法利用民社同盟来发展他们自己的个人野心。

不到两个月，三个右翼政党的领导人：高棉复兴党的朗诺、人民党的桑·萨里和国家社会党的温长顺就解散了他们各自的组织，号召他们的党员参加民社同盟。民主党，人民党，

自由党以及其他一些党则宣布它们将作为单独的团体参加预定于1955年9月11日举行的选举。

选举在国际监督委员会的监督下并按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规定举行，结果是民社同盟赢得了九十一席的全部。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会有这样令人感到过意不去的大胜利。

获得了总选票的83%，民主党获得了13%，而人民党只得到了3%。自由党和其他四个小党总共只得了不到1%的选票，从此以后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在我放弃王位六个月之后，我发现我自己已作为一个拥有国民议会全部议席的政治组织的首相，站在我政治舞台的前列。

由于不管从哪方面看民社同盟已把三个右派政党全部包括在内，而且也由于人民党已被彻底击败，华盛顿对我选举获胜大为高兴——不过高兴得有点过早。首先，民社同盟决不是只由参加进来的那三个党所组成；其次，我并不打算推行反动政策。左翼组织由于主张中立和反对美国新殖民主义而颇得人民的支持，这一点对我印象很深。这类主张比其他组织的政策更接近我的想法。杜勒斯应该记得，在华盛顿表示高兴之前，我在放弃王位仅仅两个星期之后就去访问了尼赫鲁。这位印度领导人对我采取这个步骤表示热情支持，并极力奉劝我在外交方面推行中立路线，而我脑子里恰好也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

早些时候，山玉成就与尼赫鲁有过接触，设法让尼赫鲁支持他的政策，并在印度总理同他的女儿英迪拉游览吴哥古迹时，秘密同他接近。尼赫鲁显然立即对这个阴谋家打量了一番，劝告山玉成忘掉我们之间的分歧，为了国家团结的利

益进行合作。山玉成则以对我进行恶意咒骂作为回答，其中有一条就说我“反美”。尼赫鲁倒没有为之所动，而且把事情的全部经过都对我讲了。

我对印度为期八天的访问，结果达成了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的协议，并在联合公报中规定我们的关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而这些原则是不到一年前周恩来访问德里时所缔造的。尼赫鲁同我相处得很好，他对我采取中立政策是有影响的。

选举结束两个星期之后，民社同盟举行了第一届国民大会。这种做法同我要人民直接参政的想法是一致的，现代的社会科学家把这叫做（直接参加）“决策过程”。大会决定采取了一些有历史意义的措施：给妇女以选举权；规定国家机关只准使用高棉语（这一直是我同法国人争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戈蒂埃——这位总督曾违背我的意志，要我娶个法国人——甚至走得如此之远，不准使用高棉文字，赞成另搞一套拉丁化的文字。他严肃地向我保证说，除非我们这样办，否则柬埔寨永远也成不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大会还决定，只要议员所属选区的大多数选民有要求的话，就可将议员予以撤换。从那个历史时刻起直到1969年12月，全国代表大会每年都照常开会两次，并在国家遇有危机情况时还召开非常会议。

在这八年期间，柬埔寨从一个专制君主制发展到一个拥有选举出来的议会的立宪君主制，再通过国民大会发展到一种最初形式的有指导的民主。君主的作用，在我的主动倡议下，被削减到只具有象征性。决策权在首相和内阁手里，人民的直接参政则加强了这项权力。这个制度在后五年里工作

得很顺利。

1960年4月3日出现了一次危机，我父亲苏拉玛里特国王六十六岁的时候死去了——正好是漆盒炸弹事件发生后的六个月。王室委员会是否应从安隆国王的两个儿子的男性后裔一百八十多个王子中挑选一个作为合法的继承人呢？（尽管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采取初步措施，以给妇女选举权的方式逐步走向男女平等，可是关于王位继承则谈不到有这种平等。要是有一种平等地位的话，那我母亲几乎肯定会被选为女王的。）

在王室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我就指出，君主制的最大优点之一是，国王成了全国团结的最高象征，但是现在却有个“集团拼命设法削弱、甚至公然要毁掉整个王族，然后在废墟上建立一个以山玉成为总统的共和国”。作为对几乎整整十年以后会发生什么的预测来说，我预测得还算不坏，只是山玉成不得不于1970—1971年间坐在总统接待室里等候，而且等的时间比他自己所预料的要长得多。当时要我重新当国王的压力不小，而我的决定则是不可改变的。许多人想从我的儿子中挑选一个出来，但我对此也是反对的。我对王室委员会说：

世界上谁也甭想说服我同意让我的一个儿子去继承王位。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当统治君主的担子之重、责任之大，我可算是领教过了。除此之外，他对各种阴谋、贪婪和尔虞我诈的现象还得予以容忍。在我当君主的时候，我就逃不过任何一项，因此我想，对于我为什么不要我的孩子也遭受同样的命运，你们是会理解的。

我最不愿意看到由于王族内部的争权夺利而把我们国家从上到下都搞得四分五裂，甚至威胁要打一场内战。我内心里意识到，我之所以采取这个立场，除了保留君主的形式之外，实际上把君主制都取消了。对此，我大胆地放弃了王位。但是，君主仍然是这个国家团结一致的最高象征，太突然地背离这个象征只能对敌人有利。我后来还说，等到君主制对国家的团结和进步已不再是“一种和谐一致而且行之有效的制度”时，我自己就会毫不犹豫地

采取主动，把这个制度抛弃掉，沿着其他道路来领导这个国家，帮助它和平地、不流血地完成它自己所选择的革命。^①

还没有到采取这种行动的时候。对人民来说，君主制加佛教就等于这个国家。因此，我一面力主保留君主制，但我也反对挑选一个新的君主。

最后决定，作为一项暂时解决办法，成立一个由我叔父西索瓦·莫尼勒亲王为主席的摄政委员会。他于1960年4月4日向国民议会宣誓就职。但这并没有终止危机。人们纷纷请求我提出一些比较永久性的解决办法，并一再要求我重新当国王。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建议修改宪法以便授权王位委员会

^① 《柬埔寨现状》，1962年8月3日。

根据人民所表达的意愿，将国家元首的权力和特权交给普选所明确选定的人。

1960年6月5日举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公民投票。这项建议以两百多万票对几百票获得批准。宪法第122条修正案规定，国家元首一经选出就拥有“君主的权力和特权”。该修正案于6月9日在国民议会获得一致通过。五天之后——1960年6月14日——人民一致选举我担任这个新创立的职位。王太后仍然作为象征性的君主，由我行使最高国家元首的“权力和特权”。改朝换代的危机从而结束——君主的权力也结束了。

关于1970年3月以后发生的事情，应该指出，修改后的宪法第53条规定“最高国家元首的人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就意味着，除了其他事项外，国民议会是不能把他废黜掉的。同一条款规定，所有议员在执行他们任务之前，应在每次立法会议开始时向国家元首宣誓效忠。1970年3月，所有投票把我废黜掉的议员都宣过这项誓言。规定国家元首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不仅被3月18日政变把我废黜这一行径所践踏，而且被后来以叛国罪判处我死刑的行径糟塌得更不像样子了。

这类罪恶昭彰的非法行为并没有妨碍华盛顿加快步伐承认新政权，也没有妨碍华盛顿批准这种夺取政权方式的“合法性”和“符合宪法性”。修改后的宪法第95条规定，遇有重大宪法危机时应举行公民投票。很难想像还有比废黜国家元首和把君主制政体变为共和政体更为重大的事了。显然朗诺和他

的同伙从来也不敢让人民来作鉴定。宪法第115条规定，“处理有关国家君主制的问题，不能作为任何修宪建议的内容。”第92条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两次。正如早些时候提到过的，凡是国民议会和全国代表大会之间有任何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应成为公民投票的主题内容。自从政变以来，全国代表大会甚至连一次会都没有开过。

当它们以“民主”的名义推翻我的时候，我为我国政治制度所精心设计的一切民主过程和保障条款就都被践踏在地，伴之而来的却是来自“自由世界”的一片支持他们的喝采声。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朗诺另外一次表示献身“民主”的姿态是，他于1971年10月17日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时解释道：“让我们别再玩那一套自由民主的骗人把戏了，如果我们要打赢这场战争的话。”

甚至施里玛达——他由于要达到蛊惑人心的目的，被迫放弃他自己的亲王头衔——也不得不承认，朗诺的国家“缺乏法律的、宪法的或人民的基础，因为还需要草拟一部宪法，还需要选出一个国民议会”。（这些话是1972年6月6日选举闹剧发生之前讲的。选举是朗诺在他还能控制的地区举行的，而他则力图通过这次选举被“当选”为总统。）

对于柬埔寨的未来，不管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这些政变头目玩弄多少宪法方面的花招，为他们的政变披上合法外衣，都是无关紧要的。柬埔寨的未来是在抵抗地区塑造出来的，在那里从村庄以上各级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这同我放弃王位以前所设想的方向相类似。

由于这些政变者长时期以来把共和政体搞得声名狼藉，

美国人竟于1972年奉劝他们恢复君主制，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据说，那是因为“共和国”已成了贪污腐化、空前践踏民主权利以及军事和政治灾难的同义语了，而军事和政治灾难是最突出的。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的某些新“国王制造者”就开始为柬埔寨找一个国王候选人。他们头一个选择了莫尼勒亲王，但看来我的叔父对当国王并无胃口。也许他还是比较明智的，知道这没啥当头。于是，“国王制造者”们又看上了莫尼勒的长子，西索瓦·烈那拉亲王。他们说，法国人就有过选择西哈努克而没有选择他的父亲苏拉玛里特的先例，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选择烈那拉而不选择他的父亲莫尼勒呢？

由于美国人眼看那些(他们所)讨厌的红色高棉分子——以乔森潘、胡荣、符宁和他们的同志们为代表——就要在金边出现，于是他们拚命设法建立起一个体面的、合法的君主国来——当然得把西哈努克排斥在外。可是，看来朗诺是不会轻易让步的，而那位由来已久的篡权大师山玉成也在暗中窥伺，等待他的机会的到来。因此，目前这个计划得在冷宫里放一个时候。但是，要是朗诺政权的宪法危机长期解决不了，主张立烈那拉为国王的人在一定的时候会重弹老调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烈那拉是朗诺外交部的官员，是个右翼、反共、亲美的家伙。换句话说，他是具备了一切资格的。朗诺本人对他很好。朗诺在政变后没多久开始国外旅行时总是带着他的。不过也有一点美中不足之处。朗诺虽然喜欢烈那拉，但是还没有喜欢他——或者任何别人——到了可以把自己高棉共和国事实

上的国王的位子让出来的程度。朗诺永远也不会自愿让位。如果尼克松决定踢开朗诺，那就只有一个办法——效法他的前任、已故总统肯尼迪踢开南越(也是)已故总统吴庭艳那样的办法。就象美国企图强加给柬埔寨的所有其他人那样，烈那拉“解决办法”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得逞的。

未来属于他们的对立面，而我对我能参加奠定基础的工作并助一臂之力感到自豪。

第十三章 柬埔寨在战斗中 所起的作用

理查德·尼克松可算是河内最称职的宣传员了。多亏他，将来世代的人们才会说：

那些北越人真是了不起。他们独力战胜了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大国，他们以装备简陋的地面部队在南越、老挝、柬埔寨打败了美国人，击退了美国的机群和舰队，多么了不起的人民啊！他们从河内开始，占领并统治了整个印度支那。他们无所不在——甚至炸毁了美国在泰国的飞机。

将来还会有这种神话式的传说：

从前，有一支神兵自天而降。他们叫做北越人，是世界上空前未有过的伟大斗士。他们无处不去，人们却看不见他们；他们神出鬼没，瞬息千里，携带着人们同样看不见的武器，甚至坦克，直到他们突然出现在战场上，击败那时最大的军事强国。

北越人尽力驳斥这一派胡言。每当我们柬埔寨抵抗部队打了一场胜仗，河内就发来贺电；同样，每当巴特寮捣毁了中

央情报局在老挝的几处基地，或打败了在那里的美国雇佣军；或者每当民族解放阵线来一次“春节”攻势，或在湄公河三角洲取得了胜利，他们也都发出贺电。可尼克松却非说：“但这是你们……是你们北越人打了这些胜仗。是你们把我们赶出印度支那的。”尽管河内一再否认，也全无效果。

为了增加这种传说的分量，每当我们的部队在柬埔寨或者巴特寮在老挝取得一次胜利，尼克松就要派出几百架飞机去轰炸北越，就象当年爱国者处死一个纳粹省长或是别的纳粹要人以后，纳粹分子照例要来一个血洗奥拉多或利迪斯一样。^{*}而且早在1972年“春季攻势”以前很久，他们就这样做了，只是到了那时，北越人才第一次真正带着现代化武器大举进入南越，去援助他们的南方同胞。

北越人和全体越南人民的确是创造了英勇无畏和自我牺牲的奇迹，而且武元甲的确是一个军事天才，他无疑是当代最伟大的战略家，也是古今最伟大的战略家之一。1971年2月，西贡部队开始入侵老挝南部的时候，我正好和他在一起。我们花了一下午的时间讨论柬埔寨的局势，然后共进晚餐。出乎我的意料，饭后居然还悠闲地喝了咖啡、听了音乐，而且武元甲完全没有要结束晚会的表示。最后我说：“我感到惭愧，我的将军。我占用了你那么多时间。我简直不能理解，老挝南部大战方酣，而你却给了我这么多的时间。”

他带着平静而柔和的微笑，说道：“噢，那早就准备好了。”

^{*} 奥拉多是法国的一个村子，利迪斯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村子。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纳粹德国作为“报复对象”，全村居民无论男女老少全被野蛮杀害，几乎无一幸免。——译者注

我们的巴特寮同志拥有一切必要的手段，可以就地应付，根本用不着我操心。我们早就料到要打这一仗了。”他接着说：“我今天听广播，阮文绍在西贡说，他的部队要在老挝一直呆到五、六月份。其实他们的残兵败将最晚到三月底就得给我滚蛋。”事实果然如此，他们的最后一批部队是在3月25日撤离的。

对于越南人，我简直称赞不尽，有他们这样的盟友真是我们的幸运。有一次，我对我的朋友范文同说：“答应我一件事情，等一切都过去以后，你得告诉我，你是怎样不顾千百吨炸弹、各式各样的电子探测装置，以及美国种种监视技术，创造了沿着胡志明小道维持供应的奇迹的。但是现在可别告诉我，”我说，“因为我也许会不慎泄密。”他笑了，他答应我到那时候，我们一起开辆汽车，沿着胡志明小道一直开到西贡。

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官方报道总要把印度支那任何地方的任何军事行动通通说成是“北越”部队与美国及其盟国军队之间的战斗呢？也许，要一个武装强大的超级大国，承认自己在军事上对南越、老挝、柬埔寨的农民游击队束手无策，总未免太失体面吧？难道说，他们一定要把北越抬高到他们自己那样的军事强国的水平，才算是败于旗鼓相当的劲敌吗？至于说柬埔寨，我们有自己的正规部队和游击支队，他们共同担当了在柬埔寨领土上作战的重任。他们从来没有败于朗诺的军队。但是我们的胜利却总被他们记在“北越人”的名下。

前面一章我提到过，根据我的请求，武元甲将军派来了一些军事教官，帮我们的部队训练军事干部，以加强我们原有为数不多的骨干。按数量来说，武元甲派来的人不算多——也

就是那么一、两千人，可是质量却是超等的。他是精心选择了一番的，挑选出来的人不但有军事技术水平，而且人品也不错。他们来了，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又回去了。在1971年底以前很久，我们就已经不再需要北越教官了。到那时多亏了他们的帮助，百分之九十的战斗都是由我们自己的军事干部率领我们自己的人民民族解放军进行的。

只是在边界地区，我们有时才和民族解放阵线的部队联合作战，而且我们始终严格遵守由我倡议召开的1970年4月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决议的文字和精神。决议规定与会各方在遇有请求时互相援助。在部分边界沿线，北越也占有一小块实际上无人居住的地区，以便保护他们同南方的交通，这个地区的一切军事行动由他们负责。除此以外，我们的武装部队都留驻在各自的国界之内。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将不在某些情况下进行大规模地协同作战，那样说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不是先联合英美，以后又联合苏联来打败纳粹吗？难道说那时也必须尊重国界吗？

对越南战友早期给予我们的帮助，民族解放阵线提供的武器，以及北方派来的教官，我们是永远感激的。这些人确实比美国送给朗诺和施里玛达的成亿美元更有效果得多。正如我曾对一些法国朋友解释过的那样：“从前我总是请法国派军事教官。但是现在呢：首先，你们承认朗诺，不承认我。第二，这是另一种战争，是你们被越盟打败了的那种战争！因此，我向他们，向世界上最好的游击战专家求援，就是合乎逻辑的了。”

我们也有很多本地的越南人和我们并肩作战，而朗诺恰

恰当了我们最出色的募兵官。当他在1970年4月野蛮屠杀越南人民的时候，他只给世代定居在我国的几十万越南族居民的成年人以三种选择。他们要么等待行刑队，或者被遣送到南越被强制编入西贡部队，要么同柬埔寨抵抗部队一起拿起武器。成千上万的人，不分男女，都选择了最烂一条路。即使朗诺放过了他们，到头来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也还是可能这样做的，因为我们越南族公民的绝大部分都同情越共。从南方战争打响的时候起，就有越南族的男女青年不断跨过边界，去参加民族解放阵线。我们从未加以干涉。由于我宣布了同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友好的政策，再加上美国以我们同它们友好作为推翻我的借口这一事实，因而在我号召抵抗之时，越南族居民立刻成了我的最坚定的支持者，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正是朗诺使得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人别无选择，只有拿起武器以求生存。成千上万的人加入抵抗的行列，要为他们被杀害的亲属报仇雪恨。正如他们所说，他们都有“血债要算”。

西贡军队野蛮而且贪婪，他们逼得老百姓以我们想象不到的速度投入我们的怀抱，从而有助于我们的抵抗运动从一开始就得到壮大。美国的报复性轰炸只能加速这个过程。西贡军队的贪财成性使我们能够很快地武装我们的新兵，其速度就象西贡的恐怖政策强迫人民投奔我们的阵营差不多同样快。有一次，一个西贡军官向我们的采购干部认真保证：“只要给钱，你们想要什么，我们都能供应，只有直升飞机暂时还不行。”看来想要直升飞机恐怕还得耐心等待一个时候！在早期那些动乱的日子里，由我们的朋友给我们搞点美元来，要比我

们依靠通过胡志明小道运来军火容易得多，也迅速得多。我原先曾告诉过报界，我们武器的主要来源按次序排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北越、北朝鲜和古巴。但是我很快就不得不把南越排在第二位，这笔令人意想不到的横财真是太好了。到了1972年，我们的部队接连缴获大量的美国武器，包括坦克和大炮在内，于是我只好把尼克松提升为头号武器供应者了。

不过我得说，我们抵抗力量的装备从一开始就是比较好的。前面已经说过，在红色高棉同我作对的时期里，即使是朗诺企图消灭他们的时候，同他们有联系的民族解放阵线也不大愿意给他们武器。因为民族解放阵线不希望柬埔寨爆发内战，危及柬埔寨的中立，从而丧失由于我的支持而得到的物质上、政治上的重大好处。他们所愿意做的，最多也不过是允许红色高棉的小股部队暂时避避难，如果朗诺的军队在边境地区把他们追赶得太紧的话。但是我被推翻以后，局面就改变了：红色高棉，“西哈努克分子”、民族解放阵线，一夜之间就成了盟友。政变一发生，民族解放阵线马上就认识到，他们在边界地区的基地和物资仓库迟早会遭到一次协调进行的扫荡。反正武器弹药迟早要受损失，他们就开始向我们迅速扩大的抵抗力量慷慨分发。美国人后来在基地地区只捞到了少量物资，难怪他们要大失所望。我始终认为，兵员补充不成问题。至于装备和军官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比我所料想的要迅速得多。

朗诺部队开小差的规模很大。在许多情况下，有些部队干脆一哄而散，把他们的武器交给游击队。重镇桔井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典型。桔井是同名省的首府，位于湄公河畔。桔

井和它的邻省蒙多基里都同南越有共同边界，两省构成柬埔寨的六个军区之一。政变前夕，朗诺把军区司令陈松邦上校以及其它五个军区司令召集到金边。虽然他们都是他亲自任命的，朗诺却立即解除了其中两人的职务并且加以逮捕，因为他拿不准这两个人是否会效忠于他的叛国阴谋。对包括陈松邦在内的其它四人以及取代被捕者的那两个人，朗诺透露了他的政变计划，要他们发誓绝对严守秘密。他们必须向各自的管区下达命令，务必把秩序维持好，同时严惩任何“越共骚乱”。

在桔井当地，陈松邦的副司令丁乃英少校暂负全责。从争取独立皇家十字军的年代起，他就是一个忠诚的军官。他听到政变的消息后大惑不解。第二天，确有示威，但是不管电台怎么说，他很快就发现示威者都是支持西哈努克的柬埔寨人，并非越共。他没有理睬镇压示威者的电话指示。3月23日，丁乃英听到我在北京电台发表的公告，于是一切都清楚了。这时陈松邦还没有回来，但是他不断通过电话下达命令。后来丁乃英同抵抗力量建立了联系，并试图说服他手下的两个营也这样做，但是意见分歧，主要原因是各种家庭问题。当陈松邦回到桔井的时候，丁乃英已经解散了这两个营，发给每个士兵五百瑞尔遣散费回家乡去，并把库存的武器，包括三门迫击炮和二十三挺机枪交给了游击队。然后，他口袋里装着桔井的防御计划离开了。第二天，不费一枪一弹就接管了桔井市，于是极端重要的第六军区全部落入我们的掌握之中。本来是派陈松邦回来整顿秩序的，可是已经太晚了。算他命大，总算活着从桔井逃了出来，并且设法回到了金边，但却被

朗诺立即逮捕，并以“丢失”桔井罪被判处死刑。最后，他又设法逃到泰国去了。（他比Kep-Kompot 军分区的汤·萨拉万中校运气好些，萨拉万以“失掉了”该军分区而被处决。）我对桔井事件的整个过程知道得很详细，因为丁乃英这个第一流的军官历尽了艰难险阻，设法取道老挝，并于最后到了巴黎和北京，现在他在北京当我的侍从武官。

正是由于类似桔井的许多事件，我国广大地区才能在政变以后短短几周之内牢固地掌握在我们手中。攻占第六军区并没有一个越南人参加。从那以后，朗诺和他的西贡盟军屡次试图夺回该地区都没有成功。北越人没有任何空运手段，机动车辆也很缺少，如果说他们在短短几个星期以内就“占领”了我国的一大部分：南起暹罗湾，北至老挝边境，东自南越，西、北两面直抵泰国，那么北越人准是超人无疑了！至于这些神话怎么臆造出来又能存在下去，倒有那么一位乔纳森·昂格尔先生写了一封揭底的信，投寄毫无疑问属于保守派的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并且发表在该杂志 1971 年 4 月 10 日的一期上。他写道：

柬埔寨驻香港总领事姬索先生，在本刊第 13 期（1971 年 3 月 24 日）上，就我所说柬埔寨正在打内战的论点提出了异议。

也许姬索先生愿意解释一下，为什么——少说也是 1970 年深秋以前——金边一直执行一项官方政策，扣发外国记者提到高棉人为西哈努克流亡政府而战的新闻报道。很可能，柬埔寨政府不想让外国读者，甚至也不想让

柬埔寨外交官知道，柬埔寨目前的冲突不仅仅“只是一场进行合法自卫的民族斗争”。

说柬埔寨抵抗力量并不存在的神话逐渐消散了一部分，这首先得归功于许多记者，他们未经邀请进入了解放区，结果很快就发现他们自己成了俘虏，既不是北越人的，也不是民族解放阵线的，而是我们游击队的俘虏。（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要去的地方都是朗诺的官员们向他们保证牢固处于金边控制之下的地区。）另一些记者则干脆不理新闻检查那一套。例如，美联社记者凯特·韦布，在综合报道抵抗政府成立一周年的情况时，写了以下一段话：

有情报说，柬埔寨中部和西部现在有几百个柬埔寨共产党训练营。近几个月来，许多红色高棉分子出现在柬埔寨战场上，这就说明，训练和宣传很有成效。柬埔寨人在开展武装破坏活动。柬埔寨共产党人和西哈努克分子……颇为机动灵活，到处活动，进行骚扰，切断道路，阻截供应，几乎是随心所欲。

（事出偶然，韦布小姐写了这个电讯之后不久，便被报道失踪。有报道说发现了她的尸体。我指示要不惜代价查明真相，如果她在我们手里，必须按照长期有效的指令，给予优待并尽快予以释放。所幸她是被俘虏的，安然无恙，后来很快就被释放了。）

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越南朋友，都为我们抵抗运动的迅

速发展而感到惊讶。但是我们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民族解放阵线曾经不得不在强弱悬殊的苦战中慢慢获得他们的武器。他们最初是用棍棒和锄头对付手枪和步枪。我们很快就有了大量的武器,这主要得感谢他们。在政治和思想方面,越南人比柬埔寨人觉悟要高,但是尼克松很快帮我们克服了这个差距。他用炸弹创造了奇迹,使我们的人民在几个星期之内就转向了革命。大规模毁灭城镇和乡村所引起的憎恨,一变而为愤怒和复仇的渴望。我们的农民都是游击战士的好材料,一旦他们到了韦布小姐描写的训练营里,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战术和怎样掌握新式武器。

说到这里,有必要暂且离开本题,说一说用游击战来进行抵抗,对柬埔寨人民来说根本不是一件新鲜的事。大多数西方作家总是把我的人民描写成为消极闲散、相当懒惰的人,并且总把他们同比较奋发尚武的越南人进行对比。对于由一位亲王领导武装斗争,他们更是嗤之以鼻。他们这样做,有时候是有意识的,为的就是要嘲弄柬埔寨武装抵抗这一概念。

1884年,在一项臭名昭著的“协议”强加给诺罗敦国王之后,他就发动了思虑周密的反法起义,以武器和金钱支持他的异母兄弟西沃达亲王早在协议丑闻之前已经开始了的抵抗。我们研究当时的法国官方文件就能明白,当年我们高棉游击队反对法国人,几乎同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反对美国人一样卓有成效。

1885年1月初,在磅湛和桔井之间,也就是我们抵抗力量今天牢牢掌握的那个地区,掀起了起义的新高潮。同年9月,磅湛的法国驻节专员德拉兰德·加兰先生抱怨说,他所能

控制的，仅仅是湄公河两岸一条大约十公里长的地带。在给法国政府的报告中，他写道：

在此地带之外，乡村几乎完全不在我们控制之下。地方官吏（即那时的朗诺傀儡式人物），谁也不敢单独越出河滨一步，也不敢到他们任职的地区去走动。未被占领的地区都是以前的叛乱头目在那里统治。*

这些法国的官方报告，读起来活象民族解放阵线初期在南越活动的情况。同样的游击战术：大量使用陷阱和长矛；短促伏击和迅速转移；诱使法国军队疲于奔命，然后在敌人最难预料的地点和时间加以突袭。人民把法国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向游击队通风报信，而法国人却得不到任何可靠的情报。法国军官写的那些屡战屡败的经验之谈，同美国大兵在南越写的日记或家信一模一样。起义始终未被扑灭。只是到了1886年，法国归还了两年前从国王手里夺走的很多特权之后，起义的声势才逐渐减弱。等到法国人作出让步的时候，起义已经蔓延到全国的许多部分了。各次“绥靖”行动不可避免地使被绥靖地区的游击活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驻柬埔寨法军总司令密拉蒙上校最后亲自接管了作战指挥权，但他的下场并不比哈金斯、韦斯特摩兰和阿布拉姆斯将军好。

今天我们农民的血液里就渗透着游击战术的传统和天然

* 见查尔斯·迈耶，“全国性的内乱”，载《柬埔寨研究》，第11期，1968年7—9月号。

禀赋。这就是一个因素，它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尽管朗诺和西贡的部队多次发动大规模的战役，可是3月18日政变以后还不到一年，十分之七的乡村和一半以上的人口就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

腊塔纳基里、上丁、桔井、蒙多基里、柏威夏五个省都在我们手里。南越解放区的省市中心几乎总在西贡的控制之下，而我们则不同，在上述连成一片的广大地区之内，我们控制了一切，包括城市在内。朗诺统治的痕迹荡然无存。在其余的许多省里，多半解放了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朗诺部队在被紧紧包围的省会里困守，彼此隔绝，主要依靠空运接济。在朗诺及其西贡盟友声称获得“最大成功”的干丹、茶胶、菩萨、马德望等四个省，早在第一年年底，我们就控制了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而且还在稳步上升。分门别类地说，到1971年3月，全国一百个行政区解放了七十个，一千一百二十九个村庄中有七百五十一个牢固地掌握在我们手中。六个月以后，我们抵抗政府就能这样说：全部国土的五分之四，全国七百万人口的五百万，都在民族统一阵线治理之下。

这既非夸张亦非宣传，有1971年12月10日美联社记者理查德·布莱斯通发自西贡的一则电讯为证：“据西贡高级官方人士估计，敌军现在控制的柬埔寨达百分之八十之多。”值得注意的是，这则电讯是在西贡加派五万部队侵犯我国以后几个星期发出的。到了1971年底，我们解放武装力量控制了金边周围的乡村和高地。官方编造的神话却硬说这一切都是“北越人”完成的，还说他们甚至几乎在柬埔寨全境建立了效率很高的“占领政府”，请问有谁会听信这类神话呢？

在抵抗力量尚未完全控制的那些省里，游击队也是日夜都在积极活动。所有通往金边的道路，或者在我们长期控制之下，或者我们能任意切断。我们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置金边于死地。但我们不那么做，因为我们不想把我们的同胞们活活饿死。美国的炸弹和西贡匪徒迫使近一百万难民涌进了金边。米价和鱼价月月飞涨。我们的部队让足够的食物运进首都，使人民免于饿死，但是我们也必须维持军事压力，使我们的国家得以生存，并夺回我们的独立。

我们之所以继续袭击金边波成东机场，那是因为它既是军用机场也是民用机场。我们还袭击金边市中心的军事设施。这样的进攻只能由我们自己的人民，在当地居民协助下来完成，而不是象朗诺声称的那样是越盟干的。

举个例子。第一次袭击波成东就消灭了朗诺空军的百分之九十五。各项计划都是由朗诺军队里的一个工程兵军官拟定的。计划辗转送到北京请求批准，批准令在袭击之前四十八小时用无线电发回。1971年1月21日晚，这个军官携同家属动身前往解放区。他们不用走多远，到达之后，立刻发给我一份详述进攻细节的报告。这次袭击由原来住在金边的居民执行，他们都在技术突击队里受过我们越南教官的训练。事先对可能受到波及的住户发出了撤离的警告，并嘱咐他们什么也不准讲。能够做到保密就说明我们的部队和人民彼此是信赖的。朗诺知道这是一项“有内线的事件”，逮捕了一批与这个事件毫无关系的军官。经过第一次毁灭性打击以后，保安措施加紧了，但是这并不能防止我们的突击队员四天以后再次袭击这个机场，把第一次打击之后残留下来的东西又炸毁

了一大部分。后来传说，朗诺空军的毁灭，使他气得中了风，因而半身瘫痪了好几个月。

同样，1971年9月20日黎明，我们的游击战士用火箭筒和迫击炮开路，几乎全部摧毁了金边郊区的几个油库。西方通讯社纷纷报道，在这一次袭击中，朗诺损失了百分之七十五的石油储备，包括全部航空燃料在内。其它油库的安全措施加强了两三倍，但是就在一个星期之后，在特诺河和乃良所幸存的油库又全部被毁。根据我个人的建议，按照我的北京总部制定的计划，炸毁了西哈努克城里我们唯一的炼油厂。这次的成就很大。

有人问我，毁掉这样一些耗资巨大的设施，我能不痛心吗？当然我是痛心的。我们大家也都是痛心的。但是我们并不犹豫。因为油库和炼油厂的汽油会灌满飞机和坦克的油箱，用来屠杀我们的同胞。所以，我们别无选择。但是，如果北越人或任何其他外国人把我们的财产炸掉的话，我们的人民就会异常愤慨，那就谈不上什么合作了。

当然，我们在边界地区和老挝、南越的抵抗力量合作——我们是为反击共同的敌人而战斗。但是每一方都是自己家里的主人。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想要跨过邻居的门槛，我们就首先请求许可，这样既尊重邻居的房子，也尊重房子的主人。

对于局外人来说，了解这样一点是重要的：在法国人到来之前，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印度支那。当时有三个分别的实体，安南（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东京和交趾支那是法国人制造出来的。法国人来到印度支那的时候，安南人正同最初在湄公河三角洲拓殖的柬埔寨人为争夺交趾支那而战呢。法国人

把越南北部的东京从安南帝国分割出去，把这几部分同柬埔寨、老挝合在一起，构成了他们所说的印度支那。但是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都想赢得他们的独立，于是渐渐发展了团结一致的感情。日本人占领印度支那的时候，团结又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等到法国人再度占领印度支那，后来美国又从南越开始侵入印度支那时，这就使得三国人民团结得更加紧密。

有些西方“专家”专门喜欢写那些分裂我们三国人民的事情，在所谓“传统的敌意”问题上大做文章。但是我们想得越来越多的却是怎样能把我们联合起来的那些因素。今天，最重要的事实是，我们都是美国侵略的牺牲品，美国侵略了南、北越，侵略了老挝，还侵略了柬埔寨。所以我们不得不战斗。我们三个弱小的国家是在同一个大国战斗，除非我们站在一起，不然就会一个一个地被打败。这是一场“团结胜利”同“分而治之”的斗争。

我们为得到兄弟般的援助而欣喜，这要感谢我们的越南邻居。但是，如果把我们解放力量的胜利归功于北越，那对他们并不公平，对我们也不公平。美国人学会了一招，每当他们编造了一个“北越人”的新胜利，就要大叫一通“侵略者”。我们过去吃过越南封建主的苦头，继而又遭到西贡法西斯政权的折磨，一些人就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永恒的敌意”为主题来做文章。这就好比美英军队开入法国领土去对付纳粹，而法国人却在大喊“侵略者”来了一样；也同一些政治评论员援引拿破仑战争期间的英法宿仇，来证明戴高乐将军联合英国、抗击纳粹，就等于叛国一样。要是什么人敢以“宿仇”作

口实来对抗盟军登陆诺曼底，才应该给他戴上不折不扣的叛徒帽子呢。

在纸面上，朗诺政权自夸拥有二十万军队。这是个吹起来的数字，用来为朗诺从1970年3月18日到1971年9月之间这十八个月中接受了五亿一百万美元作辩解。美国记者曾经揭露，九岁以上的男孩子都被登记为士兵，甚至他们姐妹的名字也在花名册上。花名册上还有根本不存在的人，或者早就阵亡了的人的名字，这么一来，指挥官们就能把他们的薪饷装进自己的腰包。由于那些在册的人很少拿到薪饷，他们就得靠抢劫同胞过活。朗诺有一支由鬼兵和匪徒组成的军队。实际上，他能动员到的人数约在十万左右，其中最多只有三万才是真正的战斗部队，或者说，在1971年最后几个月里，在六号公路沿线战败以前的情况是这样。其余都是被朗诺强征入伍的中小学教师、小官吏、学生和孩子拼凑起来的。我们的部队奉命不得射击这些年轻人，只要情况许可，还要警告他们攻击即将开始，好让他们能够回避一下。经常有逃避兵役的人投奔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把年轻的送进学校，欢迎那些年纪大一些而且愿意作战的参加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其余的则可以各自回老家。

关于朗诺饷单上的鬼兵问题，合众国际社1971年2月13日发自金边的一则电讯是很有说服力的：

在成立不久的柬埔寨军队里，最常见的贪污现象之一就是各营的花名册都超出实有人数，而且有时候竟有整营整营根本不存在的军队。于是负责的军官就把薪饷

据为己有。……有消息说，最高指挥部面临一个主要的困难，当它从各省抽调部队去增援六号公路或防卫金边时，“竟发现那些部队只存在于纸上”。

仅仅一周以后，合众国际社记者金·威伦森又从金边发来主题相同的报道，他在评论六号公路上“真腊二号”战役的失败时，说得甚至更为明确：

也许最坏的是，军队被贪污腐化搞得百孔千疮，它的各个部队都不满员。奉命去征补并发薪饷给新兵的营指挥官们，发现了大有油水的生财之道，那就是在饷单上写上许多纸上士兵的名字。……12月13日，他（朗诺）突然视察了军队，为的就是想在饷单上消灭空额兵，以了解兵力的真相。总人数超过一万五千的三十多个营被解散了，因为它们都严重缺员。

我的中国朋友告诉我，在中国，吃空额是国民党军队的拿手好戏。朗诺的军官们很快就学到了这一招，就象朗诺和施里玛达很快就掌握了如何将来自五角大楼的成百万美元的一大部分塞进自己腰包那一套一样。另一方面，那些向我方投诚的军官，却迅速发展成为政治上自觉的爱国者，他们在平等的基础上和部队同甘共苦。

我们的武装部队是整个印度支那抵抗力量的不可分割部分。美国人早就把印度支那当作一个单一的战场了。他们把西贡部队派到老挝和柬埔寨；把泰国部队调到南越、老挝和柬

柬埔寨作战。他们利用泰国作为庇护所，从那里出发来轰炸印度支那的四个组成部分。朗诺的突击队员在泰国、老挝和南越的美军基地受训练。各条战线都有军事上的协同作战。1971年2月发起对老挝南部入侵的同时，也平行地、协调地对柬埔寨进行攻击，企图重新占领桔井地区，（尽管有美国空军支援，卷入的西贡部队还是受到了毁灭性的挫败，始终没有接近他们的目的地。）我们印度支那人民也必须把整个地区看作一个单一的战场，协调我们的活动。这就是1970年4月24日—25日，我被废黜的五个星期之后，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最高级会议的中心思想。我们一致同意，各方既保留各自的实体，又要把我们的力量联合在一起，直到最后胜利。由法国人合在一起的印度支那，现在第一次将要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了。至少为了这一点，我们就得感谢尼克松。1970年4月和5月入侵柬埔寨，1971年2月和3月入侵老挝南部，这两件事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团结，也为我们的部队在1971年8月至12月沿着六号公路取得更大的胜利，巴特寮部队在1971年12月和1972年1月在查尔平原和波萝芬高原上取得更大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柬埔寨为共同斗争作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这是我在1970年3月23日发出武装斗争号召时远远没有料想到的。

第十四章 新生

我们这些在后方根据地的人总是眼巴巴地在盼望国内来的消息，有时甚至等得焦急万分。我们盼望的不仅仅只是军事公报中的消息，而且还想知道那些来自基层的情况。我们的人民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是怎样适应战时生活、怎样对付残暴的空袭和那些劫掠成性的西贡—朗诺军对他们家乡的袭击的？1972年1月初，我非常激动地拆阅了直接从前方根据地送来的两份报告。头一份是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乔森潘送来的，第二份是内政、合作社和乡村改革大臣胡荣送来的。胡荣从1971年10月13日到12月3日视察了桔井、上丁、柏威夏、磅同和暹粒等省的解放区，刚刚回来。这是我所收到的第一份关于我国广大农村情况的全面报告。他写道：

老年人，特别是老祖母这一辈的人，对于我们部队的模范行为和好作风总是赞不绝口。他们非常激动，一定要讲讲农村生活的根本改变。大小村庄都开始走上了轨道，并且生气勃勃。家庭争吵、互相打骂以及包括酗酒和淫乱在内的各种坏事都成了过去的事情。农民们对于解放区已无抢劫事件和偷牛行为大为赞扬。今天，如果有人把斧子或锄头忘在地里，他第二天准能在原处找到它。

显然，一种新的生活已在我们的国土上深深地扎下了根，我认为这是会永远存在下去的。尽管投下了那么些炸弹和凝固汽油弹，我所向往的一种社会，正在我们国家的中坚地带——农村里发芽成长。这种社会是我曾经想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的——一种民主的、创造性的有机体，它的成员根据佛教格言和古老的吴哥传统中最精华、最进步的内容，象一家人一样，在社会与种族和睦的基础上共同生活。

在我1970年4月4日的第二次告全国人民书中，我说过抵抗斗争目标是

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享有基于完全社会正义的新的生活；享有一种真正的人民民主制度，在这制度下，所有的权力由人民直接行使，或者在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范围内，在我们的国教——佛教的保护下，由人民中的进步青年和劳动人民间接行使。

这些想法后来写进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政治纲领。现在，根据这些官方的详细报道，我们的理想已逐渐变为生活现实了。

也许有人会说，乔森潘和胡荣都是著名的红色高棉分子，他们把这类喜报告诉西哈努克是符合他们本身的利益的。西哈努克呆在几千公里以外的北京，他怎么会对实际情况有真正的了解呢？其实，这两份报告只是综合或印证了我从十好几处不同来源得到的情况报道。对于农民为什么那样热情地

投入斗争，我实在找不出任何其他的说明。这是我们抵抗力量之所以发展得那样迅猛的另一关键原因。

乔森潘在说明敌人为什么会在他们那个倒楣的“真腊二号”^{*}战役中失败时指出，“我们得到人民的积极合作，并且行动极为迅速——这就是会有这种局面的两个主要原因。”

人民同我们一道打击敌人。从敌人进攻的头几天起，根据我们的呼吁并得到了我们人民组织的帮助，绝大多数的居民都从六号公路沿线的农村撤了出来。敌人由于得不到人力和物质资源去补充我们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在我们一再打击之下，敌军士气很快就涣散了。……参加战斗的不仅是我们人民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干部、战士和全体人民，包括住在六号公路沿线的佛教僧侣也都参加了。

人民的全力支持说明：为什么我们在数量上占劣势的军队，在没有重武器来对付敌人的坦克、大炮和气机的情况下，也还能够战胜敌人。“真腊二号”不是一次孤立的战斗，而是一次和我们在所有战场采取主动军事行动相配合的战斗。人民的这种支持，是以人民在过去和现在都同胜利有超过一般的利害关系为条件的：那就是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纲领所宣布的农村“新生活”。《圣路易邮报》记者理查德·达德曼（他在民族统一阵线成立并广播了它的纲领之后没几天就被俘虏

^{*} 在投入“真腊二号”战役的两万名敌军中，打死打伤的占70%，在从1971年8月20日到12月3日的作战中，还有上千人被俘。

了)在获释后曾写道:

我看到了好象是一种柬埔寨的人民运动的早期发展……占人口大多数的柬埔寨农村,正在被彻底地、迅速地改造成为大规模的、专心致志的革命根据地……在每个种植园或每家农舍……我们都看到了效忠西哈努克的迹象以及它的对立面——对美国和尼克松总统的深仇大恨……*

三月政变后大约一年左右,我就开始从老相识那里收到了不少来信——这些人在思想意识上同红色高棉相距甚远,但他们对金边的腐败无能再也忍受不下去,所以就设法跑到解放区去了。这些来信中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坚持说,他们找到了自由、民主的生活。前《民族》周刊社长罗介托的来信是最典型的。他在讲了金边生活如何腐朽以及他为什么要同他一家人逃离金边之后,写道:

解放区是真正的新柬埔寨——独立、民主的柬埔寨——是真正了不起的。人民过着享有尊严的生活。他们是他们村子的真正主人。人们——从老年人到孩子和年青人——的脸上的欢乐和热情,是他们对最后胜利和光明前途有信心的明证……我们在解放区所亲眼看到的一切,使我们对我们的人民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充满了信心和自豪感。

* 《国际先驱论坛报》,巴黎版,1970年6月29日。

罗介托逃离金边的那个时候，经常也有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出走。1971年3月初，我收到了这批人给我写的一封联名信。他们之中有个金边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一个牙科医生、几个工程师和政府工作人员。他们写道：

解放区离首都并不太远，但我们却有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感觉。行政大楼四周没有铁丝网。没有带着刺刀枪的傀儡军恶狠狠地把过路人从头搜查到脚。没有贪污、没有警察的突然袭击、没有宵禁、没有侮辱年轻妇女的事件。知识受到尊重；天才受到欣赏和鼓励。知识分子，所有爱国的、进步的个人都可以把他们的民主思想、爱国主义思想和对人民的感情付诸实践。每个人的尊严都受到尊重。

为什么他们的印象这样深刻？我想，同金边已经成了法西斯监狱、犯罪者的天堂进行对比，只是对这个问题的部分回答。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解放区尊重正义和人的价值，而绝大多数柬埔寨人珍视这些价值的程度大大地超过了他们对物质财富的珍视。我所收到的每封信都是这样说的。

比这批人晚几个月之后逃离金边的一个无线电工程师春海写道：

我在这里找到了一种友谊、团结和民主的气氛。不再到处都是特务、警察和傀儡军了。我们象兄弟姐妹般

地生活在一起；老百姓和我们同战士们——他们是柬埔寨人民的儿女——互相尊重，互相帮助，道德高尚，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没有歹徒、没有赌博、没有贪污……这就是我们的热情和信心的源泉。

当我在巴黎学习的时候，我就常常梦想将来会有这样一种社会。现在我可找到它了。在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已经建立起一个真正民主的政权。社会的每个阶层——工人、农民、佛教僧侣、知识分子、商业人士、小生产者——都受到重视和支持，而且都享有个人自由。

写这些信的大多数人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受过什么政治训练，但朗诺和尼克松改变了他们。他们是中产阶级自由职业者、政府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他们每天忙于干他们的日常工作，大概对于3月18日政变并不怎么关心。很多人被那些煽动性的保证弄得晕头转向，而据说成立了“共和国”就保证会给人们带来光明的前途。例如孔旺夫人，一位受过法国教育的青年女药剂师，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出身于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在金边开设了一家最负盛名的药店。但是，在朗诺统治下的金边生活了几个月就受不了啦。她冒生命危险，抛弃了她的财产，跑到解放区来。如果一定要对这样的人贴个政治标签的话，那恐怕也只能算“自由主义中间派”。要是他们属于“进步分子”的话，那在一年前也许早就逃离了。我说这些并不是要谴责他们，因为许多正直的爱国人士都受过朗诺—施里玛达政权的蒙蔽。我说这些是为了强调指出，根

本不可能指责他们是红色高棉的宣传员。

我自己的女婿西索瓦·杜萨迪亲王*用一封长信的形式给我带来了最令人吃惊的消息,而他本是一个保守派的青年人,在1971年8月底到达解放区以前恐怕一辈子都没有接触过任何红色高棉分子。我一向认为他是个为人正直、办事负责的人,所以当他向我最小的女儿波东帕花公主求婚时,我同意了。他在培养文官的学校受过教育,3月18日政变时(当时他二十九岁)在金边国家百货商店经理部任职。由于他与我有关姻亲关系,他马上就被革了职。在朗诺政权统治下生活了十八个月——在这个期间,他的妻子被捕并被控犯了叛国罪——之后,他设法逃到了解放区。他1971年10月1日写给我的信就是从解放区发来的。如果说一个有他这种背景的人,写信的口气好象太激烈了一点,那很可能是由于他把他在解放了的农村的生活同他在金边备受创伤的经历作了对比的缘故。他说“金边已变成法西斯集中营了”。

金边的爱国者今天都有一种共同语言。如果我们不打倒卖国贼,他们就会杀害我们。如果我们想要过尊严的生活,如果我们想要在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里继续做自由的人,我们就必须敢于站起来,为民族统一阵线政治纲领中所规定的崇高理想而斗争。今天敢于斗争就意味着什么都敢干!它意味着拿起武器,推翻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集团。通向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是没有

* 杜萨迪亲王是西索瓦·恩塔拉旺亲王的儿子。恩塔拉旺亲王是尤特旺亲王的哥哥,后者是民主党于1946年成立时的第一任主席。

其他道路的。

我通过参加解放区的方式，选择了尊严的道路……我很受感动，因为我在这里重新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真正面貌……一种欢乐、可爱的面貌……就象慈祥的母亲同她阔别了很久的孩子重新见了面一样。在解放区这里，每个人都在团结、和谐的气氛中生活。我可以亲眼证明，在朗诺那个假共和国里，“自由、平等、博爱”都是毫无意义的字眼……在这里，思想、言论、信仰的自由都有保证，而且得到认真的尊重。这里没有因阶级或性别而受歧视的现象。私有财产也受保护。

尽管敌人的空袭不断，我们的同胞们仍在为了经济建设而英勇斗争，为民族解放斗争而把一切资源动员起来，并在同时改善生活条件。已不存在饥饿、贫穷和失业了。我们的同胞们由于知道自己是命运和国家的主人，正在热情地劳动——这种热情得你亲眼看到之后才能相信。我发现了一种特别感动人的景象：人民在他们所有活动方面都互相帮助——在同敌人的战斗中互相帮助，在田地里劳动中互相帮助，在文化和社会活动中互相帮助，为孩子们和不同年龄的成人建立各种学校，为护士和公共卫生工作者设立训练中心……这里的生活真正是生气勃勃！

要是没有一条代表人民真正意愿的政治路线的话，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凡是从地狱般的金边出来的人……对此不由衷地感到惊奇是不可能的……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如同获得了新生——开始了一种充满了

目的和价值的、纯洁的新生活。

杜萨迪亲王现在已是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干部了。他同我的儿子拉维翁王子一样，都在解放区变得更加强壮了，而我的儿子本来身体不好，心脏和肺部都是很虚弱的。年轻的杜萨迪被证明是个好人，完全没有辜负我同意把女儿嫁给他时对他的期望。从我家庭里的一位亲密成员那里收到这样一封信，当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不用多说的。从我们抵抗总部送来的报告中的每个字都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信心百倍。

杜萨迪说他获得了新生。我在仔细读了他和其他许多人的报道之后感到，柬埔寨这个国家也同样获得了新生。政治纲领并不光是许多空洞词汇的堆砌，而是我们日常活动的指导性文件，并且在文字和精神上都是得到贯彻的。例如：

除了人所共知的卖国贼以外，保证一切柬埔寨人享有选举和被选举的自由；享有言论、发表意见、集会结社、示威游行、居住以及在国内外旅行的自由……保证人身、财产、财富和通信内容的不可侵犯。

（在目前，在国内外旅行的自由这一项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切实际，但是，在纲领里明确写上这一条是为了强调我们政府同朗诺政权在思想意识上的区别，因为在朗诺那里，只有付出极大的贿赂费用或对统治集团有过某种特殊功绩的人才享受得到这种“自由”。此外，获准到法国或其他国家去的人，得

把他们的妻子儿女留下来作为人质，以防他们一走就不回来了。）

大多数柬埔寨人，不管他们的地位、背景和政治色彩如何，都是爱国者，他们对别人的爱国主义是很崇敬的。他们也信仰民主。就连朗诺和施里玛达也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也喜欢“共和国”这个字眼，因为它听起来总比君主制度更带有民主的味道。但是，只有解放区才有真正的民主。我们的政治纲领明确指出，“目前，柬埔寨社会的民主化正在解放区实行，日后则将在全国实行。”从各户各村一直往上都已这样做了。按居民点的大小，都分别选举了三至七人组成的委员会。由这些委员会的委员选出地区委员会，再由地区委员会的委员选出省的委员会。各级的委员会代表民族统一阵线行使政权。和旧时代不同，那时寻求一官半职的人们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的私利——譬如当个税务官——而且当官是有报酬的。在今天，志愿参加选举的都是些准备牺牲自己的时间、不计报酬并挑繁重有时甚至危险的担子的人。不搞什么竞选活动，而是在村民和候选人之间进行坦率的讨论，看看谁最适宜于抓村委员会的三项主要任务：军事和保卫事务；经济生产；和一般政务，包括教育和公共卫生在内。全村的人都积极参加村委员会的选举。起初，总是那些最能说会道的人当了选；后来，当选的都是在工作和战斗中被证明是出色的人。不管怎么说，当选的人总是死里逃生的幸存者。

候选人的标准是：他们献身于反帝斗争；他们的行为堪为表率；他们全心全意地关心人民和人民的利益。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干部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参加生产劳动。被选出

的各级委员会通过青年、妇女、佛教僧侣、农民和其他人的各种社会组织，经常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在军事方面则有以乔森潘为首的全国军事委员会，并设总参谋部和地方军事委员会以及各个军区的司令部。

乔森潘的报告里提到，当敌人袭击村民时，地方组织就帮助村民，很有秩序地撤退到后方，“把他们所有的财物、粮食、家禽和猪群一起撤走，什么也不留给入侵的敌军。”这类撤退都是由各级民族统一阵线委员会组织的。他们向我保证，很少出现惊惶失措的情况。敌人集结部队和坦克时总要喧嚣一番，并且要进行大规模的准备工作，因此单凭这一项就给了我们足够的事先警告，更不用去说在朗诺手下工作的爱国者还给我们送情报了。村民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之后，当地的民族统一阵线委员会就会协助解决住宿问题。这一切任务都是在团结和杜萨迪亲王所说的那种“互相帮助”的精神下完成的，而这种精神是同柬埔寨好客的优良传统完全相符的。这类撤退通常都是暂时性质的。但是如果某一地区被敌人占领的期间延长了的话，那就把劳动力集中起来建设一个新的村庄。建造我们农民习惯住的简单房屋所需的原材料，我们的森林中有的是。如果一个村子里的某些房屋在空袭中被炸毁了，那个村子的居民就合作起来重新盖。如果整个村子都被炸平了，邻近村子的人都会来帮助他们重盖新房。

胡荣的长期视察所得到另一个印象是：

凡是我所到的地方，处处气氛温暖、人民热情，这一切证明了我们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性、深入性和广泛性，

并且是得到人民全力支持的。只举许多例子中的一个：

我在某地同民族统一阵线的干部呆了一个晚上，在那里出现了一个很感动人的场面。有三个女孩子到这个干部的家里来，要求参加民族统一阵线并要求批准她们上前线……当这个干部劝她们说，留在村子里帮助搞生产同样也是为斗争作出贡献时，她们三人就大哭了起来。我可以补充一句，她们根本不知道我当时就在场。

这只是成千上万的事例之一。它说明，在我们的青年人心中，爱国主义和革命热情汹涌沸腾到了什么程度……在每个村子，几乎天天都有青年人跑来要求参加柬埔寨人民民族解放军，女青年则要求到医院或民族统一阵线的其他机构去工作，难得有一天例外……我们想要补充多少新兵就能有多少新兵，这就是我们的实力之所以能够经常在增长的道理……在缺乏武器供应的边远地区，青年人积极制造弓箭、土枪、土手榴弹等传统武器。所有的青年人都参加了村里的民兵。

局外人很难理解柬埔寨爱国主义如此深入人心。这是一件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这是我们的命运——夹在比我们强大而又敌视我们的邻国之间——所强加给我们的。在过去，我们总得进行斗争，否则就不能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下去。今天的情况也一样。美国人硬说我们是为某种意识形态而战斗的。这不符合事实。我们是为生存而战斗的。边远地区农村里的女青年们本能地了解这一点。佛教僧侣们也了解这一点，因为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上，他们由于同人民有密切联系，

一直起着爱国的作用。因此，当我了解到僧侣们在鼓励人民拿起武器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时，我是一点也不感到惊奇的。农村里的伤亡经常都是由远处来的威胁——B-52飞机，它们既看不见，也听不着——造成的。但是，即使B-52飞机就在头上飞过，女孩子们也继续在制作弓箭。当然她们射不着飞机，但是，只要美国人或拿美国人钱的雇佣兵一出现，她们就会用她们的弓箭把他射死。我们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总是存在的，就象覆盖在土壤表层下的蘑菇苗子一样。国内的背叛行径和国外的侵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于是游击队就象蘑菇一样，到处冒了出来。

男女平等是新生活的一个部分。1955年民社同盟第一届国民大会给了妇女以选举权，然而在今天的农村里则正在实现全面的平等。胡荣提到：

有一天，当我从一个地区到另一地区去的时候，我看到有些妇女民兵在春米。她们一发现我们这几个人的到来，就很有礼貌地——不过，身上还是背着步枪——查问我们的旅行证件。

武装了的妇女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查问男子的。这不仅说明农民的警惕性很高，而且也说明妇女们已承担了更大的责任。

乔森潘在他的报告里讲了“争取人民之战”是个多么重要的问题。敌人手里需要掌握一些人民来当他们的炮灰。朗诺在1970年3月政变后没几个月就下了令，要把十八岁到六十

四岁的人，不分男女，都全面动员起来。这个事实本身说明，朗诺从一开始就在作绝望的挣扎了。1971年，他们把九岁以上的男孩子从家里或课室里抓走，逼迫这些孩子们参军。起初，朗诺—施里玛达政权还能从成千上万的难民中征补他们的新兵，而这些难民都是为了躲避美国飞机轰炸才逃到金边和其他“安全”地区来的。在金边，所造成的问题比所能解决的问题多。在战争的头一年里，金边人口差不多增加了两倍。需要喂饱的嘴巴多了两倍，而能生产的人却没几个。粮食价格涨了一倍、两倍、三倍，而在解放区呢，连金边的报纸也得承认，那里的物价是稳定的。接着就搞了南越模式的“绥靖化”，建立了“战略村”和“自卫民兵”，以便朗诺能控制农民，并迫使农民只准在铁丝网周围外不远的地区种植稻米。但是，对柬埔寨农民来说，自由是同空气一样重要的东西。要是那些过着舒服生活的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都认为解放区农村的简朴生活，同金边一比可算是天堂，那末也就不难理解农民们是怎样把新生活的情况去和“战略村”的生活进行对比的。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知道其间的差别，因为他们主要是从以前的解放区被赶进“战略村”里去的，而这些地区是被朗诺在西贡军的帮助下加以重新占领的。

乔森潘提到了磅湛省省会以南约十公里的三个地区发生的情况：它们是，湄公河上的戈索丁岛；河对岸的罗卡戈伊和卡哥。这些地区是政变后不久就解放了的，但在1971年初又被西贡军队占领并交给了朗诺。他们把当地居民集中起来，分成由十户、五十户和一百户组成的小组，每个小组的周围都围上了铁丝网，由驻在四个军事哨所的近八百名正规军和散

布在各个村子里的一千名“自卫民兵”担任看守。在这样小一个地区有这么多的军队驻守可算不少了。乔森潘指出，

尽管有这些措施，我们通过做耐心的、秘密的工作，还是在政治上控制了这些村子。因而我们能够把自卫民兵中的百分之六十争取过来。柬埔寨人民民族解放军的成员同当地居民密切合作，终于设法在 1971 年 11 月 18 日重新解放了戈索丁岛，并于次日解放了罗卡戈伊和卡哥……两万多居民获得了自由，缴获了步枪四百多枝以及军火和其他军用品。

在战斗中，四个军事哨所中的三个被歼灭了。在磅湛的北部也同时采取了行动，但朗诺的军队吓得不敢离开城市前往救援。乔森潘强调指出，农民渴望过不受束缚的生活乃是主要的因素。

总的说来，解放区起着一种不可抗拒的磁铁作用，吸引农民们离开尚被金边控制的地区。幸好我们有广大的后方，可以接受他们。到了 1971 年底，乔森潘报告说：

到目前，在金边以西的地区，那些长期以来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获胜的大多数居民都跟着我们干。有好几万人撤离了战区到后方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了。他们拒绝站到卖国贼方面去。还要他们在金边政权下遭受苦难已是不可能的了。

这样一来,不得人心的金边政权不仅在政治上日益孤立,而且在物质上也已经同农民广大群众割断了联系。朗诺—施里玛达集团所能看到的柬埔寨人越来越少,少到只剩下手里拿着武器的人,而且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往往也是为时过晚了。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纲领规定,农民有权拥有他们所耕种的土地。在我曾祖父诺罗敦国王统治的时期以前,这条规定就一直存在的。正如尤根托亲王指出的那样(见本书第十一章),把这条规定废除的是法国人,因为法国人要把大种植园分割开来,归他们自己所有。根据民族统一阵线的纲领,这项古老的习惯已成为解放区的法律。它还规定了一套关于地租和低利贷款的公平制度。关于低利贷款的规定是十分重要的。自从我们国家开始有了货币以来,农村高利贷者就一直是柬埔寨广大农村的祸根。从来也没有对这些人的敲诈勒索采取过什么限制性的措施。利率是高利贷者和农民之间私下谈定的,而农民那里又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真正能力可言呢。规定的利率按月计算,而且是利上加利,因此到满了一年的时候,本利加起来有时竟高达原借款额的一倍。我曾经设法用建立农村借贷合作社的办法来对付他们。但高利贷者凭借他们的财富所给予的政治影响,总是有办法破坏我们的措施。现在仍然有放债的人,不过在解放区,利率规定在年利5%到10%之间。

由于从最基层一直到省一级的最高权力机关都是由选举产生的,所以负责执行民族统一阵线各项政策的人实际上都是贫苦农民。他们准定会很好地执行政策,因为农村一解放就把压在他们身上的沉重负担给卸除了,所以他们一定会提

高警惕，确保这类负担永远不再强加在他们身上，对此人们可以放心。

还作出了以下有关的规定：

那些积极受雇于美帝国主义的帮凶和对人民犯了罪行的卖国贼们所拥有的土地和财产，一律予以没收。充公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

施里玛达、郑兴、何来恩以及其他封建地主所拥有的大量土地都被充公并分掉了，虽说还未加以正式没收。最终的没收手续将以法律方式为之。大部分这类的土地都交给了那些从其他地区撤退来的人，而这些人战后也许愿意回到各自的家乡去，所以最好还是不在这个时候作最终的分配。不过，卖国贼们永远也不必奢望可以收回他们的财产了。

政治纲领还规定要发展“我们吴哥文化的优良传统……建立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民族文化，爱护艺术和杰出作品，保护历史文物和古迹”。所有的报道都说明，纲领有关这方面的规定也正在得到贯彻执行。正如本书其他章节里提到的，吴哥庙宇地区已在抵抗部队牢牢控制之下。对这些古迹的唯一危险来自朗诺这伙文化艺术的破坏者——他们手中的空军和远程大炮对吴哥窟这个主要庙宇群造成了严重威胁。在其他地方，以我们优秀艺术传统为依据的文化和革命艺术正在乡村和地区这一级蓬勃发展起来。

包括艺术专门家在内的大批知识分子的来到解放区，使这种发展更加增色。值得注意的是，到了1972年年初，差不

多所有稍有名气的知识分子都已经到抵抗部队这边来了。其中包括医生中的绝大多数。朗诺不得不从法国请些医生来接替他们，而这些医生用不了多久就因为工作时间太长搞得劳累过度而怨声载道。

解放区成立了一所医学院，由一位柬埔寨著名的外科医生、前柬苏友谊医院主任医师秀臣担任院长。除了培训合格的医生之外，我们也开始搞了一种类似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招收的学员有时连字都不认识，收进来之后训练三个月，既教基本医学课也教文化课。受训后被派出去实习九个月，然后又回来接受三个月的训练，之后又出去实习九个月，再回来受训……这是使边远地区建立起公共卫生概念的绝好办法。譬如在山区的部落地带，妇女生孩子时总得自己一个人走到深山密林里去生。现在她可以在自己家里或在村诊所里生孩子，在我们“赤脚医生”安排的合乎卫生的情况下分娩。其结果是，婴儿死亡率大大下降——这对部落民族来讲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们的人口增长率这几十年来一直停滞或者在下降。多亏有象孔旺夫人这样的人，我们才能建立起一个小规模的制药工业，能生产三十多种药品。许多其他小型工业也在象她那样懂行的人帮助下开始建立了。他们不断从城市里来到解放区，把他们的技术专长贡献给解放斗争。

我们最不喜欢战争，而且我们是竭尽全力要避免战争。但是，战争既然搞到我们头上来了，那我就必须指出，除了尼克松的轰炸机给我们造成了巨大损失之外，战争激励着我们的人民在各条战线上作出了超人的努力。有些问题，在和平时期本来可能得花好几年才能解决，现在只要几个星期或几个

月就能解决。尼克松不会想到，他只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就使我们的公民们实现了高度的民族团结，使我们还没有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就成了革命者。正是这种新诞生的革命精神改造了我们的广大农村，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生活，而我们的人民是永远不会放弃这种新的生活的。

第十五章 北京——后方根据地

1970年3月19日，当我在北京机场走下飞机时，我开始了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七次也是最长的一次访问。“七”这个数字可不象“十三”这个数字——我到达莫斯科的日子——带来了坏运气那样，给我带来了好运气。这就是承认我和不承认我之间的区别，这也算是历史上决定命运的偶然事件之一吧！许多记者还问我——你干么在政变之后马上就go北京呢？我的回答是，那是朗诺和施里玛达他们这样决定的。拟定政变时间表的正是这两个阴谋家。我的日程是早就定好了的。他们选定那么个时间和地点动手使我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莫斯科以后的停留地点本来就是北京。考虑到我很快就下了决心要进行反击，而北京又正好在我旅行日程的下一站，这真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不管怎么说，事实上我是在登上飞机前几分钟才知道我被废黜的，试问我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要是我在莫斯科留了下来，批评我的人不也会照样狠批我一通吗？难道能够指望我设法劫持苏联主席的专机，然后命令机务人员飞到瑞典或其他这类中立的避难地点去？

我本来是可以顺路到半打以上的首都之一去的。可是，金边阴谋家们的行动促使命运指明了一个方向。我知道我马上能获得北京的支持。我同周恩来的友谊以及毛主席对我表示过的感情使我对此深信不疑。我从机窗先看到欢迎的群众，

后来看到了外交使节们，等到飞机停止滑行时，我又看到周恩来同一群政府显要们走向机旁，我就知道事情同我所想象的一样。周总理拥抱了我并说：“你仍然是国家元首。我们永远不承认其他人”；这只能证实我内心深处的感觉是正确的。

我是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上第一次会见周恩来的。那真是所谓“一见倾心”啊！就象我在此以前对戴高乐将军以及在这以后对毛泽东一样地倾心。世上只有这三个伟人！究竟他们有哪些共同之处能那样吸引着我？他们有伟人的朴素本质，他们尊重弱小者。他们尊重一个小国和这个小国的领导人。他们三个人都对民族和个人的尊严有高度的评价，而且也是对别人的爱国主义很尊重的爱国者。尽管这两位中国领导人同戴高乐的背景和思想不同，我发现他们有这些共同的特色。所以后来当我知道这两位中国领导人也高度评价戴高乐时，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在万隆会见周总理以前，我曾向我们出席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打听有关他的情况。他们对我说，“周是个很吸引人的人物。”“他知道怎样把事情讲清楚，怎样去圆满完成他的任务。他说他只希望同柬埔寨友好，就中国来说，只要柬埔寨保持独立就足够了。他说过，‘不过，别再落入帝国主义者手里。如果你们能保持独立，我们就支持你们，而且我们就能成为朋友’”。我们这个代表团是包括桑·萨里、狄潘以及其他同他们类似人物在内的极右翼的代表团。所以他们又补充了一句：“当然，他是个共产党，因此你得小心点。正是因为他有吸引力，他就更是个危险人物。”

在我们头一次见面时，我就发现他豪爽、友好而且非常直

截了当。他完全没有任何优越感的架子，但我感到他在我面前是个“大人物”。他那朴素而谦恭的风度同有些打着美帝国主义旗号而又趾高气扬的小人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他马上对我的中立立场表示祝贺，并说中国一定会一如既往支持我们的独立和中立的。我们只直率地交谈了几句，可我们在万隆结下的友谊从那以后却得到了日益发展和加强。周恩来邀请我访问北京，我第二年去了。但自由世界对此可惊惶失措了，特别是美国和我的一些邻国。（甚至来自北京的英国代办也居然认为有必要给我来一点长辈式的警告，说什么“他打心眼里并不希望我去访问北京”。他这话是在1955年香港英国总督宴请我的时候讲的，而他自己的国家却早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当我1956年第一次访华时，我就同毛主席会见了好几次，而从那以后的每次访问都是如此。他总有时间接见我，而且我们每次的谈话从未少过一个小时。我的初次印象就使我觉得：在我面前的是人类中的一个伟人。他慈祥而又富表情的面孔闪烁着智慧、沉着和坚毅。我认为他之所以如此频繁地接见我，而且每次会见时间又如此之长，恰好是中国对较小的国家感兴趣并且对它们尊重的象征。这总使我感到，具有爱国主义和敢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比社会背景和形式上的思想标签重要得多。我很快就对毛主席有了好感，他对我也这样，这是十分明显的。而且时间长了以后我慢慢感到他对我有了比较深的感情，就象我对他那样。

毛主席在第一次会见我时就阐述了中国政策的概貌，重点讲了真正独立的国家可不要让别的国家所控制的问题。他

说，中国赞成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很小的柬埔寨完全可以同很大的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做朋友，并且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嘛。毛同意柬埔寨采取中立乃是最好的方针。中国会一如既往支持这种方针。自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一直履行了它的诺言。

1958年8月，毛泽东在我到达后不久就在主席官邸接见了。那时北京天气很热，我们第二天就在游泳池旁边搭的一个帐篷下继续我们的谈话。后来又在海滨避暑胜地继续我们的会谈。赫鲁晓夫几个星期之前也访问了北京。毛主席的一个侍从人员对我说，除了赫鲁晓夫以外，我是唯一在一次访问过程中同毛主席见过那么多次面的政治家。周恩来总理亲自陪送我到海滨避暑地。

难道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为了洗我的脑筋？对这类怀疑我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毛主席对我们的问题、我们同邻国的关系、我们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意图的估计以及许多其他有共同利益的问题是真正感兴趣的。也许他也很想了解了解我这个人的性格和动机。很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爱国的亲王的形象引起了他的兴趣。不过，从我们一开始有交往起他就很认真地对待我。我可以说他比某些西方领导人更加平等地待我，只有戴高乐将军是个明显的例外。

譬如说英国就曾建议我对英国进行一次正式访问。但它的建议含含糊糊，还得加上诸如日期方面的限制，提醒一下英王陛下和大臣们在活动方面有许多承诺等等，以致我宁可接受社会主义世界，特别是中国，发来的直截了当得多的邀请。举个例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1960年那届联大会议上就曾

邀请我访问英国，对我保证说女王陛下“将会很高兴地接见你”。第二天，他用书面形式把这项邀请肯定下来，但加上了这次访问将“不是正式的”这么一个条件。我可不是一个旅游者，把我们国家的时间和金钱浪费在参加皇家花园宴会上。由于我也答应了许多其他的正式活动和邀请，所以我很快就拒绝了英国的邀请，使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霍姆爵士不得不亲自登门造访，设法弥补一下过失。我从那以后从未对英国进行过正式或非正式的访问。

我得立即加上一句，不是只有资本主义大国才出过这类丑。1965年，我应邀前往包括亚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北朝鲜以及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正式访问，先后次序是根据这些国家提出的日期和日程定好了的。但到了北朝鲜的首都平壤时，苏联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员来看了我。他手里拿着一份从莫斯科拍来的电报，说什么由于苏联领导人在原定访问期间突然“很忙”，因此粗暴地要我“推迟”访问，而且对新的访问日期只字不提。我苦思冥想，是不是我在北京或平壤说过什么得罪他们的话呢？可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也未曾要求苏联人对此作出说明。我取消了对其余国家的访问，直接回金边。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类行为是完全不符合他们认为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概念的。我早在1958年3月22—29日这期的《柬埔寨现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把我们同中国的关系的这个方面说得非常清楚了。我在我第一次访问北京时就发现他们是真尊重国家和个人的尊严的，这种影响也许有部分的作用。我写道：

周恩来总理谈到了大国沙文主义。共产党政府深知亚洲和其他小国对于它们应享有的尊严和联合国关于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能否落实是特别敏感的。在对待国宾的礼仪安排上的不平等和歧视现象构成了这方面的大部分幻想被破灭的基础，而亚洲国家认为西方国家的确存在这种做法，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有声望的亚洲人对他们的荣誉问题比对金钱问题重视得多。要是重物质主义的西方人真能了解这一点的话，他们准会大吃一惊。

我指出，中国给予物质援助“不附带条件，也不讲任何令人不愉快的话。使用中国的援助是完全自由的，而且实际上没有任何时间限制”。我把这种态度同美国人老是埋怨我们保持中立作了对比，而且美国人总让我们感到“他们在说服国会继续援助中立的柬埔寨方面是存在很大困难的，而且这方面的困难继续存在，将来也还会有”。我还写道，他们把这一点强调到让我有以下感觉的程度：即他们对“帮助不发达国家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和捍卫自由”方面毫无兴趣，“相反，他们是想要收买不发达国家人民的良心，就象共产党人所说的那样，把这些人当作炮灰……但是，搞一支雇佣军队到底有什么价值呢？如果这支军队愿意为付钱的人打仗的话，那么它不是也很可能背叛他，跑到肯付更多钱的新主人那边去吗？”我用不着对这段话作任何修改，因为它在今天对尼克松主义以及什么印度支那战争越南化等等都仍然适用，而且适用得更加维妙维肖。尼克松之所以最后遭到不光彩的失败，恰恰是由于

雇佣军到了面临真正考验的时刻是毫无价值的缘故。

中国领导人从来也不咄咄逼人。他们从未说过：独立嘛当然可以，不过它必须是“红色的”独立；中立嘛当然也可以，但它必须是“左派的”中立。只要独立和中立就行了，不用附带任何条件：对柬埔寨是这样，对整个东南亚也是这样。毛主席或周总理从来不对我进行说教、训斥、警告或给予什么“友好的忠告”等等之类的东西，而西方领导人及其在亚洲的仆从们则总要对我来这一套。而且中国人在给经济援助时总是很谦虚，并且通常先加上这么一段话：“要是质量更好一点就好了，可是我们自己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要是数量更多一点就好了，但是我们自己的生产还很有限。我们希望，随着我们工业的发展我们能给我们的朋友们更有效的帮助。”

我们得不断受到美国人的这类压力：“我们对于明年能否继续这项援助毫无把握”，言下之意是警告我们，“除非你们改变你们的中立政策”。但是中国人从来不施加这类压力。我们经常从西方那里听到一些多余的忠告，而中国领导人则从来不主动地这样做。要是我就某一个具体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总是在发表意见时加上以下的保留：“当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时，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不过，中国是中国，柬埔寨是柬埔寨，因此我们不能说我们的这种方法对你们也适用。”

在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飞机上，柯西金总理那热情支持的表示声犹在耳，我曾天真地设想过抵抗政府可以在国外有两个中心。如果中国人同意的话，一个中心设在北京，处理军务、技术、供应和通讯等问题，因为北京距离我国比较近并与

北越接壤，而我们又必须依赖北越来转运供应品。另一个中心设在莫斯科，处理对外事务和宣传。由于莫斯科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接触比较多，所以它在这方面是个很理想的地点。我则打算在这两个首都各住一半时间。可是后来莫斯科不愿意再见到我。苏联政府宁可同朗诺保持关系。（不过我们倒一直按这个划分责任的想法做的，派外交大臣沙林察驻在开罗，派特别使命大臣周成以大部分时间常驻巴黎。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在尽可能广泛的方面同外部世界保持适度的活动和接触。）

那么，在这么辽阔的世界里我还能在哪里找到一个更理想的首都来建立我们得继续设在国外的另一半政府呢？物质支持，包括武器和把武器送到我们战士们手里的手段，一直是极其慷慨的。就象以前的经济援助一样，他们在给我们物质支持时是那样的谦虚和周到，以致使我感到我们接受这些援助是帮了他们的忙似的。

当我提到偿还的问题时，毛主席回答说，“我们不是军火商”，“对于某些方面的帮助，你可以把它叫做贷款，也可记记账。可是军火除外。”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援助，也同物质援助一样，是全面的、无条件的。

中国政府把整个外交部腾了出来——该部原来设在那个漂亮且宽敞的前法国大使馆里——把它移交给一个“被废黜了”的国家元首和他的随行人员作为住宅，还说，只要我住在那里，它就是柬埔寨王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甚至在我们组织起一支抵抗部队之前就把另外一个新建的重要建筑群的一翼拨给我们的抵抗政府使用。一切便利与设备，从临时的

文书工作人员(在我们能从国外争取到支持我们事业的爱国人士来充任之前)到一支汽车队和日用必需品都是他们提供的,而且总使我们感到我们接受它们是帮了他们忙似的。

在1970年5月1日与毛主席会见时,我说:“主席先生,中国自己负担很重,她给了第三世界许多帮助,而我连同我的随从人员、朋友和工作人员现在又成了额外的负担。”他回答说:

“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相信你的人愈多我就愈高兴。到你身边来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持你。如果他们不能去战场上打仗,让他们来这里。六百,一千,两千或者更多,中国随时都准备支持他们,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

从一开始他们的态度就是这样。“向我们多要求一些”。“让我们为你多做点事”。“告诉我们你们需要什么”。他们从一开始就是那么坦率,那么豪爽,而且总是想得出新的方式来帮助我们。

毛主席在同我谈论柬埔寨时似乎是不知疲倦的。有一次他曾说:“西哈努克亲王——我喜欢同你谈话。你讲话很坦率,而且敢于把你的想法说出来。你不怕把你所想的都讲出来。”在我们友谊的很早阶段,我就清楚地认识到,他喜欢同反对他的某些想法的人谈话。在一次闲谈之后,他曾经说,“你有资格当共产党。”

我回答说,“主席先生,说真的,我不行啊。”

他大笑说,“你很聪明”,他又说,“你又很用功。你可以开

始学习嘛。”

我说，“我懒得去啃马克思、列宁和其他一些人的著作。”

他接着说，“我们现在有这些著作的简写本，有选集。为了掌握他们的思想实质，你完全用不着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全部著作都读完嘛。”

我回答说，“主席先生，我宁愿读毛泽东的著作”。的确，对我来说这些著作要比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容易懂一些。也许因为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我读过马克思的某些选集。读它们是有趣味的，但我认为他写东西的口气太武断，而且事物到今天已经有变化了。也许因为我是个亚洲人，我觉得毛写的东西总是会站得住的。他把马克思理论中最合乎逻辑的部分同亚洲文明与传统中最精华的部分联系在一起。他关于人性方面的思想的哲学味道比政治味道更浓，同佛教人性理论的最精华部分没有什么矛盾。我觉得他的思想在日后好几代人里还会是适用的。

我还发现毛的军事思想非常有意思。就象希诺芬和其他希腊经典战略家所写的东西至今还站得住一样，我相信毛的著作也同样会站得住，因为他的著作反映了经典的普遍真理。他能够把明确性、逻辑性和普通常识结合在一起。

象戴高乐一样，毛的记忆力是非凡的。在我们 1970 年 5 月 1 日的谈话中，他提到了我 1956 年、1958 年和其他几次访问中所说过的话。他准确地引用了我的原话，并且问我当时的看法如何。谈话都一一记在他脑子里了，随时他都可以引用。他对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以来柬埔寨的事态发展了如指掌，到了使我吃惊的程度。

我感到十分惊奇地听到他说起，“你因为在金边开设了一家国营赌场而受到了谴责”。*他接着说，“据我看来，开个赌场总比接受美国的援助强。我知道你开赌场并不是为了你个人发财。你的财政预算有困难，所以你开了一家国营赌场，用它的利润来增加国家的收入。反正你们国家的人都喜欢赌博。那么难道让它的利润去中饱赌场老板们的私囊却不让国家受益？从你在财政方面遇到了暂时困难的时候起，我就看到了你必须在接受美国援助和寻找其他财源二者之间选择一样。”这就是5月1日晚上我们所谈论的内容，而这时大家都在等候毛主席走上天安门广场的城楼，以便开始放焰火。后来我才知道，外国外交官和记者们当时都在纷纷揣测，以为推迟放焰火可能是由于毛主席的健康情况所致。

他重复说道，“他们因为你开了一家赌场为国家筹款而谴责你。看看朗诺从尼克松那里拿到了成亿的美元，他又在那里干些什么！他手里美元可多啦，可是你们国家的人民却真正在受苦。开家赌场说什么也比接受美国援助强。”他对于这件事了解得这样清楚，真使我感到惊讶。这原本是个争论很大的问题。那些大喊国家支持赌博“不道德”而且喊得最凶的人，恰恰都是些腐化透顶的家伙。但是毛主席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核心——那是为了把赌博和腐化的部分不义之财交给国库。

* 这家赌场是1969年开设的。就象许多国家经营国家彩票的目的——一样，都是作为增加收入的手段。我的政敌们把它作为一大“丑闻”来大做文章，并把它当作为废黜我的理由之一提了出来。其实他们自己才是一伙为了自己发财致富的贪污能手呢！

有个官员走进屋来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说登上城楼的时间到了。毛主席说，“等一等，我同西哈努克亲王谈得正起劲呢”。他继续问我有关柬埔寨的问题，问起朗诺和施里玛达的人品如何等等。虽然施里玛达当过驻北京大使，而且毛主席在七个月之前也会见过朗诺，但毛主席对这两个3月18日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并没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就柬埔寨形势的详细情况询问了我将近两个小时之久。而在二十四小时之前，美国和西贡军队正好大举入侵柬埔寨。在不到三个星期之后，毛主席于5月20日发表了一个少有的、历史性的公开声明。他在声明中指出：

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要询问我这么久啊！

按原定时间，毛主席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就开始放五一节的焰火，但聚集在一起的外交官们和公众却破例地等候了整整一个小时。这正是因为毛主席想要从一个小国的国家元首那里尽可能多地了解全面情况，而这个小小国恰好在几小时之前成了一场最残暴的侵略的受害者。

试问还有比这种入侵方式与我在北京所受到的礼遇更能说明这两个世界的区别吗？朗诺有气无力地抗议说，这次入侵既未得到他的允许，也未事先打个招呼。事实可能正是这

样，只要看看五年前美国入侵越南时的做法就行了，它连从西贡政权那里搞个正式邀请都没有啊。其实只要打个招呼，朗诺和当时的西贡政权都会发出邀请的。可是傀儡的主人是不习惯于向他们的奴才征求同意的。美国和西贡的高级将领随心所欲地在柬埔寨进进出出。要是阮文绍总统想飞往柬埔寨，他连做梦也想不到要征求朗诺的同意。阮文绍甚至可以跑到柬埔寨的领土上来召见他的下级傀儡朗诺并对之发号施令。在北京，没有任何中国官员(或任何其他入)会不通过礼宾程序就进入我的抵抗政府所在地，而礼宾程序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在北京，柬埔寨的主权无论在精神上还是文字上，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受到最严格的尊重。我的住所象柬埔寨领土一样受到认真的尊重。

尽管我显然要长时期留在北京，但是包括礼宾方面的尊重在内的一切待遇都没有丝毫的改变，而这种礼宾方面的尊重是我作为国家元首——1956年与1958年则作为首相——进行访问时所一贯享受的。关于我在北京的长期逗留，我收到了不知道多少几乎千篇一律的问题：为什么我不离开北京回到柬埔寨去领导战场上的抵抗部队。我的一些疑心比较重的大臣们，在研究了那些没啥名气的新闻记者们所提出的这类千篇一律的问题后，认为这是中央情报局继续阴谋削弱我的影响的新动向。也许他们希望，我那容易感情冲动的性格会驱使我往南到解放区去，以证明我自己是勇敢的。当法国记者提出这类问题时，我有时总想这样回答他们：

当纳粹入侵法国时，戴高乐将军也没有在他自己国

内领导抵抗运动嘛！他是在伦敦进行领导的，因为英国是个盟国，而且提供了一个很安全的后方根据地。事实上戴高乐是一直到法国解放之后才回到法国去的。难道有人怀疑过戴高乐的勇气和爱国主义吗？

由于通讯技术的改进和发展，我们在北京同我们在柬埔寨境内抵抗运动总部的联系，也许比戴高乐当时从伦敦同他在法国境内抵抗根据地的联系要迅速得多、经常得多。中国人让我们自由使用一套极其卓越的电讯联络设备。

把事情说得更确切一些，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国内的部分同在国外的部分是有分工的。这两个部分完全是一个整体。在北京有一个大臣，在解放区就有一个相应的副大臣。在解放区的三个主要大臣也在北京有副大臣或派驻北京总部的代表。在成立抵抗政府之前交换意见时就曾决定，只有以解放区为根据地的那半个政府才掌握必要的情况来决定哪个大臣，包括国家元首，应该在国内外行使他的职权，以及何时回到国内。来回旅行显然是有困难的。我在外交和情报宣传方面负有责任，而在我现在的根据地，我能把我的任务完成得最好。恐怕朗诺和他的中央情报局主子们是最最希望我把北京根据地关闭掉的。

从一开始我就曾要求在柬埔寨境内建立我们自己的根据地，但是我和其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领导人都得听从同一条纪律。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乔森潘 1971 年 4 月 30 日的来电，给了我们明确的答复。其中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我们的重大胜利是斗争的结果，也是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在国外的部分同在国内的部分之间完全团结一致的结果。敌人千方百计想要破坏的正是这种团结，而且为了达到破坏的目的，敌人是希望国家元首亲王殿下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其他领导人离开北京到别处去的。其实，留在北京对于保证我们之间有密切的直接联系是很有利的……除此以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在国外的部分进行斗争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都要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好，譬如说有可能通过北京电台这个途径来参加在国内进行的斗争；而且同新闻界与进步的政治力量的接触也较便利。

亲王殿下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其他领导人到解放区来毫无疑问将会加强我们的斗争。如果你们的安全不成其为一个问题的话，我们是真诚希望你们回来的。亲王殿下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其他领导人显然并不是首先考虑他们自己个人安危的问题。但是，为了我们民族斗争的利益，我们全国同胞都关心如何保存我们一切领导机关的问题。目前我们的解放区地域辽阔，而且我们的武装部队也很强大，足以有效地防止任何敌人的入侵。但是，美国空军还是极力想摧毁我们，而我们的领导机关就是它们的特大目标。

考虑到我们目前斗争的情况，并为我们人民的利益着想，亲王殿下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其他领导人必须留在北京为好。

在形势有新的质变之前，关于这个问题的明确指示就是如此。对于外部世界那些急于看到我回到柬埔寨国内去亲自领导抵抗斗争（或者希望我放弃北京这个后方根据地）的人士，我只能这样说：我本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急于想回到我的可爱的柬埔寨国土去。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必须补充一句话：让我的人民，特别是我们的抵抗战士们，知道我们已经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了一个坚强的后方根据地，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鼓舞的源泉。它至少是我们在战场上赢得胜利和将来在重建我们国家方面的部分保证。任何抵抗运动都不敢想象能够有这样好的条件：中国领导人无条件地给我们创造了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和斗争条件。要是朗诺—施里玛达和他们的同伙们能预见到这种情况的话，他们也许可能会改变他们发动政变的时间表吧。

第十六章 我要控诉

要是我提到某些个人和家庭事务就非常气愤的话，那并不是由于我要把我自己在流亡期间所遭到的苦难拿来诉说一番的缘故。而且我也不是非要把我家庭的遭遇同成千上万由于反抗朗诺独裁政权而受到残酷折磨的爱国者去作个比较。要是我写到我家庭的遭遇，那是为了揭露金边阴谋家们的真正面貌，把这些自称捍卫佛教真理的圣战战士们的道德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些政变头子们在搞政变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建立一个共和国的问题。譬如说施里玛达就最不希望搞什么共和国。他自己就有攫取王位的野心。毕竟他是西索瓦王族的一员，和我母亲西索瓦·哥沙曼王后属同一王族。起初他们企图盗用我母亲的名义，打电报给全世界说王太后批准了这次政变、批准把我废黜，从而使他们的政权合法化。

事实上，我母亲表现得很勇敢而且维护了她的尊严。当朗诺和施里玛达要挟她批准政变时，她说：“不行！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是你们把他废黜掉的。你们对他进行了诽谤。你们把他的名声糟蹋得不成样子。他专心致志地为国家和人民的幸福服务了三十年，你们不该这样对待他。我根本不想同你们打交道。”她的态度非常坚决，把他们气坏了。这就把他们企图利用君主的延续性作为他们政权的合法外衣的阴谋

挫败了。只是在我母亲不让她的名字为他们的叛逆行为所用之后，他们才决定打出共和国这张牌的。

在印度尼西亚的心理战专家——他们曾经发动过一场诽谤已故总统苏加诺的运动——的帮助下，朗诺和施里玛达也掀起了一场反对君主制的运动。他们让年青的右派知识分子和陆军军官“代表人民采取行动”，递交要求废除君主制的请愿书。他们把王太后和我的画像从所有公共建筑物上取了下来，挂上了诸如“君主往往都是卖国贼”这类的标语牌。这些假共和主义者大嚷，两千年来君主总是背叛了人民。在他们看来，甚至大吴哥和巴戎*的建造者国王贾耶·瓦尔曼七世也是“卖国贼”。他虐待人民，强迫人民去建造寺庙和宫殿，残酷剥削全国人民，以致柬埔寨无法抵御暹罗和安南侵略者。他们宣称，1863年把我们国家“出卖”给法国人的，正是我的曾祖父诺罗敦。由于我没有落到他们手里，于是我母亲就得为所有这些罪行负责。要是我母亲肯让他们利用她的名字去掩盖他们的叛逆行为，那么君主制显然会继续是最最高贵的制度。

我母亲在王宫里有她自己单独住的住宅。政变之后不久，随着朗诺手下的暴徒们掀起了一阵反君主制的恶浪，这些新当权派竟勒令她从王宫搬出去。她起先拒绝搬家。

朗诺和施里玛达之所以憎恨我母亲是因为我母亲拒绝支持政变。但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他们恨她还因为她坚持主张他们应就洗劫越南大使馆一事向越南人道歉，并应赔偿损失。（当然损失是从来也没有赔的，不过类似道歉的话倒是说过。）

* 它们是吴哥寺庙群和其他建筑物中代表吴哥文明的两座杰出的建筑。

由于她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坚定，他们后来就把她说成是“卖国贼”，还说她站在越盟和越共一边“反对她自己的人民”。那些被中央情报局雇用来执行洗劫并对金边越南居民进行了狂滥报复的下高棉分子倒成了“她自己的人民”。

朗诺、施里玛达和英丹——当时的国民议会议长——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王太后。他们说，“如果你不离开王宫，我们就把你赶出去。你和你的儿子同越南人站在一边反对你们自己的人民。好嘛！如果你不离开这里，我们就把人民处死的越南人的尸体堆在你别墅外面。你可以眼见兀鹰啄这些尸体的肉吃。你把国家出卖给越南人，所以我们就把越南人的尸体拖来，堆放在你的窗下。让这些尸体腐烂发臭，把你给熏出来。”朗诺、施里玛达和英丹——后者是由著名的君主主义者转变为著名的共和主义者的——就是这样对待我母亲的。我母亲是个七十多岁而且有病的老人，她行了一辈子的善，什么坏事也没有做过，而且她以前对那些当时诽谤她的人也是很仁慈的。

王太后过去总是运用她的影响设法避免最高层的不团结。她并不想参与政治，但她的确总是设法使各派政治力量之间避免产生不和。有好些政治要人就利用过她的善良心肠去得到政治上的好处，有时甚至不惜损害我的利益。沈法*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从早到晚都在王宫里逛来逛去。我同沈法与其追随者一类的人公开争吵过。他们想要我改变我的中立政策，拉柬埔寨向右转。这些人拼命奉承我的母亲，设法让

* 政变不久后他是朗诺手下得力人物之一。他和山玉成一起为日本人救过劳。朗诺后来派他去当驻日本大使。

她相信他们是王国最坚定的支持者。我母亲就给我写个条子：“设法排解你同沈法和其他人的分歧意见。他们不是动机不良的人，他们对王国是完全忠诚的。”尽管她的健康情况欠佳，她还是能腾出时间和精力来倾听这些人的意见并给我写信：“对他们不要太严厉，要宽厚些。”至于说英丹呢，他就会跟着发表一通议论：“和平——指的就是我们的国王。独立——指的就是我们的国王。安定——是我们国王的同义语。一个国家、一个领袖——西哈努克亲王。”我母亲就会笑容满面地说：“你看，就象我说的，英丹真正是王国的栋梁之材。”沈法也做我母亲的工作，企图离间她和我的关系，不过没有成功。因为我是王太后的儿子，不论是沈法还是什么别人，都无法让我母亲反对我。不过，我母亲倒总是把沈法、英丹和其他这类逢迎拍马的家伙当成是国王最忠诚的支持者，并且总是象母亲般地爱护这些一文不值的坏蛋。

当他们露出了以怨报德的狰狞面貌时，这对她当然是沉重的打击。那些以前曾经卑躬屈膝极尽讨好奉承之能事的家伙，正是那些连用最最无耻的语言来侮辱她都还嫌不够的人。

在政变前，王太后多年来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发展我们的古典芭蕾舞艺术方面。大多数芭蕾舞女演员都是她亲自训练出来的，而且她还指导了非常受外宾欣赏的作品和演出。她秉性温和，为人机敏，凡是了解她的人都很敬爱她、尊重她。尽管她做了这许多好事，可是坏蛋们却要用因为种族不同而被杀害的人的尸体散发出的臭气，把她赶出自己的家门作为回报。我母亲同王室其他成员一样，都对我们这个多民族的社会感到自豪，并且觉得我国各族人民的和谐相处正是佛教容

忍哲学的好榜样，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当她获悉越南人遭到屠杀的消息之后，她深感悲痛。

对于朗诺的代表们的威吓，我母亲回答说：“用不着把那些尸首——那是你们犯罪的证据——拖来。我会离开王宫。把我儿子在那里诞生的那所房子给我，让我搬到那里去住。”那所别墅是我被选定为国王以前我母亲与我父亲一起住的房子。后来我把它交给了国家，作为一所国家博物馆。（有些西方记者说，我办这所博物馆是为了给我自己树碑立传。事实并非如此。我把与我国独立斗争有关的文物，以及我当国王和后来担任国家元首时外国政府赠送给我的礼品都放在博物馆里。我认为这些礼品都是因为我代表了我们的国家别人才赠送给我的，因此我把它们陈列在博物馆里让全国人民观赏。）不管怎么说，在我被推翻后这所博物馆马上就被搬空了，所以他们才同意我母亲可以收回这所房子。至于朗诺和施里玛达怎么处理那些文物和珍贵的礼品，我是无从而知的。也许会象政变后他们所掠去的其他无价之宝的纪念物一样，现在都可以在香港和新加坡的古董商店里买得到。

我母亲的新居周围布满了朗诺的宪兵，任何进出的人都得被严密搜查一番——对于来访的女宾则用极其侮辱人的方式进行搜查。在政变后的头几个月里，简直没有任何人敢去接近她。随着朗诺政权累吃败仗，有人就鼓起了勇气前往探望。有些访问者后来到了法国，给我捎来了口信：“别为了我而过度悲伤”——这就是我收到的第一个口信。“我进行了回击，而且我一定回击到底。我很为你感到骄傲。我只怕也许不能再见你一面我就死了。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可遗

憾的。”

尽管年迈多病，孤独寂寞，无人理会，而且几乎每天还不得不听那些最可耻的侮辱话，我母亲还是维护了她的尊严和勇气。他们使尽了一切花招来凌辱她，挫伤她，想从精神上搞垮她。譬如在1970年10月9日“共和国”宣告开张的那天，一伙朗诺突击队员抬着我的模拟像到塔山——首都就因为这个山顶上有寺庙的山而取名为金边的——去焚毁。但在焚毁仪式举行之前，他们抬着模拟像走过我母亲的别墅，用最粗鲁、最令人恶心的语言侮辱我——当然也就侮辱了我母亲。他们侮辱的不仅是我们俩，而且也侮辱了我们所有的先辈和柬埔寨两千年来的历史——这一切就发生在我母亲住处的窗口外面。这些游行者中有许多学生，他们互相比赛，看谁能说得最粗俗、最无礼的语言。

这场事件有个颇带讽刺意味的续篇，但由于我母亲一贯刚毅过人，看来她还是顶过来了。这时，法国政府继续提供奖学金，让朗诺政权能派青年学生去巴黎学习，也让青年军官能去学习军事方面的技术课程。有一次，当一批学生到达时，我们驻巴黎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他是早几个月以前设法从金边逃出来的）也正好在奥利机场。他们一走出检查站，很多人就马上开始高呼：“打倒朗诺和施里玛达！亲王万岁！”更使他惊奇的是，他发现这批学生中有些正是共和国日那天在我母亲别墅门前喊口号喊得最响的人。他一面使劲儿地回忆那天的情景，一面同他所认识的一个学生打招呼。这个学生回答说，“要想离开柬埔寨，只有走这条路啊！你非得高声大喊侮辱性的语言或干点类似的事去讨好政府才能搞到奖学金、出国签

证和一张飞机票。”另外一些学生也挤过来证实他的说法，只有那些表明自己热烈拥护朗诺政权的人才有机会得到奖学金，从而可以逃离柬埔寨，特别是逃避服兵役——那是准死无疑的。他们还说，对任何人都是如此，包括军事学员在内，他们也竞相争取被派到法国学习。不管怎样，就来法国的学生而论，至少总有百分之七十的人一到巴黎机场就宣布效忠民族统一阵线，这一点是确确实实的。

柬埔寨的男子总是梦想能到法国去。让某一个人有到法国去深造的机会，那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最高的奖赏，过去是这样，3月18日政变后就更是这样。在以前，那是由于法国本身有吸引力——甚至法国女人都是可爱的、友好的并且没有种族偏见。柬埔寨人喜欢法国的生活方式。他们在金边和其他城市已尝过点这种滋味，足以引起他们有更浓厚的兴趣想去多尝一些。学生们对法国的历史和文化都有相当的研究。今天则可再加上一项格外的奖赏：逃避开朗诺的征兵机构，获得为爱国主义服务的机会。于是我母亲便不知不觉地成了成千上万个竞争者争相打击的对象，谁都想搞个什么新招儿来证明他自己是西哈努克最凶恶的敌人，目的就是要在日后变成西哈努克最好的朋友。这些人被派出来之后，连法国人也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收留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糟糕的是，法国人这样做的动机是要为朗诺政权培养一些好干部，包括军队干部。为此，我有时批评法国，尽管我对它的许多优点是很钦佩的。在另一方面，这些留学生包括军官和技术干部，跑到我们驻巴黎的使团对我们的人说：“请原谅我们，把我们收留下吧。我们只有对西哈努克侮辱一番才有可能到这里来。其实我们是

支持民族统一阵线的。请吩咐我们干点什么吧。”法国政府知道这些——可是它能有啥办法？

要是我母亲还活着的话，当她听到我们说她不知不觉地当了抵抗部队的招募代理人时，她准会大笑。她有很强烈的幽默感，但是当时那种侮辱话对她来说也还是够受的。她当时非常孤独，没有人服侍她，也没有人安慰她。后来，当人们感到风向有变动了，也就开始有人去探望她，不过他们的名字被记了下来，他们的家里也常有警察来光顾。但也有不少人顾警方会进行报复，为的就是给自己将来的前途保个“险”。通过这些人的口，我收到了不少从我母亲那里捎来的口信。

我母亲所受到的诽谤中伤正是朗诺政权给予的典型待遇。遇有某个王国改变成为共和国的情况，准许原来统治的王族流亡出国本来是正常的做法。我母亲在政变后就曾要求准她离开柬埔寨，但却被拒绝了。后来，一个前友好国家（也许是由于它对它在政变期间及政变之后这段期间的表现感到内疚）主动提出来要帮助我母亲离境，建议我母亲退隐到老挝的王都琅勃拉邦（不是万象，那是行政首都）居住。老挝王族愿当东道主，我母亲也接受了邀请。琅勃拉邦是个僻静的地方，与外界没有多少联系，因此不存在我母亲会用它来作为政治活动中心的风险。但是朗诺和施里玛达却要求我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并辞去一切职务，作为给予我母亲以出境签证的代价。在我付出他们所勒索的政治代价之前，我母亲仍将作为人质。可见这批篡权者们的道德水平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

虽然我极爱我的母亲，我也只有加以拒绝，别无他途。我本人是抵抗斗争的合法代表，如果还代表着其他力量的话。即

使他们威胁我母亲或我仍留在金边的孩子们的生命，我也没有其他选择。王太后给我捎来口信，力促我坚持我的立场，这使我受到很大鼓舞，而且她还说，假如我不这样做的话，她将会责备我。

朗诺的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我死刑，但在文明社会中，即使这条罪状也并不被认为构成迫害一位母亲和孩子们的根据。道德法中就有“父罪”不由儿子承担的一条，更不要说由年迈的母亲来承担了。令人感到沮丧的是，那些过去同柬埔寨关系很好的西方君主国家竟一点儿也不肯帮王太后说句公道话。难道这是个肤色的问题？难道由于我们“只是”亚洲的君主因而骑士惯例和规范就可以废弃不顾？从3月18日政变以来，我曾经由于向欧洲君主国家写信而两次受到侮辱——信被标上“退回寄信人”而退了回来。

有些美国人写过信给国务院，有些澳大利亚人和其他人士也写过信给美国驻外使馆。他们都问美国政府为什么不运用它的影响制止朗诺政府以如此野蛮的手段行事。为什么不准王族成员流亡到外国？尼克松政府千篇一律地回答如下：

朗诺政府是一个主权政府。柬埔寨是个独立的国家。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要是我们过问了，那就会被认为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的不可容忍的干涉。

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为虚伪的说法了。美国自己的报刊都说朗诺完全靠尼克松的美元施舍过日子。难道中央情报局没有为了推翻一个合法政府而进行过干涉吗？据朗诺说，美国不用征求他的同意就可以入侵。B-52轰炸机和武装直升飞

机可以飞来屠杀我们成千上万的农民，可是等到要他们允许一个年迈多病的妇女悄悄离境以便能够平安地死去，尼克松却诚惶诚恐地摇摆他的双手，居然会想到那是对朗诺主权的侵犯！

好一个主权国家！合众国际社记者金·威伦森 1971 年 12 月 20 日发自金边的一则电讯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威伦森在评论朗诺军队在“真腊二号”行动中惨败后面临一场政变时写道：

美国是不打算去赞助一场由任何人发起的政变的……任何强制性的改换政府……至少也必须得到美国的默许才行，因为美国在本财政年度向柬埔寨提供了三亿四千一百万美元的援助。

在谈到为什么有必要在最高层来一个美国能控制的政变时，威伦森说得再露骨也没有了：

无情的事实是：柬埔寨的陆军并没有完成美国交给它的任务。（着重点是作者加的）

1971 年 11 月 29 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总结这场“主权国家”闹剧时甚至说得更加直截了当：

柬埔寨一个危机紧接着另一个危机，根本不能自立。它完全依赖美国成亿美元的援助、美国人给予的军事指导以及南越军队所给予的协助……要不是靠美国的空军

和在柬埔寨境内的南越军队，金边根本就不是红色高棉部队的对手……而红色高棉部队早已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很大一部分。

在屠杀我们人民时，柬埔寨的主权就不存在了，而到了帮助一个上了年纪的无辜妇女退隐并流亡国外时，却把主权抬出来作为拒绝帮助的口实。请问尼克松总统是多么的不光彩啊！美国盟国的行径也是半斤八两。1972年5月11日，澳大利亚反对党工党的领袖惠特拉姆在议会里倒是比较仗义地质问了外交部长：“政府在使西哈努克亲王的母亲获释方面做了些什么？”惠特拉姆反复提出这个问题，他在这方面是很值得表扬的。外交部长鲍恩在注意到上述的质问是有关“西哈努克亲王的母亲哥沙曼王后的处境问题”的同时，回答道，“政府决定，澳大利亚不应干涉另一国家的内政。”澳大利亚在泰国境内为山玉成建立过一个电台，每天广播里都在鼓吹把我推翻掉；澳大利亚今天则为朗诺的军队提供教练和运输机，它居然倒会为应否干涉别人的“内政”而大伤其脑筋，真是咄咄怪事！！

受折磨的不仅是我母亲。我的女儿波东帕花和我的儿子纳拉迪波与拉那烈*也得为我的“罪行”受苦。起初他们只把我的两个儿子软禁起来，后来三个孩子都以“叛国罪”被逮捕。我的儿子们在被软禁的时候，同我母亲一样，都得忍受同样有组织的侮辱待遇，还加上威胁要把他们拉出去处刑，去抵他们父亲所犯的罪。我的女儿从未参与过政治，被逮捕时她只有

* 这几个孩子分别是 1951、1946 和 1944 年出生的。

十九岁。她身体很脆弱，可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因为我们国家的女孩子都习惯早婚。和她的两个哥哥一起，她被指控为“政治杀人犯”，说他们是应对1970年最后几个月的炸弹和手榴弹袭击——其中有一次是袭击美国大使馆——事件负责的恐怖运动的头子。

她真正的“罪过”是在她特别喜欢的一个叔叔的葬礼上让自己的感情迸发了出来。这个叔叔是一个星期以前被朗诺军队的一个上尉在大街上打死的，这个上尉曾扬言“要以共和国的名义把所有吸血的亲王们从地球上消灭掉”。

波东帕花在葬礼上大哭大叫：“这是个什么共和国？这是个匪徒的共和国，军官们可以这样随便杀人！法律哪里去了，在这个共和国还有点正义吗？”

被杀害的亲王是陆军里的一名少校，施里玛达的堂兄弟。施里玛达下令把我女儿抓起来。他说，“你是我的侄女，远房的侄女，但你仍然是我的亲戚，因此我要设法挽救你。你侮辱了我们的共和国。你必须赔礼道歉，收回你的讲话。”

我女儿回答说，“我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能收回。”所以她的这位叔父就把她交给有权判处她死刑的军事法庭去审处。不过美国人显然意识到，审判这样一个弱不禁风的公主，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宣扬出去总是影响不好。所以他们建议释放她，并且也这样做了。在这之后没几个月，她的丈夫西索瓦·杜萨迪亲王在她的鼓励下逃到解放区去了。

我的两个儿子被指控曾花费数以千计的法郎去印刷宣传品和制造手榴弹，然后又“雇用土匪”散发宣传品和投掷手榴弹。至于我的两个儿子上哪儿去弄“数以千计的法郎”，这我

就无从知道了。政变后的第二天，具体地说是1970年3月19日，他们俩就申请准许他们流亡到国外。结果是他们俩都被软禁起来，受到最严厉的监视。姑且不提那些张口就侮辱人的暴徒们不断在他们俩家门口游行示威。简直很难想象得到他们能组织什么阴谋之类的活动。

尽管没有任何证据，纳拉迪波还是不免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说他“把情报给了敌人”。其实判他徒刑是有政治目的的。他是我的孩子中最有政治头脑的一个——或许说当时是如此——所以我把他送到北京去学习。周恩来对他关怀备至，亲自照管并教导他——不是教他怎样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而是教他怎样成为一个好柬埔寨人，教他怎样在学成之后好好地为我国服务。纳拉迪波勤奋地学习农学和中国语言文学。他后来在我的秘书处当了一名很称职的译员。他在中国时总是和其他学生一同去参加劳动，并同中国学生的各种活动完全打成一片。文化革命期间他的学习中断了，于是他就回到金边担任国家出版的中文报纸的编辑。我曾经公开地表示过我的希望，万一我有不幸，他就可以当我的“政治接班人”，因为我对他的爱国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及政治上的成熟都有深刻的印象。

照朗诺的说法，成百万的柬埔寨人都可以被指控为“把情报给了敌人”，因为他的敌人就是广大的人民和他们的抵抗部队。纳拉迪波就是因为曾被提名为我的“政治接班人”而被判刑的。

指控拉那烈的罪名之一是，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他私藏了颠覆性的材料。其实呢，这些材料只不过是受人尊敬

的法国晚报《世界报》上剪下来的东西。拉那烈之所以被开释倒不是由于这些指控和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是荒谬无稽的缘故，而是由于我母亲自己花了一大笔钱赎回来的。拉那烈是她最喜欢的孙儿。在朗诺政权统治之下，许多人被逮捕就好象西方国家的人被绑了票一样——得花一大笔赎金才能得到释放。由于警察不需要有拘捕证的形式就可以任意抓人，军事法庭和其他执法机构的人员就有了取之不尽的收入来源了。

后来，我的另外两个儿子拉维翁和克马努拉*也设法逃离了金边。拉维翁王子到了解放区。新闻机关宣布克马努拉王子是1971年9月17日从他家里失踪的，据说是通过泰国逃往巴黎的。从那以后就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在审判我三个孩子的时候，本来安排了两名被告出庭作证反对这三个孩子，但这两名被告却站出来告发说，为了要他们提出假证据，他们曾受过严刑拷打。其中之一叫斯摩克恩的就当场脱下了衣服让人看那受过电刑的伤疤。他在法庭上坚持说，准备散发传单的事由他一个人负责。他把涉及到我三个孩子的证词一律推翻了，因此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根据审判的新闻报道，波东帕花从前的一个女仆在法庭上讲了警察是如何折磨她，非要她作证说她是波东帕花和英勇的斯摩克恩之间的联络人。她在法庭上撤回了她的证词，因而被判处了十年苦役。朗诺和施里玛达就是用那么卑劣的手段，欲置我的孩子们于死地，并且那么野蛮地处罚了那些拒绝同他们合作的人。

对我本人的缺席审判是1970年7月初举行的，那简直是

* 他们两人分别是在1944和1949年出生的。

对一切正常法律实践的愚弄，这是从不让我和控诉我的人见面（如有违反立即处死）这一事实开始的。1970年7月7日的《世界报》对这场滑稽剧作了典型的报道。

对西哈努克的起诉进行了三天。其结果成了通常预先写好了台词式的审判；整场闹剧的必然结局也是可想而知的。当局指定的律师拿被告寻开心，使得法庭哄堂大笑。起诉方面的证人在大约一百五十人的面前鱼贯出场。政府召集不到多少群众来为这次审判增添一些真正的分量。顺便说一句，自从3月18日政变以来，还没有过任何自发地支持朗诺的群众示威游行。

如果那些罪名还有点实际意义的话，那末事实上就等于是给现政权——前政权的直接继承者——定了罪……他们指控西哈努克“未能使柬埔寨保持和平”，可是就闭口不提从1953年到1970年这段期间里，西哈努克在使柬埔寨不卷入印度支那冲突方面比谁都付出了更大的努力。被B-52轰炸机、毒气、美国与南越（现在又加上泰国）军队的军事行动所蹂躏的农村居民，在法庭上没有发言权。他们都知道，随着西哈努克的被解职，和平在3月18日就宣告结束了。

人们只要回顾一下那些把我判处死刑的“罪行”，就可以看到《世界报》记者的述评写得多么正确：事实上那些罪名等于“给现政权定了罪”，定罪并不是由于过去究竟干了些什么，而是因为政变以后的所作所为才该定罪。指控我的罪名中有

一条是说我专制。我们只要考察一下朗诺—施里玛达政权在这方面的记录,就可以看到该予定罪的究竟是谁:

1970年3月18日:甚至在废黜我的最后法令完成(立法)手续之前,就根据紧急法令使宪法暂停适用六个月。

1970年3月20日:对3月18日的各项决定作了澄清。首先是“紧急法令”可以延长;第二是在紧急法令生效期间,政府有权“在有关警察和法律、报刊和舆论、集会和私人通信等方面采取适当的措施”(镇压在西哈努克专制主义下行使的那些民主权利)。

1970年5月30日:没有等到六个月有效期间届满,朗诺—施里玛达政权就无限期地延长了“紧急法令”,并颁布“戒严法”。戒严法规定如下:

凡有以下行为者一律枪决:

参加或公开煽动反对政府的叛乱或暴动;用口头或书面,或用任何看得见或说得出的方式,故意进行颠覆宣传;在陆军或国防部队中散播谣言惑众。

凡收听北京、河内、越共或其他敌台广播者,处以五至二十年苦役。

1971年10月18日:下令解散国民议会和政府机关。朗诺解释说:“我们对那些骗人的自由民主领教够了。”

1971年12月17日:下令禁止一切政治集会、反政府的游行示威,并给予警察以:

不受限制的权利去盘询和拘留有颠覆活动的嫌疑分子……随时搜查和拘捕嫌疑分子……无需许可证，不论白天还是晚上均可搜查私人住宅……本紧急法令对根据战前宪法享有的一般权利——其中包括言论、结社和通信秘密等自由——不予承认。*

关于专制主义的问题，过去的历史是一清二楚的。我还被指控为犯有“破坏国民经济”的罪行。前面就有一章讲了朗诺与施里玛达这些人怎样通过他们私人的买办代理人，吸吮国民经济部门的收入，将美元利润中饱私囊，更具体地说，存入了他们在国外开的存款帐户。（我本人从未在外国银行开过存户。）更严重的是，由于朗诺—施里玛达把美国西贡侵略者引进来保护他们的政权不至于垮台，其结果是：在他们统治的头几个月里稻米生产下降了60%；橡胶生产等于零；出口货物全无；在他们控制下的被包围地区，粮食价格已上涨了三到四倍；瑞尔的牌价下降到只值政变前的五分之一。那些用来使金边篡权者能继续掌权的B-52轰炸机、凝固汽油弹和有毒的化学物，把国民经济全给毁了。

另一条罪状是说我帮助“越南共产党人”占领了柬埔寨的一部分领土。抵抗军所占驻的领土总共从未超过几平方公里，几条狭长地带的纵深处从未超过五百米。抵抗军从未伤害过我们的人民，也未影响过我们的经济，倒是使边境地区的贸易兴旺了起来。他们的暂时留驻从未侵犯过我们在法律上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我们的中立。

*引自路透社和合众国际社1971年12月1日发自金边的电讯。

可是今天的情况如何呢？西贡政权兼并了我国的柴桢、波萝勉、磅湛、贡怀和茶胶等省——西贡邮政地图已把这些省的某些部分当作南越的领土了。离金边四十英里的渡口市镇乃良已被命名为“小西贡”。我们沿海岛屿被西贡军吞并了。我们的领空则几乎长期地被美国、南越和泰国的飞机所占领。究竟是谁应对丧失领土给外国占领者负责？

我还被指控为反叛朗诺—施里玛达的“合法”政权。我是领导着一场反对这个政权的斗争，这我承认。我还怀疑这个政权——尽管1972年6月有过一场选举总统的闹剧——连一丁点儿合法性也没有。而国际法和宪法在我这一边，支持我。

朗诺—施里玛达和其他阴谋家用这类捏造出来的罪名判处我死刑，等于准备好了绞索，到时候就会套在他们的脖子上。就在他们为了定我罪而列举的几条罪状范围以内，在所有罪名上都加倍有罪的正是他们一伙。等时候一到，还得给他们增加好几条严重得多的罪名。将把那些捏造罪名的家伙判处死刑，而原来宣判我的也正是死刑。同他们对整个国家犯下的罪行来比，他们对我本人和我的家属所犯下的罪行则算不得什么。对于他们犯下的罪行，我们的人民一定会要求严加惩处的。我可不是一个伪善的人，因此我要明确宣布，3月18日政变的主犯将会有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奎士林、赖伐尔式的人物一样的下场，因为他们对国家造成了如此不可估量的损失，使我们的人民遭受了如此残暴的苦难！

第十七章 春季攻势

如果说西贡军队 1972 年春在各条战线都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的话，那是由于全印度支那人民和武装部队之间配合得极好的缘故。这次联合作战是这样配合的：武元甲指挥的坦克、重武器部队从北越方面来；巴特寮的武装部队从纵深方面保护着南北补给供应线，并在老挝西部地区进行牵制性的攻击；民族解放阵线的正规军和游击队在南越各省发起进攻和暴动；我们柬埔寨的人民解放武装部队在我国东部和东南各省向敌人进攻。后者在以下地区发挥了很显著的威力：鸚鵡咀地区、连接金边与西贡的一号公路沿线以及沿着柬埔寨—南越边界的各战略要点。老挝、南越和柬埔寨人民在发动春季攻势之前，英勇地作出了一年以上的努力，不顾敌人残暴的空袭，帮助运输和储备了大量的供应品。

从军事上讲，通过柬埔寨境内的鸚鵡咀地区是通向西贡距离最短的道路。战略上重要的南越中部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同我国已完全解放的东北诸省相毗邻。通过我国东南诸省同湄公河三角洲的游击队取得联系，乃是把配备重武器的部队渗透进来的最简便的途径，而游击队的老战士中就有不少属于在那里定居的几十万柬埔寨少数民族。因此，在南越解放的最后阶段中，柬埔寨是起了关键作用的。我们一向认为，南越的解放与我们自己的最后胜利是密不可分的。我们

的部队一面防守我们自己的解放区，并继续对金边本身的敌军设施进行猛烈的攻击，同时也在边境地区发起主要攻势，为我们的盟国打开进入南越的渗透路线。

1970年4月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就已经预见到这种协同作战方式了。这个会议的最后公报指出：

从每一个国家的解放是其本国人民的事务这一原则出发，各参加国保证尽一切力量，根据有关国家的愿望，并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彼此相互支援。

它还进一步规定：

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在胜利的推动下，将最充分地利用他们主动进攻的态势，在各条战线上毫不停顿地向前推进、加强战斗。

我们每一方都忠实地执行了这个设想。在整个1971年和1972年的头几个月，主要的战场似乎已经转到了老挝和柬埔寨。正是在各条战线的配合作战为在南越的春季攻势铺平了道路。

在发动总攻的前夕，我们的武装部队在金边地区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3月16日，金边的波成东机场的一个大军火库被炸毁；3月21日，对该机场的军事设施和金边的主要电台发起了另外一次猛攻。3月24日，金边市中心横跨洞里萨河的重要大桥——水净华大桥的中段被炸毁。对金边市内的

袭击迫使敌人从其他地区抽调军队回来防卫首都。我们的军队在其他战线也很活跃。3月20日，我们的突击队炸毁了金边东南二十五英里西贡军队的一个重要军火库，还把位于其东五英里的另一军火库炸毁了一部分。这些只是在发起主要进攻之前，旨在最大限度地分散敌军兵力的几次著名的行动。

当我二月份去河内时——那正是尼克松总统到达北京的前夕——就对全面的战略进行了讨论。我和我的北越朋友，以及当时和我同在河内的民族解放阵线与巴特寮的朋友们，都一致认为，谁也不用想拿某种新的日内瓦会议的胜利来欺骗我们了。我们觉得，我们以前老是受西方的愚弄，这次非要把那些美国傀儡政权彻底粉碎不可。

在研究了印度支那形势的各个方面之后，我们都一致认为，我们现在有如顺水行舟，而且背后还有顺风相助。武元甲深信，西贡傀儡军已无能力进行象1971年3月入侵老挝南部和柬埔寨那样的作战行动了，朗诺军也无能力支持另一个类似1971年8月—12月在柬埔寨六号公路沿线的“真腊二号”那样的作战行动了。由于伪军中训练、装备最好的部队都受到了惨重损失，进行那样大规模的行动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然而，正如武元甲所说的那样，我们的部队今年却有能力举行大规模进攻，因为无论从总的方面还是相对地说，我们的力量都在不断壮大。美国人的对策可能是加强空袭，扩大他们所谓的电子侦察装置战，但是我们的供应线仍能畅通，除非出动美国军队去占领这些地区，否则他们是阻挡不了我们的供应的。1971年3月，他们曾试图从老挝南部和桔井入侵柬埔寨，结果是以惨败告终。没有美国军队亲自参加，傀儡军的作

战能力就大大降低了。

傀儡军本身是四分五裂的。南朝鲜雇佣军看不起西贡的军队。西贡军队的主力部队看不起一般正规军。西贡正规军又看不起朗诺的军队。在老挝的泰国军队和苗族雇佣军则看不起万象的军队。这些情绪又是相互都有的，因而大大地影响了他们的整个士气。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一致。在这同时，随着我们武装部队的发展，我们协同作战的能力和由于有共同的目标所产生的团结精神都有所加强。我们三国人民武装部队所具有的崇高思想素质，使任何种族主义的残迹都没有市场。

在1971年春季冒险入侵柬埔寨与老挝时，尼克松错误地消耗了西贡军的战略后备力量，这就为我们武装部队在1972年采取攻势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印度支那革命力量的声势在我访问河内时已接近高潮了。当我们翻开军事地图研究整个形势的时候，武元甲的情绪乐观极了。

我们柬埔寨部队是印度支那大家庭中最年轻的一支部队。我只要用我们部队的发展情况作为衡量尺度，就可以对那些有作战经验的老大哥们的素质有一定的了解。在一个短得令人不可置信的时间内，我们的部队就已经变成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并且能很熟练地使用各种我们武装部队以前从未有过的武器。在春季攻势的前夕，敌军的士气已下降到了一个新低点，而我军的士气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从抵抗根据地来的一切报道都证实了这一点。在提高战斗精神方面，正义的事业、战场上的胜利以及人民的紧密支持等等因素是不可战胜的。我们在河内会议上的估计是非常重要的：不

管尼克松对战场上的失败作出多么凶残的反应——我们之中任何人都没有低估他的野兽般的报复能力——但那也只能提高我们部队的士气和决心。

挨个儿地向我们三国人民进行挑战的不是别人，就是尼克松。决定要同我们较量一番并迫使我们除了接受挑战别无他途的不是别人，就是尼克松。我们决定使用我们联合的力量来对付他，或者任何接替他当美国总统并推行同一政策的人，直至完全胜利。我们遭受的苦难太多了；我们遭受屈辱的时间也太长了。我们的目标够低了——不要干涉我们，让我们自己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在河内一致同意：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团结一致，争取全胜。这就是我同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会谈所得出的主要结论。这些领导人中有孙德胜主席、范文同总理、武元甲国防部长、劳动党总书记黎笋以及其他。我同孙德胜主席于1972年3月5日签署的公报表达了我们的一致看法和目标。公报中有一段提到：

只要尼克松政权还继续在印度支那各国推行其新殖民主义阴谋，继续推行“尼克松主义”，柬埔寨人民和越南人民就决心竭尽全力、并肩战斗，直到彻底胜利……柬埔寨人民方面决心毫不妥协、绝不动摇地进行斗争，把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西贡和曼谷走狗以及它们所有的武装力量和军事人员从柬埔寨赶出去，推翻和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朗诺、施里玛达和山玉成集团的反人民、反民族和反宪法的法西斯政权，以便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主权、中立、和平、民主和繁荣的柬埔寨。

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暴力、任何蛮横威胁或任何险恶阴谋都不能使印度支那三国人民背离他们的崇高目标：解放整个印度支那，使印度支那成为一个由独立和主权国家组成的自由与和平的半岛，确保越南南方、柬埔寨、老挝有权沿着独立、和平与真正中立的道路前进。

也许由于全世界的注意力还集中在尼克松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果方面，所以当时才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个历史性的文件。但是，春季攻势正是在这个旗帜下发动的，我们三国人民正是根据这种精神在进行攻势之前和在攻势过程中互相合作，赢得了印度支那人民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胜利。

关于尼克松访问中国的问题，我们的中国朋友、越南朋友和老挝朋友以及我自己，都不抱任何幻想。尼克松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中国人和我们民族解放运动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在基辛格第一次访华离开北京返回华盛顿之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于1971年7月12日凌晨坦率地对我谈了对形势的估计。尼克松结束对中国的访问，离开上海后没几天，周恩来总理来看我，当时我正在北越进行访问。他在这次三小时的会见中，把他和尼克松的讨论内容对我说了。关于印度支那部分，他们的讨论如下：

周恩来明确地对尼克松说，如果他想解决柬埔寨问题，或越南问题、老挝问题，那他就应该自己去同柬埔寨、越南和老挝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打交道，直接同他们讨论问题。周恩来总理解释说，尼克松对于同我见面不表示热心，因为如果同我见了面，那就意味着朗诺政权会马上垮台，而尼克松还不想看

到它垮台。印度支那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决不会放弃他们的主权，而中国人的观点是这样的：美国应该承认，抵抗运动领导人才是他们各自人民的真正代表，因为他们是为他们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而美国的傀儡们则并不代表任何国家的愿望。尼克松总统应该首先决定同抵抗领导人谈判。第二，他应该认真对待他们的要求，因为那些要求都是合法的。第三，中国奉劝美国不要干涉印度支那人民。

走开吧！这才是你们应该做的。如果你们不这样做，我们中国人忠于我们对正义和与一切被压迫民族团结的信念，将给予印度支那人民一切必要的援助——他们为了获得解放所可能需要的一切。我们将支持他们到底。我们决不会从这个立场后退，因此最好还是让你们知道这一点。我们的对话只应该讨论与中国和美国双方有关的事项。印度支那问题是你们与印度支那人之间的问题。这不是你们同我们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只告诉你们，我们认为你们该怎么做。就我们来说，我们通知你们，我们对全面支持和援助抵抗运动是决不会犹豫的。

周总理说，尼克松当时的反应只是说他注意到了这是中国所持的立场，但是这个问题在讨论台湾时又出现了，因为尼克松声称“在该地区紧张局势未减少以前”美国军队仍将留在那里。周恩来坚持说，这个地区存在紧张局势主要就是由于印度支那的战争。他对尼克松说，“可是你们却不准备撤出印度支那。”

你们继续推行你们把战争越南化、高棉化和老挝化的政策，而这种政策是印度支那人民和他们的真正领导人所不能接受的。你们继续撤出军队，但你们也在不停地轰炸印度支那的人民。你们企图通过雇佣军——拿你们钱的人——来维持你们在印度支那的地位。只要印度支那战争不停止，紧张局势也就谈不到缓和，因此你们就将赖在台湾一直到死。我们说，假如你有诚意想要改善同我们的关系，那么就停止你们对印度支那的干涉。那样一来，紧张局势也就不存在了。我们永远也不会进攻美国，你们也没有权利无限期地赖在台湾。为了使这个地区不再存在紧张局势，以便你们能够离开台湾，你们必须结束印度支那战争。这是无可辩驳的、无懈可击的逻辑。

周总理在我们谈话一开始和结束时都作了以下的表示：“我们中国人和你们印度支那人民完全团结一致。美国同我们之间的大问题是台湾。不过在台湾还没有战争，而在印度支那则仍然战火熊熊。你们的人民还在遭受痛苦。只要我们能消除这种痛苦作出贡献，我们一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人说：‘就台湾而言，我们是能够耐心等待的。可是就印度支那而言，我们要求你们结束这场战争。如果你们想要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这一点是你们必须做到的。’”

至于说召开一次新的日内瓦式的会议——这是尼克松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中国不能接受这样的会议，因为印度支那的主要当事国不想开这样的会，所以中

国也将依照它们的愿望行事。周总理非常了解，越南人、老挝爱国战线党人和我自己都根本不想开这样的会。

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对我们的支持并未动摇。具体的证据是，尼克松离开后不久，中国就加快了对我们抵抗部队进行援助的步伐——这种援助本来就已很可观——答应给我们所最需要的物资还加上运送这些物资的手段。

尼克松之所以在访问北京之后又访问莫斯科，也许背后有这么一个目的：他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防止我们在（美国）总统竞选前的最后一个作战季节里发动攻势。他在1970年和1971年先后两次对柬埔寨和老挝的“胜利”攻势都失败了，因此他准定担心1972年将会怎样的问题。如果他期望中国人会施加某种压力来阻止我们发起攻势，那他可大错特错了。在整个1971年和1972年的头几个月，中国人对我们和我们越南战友的援助都在稳步增长，而且中国对我们加强春季攻势的计划的鼓励从未动摇过。

前面提到过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乔森潘的年终报告，对春季攻势前夕的柬埔寨形势作了总结。这是个很重要的文件：

敌人的所有作战方案都是为了：侵占我们的解放区；掠夺人民的财物；强拉民伕来补充朗诺军队，从而使力量对比变得对他们有利。但是这些目的都被我们粉碎了。由于敌人未能攻占和“平定”解放区，所以他们也就无法得到新的补充。他们现有的兵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而且败绩累累（连一次胜仗也没有打过）又使得仅存的部队的士气大为低落。看来尼克松主义在柬埔寨的处境

不妙。

乔森潘接着总结了形势的四个特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我们的武装部队能对春季攻势作出贡献。

一、我军的强大

朗诺军妄图动摇我军对六号公路——该公路从金边北经斯昆、巴莱和当格罗桑到磅同，然后从磅同西通暹粒与吴哥——的控制，进行了“更加全面、更加激烈、更有组织而且不停顿的进攻”，它的失败证明了我军的强大。西贡—朗诺军甚至也未能把我军逐出金边的近郊。乔森潘认为这是敌我之间“军事、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总对比起了根本变化”的证明。他指出，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头几个月里，我们的部队必须抵挡得住那种妄图把我军“掐死在摇篮里”的强大攻势。我们的部队必须采取主动，在解放大片地区的同时，把武装力量和基层政权机构建立起来。乔森潘的报告说：

然而现在，我们的正规军、地方军和游击队之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撒下了如此坚实的天罗地网，只要敌人一露面就会尝到我们人民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铁拳是什么滋味。

乔森潘国防大臣还强调指出，下述方面的能力说明我们的战斗效率和士气在不断地提高：

把游击战与正规战结合起来；实现正规军、地方军和乡村民兵之间，武装部队的三军和人民政治组织之间的密切配合。

由于力量对比的改变，敌军已不再能够把驻在一个地区的部队调去援救在别处受攻击的部队，而在 1971 年年中以前他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们现在能够把敌军固定住，使他们不可能互相救援。”

二、敌军的分崩离析

“真腊二号”战役（乔森潘在下面将进行详尽的分析）证明，即使具有大规模海、空支持的敌军也打不垮我们抵抗部队，可是当我们进行反攻时，敌军就完全垮了。报告书接着写道：

目前，失败情绪已使卖国贼军队陷于完全瘫痪状态。同我们的武装力量完全不一样，他们根本不是团结一致的。他们的部队连想都没有想到要去救援别的部队，哪怕就是参加同一战役的部队也是这样。金边的领导只关心首都的命运，只关心如何保住他们最后的巢穴。

乔森潘指出，到了 1971 年下半年，西贡傀儡军“一年前的那股傲慢劲儿已所剩无几了”。他当时认为，要是敌军凑齐了

足够数量的人员和装备,还是能够“在各处推进”的,不过不管敌人投入多少兵力,“也决不能改善朗诺军的可悲处境。敌军愈是深入我们的地区,他们的处境就愈不妙。”乔森潘当时还正确地预料到,到了1972年“敌人肯定不会比1971年更有所作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使敌人吃更多的败仗,这是肯定无疑的”。

三、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进一步配合

我们的国防大臣在这里强调指出了“武装部队与人民积极合作”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有鉴于美国起先是企图使在柬埔寨的战争“越南化”,等到这个失败之后又企图把战争“柬埔寨化”。附带提一下,我们认为,“全胜”战役中的一次打击使尼克松把柬埔寨的战争“越南化”的企图受到了致命的创伤。“全胜”战役是西贡军想要占领湄公河畔的桔井所发起的一次倒霉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进攻部队的大部分装甲和大炮不是被摧毁就是被我军缴获。指挥这次战役的西贡将军杜高智,在他乘坐的直升飞机被击落时被击毙。进攻的军队溃不成军,连桔井是个啥样子都没有看到过。与此同时,尼克松要把老挝的战争“越南化”的企图,也由于在老挝南部的大败而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乔森潘认为,随着朗诺大吹大擂的“真腊二号”战役的溃败,战争的“柬埔寨化”实质上在1971年12月就失败了。

正是由于地方上老百姓的支持,我们的精锐部队才

能打 1971 年 10 月那样大的胜仗——部队穿过了极其密集的防御设施，把在一号公路上以磅略白为中心地区的主要军事据点摧毁了，还清除了一系列的支持据点，并把两个月前在一次作战行动中被西贡军所驱集在一起的成千上万的农民解放出来了。*

正如在其他章节里讲过的那样，战争“柬埔寨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象在南越一样，把农民驱赶到周围有铁丝网的“战略村”去，由“自卫”部队加以防守，保证他们与外界毫无接触。我们武装部队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帮助农民们逃出这类集中营，使他们不受敌人的管制。这也包括帮助他们及时从敌人进攻的路线撤出来。乔森潘的报告说，由于我们这样做的结果，朗诺军在沿六号公路作战中损失了一万二千人，却没法从这个地区征补到一千名以上的人员。由于敌军作战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搜集炮灰，所以，乔森潘把这类例子当成是战争“柬埔寨化”的大失败，从而也是尼克松在印度支那全面战略的大失败，这是完全正确的。

四、国内外的团结进一步加强

报告的这一部分强调指出，我们同兄弟的越南人民与老挝人民形成了高度的战斗团结，还提到了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和其他友好国家人民的重要支持。乔森潘在总结时指出，

* 磅略白是金边—西贡公路干线上的要镇，于 1972 年 4 月被人民民族解放武装部队攻克，为把西贡军从整个鸛鹉咀地区清除出去铺平了道路，同时导致了位于南越边界地区的战略要镇巴韦——距西贡只有四十多英里——的解放。

当敌军在各条战线溃败时……我们同兄弟国家和国内各阶层紧密团结一致，不断前进。我们现正处于革命高潮。

乔森潘预计，在即将到来的几个月中，将继续

在国内外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和心理等方面（进行联合攻势），那么我们就有把握在 1972 年这一年中把总的力量对比改变得对我们更加有利，并加速朗诺、施里玛达和山玉成政权走向死亡。

当我最初读到这份报告时，我觉得乔森潘的乐观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是否把前景描绘得太美好了呢？然而，事态的发展证明，他的估计是既严肃认真又是十分现实的。

正象将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把“真腊二号”战役看成是在柬埔寨战斗中的决定性转折点一样，乔森潘对于所经过的情况的分析也是很重要的。他着重指出，这次战役是朗诺于 1971 年下半年同时发动的一系列战斗行动中最野心勃勃的一个，主要的意图是想消灭抵抗部队。“真腊二号”有两个主要作战目标：（1）重新控制从斯昆到磅同之间那段重要的、长达五十英里的六号公路；（2）重新占领六号公路、七号公路和二十一号公路之间的三角地带，这个地带人口稠密又很富饶。在这个三角地带中，就有巴莱、占卡勒和斯栋德朗等地区，不是在六号公路上就是在它的东侧。

乔森潘接着指出：

要是这个地区落入了朗诺手中，他的军队就会把当地所有资源都洗劫一空，迫使农民到“战略村”里去，把适龄壮丁都拉去补充军队，把这个地区变成入侵我们在磅湛、磅同、柏威夏和暹粒等省的其他解放区的基地。他们投入了十四个以上的步兵旅和其他部队，总兵力达七十多个营，还有美国空军，朗诺的海军、坦克和重炮的支援。

我们的作战分三个阶段。从8月20日到10月25日，我们主要采用游击战术——进行伏击，打了就迅速转移。在这个阶段里，我们使五千以上的朗诺军失去了战斗力。帮助当地人民逃出敌占区，挫败敌人的“绥靖计划”，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这一阶段的成功为后两个作战阶段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10月26日开始的：炸毁了位于斯昆与磅同中点巴泰的重要的布雷德拉大桥，从布雷德拉—巴泰到山图克对沿着六号公路的敌军据点展开猛烈的袭击，对他们进行分割包围，切断他们的后方补给线。等到我们开始对敌军主要指挥据点缩小钳形包围圈时，六号公路沿线的敌军据点就先后被我军一一攻克。这个阶段是11月13日结束的。这时，我军在包围了十九天之后对第四十六步兵旅设在伦隆的指挥部发起进攻，全歼了这个指挥部和守军。在第二阶段里，又使朗诺军损失了四千人。这是个致命的打击，为第三也是最后的阶段铺平了道路。

从11月4日到12月3日，我们对“真腊二号”各主要指挥据点展开全面进攻。先从巴莱和磅特莫这两个防御最坚固的据点着手，然后再收拾其他所有重要据点——共有十个之多。在消灭了头两个据点后，敌人就开始溃败了。指挥据点间的彼此联系被切断了。随着据点的被摧毁，整个指挥系统也就崩溃了，于是其余的军队就开始拼命后撤。参加这次战役的朗诺军总共有两万人，其中被我军打死、打伤和俘虏的在一万二千人以上。逃走的军队中，没有一个营是未受严重损失的。

在“真腊二号”冒险行动中，朗诺丧失了他最精锐部队的一半还多。对他来说，更严重的是，除了那次战役中损失很重的七十个营之外，其余的军队——都在各条战线上挨过打——不能再作为第一线战斗部队用来防守金边或其他地方了。他们的士气在零的水平上，只要一投入战斗就每仗必败。这标志着战争“柬埔寨化”走向全面失败的第一个战略转折点；标志着“绥靖计划”、建立“战略村”和“自卫”部队等等的失败……也标志着尼克松主义在柬埔寨的骨干的垮台。

取得规模如此大的胜利是人民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在1971年的巨大成就之一。必须强调指出，正是由于我们全体武装部队在所有战场同时采取了军事行动，我们才能取得这样大的胜利。在1971年，敌军还能够用从其他地方撤回来的部队来增援四号公路——连接金边与我国唯一海港西哈努克城——沿线的守军，从而减少他们的损失。可是，朗诺的军队这一次却在各个战场都被拖住

了，什么部队都撤不回来。对“真腊二号”指挥官们求教的呼吁根本无人理睬，也没有可派的增援队伍。甚至西贡那些干涉主义者也没有多余的队伍可派出。因为我们的部队在首都以东的地区把他们给拖住了。

乔森潘最后指出，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武装部队得到了坚强的军事、政治和社会基础的支持”。西方通讯社发自金边的许多报道(时间同我收到乔森潘的报告差不多)都证实了乔森潘对形势的估计。美联社的罗宾·曼诺克于1972年1月4日报道说，政府军由于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士气已经涣散。在“真腊二号”战役——这是朗诺总理领导的一次战役——失败之后，士气简直就崩溃了。“共产党指挥的部队”切断了“柬埔寨军”的补给线，把他们分割包围在几小块地方，而这些地方又很快就被攻陷，尽管美国和南越给予了大规模的空中支持。*

(请读者注意，对罗宾·曼诺克来说，就象对大多数西方记者一样，所谓的“共产党”指的就是爱国力量，只要他们这些人不是北越人，那么大概就是无国籍者，而所谓的“柬埔寨军”指的就是朗诺卖国贼的军队、美国和西贡的傀儡军。至于说到战役是“由朗诺亲自策划”这种神话般的提法，要是朗诺的作战计划没有得到美国军事顾问的批准——如果说作战计划不是完全由美国顾问们制订的话——这类战役还能发动得起来，那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事。呆在那里的美国顾问们毕竟

* 本书的出版者未能为西哈努克亲王征得引用这篇报道的许可，因此在这里增写了一段编者按语。

得去监督美国制造的武器能够得到有效的使用呀！)

不管怎么说，“真腊二号”的失败挑起了一场迄那时为止的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而政治危机的没完没了则又是朗诺政权的固有特点。关于由谁来解决这类危机的问题，可以读一读合众国际社的金·威伦森于1971年12月20日所写的“专题报告”——大概只供主编们参阅，我在前面的一章里也曾简单地提到过这个报告。威伦森说，由于“真腊二号”的惨败，传闻“政府即将改组，大概会把朗诺踢到一个很高很高的职位上去，就象有个消息来源所说的那样，把他踢到‘行星上或甚至星球上去’，使他或多或少成为一个傀儡”。这位合众国际社记者接着讲到我在前面的一章里提到过的那段话，大意是说，不过美国“也不会不问政变是由谁搞起来的就一律表示支持”。

当时我在北京总部接到的情报说，美国驻金边的使馆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新内阁的名单，在一场把朗诺搞下台的宫廷政变之后就成立新内阁。但是，看来中央情报局同国务院有分歧意见，此外同法国人也还有纠纷。据说法国驻金边大使讲过，要是山玉成当了新的头头，法国“就不再合作了”，（因为法国曾把山玉成作为卖国贼判处了死刑，只是由于我的干预才免了他一死。）这岂不就意味着法国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同朗诺反对西哈努克的政变进行过合作了吗？产生分歧意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央情报局想以朗诺的弟弟朗农来取代朗诺，但是国务院反对，因为朗农与从老挝私运麻醉毒品供在越南的美国士兵吸用的案件有关——在南部老挝建立的一个培训朗诺突击队员的训练中心，很快就变成了一个贩卖鸦片的供应点。美国国会派了一个调查组去调查给美国士兵供应毒

品的渠道和来源，无意中发现了朗农与此有牵连，明确指出中央情报局办的一所训练朗诺突击队员的训练营是批发各种毒品，从大麻到海洛因的主要场所。*

山玉成施展了讹诈手段。他威胁说，除非让他得到最高的职位，否则就要把他手下那一万名中央情报局训练出来的下高棉突击队员撤走，而朗诺则主要依靠这批突击队员来守卫金边。到了这个时候，名义上归朗诺指挥的很大一部分军队都纷纷站出来保护各派势力，以免被对方吃掉。最后来了一个暂时解决危机的办法，朗诺把“总统”郑兴和“总理”施里玛达一脚踢开，由他自己就任总统。几乎所有在金边的外交官都拒绝出席他的就职仪式。朗诺后来给了山玉成以“总理”一职作为安慰奖。就山玉成而言，变节的全过程到现在总算完成了。头一次当总理是作为日本人的傀儡；第二次当总理则是美国人的傀儡。其实哪一次他也没有掌握实权。不过这两次都是由于他立下的“汗马功劳”而得到了象征性的奖赏。

朗诺到了这个时候已完全孤立了，连那些在3月18日政变中同他关系最密切的人都抛弃了他。英丹在国民议会被解散后就反对他了。施里玛达在政治上已经完蛋了，郑兴被无情地抛弃到一边去了。甚至从日本调回来那个本来有可能作为总理候选人之一的沈法，在略为观察了一下金边的形势之后就拒绝出任总理。（他在他办的报纸上写了一篇社论，其中就提到朗诺政权的贪污情况“比西哈努克时代严重一百倍”！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发现朗诺、施里玛达和少数几个其他的人垄断了一切主要渠道，把五角大楼给的成百

* 主管这个训练营——后来被关倒了——的是朗农手下的一个门徒。

万美元都存到他们自己在外国银行的帐户里去了。)朗诺组织学生示威来支持他赶走施里玛达。学生们进行了热情的合作,不过等到施里玛达一被打倒,他们又愤怒地反起朗诺和山玉成来了。其结果是,朗诺和山玉成直接下令让宪兵于1972年4月27日对金边大学法学院的示威学生开枪,打死打伤至少三十名学生。朗诺的宪警秘密地把死者搬走并埋了起来。这就在金边市中心挑起了一场更为激烈的示威,死者的父母和亲属们要求至少得把死者的尸体交还给他们。学生和死者的父母们结队走向金边市中心的独立纪念碑,走在队伍前列的还有佛教僧侣们。群众举行示威,表示声援死者和他们的亲属,直到朗诺在纪念碑周围的花园布了雷,酿成更多的伤亡时为止。

等到发动春季攻势时,朗诺政权已完全土崩瓦解了。当我们的突击队员于1972年5月6日夜晚渗入金边市郊,烧毁一座油库,进攻波成东机场,并在城里好几处地方同朗诺军展开肉搏战的时候,西贡根本没有派任何军队来援救。朗诺通过金边—西贡间的“热线”求救时,据说阮文绍——他自己刚把广治省丢掉,顺化又受到严重威胁——的回答是:“难道你疯了吗?”

人们可能以为,既然篡权者朗诺和山玉成已被证明是孤立得很,尼克松大概会重新考虑他对柬埔寨的态度。看来,抱这种期望显然是对他的才智和现实感作了过高的估计。要是在金边或西贡掌权的人不完全是美国的傀儡,那就等于使尼克松总统“丢了脸”,并有损“美国总统职位的尊严”。因此,我们从1972年4月24日的《华盛顿邮报》读到,美国“在美军撤

出越南以后也还对柬埔寨的防务负有承诺”。这条消息是以五角大楼要求美国“在 1973 年这个财政年度里为柬埔寨建立一支二十二万人的军队”为根据的。由于朗诺控制的地区只有二百万左右的人口,而且还在逐日减少,所以这个估计数字至少也是偏“乐观”的,特别是这两百万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躲美国对农村地区的轰炸而逃出来的妇女、儿童和老年人。朗诺能够在纸上建立一支二十二万人的军队,并把根本不存在的人的薪饷都存到瑞士的银行里去,这种可能性倒是很大。前面提到过的威伦森报告书中讲到,“被派去招兵并负责给士兵们关饷的营长们发现,只要在他们的花名册上多保留一些纸上的兵,他们就可以大发其洋财。”

同朗诺和与朗诺一起在上面掌权并共同分赃的一小撮政治骗子所贪污的千百万美元相比,这些营长们中饱私囊的数目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同美国人所作的新承诺的影响相比,贪污本身也只是次要的问题。

尼克松政府等于公开表示柬埔寨将无限期地成为美国的领地。为了说明这一点,美国主管亚洲事务的副国务卿马歇尔·格林伪善透顶地对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说,美国“对柬埔寨人能否根据自己的选择组成一个政府是关心的”。柬埔寨从法国人手里获得独立后差不多整整十七年里,我们武装部队人员最多的时候也只有三万五千左右。美国安全援助署长乔治·M·塞格尼厄斯中将在支持格林时显得比较不那么虚伪,但却更令人可笑,他说:“我想我们美国可能是关心的,而且还有政策方面的理由,它们将会说明,在美国军队从越南撤出后,继续对柬埔寨进行某种形式的援助是明智的,而且也是

符合我国利益的。”(重点是作者加的。)

这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国想要柬埔寨永远当傀儡的意图，同威伦森的报道的口径是一致的：“柬埔寨的陆军没有完成美国交给它的任务——不断地袭击共产党军队的后方根据地，以便美国能够更容易地从邻近的南越撤出。”起初，必须得有一支柬埔寨傀儡军，让美国能够安全地把它的军队撤出比较危险的南越，以后则必须有一支傀儡军来保护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

正如在“春季攻势”期间就已明确指出的那样，柬埔寨人民和武装部队认为他们应起截然相反的作用——“不断袭击”西贡和金边的“后方根据地”，以便“春季攻势”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保证印度支那人民能真正赢得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并组成“自己所选择的政府”，既不用美国枪炮在背后指挥，也不用美国傀儡在头顶上发号施令。

第十八章 未来

我们能打赢这场争取民族生存的战争吗？如果能，以后又将如何？西方国家的许多记者们似乎只对第二个问题感兴趣。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与金边现政权或美国强加给金边的任何政权之间的斗争结果直接有关。这类政权只有依靠外国力量出马保驾才得以维持。因此，归根到底，这类政权的继续存在就会招致我们民族的灭亡。说得更确切一些，它意味着柬埔寨将被我国的传统敌人所瓜分。在今天，这些敌人就是越南和泰国扩张主义的最恶劣的继承者和推行者——西贡和曼谷的军事独裁政权。

然而，获胜的将是柬埔寨的抵抗部队，就如同越南南方的抵抗部队最终要把西贡独裁政权赶到大海里去一样。泰国的人民迟早也要算曼谷独裁政权的账的，这取决于曼谷政权在采取冒险行动反对老挝和柬埔寨方面让美国把自己推得多远、多快。（假如美国果真驱使泰国侵略柬埔寨，那末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目前的抵抗阵线就会扩大成为我们三国人民与泰国之间的军事对抗。我们的阵容会由于泰国爱国阵线的参加而得到加强，而且我们将协调我们在西线以及在北线、东线的活动。）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就是柬埔寨的希望。在这方面，我们的地位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

在越南南方，阮文绍政权——或它在西贡的任何接替者——多少总是法国人建立的保大政权的继承者。保大政权是由一系列法律地位都成问题的独裁政权接替的，从吴庭艳到阮文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完全靠美元和美国武器的力量才能生存，最后甚至要靠美国军事力量亲自出马保驾。在那里，还有代表民族解放力量的临时革命政府。通过他们英勇的、胜利的斗争，临时革命政府的领导人在战场上赢得了建立国家政权的权利。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自称能够代表整个越南南方，正象民族解放阵线总是反对任何人在决定国家的前途方面拥有垄断地位。民族解放阵线从一开始就声明，它是为越南南方人民，在没有外国控制、没有外国傀儡的情况下，决定他们的未来创造条件而战斗的。临时革命政府和民族解放阵线要求，应该把那个代表美国利益、专靠从事战争反对自己人民的西贡政权，改变成为一个谋求和平与独立的政权。临时革命政府准备同这样一个政权谈判一项和平解决的办法，并且准备同该政权的成员一起参加一个临时的联合政府。

在柬埔寨，情况就很不同了。金边的政变分子违反了宪法，并且非法地、暂时地篡夺了金边的政权。他们靠外国武装部队来维持统治。他们是在法律意义上的卖国贼和歹徒，对我们的人民犯下了无法形容的罪行。我们永远也不同他们谈判，永远也不同他们一起搞任何联合政府或达成任何妥协。一定要把他们消灭掉。要是任何政变头子被我们抓住了，毫无疑问就将予以处决。他们是阴谋家、奎士林分子；他们参加了妄图摧毁我们独立的国际阴谋。不管他们或他们的主子们

在事后给这个政权穿上什么样的合法外衣，民族统一阵线对它只坚持一条政策——它要是不投降就把它消灭掉。

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是柬埔寨的唯一合法政府。它接受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政治纲领，并且根据这个纲领来进行斗争直到取得胜利。因此，要理解“以后又将如何”的关键，就得在这个政治纲领里去找。譬如这个纲领就规定：“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外交政策是，民族独立、和平、中立、不结盟、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与政府友好、团结。”对于中立，还规定了具体内容：不参加军事同盟，不接受任何国家的保护，不准在柬埔寨领土上有外国军事基地或驻扎外国军队。在共同的斗争中，柬埔寨与老挝、越南携手合作：

根据每一国家的解放和防务都是每一国家人民自己的事务的原则……此外，柬埔寨还准备同老挝、越南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使印度支那成为一个真正独立、和平和进步的地区，而地区内的每一个国家又保持各自完全的主权。

在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方面，柬埔寨将一如既往：同一切尊重我国独立和主权的国家友好。我们将同越南南方和老挝——这只能是我们能够看到将通过它们各自抵抗斗争的胜利而涌现出来的越南南方与老挝——有特别亲密、特别友好的关系。我们同北越和中国的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友好，这种友好关系是由于一个国家是我们的战友，另一个国家则给了我们慷慨的援助而结成的。这种关系将保证在世界上

的这个角落里会有一个和平和稳定的时代，而这在过去好几个世纪里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都需要有这么一个时代，因为我们都将面临重建家园的大问题，且不提还有其他原因。只要战争继续一天，只要美国继续推行凡是美国傀儡所不能控制的一切均予摧毁的政策，美国空军每天都在加重这个问题。

我们将来同泰国的关系如何，取决于事态怎样发展。如果泰国不幸采取进攻我们的步骤，那末在泰国人民和我们的越南与老挝战友的协助下，我们将予回击。我们将取得胜利。泰国的军事独裁政权——不管到时候由谁掌权——将会被推翻，我们两国之间友好的新时代将会开始。泰国对于采取这种步骤很可能拿不定主意，特别是泰国军队 1971 年末、1972 年初在老挝的查尔平原和龙镇吃了大败仗之后。泰国很可能不想充当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大陆的最后一个基地，也可能不想成为这个地区最后一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修好的国家。

依我看来，东南亚的前途就是中立。根据各国不同的情况和意愿，中立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河内和北京都支持这种解决办法，它是使这个地区保持真正独立的最好保证，从而堵死了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的门道。不管采取什么样的中立形式，它必须是一种反对帝国主义的中立。由于帝国主义是干涉的同义语，所以亲帝国主义的中立和中立这个名词是矛盾的。1971 年年底，西方大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进行暗地策划，企图利用中立主义倾向的潮流，在东南亚提出它们自己设想的一套中立方案，这一定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越南南方、老挝和柬埔寨已经选择了一种进步类型的中立，这是 1970 年 4 月

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最后文件所表达的那种中立。泰国和马来西亚都有强烈的中立主义倾向，它将使独立更加有效。这是使东南亚地区的中小国家在保持它们自己的政治、社会制度的同时，而又不受超级大国控制的最好保证。杜勒斯常说，中立主义是“危险而又不道德的”。从那时起，这个地区的国家都看到了：同中立背道而驰就意味着民族灾难。中国能够接受东南亚的中立，因为中立对她的利益没有危险。获得中国的支持和友谊是极为重要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就更加如此。由于我和我的朋友们现在对北京和河内的政策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我们流亡在国外，不可避免地使我们对中国和北越的领导人以及他们对共同关心的问题的想法有了更密切的了解——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东南亚的中立为这个地区所有国家之间的和平与互相友好关系，提供了最合宜的条件。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挑起敌对行为和使我们进行自相残杀的，正是帝国主义。中立是使这个地区能进入和平、稳定的时代的最好的保护伞，使不怀好意的外来者不敢问津。

我们的国内政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进步的，但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国营、公私合营以及私营企业均将并存。正如政治纲领中所规定的，我们的目标是“社会正义、平等和博爱”。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领导人中，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既然能在草拟纲领时进行合作，那有什么理由怀疑他们在执行纲领时就不能进行类似的合作呢？解放区的发展情况证明了这一点。纲领本身就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很好的妥协。在抵抗斗争中形成的友谊和团结精神是

我们以后进行合作的最好基础。我们的社会主义要比政变前我们想实行的佛教社会主义要更左一些。最重要的是，右派、贪污腐化分子、黑市商贩和其他诈骗分子——所有那些甘愿为美元而出卖国家的人——在一个时期内将不准他们参加政治生活。他们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他们得用行动来证明他们愿改过自新。

虽然在我们解放区的墙上都有反美帝国主义的标语，但我们对于将来的危险——譬如日本的兴起——也必须保持警惕。日本的代理人在柬埔寨——以及东南亚的其他地方，包括南越和泰国——都深深地扎下了根。维持不结盟的唯一真正保证就是要把国内反动力量孤立起来，而我們是有决心要做到这一点的。

只有实现了民族团结——不包括反动集团和个人在内，他们人数虽不多，但由于拥有财富而很有势力——才能做到不结盟，这一点现在明确了。换句话说，在国内事务方面，我们将比政变前任何一届政府都要左一些，或者说至少在保证严格实行当时认为最进步的措施方面更加有力一些。佛教仍然是我们的国教，但纲领“承认并保证其他一切宗教信仰的自由”。

以北京为基地的那部分政府，仔细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北朝鲜、北越在解决它们战后建设问题方面的经验。例如，北朝鲜在1950—1953年的战争中，整个国家被“联合国”的空军破坏殆尽。从那时起北朝鲜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就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学习中国人的工作方法，每当我对平壤和河内进行国事访问时，负责战后计划的大臣总是陪我一起

去的。凡是大臣们感兴趣的方面，就为他们进行研究学习提供一切方便。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盲目地照搬人家的做法。柬埔寨将保持它自己的特点，但从我们亚洲邻邦的经验中，我们会找到很多适合我们需要的东西。

我们已在草拟战后建设的方案。由于我们以北京为基地，这对于做这项工作真是太幸运了。我们密切注意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例如，我们的大臣们对于北朝鲜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就很感兴趣。柬埔寨的绝大多数干部都在法国受过一些训练，但那种训练是为一个已经定型的政府服务的，它与柬埔寨的现实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它和人民与人民的需要相脱离。在朝鲜，我们发现他们不仅把重点放在如何为人民服务方面，而且还要把干部培养成既有实际工作能力同时又有办事效率，并且能够处理最基层的事务。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干部——不是光会办政府公文的干部。

我个人对于人民公社很感兴趣。我在中国参观过许多规模大小不同的公社。公社有许多明显的优点，但有一点对我特别有吸引力。甚至比较小的公社也有几平方公里的面积，包括有好几千户人家的大村庄。年青人就在公社里上学——有中学，也有技术学校。他们学成之后，并不象在我国那样永远不回自己的家乡去。我们在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并对我们建立了自己的中学和技术教育体系而自豪——到1968年时我们已拥有学校279所，在校学生124,000人；而我们获得独立时则仅有学校17所，在校学生5,600人。但是，它们几乎都全设在各个省的省城里。学生们学完了学业就不愿意回到农村去。他们的家乡往往无法提供与他们所学专业对口

的工作。中等学校就设在学生居住和他们父母工作的所在地，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十分重要的。

他们一面学习，一面参加公社的活动。教师通常也是来源于本公社，特别是那些教所有公社都有的实践课与技术课的教师。由于公社除了经营农业之外还办了一些小型工业，那些愿意搞技术工作的人是完全可以在本地找到工作的。青年人在本乡本土扎根这件事非常重要。我们的青年人不愿扎根农村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有这个问题。学生们在城镇学校里学了点知识就不肯回到农村去，他们往往宁可在城市里堕落成为流氓、小犯罪分子也不愿回到自己家乡去“务农”。在中国的公社里，各行各业都有一点：农业、小型工业、手工业、修理业、教育工作、公共卫生工作——对本地培训出来的一切人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出路。

青年人从一开始就懂得真正的生活有哪些内容。他们到公社的其他部门去串门、找朋友——如果他们是工人的孩子，他们就会去熟悉农业的情况；如果他们是农民的孩子，他们也会去熟悉工业的情况。我在公社看到有生产各种消费品的工厂——生产达到出口质量的商品；也生产质量很高的手工业品。这个地区的每一个人都是公社社员，因此技艺水平很高的工匠颇不乏人，而且还有技艺学校可把水平向前推进一步。那些出色的技工就成了各自行业的专职或业余教师。有培养汽车司机和拖拉机手的专门学校，也有培养车工、机械维修工、管理小型电站人员的专门学校，而这些工种自然都是掌握一定技术的青年人所愿干的。

在我第一次参观公社之前，我听说公社有点象监狱——

丈夫和妻子分居在隔离的兵营里，都不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当然，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家庭成员同以往一样都住在一起。是设有照顾婴儿和幼儿的托儿所，但这是很解决实际问题的。也许丈夫在农业生产队里干活，妻子在一个面条厂工作。谁早上最后离开家去上班，就把孩子带到托儿所去；谁下午先下班，就把孩子领回家。我亲眼看到托儿所都管理得很好，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妇女在负责。在平时的晚上和休息日，都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我走到哪里都要访问人家。凡是我晚上去的时候，人家家里总是有孩子在。妈妈胸前抱着婴儿，爸爸膝上坐着个孩子——要是你在晚间去访问社员的家，这就是典型的景象。

公社保护家庭观念，决不是在分裂家庭。在我们的制度下，中学设在省城，由于孩子学成不愿回家乡过农村生活，家庭倒是分裂了。人们的兴趣和生活方式都改变了：公社把家庭维系在一起。它已成为新中国社会中团结一致的重要组成要素。我对欧洲的传统与概念知道得不多，但我觉得，对亚洲来说，公社真是一大发现。这是使青年人安定下来，合理地使用他们的劳动力，发展他们聪明才智的好办法。它可以防止人们向城镇盲流。象柬埔寨过去那样，城镇里很多受过中学教育的青年人只想在政府里谋个肥缺——最好是在警察和海关等能刮别人钱的机关。公社那种“互助”精神则提倡一种完全相反的精神境界。

公社有自己的商店、诊所、影院、剧场和体育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文艺团体，并且代表着几乎自主、独立的村社。公社是一个国家的缩影。由于公社在政治上做到了自己管理自

己，公社的发展就导致了有些中央政府部门可以大大地精简。不管怎么说，当今世界上许多地方让青年人感到头疼的问题，包括教育与现实生活（照理说，他们在学校里是为适应现实生活作准备的）之间的差距，在公社里并不存在，而公社正是今天中国绝大多数青年人居住、学习和工作的地方。在道德、精神和身体等方面，他们都比我所访问过的任何其他国家的青年要强一些。

在经济方面，肯定也有很大的优点——公社意味着经济权和行政权大大地分散化了——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在公社内，人们感到社员都属于一个大家庭，各个成员之间彼此和睦相处。如果说中国连续十年获得丰收而且粮食储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我认为这主要并不是由于没有出现过水灾和旱灾，而是公社制度具有抵御自然灾害的内在力量。一个公社搞的灌溉防洪工程规模之大，在其他国家是只有国营或资本主义大农场企业才搞得起来的。今天，人们无论旅行到哪里——自从1970年3月以来，我曾到处旅行——都能看到消费品非常充足，在我看来，其基础就在于公社。我相信，这种把农村组织起来的新方法是对柬埔寨很有用处的。在一定程度上，大家共同耕作、共同收获也一向是柬埔寨农民的优良传统。

为了解决美国空中侵略和西贡军队的掠夺所造成的各种骇人听闻的问题，我们将需要有许多新的设想和做许多新的组织工作。数以万计的耕牛、水牛——我们主要的耕作牵引牲口——被屠杀了，还有成千上万的耕牛、水牛作为“战利品”被弄到南越去了。因此，要克服耕畜与农具的缺乏是“必须”

进行互助与合作的。

然而，最可怕的问题之一是，有意识地对自然环境进行的一场战争。其实，那是一场毁灭我们未来的战争。柬埔寨一般被认为是土地最肥沃的国家之一。相对地说，这是如此。我们国家有三类土壤，但决不是用之不尽的：湄公河及其主要支流流域的冲积土地带；与南越接壤地带的红土地带；和马德望平原肥沃的黑土地带。加在一起只占我国领土的一小部分，而且只限于某些确定的地区。B-52轰炸机不停地进行轰炸——每三架一批，在某一密集地区投下了几乎上百吨的炸弹。其他类型的飞机也投下了各种炸弹、凝固汽油弹以及大批摧毁植物生长的化学品。这些对自然环境进行破坏的轰炸，对于土壤本身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甚至在3月18日政变以前，就已把红土地带的橡胶种植区作为一个特别的轰炸目标。反复进行的轰炸、化学战，摧毁了广大的地区，也把邻近红土地带的广阔森林区给毁了。由于树木、树下丛木被摧毁，所有的树根都死了，因而也就无法把地面表土保持在一起。等到热带暴雨一来，成千上万吨的表土就被雨水冲走了，只剩下了瘦脊的红土。永远也无法补回这些被冲走的表土，受害的地区就变成一片象撒哈拉大沙漠那样荒芜的不毛之地。这种大片的不毛之地每天都在扩展，即使立即停止了轰炸和化学战并且开始了无法弥补的换土工程，由于森林地带已经注定会慢慢死绝，不毛地带也会继续扩大。

当凝固汽油弹用来对付某种类型的冲积土壤时，土地表面就会出现一层坚硬得象石头一样的东西。在这种土地上什

么也不长。高温燃烧把土壤的分子结构都破坏了，而土壤的肥沃是靠分子结构维持的。土壤的化学成分改变了，土地也就不长东西了。对于沃土埋在深层的那种土地就更是如此。还有千千万万个弹坑，把沃土与瘦土搅混得难解难分，恐怕得花几十年功夫才能使土地变成象以前那样肥沃，如果还有可能的话。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破坏给我们的未来造成了最令人头疼的问题之一。它是搞长期种族灭绝的一个侧面。至于我们的老百姓缺胳膊少腿的又何止万千！他们对于重建家园已无能为力，但他们至少还能生育第二代来接替他们。可是土地比人更脆弱——它更容易死亡，而且连接替的东西都没有。

我们有些人以为，只要战争一结束我们就可以重新种植橡胶树，五年左右我们就会有橡胶了。情况不是这样。一旦表土散失——在大面积的地区情况已经是这样了——那就什么也长不成了。美国和它的傀儡们想不让印度支那革命人民能够生存下去。他们实际上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们打赢了而我们非离开不可，那么什么也不留给你们。你们将贫穷一辈子。倒不是因为你们缺乏勇气和精力，而是因为我们连你们的土地都不放过。”这是美国使用空军干了极其罪恶的勾当的一个方面。这比希特勒的所作所为还更坏。我的许多美国朋友要是看到了这些景象，准会毛骨悚然。在密封的屋子里把人烧死或用煤气熏死，同在光天化日之下把整个民族残害至死又有什么两样？而今天，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在做的恰恰就是后者。谁都听说过奥斯威辛和其他集中营的恐怖情景。可是尼克松却在对全体印度支那人民进行一场灭绝人性的战

争。要是说人们可以医治好幸存者的创伤，但是大自然的创伤却是永远也治不好的。我们的森林本来是世界上最茂盛的森林之一，是用了好几代人的时间才长起来的。试问怎么才能再长起来？整个生长周期被摧毁了，在广大的地区恐怕再也长不起来了。根据古代的历史记载，非洲现在的某些沙漠地区以前就象柬埔寨过去那样，一度曾是有雨的密林地帯。之所以变成沙漠，是人们的过失造成的。在柬埔寨，一切就发生在我们眼前，这是美国政策（特别是尼克松政府的政策）有意造成的，它企图通过毁坏我们的环境来消灭目前这一代和未来几代的柬埔寨人。自然环境死亡了，人当然也会死掉。

有个美国上校据说曾讲过，解决“越共”的问题就得把“整个南越都涂上一层沥青”。什么庄稼也长不了，什么生物也活不了，“越共也就会象蔓草一样凋谢枯残了”。这正是在柬埔寨使用凝固汽油弹的做法。

根据我们抵抗部队总部的报道，两年来在柬埔寨的轰炸比十年来对南越的轰炸所摧毁的东西还要多。（这些报道是1972年4月开始对南越北部进行灭绝性轰炸之前收到的。）毁灭柬埔寨所有活着和生长的东西，是根据轰炸目标地图上所标的方格子，有条不紊地对一个地区一个地区进行饱和轰炸来实现的。

也许这是由于西贡政权——它对美国空军是惟命是从的——想要消灭它的“传统敌人”？且不去说消灭它在天然橡胶方面的竞争者了。还得再加上朗诺的疯狂性在内——除了他患过脑中风之后被证明有癫狂症之外，老打败仗也使他发狂。他本来满以为一旦政变成功，他就不会有其他问题了。什么

也阻拦不住他可以当“共和国”的“国王”了。等到他发现西哈努克同他的红色高棉盟友不可避免的胜利使他的理想变成一场恶梦时，朗诺就只能对美国人说：“身后之事与我何干，把一切都给我毁掉。”朗诺和施里玛达为了保住政权是准备毁灭一切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等到他们眼看他们自己就要失败了，他们的决心甚至只会更大。就象美国人那样，每当他们失去了一个基地，他们就派飞机去把那个基地夷为平地，片甲不留。现在的情况是要失去一个国家了，所以他们就同意他们傀儡的意见，把那个国家境内的一切都毁灭掉。这就是1972年上半年所发生的情况。

举个例子，他们甚至做得出这样野蛮的事来：1971年开始用飞机在稻田里投下成吨的碎玻璃，把播种季节在稻田里干活的赤脚农民和水牛的腿划破。农民和牲口都被危险的伤口折磨得够呛。对农民的这种残暴袭击是很难对付的。美国、它的西贡傀儡和在金边的次等傀儡，彼此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危害我们国家的未来，而且危害得越久远越好。

至于说我个人的前途问题，我早已决定好了，一旦入侵的敌人被赶走了，一旦卖国贼都被彻底打垮了，我就退休。我丝毫没有继续掌权的愿望，而且我曾一再表示，未来掌握在年青的进步分子手里，他们的动机和爱国主义的纯洁无瑕是我一向都承认的，随着我们在抵抗斗争中团结合作以来，我的这种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在北京，我就和政府内部的左派成员有过长谈，也曾同英萨利——前面提到过他是早在1963年就开始改造老根据地的头一批红色高棉成员之一——有过长谈，我们对于彼此的动机和目标都很了解。有了

我们这些年青的进步分子，柬埔寨的未来就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根据那些在国内领导抗战的人们的请求，我同意继续担任国家元首。他们的请求是那样的亲切，而且又得到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我显然有责任继续担任下去。

建设国家的任务将是巨大的，而我的同胞们愿意我来出面主持这项工作，作为在抵抗斗争中形成的团结的“工作象征”。譬如说，由我来充当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之间，红色高棉分子——对于他们我已经有相当的了解——与西哈努克分子之间的桥梁，恐怕还是很有好处的。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有必要发扬团结，抛弃一切不团结的因素。

我还将把我三十年来在外交和与各国政府、元首打交道方面的经验贡献给我们的国家。对于二十六个曾经支持我们并在法律上承认我们的国家中的许多国家，我们要去进行访问。^{*}我们还要接待来访的国家元首和其他贵宾。但我决不再领导政府工作，也不再行使国家元首的行政权。充当我们团结和高棉国家的象征就够令我心满意足的了。

在柬埔寨面临两千多年历史上最大的一场考验中，给了我曾经领导我国人民走向胜利这一道义上的酬谢，这就是我的最高奖赏。

^{*} 1972年8月8日—12日在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上，事实上承认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国家已大大地增加。六十多个国家（这几乎占了联合国会员国的半数）接受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为不结盟国家组织的正式成员。朗诺的代表被驱逐了。当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国旗在大会堂前升起的时候，这是印度支那人民的历史性的胜利啊！我将率领柬埔寨代表团出席将于1974年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的最高级会议。

后 记

自从我最初写成这本书以来，事态的发展使得我感到毫无必要对它的内容作任何修改，无论在分析形势方面或在预测未来的发展方面都是如此。就有关美国干涉柬埔寨事务这件令人不可容忍的事来说，情况一直“没有改变”。但是，到了时间允许的时候，我会再为本书写个续篇。我将在这个续篇里把某些“大”国的卑鄙阴谋一五一十地揭发出来——它们力图阻挠柬埔寨人民享受抵抗斗争的胜利成果，并且不惜任何代价要在日后为他们各自的代理人谋得一个席位。也许就人口、面积和物质财富来讲，它们算得是“大”国，但是为了使一个小国屈服，它们所用的手法是何等的卑劣，它们对民族自豪和人类尊严的藐视又是何等的可恶！

我不得不提一提我 1973 年 7 月 6 日在北京的一次讲话中曾含蓄地讲到这类阴谋。这次讲话是我的朋友周恩来总理为我在 1973 年初夏访问非洲和欧洲各国归来举行的宴会上讲的。当时，关于为了结束柬埔寨冲突进行“微妙”而且“秘密”的谈判之类的谣言甚嚣尘上。在斥责了这类说法和谣言的伪善性质之后，我指出：

然而，我们已不再是慕尼黑时代了，当时，一个希特勒，一个墨索里尼，一个张伯伦，一个达拉第就能够随心

所欲地瓜分一个小小的、毫无防御力量的捷克斯洛伐克。高棉人民决不让外国帝国主义随心所欲地把“小小的柬埔寨”瓜分掉。小小的柬埔寨能够自卫到底，不惜一切代价，以保证自己的生存。

这不是光说说漂亮话而已。这是我几个月以前回到解放区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领导人一起作出了决定的结果。此外，我还抨击了所谓好心的朋友们所极力兜售的某些“解决办法”。

我在答谢周恩来总理的祝酒辞时说了，“不！”

高棉人民决不能接受“美国式的和平”——这种“和平”强迫他们放弃解放尚在美国新殖民主义手中的百分之九的国土。

不！高棉人民决不能接受“美国式的和平”——这种“和平”强迫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解散，并由一个所谓联合和和解政府来代替，也就是同卖国贼联合和和解。

不！高棉人民决不能接受“美国式的和平”——这种“和平”强迫他们“就地停火”，也就是事实上把柬埔寨分割成两部分或两个国家，或两个政府，或两个政权，即使不是永久的分割，也是长时期的分割。

到了1973年年中；柬埔寨已成了水门事件在国际上的翻版，成了史无前例地使用超级轰炸机外交的最最臭名远扬的场所。试问什么时候有过一个大国——这次是个超级大国

——公开宣称它必须继续用轰炸来屠杀平民，以加强它的谈判地位，求得一项和平解决办法，保住它自己制造出来的傀儡政权？试问什么时候有过一个大国敢断言它的国际威信得依靠继续搞屠杀人的侵略行径才能保住？试问以前什么时候有过一个大国的总统向全世界撒谎，编造出从未举行过的“谈判”、从未有过的“秘密接触”，并以此为借口来继续屠杀一个只要求自己得到自由的小国的人民？而西方各“民主国家”（碰巧只有一个显著的例外）竟会毫无异议地轻信这种彻头彻尾的欺人之谈，这对所谓“自由世界”的道德实在是太令人不能恭维了，而人们还期望我们这些“落后的”柬埔寨人把这种道德作为榜样来学呢！

那些企图掩盖水门事件的谎言，同那些掩盖屠杀我成千上万的同胞的行径比起来恐怕也会黯然失色。他们否认柬埔寨被轰炸过；否认用过 B-52 轰炸机；否认用过凝固汽油弹——这些谎言同尼克松政府的资格一样老。薛明顿参议员 1973 年 7 月 24 日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报告说，美国国会根本不知道美国早在 1969 年——尼克松当总统的头一年——和 1970 年就已经一直在轰炸柬埔寨了，这甚至是在搞掉我之前。但我当时的抗议却被他们狠狠地否认掉了。薛明顿参议员还说，进行这种轰炸的经费是根据“假借口”弄得来的。第二天，国防部长詹姆士·施莱辛格承认情况属实，不过他说轰炸是得到“最高级领导人”批准的，并补充了一个拙劣的理由——在战时嘛，“保密有时还是必要的”。唉呀，就好象是柬埔寨的抵抗部队一直在入侵美国似的！施莱辛格无意中还透露了有八十一名美国人在柬埔寨和老挝执行秘密任务时丧

命，而在报道时则被说成是在南越“边境地区”丧命的——好一个水门式的掩盖手法！

在1973年3月这一整月里，我亲眼看到了另一谎言之无稽到了什么程度：那就是说，被轰炸的“只是”北越的军队和他们的“供应线和运输车队”。我从东到西，从西到东，走遍了我可爱的祖国。我每天都听西贡和华盛顿电台播送的这类谎言，可是我每日每夜都不断地看到美国飞机，不断地听到炸弹声，只要有生命的地方都挨了炸，甚至连最边远的地区也不放过。除了金边和其他五、六个被抵抗部队紧紧包围的城市之外，我们整个国家都成了美国空军的轰炸靶子。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是一片瓦砾，到处都有弹痕累累的村庄——尽管它们距离任何供应线都很远。这些情况的本身就能把西贡和华盛顿每天发表的假公报驳斥得体无完肤。这些情况都雄辩地证明了美国违反旨在结束越南战争的日内瓦协议，而该协议曾庄严保证外界国家停止一切对柬埔寨的军事干涉行为。

我在前面有一章里曾写到，从1971年下半年起，就已没有任何北越军队在柬埔寨作战，这时，应我的请求来帮助我们训练抵抗部队的北越教官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了。尼克松总统当然可以随心所欲，无视这一事实。我曾经多次，特别是从我自己视察了解放区以来，庄严宣布：自从巴黎协定生效以来，在柬埔寨领土上没有任何一支北越或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武装部队。此外，在后勤支持方面，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严格遵守巴黎协定的第二十二条的，该条规定禁止把军火和武器运进柬埔寨。从1973年1月27日结束越南战争的巴黎协定签署之日起，我们的人民民族解放武装部队没有从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等兄弟国家得到过任何武器和军火。值得指出的是，美国新闻记者曾经引证美国驻金边大使馆的材料，证实没有任何北越军队在柬埔寨境内作战。这也不妨碍西贡和华盛顿每天重复发表他们的谎言公报。

美国国防部长埃里奥特·理查森于1973年5月7日倒是无意之中把真象说出来了——他在设法阻止国会要求停止轰炸时说漏了嘴：要是不进行轰炸，朗诺政权就会垮台。这是多么可笑的招供啊！只要美国在金边的“自己人”的独裁政权没有被接受，我们的人民就得继续忍受牺牲。而那一小撮最最厚颜无耻的卖国贼正是绝大多数柬埔寨人民所蔑视、憎恨和反对的家伙。人们得回到希特勒的时代才能找到这种野蛮的国际道德标准。事实上，他们的标准都是一样的，所不同之处，只不过是希特勒还远远没有掌握美国人手中那样多的杀人手段而已。我们柬埔寨人民绝对无法理解的是，那个所谓的自由世界面对着这种史无前例的国际匪徒行径，竟会继续保持缄默，好象是被上了蒙药似的。在早先的历史上，在执行外交政策方面，采用 Billingsgate 式的语言*是大家公认的最低水平，难道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国际水门(Watergate)事件统治的时代了吗？

关于尼克松总统的托辞——所谓如果停止轰炸的话，就会危及“微妙的谈判”取得成功。——我必须一再指出：

1. 根本就不存在这项谈判。
2. 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或个人可以代表柬埔寨王国民族

* Billingsgate 是伦敦的水产品市场，采用这种形式的语言是指措词粗鲁不堪的意思。——译者

团结政府进行谈判。(如果有人这样做了,那就是对巴黎协定的公然违反,因为协定明确规定,柬埔寨问题必须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由柬埔寨人自己来解决。)

3. 没有任何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代表同朗诺集团的代表或所谓调解人进行过任何秘密的或公开的谈判或接触。

鉴于这类报道不断出现——几乎总是从华盛顿透露出来的——我不得不重申 1973 年 7 月 19 日告柬埔寨全国人民书中所持的立场:

我作为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即民族抵抗运动的领袖,庄严地保证,宾努、乔森潘、胡荣和符宁阁下,他们是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成员并分别是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副首相和大臣,他们从来也没有同意与任何卖国贼或“对方”的任何使者进行任何接触(即使是秘密接触),他们永远也不会同意与走狗朗诺、施里玛达、英丹、郑兴、山玉成匪帮进行谈判或实行和解或妥协。

此外,我还要声明,宾努首相曾向我保证,一俟金边获得解放,他“就毫不犹豫地要求判处以下这些大卖国贼、大刑事犯以死刑:朗诺、施里玛达、英丹、郑兴、山玉成费尔南德斯(这时他已被擢升为朗诺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朗农、隆波烈……”。这些人不仅是甘心情愿出卖柬埔寨国家的独立、中立、和平与领土完整的超级卖国贼,而且也是大刑事犯,他们本人

要对我们国家的毁坏和无数无辜爱国同胞的死亡负责。把美国空军和美国、南越和泰国的军队招来烧杀柬埔寨和它的人民的，是他们。要求美国甚至在1973年8月15日以后还继续进行轰炸的，是他们。而8月15日则是美国国会规定停止支付轰炸费用的日期。

炸弹、谎言和散播“谈判”的谣言，都是尼克松总统不光彩的企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企图威吓和分裂我国人民，企图在我们抵抗部队的内部散播猜疑、引起不和。这种妄想，就象华盛顿其他背信弃义的阴谋一样，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在我到解放区去执行历史使命的期间，全国各阶层人民支持独立斗争，团结得磐石一般的事迹比比皆是。民族统一阵线是团结一致的产物，它经受了战争熔炉的锻炼，代表着我们人民团结和不可动摇的决心：扫除卖国贼，赶走侵略者，建立独立的、新型的民主生活，并充分行使我们国家主权。

无论我走到什么地方——在农民或知识分子中，在工人和从城市里走出来参加我们的斗争的公务人员中，在佛教的僧侣或我们光荣的、英雄的人民民族解放武装部队中——人们的意志和决心都是一样的。他们要我带回来的口信是：决不同朗诺一伙法西斯匪徒和卖国贼妥协！决不搞联合政府！决不停火，直至敌人完全被打垮！

当歹徒们还在挥舞权力的时候，有谁能够相信有可能建立起一种每个人都向往的新生活？尽管炸弹不断，这种新生活事实上已在解放区实现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1973年7月16日告全国人民书中警告

那些正在进行活动，或打算(或希望)进行某种活动的外国。它们显然想根据它们自己的利益——它与柬埔寨人民、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利益是相违背的——来“帮助”解决柬埔寨问题。它们必须立即停止插手，永远不要过问柬埔寨事务，柬埔寨的事务与它们毫不相关。

在我视察解放区的一个月之中——轰炸是昼夜不停的，这可决不是游山逛水——我亲眼看到我在本书前几章里谈到的那种灿烂的新生活确已成为现实。它甚至超过了我远在北京所收到的那些热情洋溢的报道。这不仅是一种真正的民主生活——人民通过自己选举的委员会决定日常的事务，而且也是一种丰衣足食的生活，尽管空中袭击是不停的。我们的抵抗政府在管理经济事务方面创造了奇迹：以前是一年一熟的稻米，现在是一年两熟；以前的荒地，现在长上了稻谷和蔬菜；以前野兽漫游的地方，现在到处是猪、鸡和水牛。（在我视察之行以后，以北京为基地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各部都已迁回柬埔寨了，只有首相宾努由于要留在中国治疗除外。已经任命国防大臣乔森潘为代理首相。至此，再也没有一丁点儿“流亡政府”的痕迹了。）

尼克松想摧毁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新生活，而且还想通过炸弹的力量来迫使我们接受朗诺一类极度腐败的新殖民主义政权。尼克松将驱使更多的泰国军队从西边进攻我们，驱使更多的南越傀儡军从东边进攻；他将会让西贡的空军来替代美国空军继续从空中进行屠杀。但是，民族统一阵线从上

到下、从下到上都下定决心继续打下去，如果有必要的话，一直打到 1976 年另一个美国总统接任时为止，或者一直打到把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的卖国贼赶出我们国家，并实现在我们自己国界以内过我们自己柬埔寨式的生活这一不算高的目标为止，不管这要到 1980 年或 1984 年或更长一些的时间才能实现。

难道这个目标不合理吗？难道这个目标如此无法无天，竟招致了要消灭我们民族的威胁？想要得到对这些问题的答案的不仅是我们柬埔寨人民，还有一切希望获得真正民族独立并有权按自己生活方式生存下去的国家的人民。柬埔寨人民深知，他们流血牺牲不仅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民族解放，而且也为了其他被压迫人民。由于许多兄弟人民——包括四十个给予我们以外交承认的国家的人民——的支持，我们的人民已有了强烈的国际主义感情。他们知道，保卫他们自己的民族权利也就是在履行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希望其他人民也努力这样做：

诺罗敦·西哈努克

于北京

1973 年 12 月 15 日

主要人物一览表

本表只包括印度支那的主要人物,按在本书出现先后为序。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1922年生,下同)

1941年4月在他祖父西索瓦·莫尼旺国王死后继任柬埔寨王国国王。1955年3月放弃王位,让位给他父亲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国王。1960年4月他父亲死后任国家元首。在这以前,多次担任过首相和外交大臣。1970年一次军事政变后被废黜。政变后继续担任流亡的国家元首兼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领导武装斗争反对在金边建立的政权。

朗诺元帅(1913)

1955年任柬埔寨陆军总参谋长。1960年任国防大臣。1966—1967年以及1969年先后两次担任首相。1970年3月政变的主要组织者。担任首相直到1972年3月11日他宣布自己为柬埔寨共和国总统时为止。他放弃了总理的职位只几天,于1972年3月13日又暂时兼任了总理。

西索瓦·施里玛达中将(1914)

1954—1956年任国防大臣兼外交大臣。1957—1958年任国防及教育大臣。1962—1964年任驻北京大使;1966—1969年任驻东京大使。1969—1972年任副首相。1970年3月政变的组织者之一。1972年3月11日至13日任首相,因学生反对被朗诺免职。

朗农上校

朗诺的弟弟。在1970年3月政变之前,组织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大使馆的袭击。以有“铁腕”手段著称,一旦他有病的哥哥不能行使职务时他就是最高领导权的争夺者之一。

西索瓦·哥沙曼王太后

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国王的遗孀。多年来任柬埔寨皇家芭蕾舞剧院院长。3月18日政变后被软禁,不准她离开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的母亲。

宾努亲王(1906)

“元老政治家”,西哈努克亲王最亲密的政治事务顾问。先后于1948—1949, 1952—1955, 1961—1962, 1967—1969年担任首相。1941年以后历任许多其他要职。1970年5月任在北京成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

莫尼克·西哈努克公主

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妻子。柬埔寨红十字会主席。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委员会委员。

涅刁龙将军(1910)

1941年以后历任许多要职,包括教育、财政、新闻、公共工程、外交等部的大臣。1954年以后数次任国防大臣和柬埔寨王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1970年3月政变前退休去法国。

山玉成(1908)

南越裔柬埔寨人。1937年任佛教协会秘书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日本在金边建立的傀儡政府首相。1945年法军重新占领柬埔寨后以叛国罪被捕并判处死刑。由于西哈努克亲自干预得免一死。最后获准返回柬埔寨,发动了一场名为反法实为反西哈努克的右派武装运动。失败后逃到泰国。几年后以自由高棉首领身分重新出现。自由高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的组织,以泰国和南越为基地,拥有自己的武装部队,声称以推翻西哈努克和他的中立政府为其目标。回到柬埔寨担任朗诺的“特别顾问”,并于1972年3月被朗诺任命为总理。

黄晋发(1913)

西贡的建筑工程师。在第一次抗法战争中任西贡—嘉定抵抗政府委员会委员。1961—1969年任民族解放阵线委员会西贡—嘉定地区主席。1969年10

月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成立时任政府总理。

英丹

原茶胶省省长。国民议会代理议长，于1970年3月18日提议用投票的方式解除西哈努克国家元首职务。后来任国民议会议长、内政部长、短命的制宪议会议长。1972年6月总统选举时，他是两个反对朗诺的候选人之一。

郑兴

原任金边中央监狱典狱长。国民议会议长。3月18日政变后接替西哈努克任国家元首。1972年3月朗诺又以高棉共和国总统的身分取代了他。

达琼将军

1959年2月发动政变时任驻暹粒省和磅同省的柬埔寨王家空军司令，在政变中丧命。

乔森潘(1930)

哲学博士，受过法国教育的经济学家。曾任国民议会议员、贸易大臣。1967年初去抵抗根据地。1970年5月任国防大臣兼人民民族解放武装部队总司令。1970年7月任王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

胡荣(1928)

哲学博士，受过法国教育的经济学家。曾任经济计划大臣。他也是1967年离开金边到抵抗根据地去的。1970年5月任王民族团结政府内政、社会事务和合作大臣。

符宁(1929)

法学博士，受过法国教育的律师。曾任国民议会议员。1967年以前历任政府高级职务。也在1967年离开金边到抵抗根据地去的。1970年5月任王民族团结政府情报和宣传大臣。

周成(1928)

在政变前任过教育与农业等部大臣的职务。还任过王家议会成员、西哈努

克亲王的办公厅主任。1968年自愿流亡到法国。1970年5月任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特别使命大臣。

陈松海

估计是山玉成的假名。

桑·萨里

1941—1958年间担任过许多高级职务,其中包括副首相、出席1954年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柬埔寨代表团成员、驻伦敦大使(1958年6月因为道德丑闻被召回)。1959年1—2月间参与了达琼阴谋事件,后来逃离柬埔寨,参加山玉成一伙,任自由高棉副头目。几年后在老挝神秘地死去。

文翁亲王(1911)

原占巴塞的统治者。占巴塞是组成老挝王国的三个土邦之一,位于最南部分。1949—1950年,1960—1962年任老挝王国首相和国防大臣,1966—1967年任宗教事务大臣。

宋双(1911)

受过法国教育的财政专家。1946—1970年间担任过许多高级政府职务,其中包括财政大臣(1945—1956年)、外交大臣(1950年)、国家银行行长(1954—1958年)、首相(1967年)。3月18日政变后被软禁,后来自我流亡到法国。

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国王(1896—1960)

1955年3月继他的儿子诺罗敦·西哈努克任国王,死于1960年。

贺宁·奔舍那

老挝政治家,和平中立党的缔造者和主席。1962年任老挝王国政府外交大臣。1963年4月1日被暗杀。

阮友寿(1910)

受过法国教育的西贡律师。1950年由于率领抗议美国军舰到西贡的游行被法国当局逮捕。1954年日内瓦协议达成后被释放。西贡—堤岸和平运

动的创始人兼主席。1954年11月被吴庭艳政权逮捕。游击队把他营救出来后被选为民族解放阵线主席（1962年）。1969年6月临时革命政府成立任越南南方共和主席。

富米·诺萨万将军

老挝右派政治官员。1959—1965年间担任过老挝政府的许多高级职务，其中包括国防大臣、内政大臣、财政大臣、文化大臣、副首相（1961—1962年）。1965年流亡到泰国。

大事年表

1941. 4. 25 诺罗敦·西哈努克就任柬埔寨国王, 时年十八。
1945. 3. 12 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在日本占领期间宣布柬埔寨为独立的主权国家。
- 10月 法国人返回后, 力图恢复柬埔寨以前的“保护国”地位, 但受到西哈努克国王的反对。
1949. 11. 8 法国给予柬埔寨王国以“有限独立”地位。
1953. 11. 9 法国给予柬埔寨以完全的独立。
1954. 7. 20 关于印度支那的日内瓦会议最后议定书给柬埔寨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国际承认。
1955. 3. 2 诺罗敦·西哈努克放弃王位, 让位给他父亲诺罗敦·苏拉玛里特, 以便专心从事政治活动。西哈努克宣布人民社会同盟的成立并自任主席。该组织在 1970 年 3 月之前的柬埔寨议会政治生活中一直占统治地位。
1959. 2. 21 达琼政变结束。政变头子达琼将军被捕并被处死。这次政变与中央情报局、南越和泰国有牵连。
1959. 8. 31 发生了漆盆炸弹事件, 西哈努克亲王、苏拉玛里特国王和西索瓦·哥沙曼王后险遭暗杀。
1960. 4. 3 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国王逝世, 产生了一场继承王位的宪法危机。
1960. 6. 14 国民议会选举西哈努克为国家元首, 从而解决了宪法危机。
1962. 7. 23 在西哈努克亲王倡议下, 在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达成了万象三亲王中立政府的协议。
1963. 4. 1 老挝中立派的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被暗杀身死。
1963. 5.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访问柬埔寨。中央情报局与国民党阴谋在金边飞机场到首都的途中炸毁包括西哈努克和刘少奇在内的官方车队的事件被破获。
1963. 11. 1 南越的兄弟独裁者吴庭艳和吴庭儒被推翻并被杀死。政变与中央

情报局有牵连。

1963. 11. 20 在西哈努克的倡议下, 人民社会同盟国民大会一致通过决议“终止美国给予的一切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方面的援助”。
1964. 10. 27 柬埔寨王国政府和国民议会警告说, 如果美国飞机再侵犯柬埔寨的领空就要断绝同美国的外交关系。
1965. 5. 1 美国飞机轰炸柬埔寨南越边界“鸚鵡咀”地区的村庄。
1965. 5. 3 西哈努克断绝同美国的外交关系。
1966. 9. 11 柬埔寨举行第一次“完全自由”的普选。人民社会同盟的领导人在选举中并未事先指定候选人。
1966. 10. 22 这次普选产生的右翼国民议会批准朗诺组成新政府。
1967. 头几个月 1966年9月选举中当选的三位著名左翼议员离开金边到边境地区的初期抵抗据根据地。
1967. 4. 马德望省三洛地区农民武装暴动, 抗议朗诺当局试图没收他们的农庄。
1967. 4. 30 朗诺辞去首相, 表面上的理由是在一次车祸中受了伤。
1967. 5. 3 宾努被任命为“紧急政府”首相。
1969. 6. 11 恢复同美国的外交关系, 以美国保证“尊重柬埔寨的独立与现有边界以内的领土主权”为交换条件。
1969. 8. 1 宾努因“健康原因”辞去首相职务。
8. 12 朗诺继宾努任首相。
9. 3 胡志明主席逝世, 西哈努克前往河内。他是参加葬礼的唯一国家元首。
- 9月 朗诺以车祸受伤为名去法国治疗。副首相施里玛达代理首相。
1969. 12. 27 人民社会同盟国民大会支持西哈努克, 反对施里玛达将银行和进出口贸易非国有化的措施。
- 29—
1970. 1. 7 西哈努克夫妇在宾努夫妇陪同下前往法国里维埃拉的格拉斯。西哈努克每两年左右都要去那里疗养一次。
3. 8 柴桢省爆发了反越南的示威。
3. 11 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在金边的大使馆遭到洗劫, 主要是由穿便衣的军队搞的。
3. 13 西哈努克亲王离开巴黎前往莫斯科。
3. 18 金边发生政变, 西哈努克被解除国家元首职务。西哈努克离开莫

斯科前往北京。

1970. 3. 23 西哈努克发表呼吁书, 号召组织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以武装斗争来推翻朗诺—施里玛达政权。
1970. 4. 24 在西哈努克倡议下, 在老挝、越南和中国的边境地区举行了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以协调三国人民的斗争。周恩来主持了庆祝会议召开及其决议的宴会。
- 25
1970. 4. 29 在爆发了群众性支持西哈努克的暴动后, 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以支持朗诺政权。
1970. 5. 1 美军从南越入侵柬埔寨。
1970. 5. 5 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北京成立。西哈努克亲王仍任国家元首, 宾努任首相。三位留在柬埔寨的左派议员乔森潘、胡荣和符宁分别担任国防、内政和宣传大臣。
1970. 7. 5 金边军事法庭进行了三天的“缺席审判”, 判处西哈努克死刑, 判处西哈努克夫人莫尼克公主无期徒刑。
1971. 3. 抵抗政府声称控制了全国五分之四的领土和七百万人口中的五百万, 包括全国一百个行政区中的七十一个, 一千一百二十九个村庄中的七百个。
1971. 10. 18 朗诺下令解散国民议会并废除现行政府制度。
12. 17 朗诺下令禁止政治集会、禁止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并停止所有宪法规定的民权。
1972. 3. 11 朗诺宣布自己为柬埔寨共和国总统, 废黜于 1970 年 3 月 18 日取代西哈努克为国家元首的郑兴。任命施里玛达为总理。
3. 13 免去施里玛达的总理职务。朗诺暂时兼任总理, 后来将总理职位给了山玉成。
6. 4 朗诺在选举中当选为“高棉共和国总统”。西哈努克否认这次选举的合法性; 两个反对派的候选人英丹和邱安也极力指责这次选举不公正。